金雁 著

从“东欧”到“新欧洲”



年转轨再回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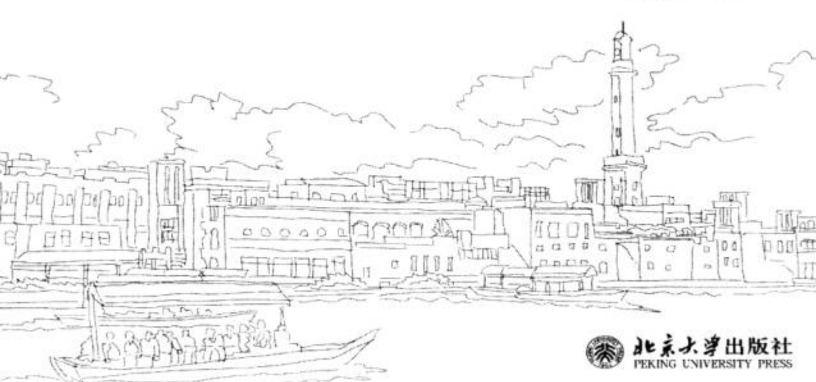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从“东欧”到“新欧洲”



年转轨再回首

金雁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金雁著．—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
ISBN 978-7-301-16833-2

Ⅰ．①从… Ⅱ．①金… Ⅲ．①经济发展—研究—东欧
②社会变迁—研究—东欧 Ⅳ．①F15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5931号

书　　名：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
著作责任者：金　雁
责 任 编 辑：岳秀坤
封 面 设 计：思想工社
排 版 制 作：思想工社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16833-2/K·0769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北京飞达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14.25印张　200千字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秦晖在波兰国家军雕像前



2009年，金雁在布拉格



1991年，金雁与波兰军队



1991年，金雁在莫斯科



2009年，金雁在柏林马克思恩格斯像前



2009年，金雁在布拉格



2009年，金雁在奥斯维辛



2009年，金雁在波茨坦



2009年，金雁在匈牙利英雄广场



2009年，金雁和矿工

前言

自2004年《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出版以来，我虽然对东欧国家转型的现状仍很关注，但这方面的文章写得少了。这首先是因为，我原本的专长是研究“苏联东欧”的历史，而不是现状，对于“苏东剧变”之前的旧体制，也主要是关心该体制“从何处来”，而不是它“向何处去”。也就是说，我主要研究的是，东欧地区（其实主要是俄罗斯）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节外生枝”地“岔”向了奥威尔描述的那种“1984年”式的体制，而这个体制怎么又会“岔”回“主干”去，应当是另一个课题。但是天赐机缘，使我于1990～1992年间在波兰学习访问，恰巧亲身经历了那场“剧变”以及剧变之后的“阵痛”时期，于是我的研究方向就顺理成章地转向了东欧的体制转轨。

现在，绝大多数前“东欧”国家的转轨已经尘埃落定，我们以《十年沧桑》一书对这一段的研究做了总结之后，虽然仍然保持着对这片土地现状的关注，但主要兴趣再一次转回到了历史。星移斗转，“十年沧桑”之后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其间，国内听闻到的消息，多以“剧变”是如何糟糕为主调。所以，“阵痛”时期的东欧报道自然很多。但在进入“第二个十

年”之后，东欧的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走向复兴，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已加入欧盟的那些国家，已经开始了一场“新欧洲追赶老欧洲”的比赛。在这一情况下，“消息人士”则似乎把视线移向他处，不再对东欧感兴趣，于是就有了所谓东欧“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说法。

从2008年冬到2009年春，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国家才再次走入国内媒体的视野。那些关于“东欧”转轨国家在此次危机中受到重创的消息，以“东欧沉沦”、“东欧危机”、“东欧陷落”、“东欧贫血症”、“东欧遭遇滑铁卢”、“第二波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等语句为标题，屡屡见于报端。另外，2009年又刚好是东欧转轨二十周年，很多朋友对此很关心，希望我们接着撰写这些国家的第二个“十年沧桑”。

2009年7月，我有机会去德国、捷克、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六国做了一次考察旅行，其中波、捷、匈、斯四国都是转轨国家，就德国而言，我们拜访的柏林、勃兰登堡、萨克森和萨克森—安哈特等州也都在前东德的地盘上。所以，除了在奥地利之外，我们的旅行基本上就是一次“新欧洲”之旅。虽然只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在转轨二十年之后，在当前的“金融危机”期间的世道民情与社会风貌。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这些国家对“东欧”这个概念很排斥。因为作为自然地理概念的“东欧”，本来只指俄罗斯，我们此行拜访的各国传统上都被视为地理意义上的中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地方也都是德国与奥匈帝国这两大“中欧强国”的版图。将这些国家归入“东欧”，只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的“冷战”时期的政治地理观念。如今波、捷、匈、斯等国均自称“中欧国家”，以区别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诸国等“巴尔干国家”以及前苏联范围内的“独联体国家”。不过，“中欧国家”这个概念与转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其中的奥地利、瑞士、前西德等都没有转轨问题），而新加入欧盟的这几个转轨国家现在又以“新欧洲”自居，以区别于非转轨国家的“老欧洲”和尚未加入欧盟的其他转轨国家。

我们的一位英国朋友对“新”、“老”欧洲的分法颇为反感，他认为这是美国人喜欢的一种说法，“他们不愿看到一个一致对外的完整欧洲”。尽管如此，我们拜访的这些国家的媒体上确实常有“新欧洲”的说法，而这些媒体未必亲美。一般认为，“考试”合格加入欧盟就意味着“转轨”大功告成，所以“新欧洲”国家主要是作为“转轨完成国家”区别于“转轨中国家”的，而不是区别于“老欧洲”国家的。鉴于这几个欧盟新成员国的情况的确有些不同于塞尔维亚这样的“转轨中国家”，我们的观感或许不能涵盖后者，所以将此行称为“东欧之旅”、“中欧之旅”、“转轨国家之旅”，确实都不如“新欧洲之旅”合适。

但是因为约定俗成的原因以及“东欧”称谓的概括性更广，国内仍习惯在行文中把“前东欧”国家统称为“东欧”，或者并没有一个明确地名称改变的“时间段”，不但“中欧”、“东欧”混着用，也经常出现“中东欧”这样的称谓。

下面的文章主要是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因为我们与该报“观察家”版的殷练有多年的合作关系，彼此都非常熟

悉，她也非常关注东欧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经验教训，总是希望我把与东欧有关的新情况介绍给我国的读者，甚至可以说，有些文章是在她的“策略催促”下“逼”出来的。我是属于那种想法挺多但落笔迟缓的人，现在想来真要感谢她，否则稍微一懒，“兴奋点”过去了，很多想法也就胎死腹中了。我把以往的文章大体上分为三个单元：上篇是“新欧洲之旅”后的感想，中篇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波兰独立90周年时写的，算是对波兰历史一个长时段的回顾；其二是谈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其三是乌克兰问题。下篇是关于东欧知识分子精神追求和思考方面的内容。

另外，这里面用了秦晖的两篇半文章。《东欧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他给《十年沧桑》一书写的自荐式的书评，收入其中是为了与东欧的前一个十年转轨做一个呼应和衔接。另外一篇《还有很多墙需要拆掉》，本来是殷练邀我为“柏林墙倒塌20周年”专栏所写的，我写了开头两段后，有别的事情插进来，实在来不及完成了，只好央求秦晖来接力完成下半段，而且我知道一旦把他拖进来，他进入“角色”后会远远比我投入，最后的成品也会胜于我的个人之作，多少年来他都能够与我共同合作写作有关东欧、俄罗斯的文章，而我对他感兴趣的题目却插不上手、帮不上什么忙，好像显得对他有些不公平，平时我写作的过程中也常与他讨论，或者写完之后让他“润色把关”。但是这次让他放下自己手中也十分紧迫的“活”，来接手我的半拉子文章，时间也只剩下不到一天了，必须得讲究方式，只好“哄”他说，我“送”你半篇文章，署名和稿费都给你了，他明知道这只不过是我忽悠他上钩的“小伎俩”，但

时间紧迫没工夫和我磨嘴皮子，赶紧接过来埋头于电脑之前，赶了一个通宵终于在“观察家”星期四排版前的最后一刻完成，把文章传走后，急忙又赶去上课。我们的这种“互助组”式的合作关系由来已久，彼此之间谈不上谁掠谁之美、谁贪谁之功，但是他付出的劳动我认为还是有必要讲明一下。

我们此次“新欧洲之旅”也去了波兰南部的维列奇卡盐矿、奥斯维辛和波兰古都克拉科夫，由于我在2008年底波兰独立90周年纪念日时写过有关波兰的文章，时间间隔并不长，所以在2009年“新欧洲之旅：回首看东欧”的那一组文章中便没有再写波兰。2008年底写回顾波兰历史的文章时，我不在北京，所以从写作到发稿都没让秦晖看，报纸出刊以后他一边读一边批评，最后他要求我，重新改写一遍，并主动说，你写上篇我写下篇，于是就有了“波兰独立之路”这样一组文章。之所以把它收入其中，是因为2010年4月10日的“黑色星期六”，波兰总统和他们的全体高层政府官员在坠机事件中全体罹难，使几乎已经淡出人们视线的波俄关系史上的历史事件又重新被拉回到现实当中，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于是我把保持了偏重历史回顾风格的有关波兰的文章放在中篇里，这一单元还有我在2006年先后写的《谁葬送了南斯拉夫：兼评米洛舍维奇其人其事》和《聚焦黑山：论黑山独立与“南斯拉夫遗产”的最后终结》两篇文章，前者原本是2006年米洛舍维奇死亡时所写，写作的动机是感到当时被误导的我国媒体上充斥着对前南斯拉夫事态的无知和对米洛舍维奇的盲目颂扬，有必要讲出真相。这种误导不但蒙蔽了公众而且也影响了我国的决策层，致使我们不断在前南问题上作出误判。最典型的就是在2000年大选前米

洛舍维奇已经众叛亲离时，我们许多人还认为他在塞尔维亚深得人心，而把宝完全押在他身上，以至于对他的垮台瞠目结舌不知所为。但是由于文章篇幅太长，当时在报纸上只发表了一部分，很多人仍不知道。以至于几年过去，最近笔者在一次会议上又提及这些事时，一位德高望重而且以思想敏锐著称的前辈还大为惊讶："就在今天上午前，我还以为米洛舍维奇是作为最后一位顽强的共产主义者而被西方推翻的呢！"他并且劝我把这些情况都发表出来，经修改补充以后我把它也收入在中篇里。

关于"乌克兰大选风波"的文章写作时间更早，可能在有些人看来这已经是一篇"过时"的文章，因为乌克兰"颜色革命"的"橙色联盟"已经瓦解，尤先科、季莫申科的一页似乎已经翻过，现在乌克兰的政治钟摆是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时代"。但是别忘了，选举政治的轮回特点、"颜色革命"的潜在能量以及乌克兰内部的"东西矛盾性"并没有因此消亡，我们一些人对这些国家选举政治的"一厢情愿"的全程式依然过于武断，所以考虑再三，还时把这篇文章收了进来。

东欧改革派和知识分子思想探索与互动关系，一直都是我关心的题目，也是我观察中国问题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参照系，在这方面我积累了不少资料，一直想等有时间写一个厚重一点的东西，但始终未能如愿。2010年初我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组关于东欧"面包时代"的文章，算是其中的部分思考，我把它们与另两篇思想史的文章编入在下篇的"前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一组文章里。

为了使大家便于理解、阅读起来不那么枯燥，我在文中配了一些图片，其中一部分是我们此次"新欧洲"之行中拍摄的，另

一部分是我平常讲课时收集起来的，希望它从视野的定格角度上对阅读起一点辅助作用。

最后要说的是因为上述大部分文章当初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编辑因考虑受众的阅读习惯删掉了征引文献和注释，我在收入书中的时候曾想恢复，但一来因为时过境迁，一部分原文已经找不到了，二来因为几种文字都有，一时间顾不上核对原文，最后还是决定保留初次发表时的原貌。若有些读者的确需要，可向出版社索取电子版的注释和征引文献。另外，一些论述因为上下文衔接的关系，与其他文章中的一些段落可能有些重复，这些缺陷和不足恳请读者谅解。

最后还要感谢为此书出版付出辛苦劳动的北京汉唐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尚红科先生和编辑李占芾先生，另外《经济观察报》的编辑秦蓓蓓亦对此书有所贡献，在此一并感谢。

2010年6月4日

目 录

上篇

金融危机后回首看东欧

中篇

波兰独立之路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

下篇

前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

上篇
金融危机后回首看东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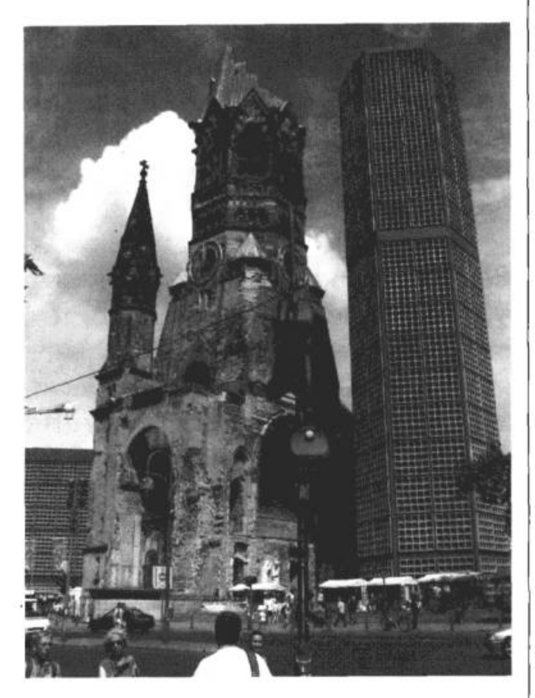

前东德

波澜不惊二十年

前东德："资本"不愿来的"资本主义"？

1990－1992年我在波兰做访问学者时，曾不止一次地去过这些中欧国家，但后来多次去俄罗斯各地，而没有机缘重返中欧。2009年7月的"新欧洲"之行圆了我重返中欧的愿望，行前我心里多少有点悬念，不知将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欧：是像剧变之初那样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的中欧？还是在"危机"冲击下一蹶不振的中欧？

我们最先进入的是前东德，除了一些苏式的街道布局中留下的旧体制的痕迹外，这里的就业、社会福利、移民等各种问题都已经和原先的西德一样，融入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过去的东德因为与西德近在咫尺，可比性十分显著，由于处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地带，故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是东欧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民众生活最好的国家。尽管如此，它当年的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职工收入为西德的1/3，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当时东德与西德的说法不同，东边说"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西边说"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东边是"勒紧裤带增加生产"，西边是建立"福利国



柏林断头教堂和当代建筑

家”的社会保障。从1945年到1961年，总人口1664万的东德竟然有350万人逃往西德，也就是说超过1/5的人口流失，而且其中许多还是各种人才。这场“逃亡潮”对东德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极大的冲击。赫鲁晓夫对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说，“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于是就有了柏林墙。但是，高墙的修砌也并没能阻隔人们对西边

的向往，从1961年到1980年，又有近20万人成功逃亡，但也有许多人"越狱"失败，喋血高墙，演成无数惨剧。1989年剧变时，东德游行队伍高举的口号就是："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为了应对逃亡浪潮，西德政府提出两边货币统一的建议，于是东德的示威者提出了一个更有冲击性的口号："如果西德马克不能到东德来，我们就到西德马克的老家去！"

于是德国政府采取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从1991年到1999年，西部向东部"输血"高达7740亿马克，为东部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前东德公民的个人存款可以按1∶1的比率兑换成西德使用的马克[①]，这为前东德提供了其他东欧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优势，于是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全面实现了经济转型。前东德因为由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包下来"买断"，因而成为整个前苏东阵营中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的一员。

但是，德国东部目前也是中东欧地区民众心理落差最大、牢骚最多的地方。道理也很简单：现在这里的人们不是将自己的生活与过去相比，而是与西部的同胞相比，这与其他转轨国家民众对于更为富裕的"外国"的感受是不同的。其他转轨国家在"阵痛期"，都曾有过民众收入一度降低的情况，但在前东德地区，虽然在"剧变"后的第一年里，大批工厂的关闭导致产值下降，但仅仅东部与西部的马克按1∶1的比率兑换一举，就使前东德居民的腰包一下子鼓起不少，购买力大大提高。前东德生产的低档（在"东欧"算是高档）"卫星牌"轿车曾经满街都是，剧变之后，一下子就被西德的高档车淘汰掉了。我们这次在柏

①（德）《法兰克福汇报》，1990年5月25日。



◂卫星轿车

林帝国教堂附近看到一辆“卫星”，众人纷纷拍照，仿佛看到了大熊猫。在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德国东部与西部差别并不大，其主要原因是，全德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东部人去西部工作，这两个因素使得人们的收入趋于平衡。

但这样的“拉平”并不能填平自尊心上的落差。前东德地区大批“低效率”的工厂关闭后，代之而起的第三产业与旅游业并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虽然统一后的德国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鼓励西部资本到东部投资，以实现东部制造业在更新换代基础上的复兴，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二十年来，西部资本在东部投资的数字看起来很大，但大多是房地产与第三产业，制造业投资并不多。

为什么呢？说来有些讽刺：恰恰是由于剧变之后德国政府通过转移支付，迅速实现了社会福利、劳工权益的“拉



▲德累斯顿

平"和收入的接近，从而使得西部的资本在东部得不到多少廉价劳动力的好处，更不可能开设"血汗工厂"，以产品回销西部。另一方面，欧洲一体化使西欧企业可以更多地使用外国劳工，而东部的专业人才又前往西部就业，所以西部的制造业企业宁可就地雇用土耳其或巴尔干诸国的蓝领和来自东部的白领，或者到比东部更贫穷的转轨国家投资，甚至不远万里到中国来输出"资本主义"，也不愿去东部投资设

厂，“剥削”那里的同胞。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生产的德国品牌的汽车现在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东德地区的产量。

对于西部企业而言，德国统一带给它们的真正机会就是全国市场的扩大，使它们可以瞄准东部人鼓起来的钱包（虽然未必有西部人那么鼓），大力推销自己的产品。这样的举动自然在两边都引起了抱怨。东部人怪西部人：“我们的企业被你们的竞争搞垮了，你们又不来投资而只是倾销商品，搞得我们没了工作”；西部人觉得更冤：“我们掏了那么多的‘统一税’来提高你们的收入与福利，使你们买得起我们的高档商品，以至于西部经济因此而减速，对此你们不感谢，反倒抱怨。说什么我们‘倾销’，你们自己不愿买‘卫星牌’，难道也要怪我们？”

“剧变后进入了共产主义”？

抱怨归抱怨，如今德国东部的面貌确实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我们在柏林下榻于泰尔托运河之畔，这里在剧变前本是东柏林南郊著名的工业区，而现在完全是一片绿化带中稀疏的独户住宅群，绿影扶疏，清波荡漾，昔日的烟囱与厂房都无影无踪了。柏林以南的各城市也在大兴土木，火柴盒式楼群构成的苏式市区很多都变成了“修旧如旧”的“古城”。易北河畔的德累斯顿是前东德第三大城市，在古代原是萨克森选帝侯的宫廷所在地。萨克森在古代曾是德国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而后来靠“铁血”政策统一德国的普鲁士，相对于萨克森而言，不啻是落后的“蛮族”，当年德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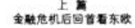
斯顿的古城要比普鲁士占据的柏林华丽、典雅得多，可惜却在二战末期著名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完全被夷为平地。冷战时期，前东德领导人醉心于工业，不喜欢"旧社会"的那一套，位于东德版图内的德累斯顿因而完全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中心。所以我最初没有将德累斯顿列入考察日程，后来列入，也只是想看看那里的"国企转制"的情况，以及这个"民主带头羊"（该城是1989年东德首先爆发民主示威、地方领导层首先转向表示支持民主的城市）二十年后的政治生态。听说要游览景点，我还想这个东德的"铁西区"会有什么可看的？无非是发发"思古之幽情"而已吧。

没想到车一开进城我就吃了一惊：没看到什么"私有化的大工厂"，更没看到街头民主的遗风，看到的却是活脱脱一整座当年的萨克森王城。美轮美奂的巴洛克式"古"建筑：圣母大教堂、茨温格宫、阿尔伯特殿、森佩歌剧院、塔什贝格宫、宫廷教堂、王家城堡……座座有古风，以黝黑的石料为材质，似乎饱经风霜，很多雕塑都被精心"做旧"，有点"风化"的模样。其实除了森佩歌剧院复建于剧变之前，其余多是剧变后这20年间复建的。圣母大教堂甚至是前不久刚刚启用。如果没有介绍，谁会想到这一大片"久历沧桑的古城"其实不久前还是"东德的铁西区"？德累斯顿如今已经以旅游、金融服务等为主业，有人说，这个当年被盛称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的城市，如今比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本身还显得古雅。

对于这样的变化，人们的评价自然是见仁见智。怀念当年工厂林立的人很失落，据说由于制造业的衰落，德累斯

顿的失业率最高时达到30%，属全德之最。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福利制度下的“自愿选择性失业”：一方面许多前东德人无所事事，另一方面大量的外国打工者充斥于蓝领工作岗位中。但与西边同胞“个人奋斗成功者”的自豪相比，许多“吃福利”的东德人仍然感到不是滋味。要知道剧变前他们的收入与购买力虽然远不如现在，但在“东方”各国中却是首屈一指、令人称羡的。东部地区的大型工厂虽然剧变后被认为是“低效率”的，剧变前却代表了整个意识形态阵营的最高水平，那些壮观的流水线、“高精尖”的设备赢得了东方“同志们”的多少赞叹！当年，西边的另一个世界他们虽然不能企望，但其他“东方”国家的羡慕使他们自视甚

▲德累斯顿市“沧桑”的古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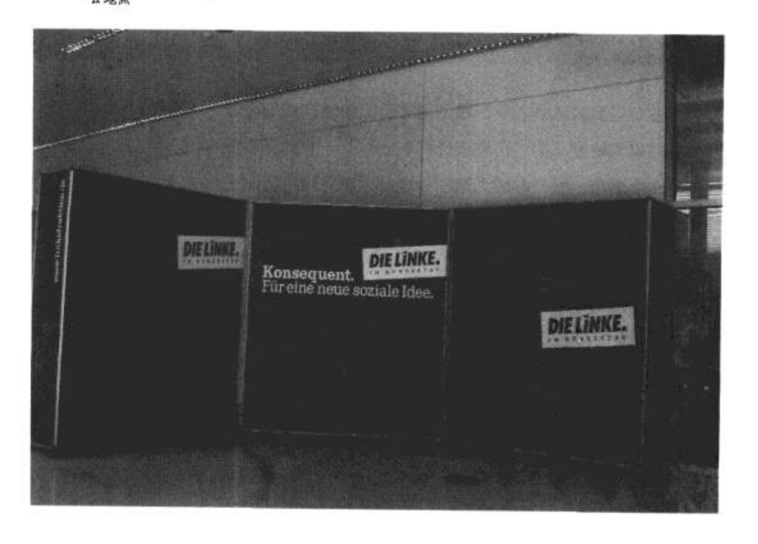


高。然而，柏林墙一倒，情况大变：西边"同胞"取代东边"同志"，变成了主要的比较对象，"比下有余"顿时变成了"比上不足"。福利再高，也有一种接受"施舍"的自卑感，他们对当前生活的满意度不如以前，也就不难理解了。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比较了13个前社会主义国家转轨之后居民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他发现，通常是1990年最高，此后虽有波动，但整体呈下降态势。在前东德地区，1990年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为6.59（1代表"完全不满意"，10代表"完全满意"），2005年则下降为6.32。这个调查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仅从这一点，能不能判定2005年的东德不如1990

▼前东德左翼党办公地点



年的呢？前东德人真的希望回到过去吗？我想大概绝大多数前东德人不会这样认为。在统一之后，许多前东德人并没有感到自己进入了西部那样的“资本主义”。一位东部的工程师自嘲说：“过去我们过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柏林墙一倒，我们倒进入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指高福利制度）了！但我们唯一没有体验到的就是‘资本主义’，因为西边的资本家宁可去‘剥削’土耳其劳工，也不愿来这里‘剥削’我们。”

说这话的当然只有东部人。因为只有他们会以“按劳分配”还是“按需分配”来区别“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在西部尽管也有这样两个词，但“社会主义”就是指“社会党人”（socialist）的主张，而“共产主义”就是指“共产党人”（communist）的主张。不少德国西部人也把他们的民主福利国家（或曰“社会市场经济”）认作社会主义，或者至少有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而“共产主义”只是过去东德搞的那一套，他们是不会把两者相混淆的。

怎样“转轨”会更好？

在许多前东德人看来，虽然这西德式的“共产主义”似乎确实比东德式的“社会主义”富裕，但他们还是对此深表遗憾。他们遗憾的究竟是什么？是想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去呢？还是不满于如今的“共产主义”而希望更深地融入“资本主义”？这是耐人寻味的。

前东德现在并没有经历制造业的复兴，工业就业率也不

高，转轨的这两个结果影响了东部人的情绪，其实如果按照另一种方式来转轨，这两个结果未必是不可避免的。比较另一些转轨国家的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假如20年前东德没有民主化，而是原来的执政者忽然羡慕起市场经济的"花花世界"来了，他们完全可以用行政手段来"招商引资"，不搞什么高福利和1：1马克兑换，更不搞西方式的自主工会，而是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和随意圈地的"优势"，以铁腕手段"减员增效"——如果是这样，西边的制造业资本不一窝蜂地涌进来才怪呢！土耳其人、巴尔干人也都不用雇了，东德的"农民工"比谁不好使唤？如果是那样的话，东德没准早发生"奇迹"了，制造业大暴发，廉价产品充斥西方，都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德累斯顿也会多出十倍的烟囱，而不是像如今这样多出许多哥特式、巴洛克式的尖顶！——只是，如果这样干，如今的东德人会更加满意吗？

其实如果这样做，不要说东德的"社会主义"完了，西德的"共产主义"也要玩完。你西德人不是要什么高福利、强势工会吗？资本都跑到东边去了，看你工人还和谁讨价还价？廉价商品从东边再冲击过来，你要不蔫了工会、黄了福利，怎么跟东边的血汗工厂竞争？所以东边不搞市场经济则已，如果搞了，但又没有民主化，那在统一市场上就难免"劣币驱逐良币"，野蛮市场经济压垮"社会市场经济"和"民主福利国家"，都是不难想象的事！

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比较维度。1990年整个东欧沉浸在政治浪漫主义的狂想中，对转轨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很多人认为只要改换了社会体制，生活便

会一帆风顺。那个时候人们的满意度高，是因为和旧体制时期相比。到了2005年，“剧变”早已成为“过去时”，而比较的参照系变成了德国西部，满意度下降实属情理之中。生活满意度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则更为明显。剧变时已过而立之年、已在原制度中建立自己的事业、尤其是已经进入官僚体制的人，对于转轨的满意度很低，所以前东德的六个州也是由前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改成的“民主社会主义党”（PDS）的大本营。现在民主社会主义党约有五六万党员，主要反映的是东部一些已经消失的国有企业的职工、干部和老人的声音，而年轻人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则与老年人截然相反。从这样的状况中能否截取出“东欧人民今不如昔，怀念远去时光”的结论，实在大成问题。

▾6·17大道



事实上，甚至如今的民主社会主义党能够反映东部弱势群体的呼声，也是剧变之后的事情。剧变以前的东德执政党，权大气粗，内有发达的秘密警察系统，外有几十万苏联驻德军队撑腰，号称是"工人阶级政党"，其实哪里把工人真当一回事？今天从著名的勃兰登堡门西望，与东边"菩提树下大道"相对的是前西柏林的"6月17日大道"，这条西柏林最宽广笔直的大道的名字，就是纪念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工潮的。当时东德大批工人示威，抗议当局提高劳动定额却不涨工资，东德当局开枪镇压，酿成血案，成为冷战时期整个"东欧"第一起大规模民众抗争事件，也是后来民众大逃亡、政府不得不建起柏林墙圈禁民众的缘由。如果这个党真的是靠工人的选票上台，它怎么敢这样对待工人？[1]

"马克思大街"上的思考

如今，民主社会主义党确确实实是靠弱势群体的选票生存了。二十年来他们兢兢业业，为自己的选民谋利益，在民主政治中站住了脚跟。他们的根基仍在前东德地区，尽管在这"东部六州"总体上他们的支持者也是少数，但在一些市镇，他们已经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在一些东部州，他们也开始与社会民主党等其他左派力量合作而崭露头角。而在剧变之初，由于其背负着历史包袱，其他"民主左派"曾经很长时间与民主社会主义党划清界限。德国主要的左派党社会民主党，至今也没有在与民主社会主义党合作的问题上

①（德）赖因霍尔德·安德特等：《倒台——昂纳克问答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158页。

松口。但是在东部各州，面对右派强大的势力，当地的社会民主党在前些年就已经开始与形象大有改善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合作，以扩大左派的政治空间。最典型的就是德国首都柏林市，现任的市长是社会民主党人，副市长是民主社会主义党人，可以说是个左派市政府了。当然，这种情况在“新欧洲”并不罕见，宪政民主体制下的政党轮替在这里已经成为常态。比如波兰和匈牙利，在剧变后的二十年间，“前共产党人”或由共产党改组而来的后继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主持中央政府，均有好几次先例了。比起他们，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成就算是小的。

在当今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无疑是对现行转轨方式最不满的政治派别。但是他们也并不主张回到过去，其实柏林墙就是在他们还在台上时被推倒的，昂纳克等“斯大林主义者”也是被他们开除的。他们已经告别了极权主义，但并没有告别马克思主义。而对本文前面讲到的“另一种转轨方式”，他们会更有好感吗？最近我们的一位左派朋友曾到柏林访问过他们的一些活动家，据他说，本是想向这“兄弟党”传授经验的，但令他大为吃惊的是，还没来得及开口，对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你们的一些做法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吗？你们的一些政策工人能同意吗？……这位朋友于是感叹说，真没想到他们落到了这步田地，还如此教条而不知变通！

但我却想，当年的东德执政党又何尝是完全按照马克思主义行事呢？而在今天的德国，为了独揽大权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的势力还能存在吗？今天这些左派人士凭着那些“落

伍”的理念能否赢得选举并掌权，固然难说，但起码他们的真诚能赢得一部分选民。如果他们毫无原则，还有谁会把选票投给他们？从另一方面讲，在今天的德国，用不着看谁的脸色讲假话，只要是自己真信，又不强迫别人，“教条”一点又何妨？

来到前东德地区，我的一个发现是，这里在“剧变”后，并没有像一些国家（如俄罗斯）那样，发生大量更改地名的事。除了萨克森州的“卡尔·马克思城”恢复了开姆尼茨的传统城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发祥地萨克森—安哈特州的维滕贝格前面加了个“路德城（路德施塔特）”的前缀（现在该城正式名称为路德施塔特—维滕贝格）之外，其他前东德时期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地名都没有改。我们下榻的勃兰登堡州小镇克伦马克瑙就有一条卡尔·马克思大街，我们住的酒店门前是托马斯·闵采尔大街（闵采尔是



洪堡大学主楼内镌刻的马克思名言

16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德国农民战争领袖，是一位受前东德意识形态推崇而与西部的主流价值观并不契合的人物），但是剧变之后这些街名都没有变。进入柏林东部，保留下来的地名就更多了：如卡尔·马克思大街、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倍倍尔广场、李卜克内西大街、卢森堡大街、蔡特金大街等，如今都保持原名。马克思恩格斯广场上的马、恩大型塑像也仍然耸立，接受左翼民众的瞻仰。甚至洪堡大学主楼正厅内也仍然镶嵌着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俯视着来往楼内的莘莘学子。当然，这些左派名人都是德国人，外国人就未必受到这样的待遇了。东德曾经有一个"斯大林城"（斯大林施塔特），现在叫做艾森许滕施塔特，不过那是赫鲁晓夫时期就改了名，不是剧变后改的。如今，即便在社会主义国家，似乎也没有以斯大林命名的地名了，倒是在"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巴黎，现在还有一个斯大林格勒广场。

我们的一些朋友看到这些地名，大概又会惊呼起来，引为前东德人民"怀念过去"的证据了。但是我们还是有点平常心吧。曾经的极权体制下，左派上台就要消除右派痕迹，右派上台就要消除左派痕迹，这都是不知哪个年月的老黄历了。今天的东柏林当然仍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新欧洲"各国也都是如此，也许他们有朝一日也会通过选举"重新"上台执政，但是他们不可能再像在1953年6月17日那样对工人搞"专政"了。——这就是我从"马克思大街"走到"6月17日大街"时的感想。





中东欧金融危机与融入欧洲问题

2008年秋后"全球金融危机"开始打击中东欧地区，因此我们的"东欧之行"最大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危机下这些"新欧洲"国家的状况。在各种媒体一片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中，我想我见到的两位同胞在当地的切身感受是首先值得一提的。这两位在东欧都已好多年了，其中一位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开餐馆，据他说，危机以来他的生意确实颇受影响，匈牙利人的消费比过去谨慎多了，他的中餐馆2009年上半年的营业额大约萎缩了20%。

另一位是在捷克的布拉格做中国产日用百货批发生意的，他同样感叹现在生意难做。但其中的涵义却与前一位大有区别：据他说，转轨初期捷克市场商品紧缺，人们收入也低，因此廉价的中国百货卖得非常火，那是他的黄金时代。可是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捷克人手头越来越阔绰，市场商品也越来越丰富，中国的廉价商品就越来越卖不动了。他的市场也从相对富裕的首都布拉格，逐渐转向了捷克的相对贫困地区如俄斯特拉法、乌斯季等地。"那么现在碰到危机了，布拉格人手头又紧了吧？他们对中国货是不是又感兴趣了？"我问。"哪里，我在这里就没有感到什么危机，我今年的货还是只能批发到俄斯特拉法去。"他说。

这两位同胞的直观感受与宏观经济形势应当是合拍的：

经济危机对“新欧洲”的影响在各国差别很大，在匈牙利比较明显，而在捷克则比较缓和。

在捷克、波兰不多的几次与当地学者的交谈中，我们就当前比较突出的“金融风暴”和“入盟”后的变化提出了下列问题：1．经历了金融危机，你们是否认为过去“越开放就越好”的战略是错误的？左派是否通过这次经济危机开始对自由市场反思？2．加入欧盟后的政治、经济状况如何？入盟的政治目标达到以后，社会共识、政党凝聚力是上升还是下降？3．经历了“东倒（靠向苏联）西歪（融入欧洲）”以后，你们自我认同的理念如何体现？尽管只是几个学者的看法，而且有些观点难免偏颇，但听听他们的见解对我们还是有益的。

他们如何看待金融危机？

由于捷、波、匈各国本身的国情差异，加上各人的个性区别，他们关于金融危机影响的回答是五花八门。概括起来有如下内容：对危机形成的原因，有的认为是因为年轻人和美国人一样过度“透支消费”的“寅吃卯粮”造成的，使消费支出大大超过了实际经济能力，导致国家大量举债，中欧的外债共达1.7万亿美元，几乎每个国家的外债总额都超过GDP比例的50%。有的认为是金融体系自身的漏洞导致经济萧条，世界金融秩序在这次风波当中的重组调整就是要提高调控能力，这与转轨国家的私有化制度改造、融入欧洲是两码

事。还有的甚至同意俄罗斯总理普京的说法，说是由于中美两国造成的，美国不负责任、毫无节制地滥印钞票，中国以向全球销售廉价商品把其他国家花的钱聚敛起来。总之，大部分人都倾向认为，金融危机的确对各该国造成了影响，但并不是根本性的、不是来自体制内部的，不是转轨战略造成的，与转轨国家左右派的价值理念也没有什么关联。

从目前看，新欧洲的增长速度一直比老欧洲的快，现在双方的差距是在缩小而不是拉大。从经济增长水平看，2001～2003年中欧八国的经济增长率是3.1%，比欧盟15国平均高1.7%，入盟以后的2004～2006年平均增长率是5.3%，比欧盟15国高3.1%，2004～2006年新入盟八国投资增长率比欧盟15国高4.7%。即便是金融危机状况下，“新欧洲追赶老欧洲”的趋势也没有中止。新欧洲的发展仍要好于老欧洲。显而易见，新欧洲成员国是“欧洲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

在危机发生的2008年，老欧洲的德国、法国与意大利“三巨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1.3%、0.7%和－0.6%，而新欧洲的波兰、捷克与匈牙利虽然也减速了，但仍然分别达到5%、4.2%和0.9%。到了2009年1月末，欧盟再次调低今年预期，德法意今年都将是负增长，分别为－2.3%、－1.8%和－2.0%，而波捷匈则分别是2.0%、1.7%和－1.6%，只有匈牙利出现了些许负增长。尽管现在看来情况可能还要严重一些，但老欧洲比新欧洲更麻烦的局面并未改变。无论是这些数字，还是我们在各国市面上得到的直观感觉，都与所谓东欧国家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的“又一次多米诺骨牌”之说相距太远。

而且危机影响主要反映在卷入金融投机的富人中，对底

层社会影响更小。以退休人员的状况为例，据欧盟统计局7月份公布的数字，2009年，退休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英国是30%，德国是17%，法国是13%，而捷克只有5%。尽管这个所谓贫困线是各国国内的相对指标，并不意味着捷克人就比英德法人更富，但也可见受金融冲击直接影响较大的是老欧洲，而不是新欧洲。当然受大环境的影响，中欧国家2009年的经济减速也是现实存在的。而危机影响的强弱与当年的转轨方式有明显的关系。如当年主要采取向全民平均分发资产证券的方式搞私有化的捷克，以及采取工会全面参与、“雇员私有化”程度较高的波兰，当时曾由于外资参与较少、经济缺乏活力而颇受非议，但恰恰由于其金融国际化程度低，这次受冲击就比较轻微。而当年采取“只卖不分、价高者

▾ 布达佩斯



得"、"面向外资全卖光"的方式搞私有化的匈牙利与爱沙尼亚，当时经济更为活跃，但由于金融国际化十分彻底，如今就成为此次"新欧洲"受危机冲击最大的两个国家。看来什么方式都有利有弊，很难说谁的模式就是最好的。

但是，正因为这些国家各自的做法其实都是在转轨后民主体制下、民众自己在多元政治的各种主张中投票选择的结果，所以民众对这些选择也有足够的承受力。当年波兰人、捷克人并没有因经济不如匈牙利有"竞争力"而向统治者兴师问罪，今天匈牙利人也没有因本国的危机比邻国更严重而怨天尤人。即便他们觉得当年的选择有问题，现在改主意了，到选举时另选别人就是了。因此即便在危机相对最严重的匈牙利，政治、社会依然稳定。在"危机中的布达佩斯"你看不到"街头政治"，"极左派"也并无崛起的迹象，人民基本上都在平静地等待"危机周期"的过去。这和当年完全靠经济高增长建立独裁统治合法性的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繁荣时期矛盾还掩盖着，"亚洲金融危机"一爆发，老百姓的日子一受影响，顿时民怨沸腾、天下大乱的状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这些国家，危机具体造成的影响大体可以排列为，对富人的影响大于穷人；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大于本国企业；对短期投资影响大于长期投资；对出口行业的影响大于内销企业；对老欧洲的影响大于新欧洲；它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大于实际影响。但是它已经使中欧企业的国际融资减少，外销订单萎缩，失业人口上升，通胀压力增大。这其中最大的因素是西欧国家的金融业首当其冲受到危机打击，为了保证本国银行的资本流动性，母公司会

从中欧的子公司抽取资金，导致流动性不足危机传导到这些国家，尤其是像匈牙利这样银行业基本“外资化”的国家受冲击尤大。其次，在金融业萎缩影响实体经济后，西欧的失业率上升，便会减少对中欧国家劳动力的需求，这对罗马尼亚这样入盟后借人员自由流动之便、很多人在西欧打工的国家不利。最后，西欧消费下降导致那些制造业发达而且依赖出口的国家遇到“外需屏障”，捷克面临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但从目前看，中欧国家失业率都没有达到1990年代转型危机时的那种高峰，而老欧洲和新欧洲的就业率基本持平。

解决上述问题，尤其是西欧资金撤离问题，就是要求欧洲这条大船的“船长”，不但要顾及“头等舱”也要顾及“二等舱”和“三等舱”，因为船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受损都会导致大船的倾覆。新欧洲既不应该是“老欧洲的弃儿”，也不是这个统一体中的“贱民”，而是与老欧洲利益互补的共同体。2009年有两个“关键词”很流行：一个是“integrated”（一体化），一个是“solidarity”（团结）。



◀ 象征欧洲的大船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各国彼此联系越来越紧密，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一枝独秀，孤立的国家更难对付这种世界性的危机，换作中国的语言就是"聚则兴，散则败，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冰岛就是一个例子，金融危机之后加入欧盟的呼声更高了，而不是更低了。2009年3月21日欧盟27个成员国在布鲁塞尔举行特别首脑会议，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克服新老欧洲之间的矛盾。这期间9个原东欧成员国也单独举行了会议，为反对保护主义而统一步伐，他们向老欧洲发出了不能有"丢卒保车"狭隘考虑的警示。

在"老欧洲"国家中，这次法国萨科齐政府显得比较小气，他在搞贸易保护方面的动作时，就受到中欧国家的一致反对，被认为是一种"逆一体化"的"经济铁幕"。而有趣的是：西欧为了减少原东欧地区廉价劳动力与廉价商品的冲击，早在"新欧洲"各国入盟"考试"时就设置了很高的"福利门槛"和"劳工权益门槛"，以严防"血汗工厂"的"低人权优势"在经济一体化中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威胁到西欧"民主社会主义"传统下的福利国家体制。这些门槛之高，往往比自由贸易之类的"资本主义门槛"还难迈过。因此，"新欧洲"各国的入盟过程其实与其说是西欧向东欧输出"资本主义"的过程，毋宁说更像是向东欧输出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那一套。无怪乎入盟谈判期间前波兰总统瓦文萨曾不满地说："他们多年来鼓励波兰建设资本主义，到头来他们自己却是共产主义者，真不知道为什么。"[①]而法国就是当时他批评的对象。

当然，这种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绝非东欧过去

①（美国）《新闻周刊》，转载自《参考消息》，2005年12月28日。

那种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一切由官僚说了算、工人只有开展“忘我劳动竞赛”来向前者“无私奉献”的份。在这种西欧式的“社会主义”下，欧洲一体化后劳动力虽然可以自由流动，为自己的利益而“用脚投票”，但企业必须让外来打工者成立工会与自己进行集体谈判来保证其权益。这种体制既不允许本国工会搞针对移民工人的排外行动（在移民本身有组织、有诉求能力的情况下想要排外也不易），也不允许企业利用一盘散沙、毫无博弈能力的外来廉价劳工建立“血汗工厂”，排挤本国工会会员。甚至西欧企业到东欧投资也必须按这个规矩，不许在劳工没有集体博弈能力的条件下设厂。因此，东欧劳动力在全欧统一劳动市场上虽然仍然有工资要求较低的“廉价”优势，但并没有不能讨价还价而只能任人宰割的“低人权优势”。

说实话，这种“社会主义”也确实有其“虚伪”的一面，因为西欧人本来是为自己的劳动者（其实就是本国选民）、而不是为东欧的“阶级兄弟”设计这套制度的。因此在经济繁荣时期由于就业率较高，在不影响本国公民就业的情况下西欧人并不会严格计较这种“门槛”，没有组织工会而仍在“老欧洲”打工的东欧人那时并不少。但是危机一旦来临，就业形势严峻了，西欧工人阶级就要用这“社会主义”门槛把东欧的阶级兄弟挡回去了。

而这种做法在今天“新欧洲”的危机中起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就国内而言，入盟时按这些“社会主义门槛”建立了民主福利国家体制的新欧洲地区都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在这里不仅本国公民，甚至外国人如果有较长期的合

法居留身份，也能享受相当高的福利。我就听到一位同胞对他一家享受的各种补贴津津乐道地大讲了一通，根据他的计算，仅他太太生孩子一项，产前产后婴儿期各种补贴加起来约有7~8万欧元。说完还骂了一句："这么大锅饭！怪不得他们这边的人这么懒。"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条件下老百姓抵御危机的能力自然较强，经济危机几乎不可能导致社会危机。

另一方面在国外，一些"老欧洲"国家在危机期间动用"福利门槛"和"劳工权益门槛"挤兑东欧劳工乃至东欧产品的做法也引起了"新欧洲"的批评，而这种批评正是根据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新自由主义反"保护"理论。于是出现了个吊诡的现象：我们称为"资本主义危机"的这件事似乎没有使"社会主义话语"盛行起来，反而使"新自由主义话语"更流行了。

中欧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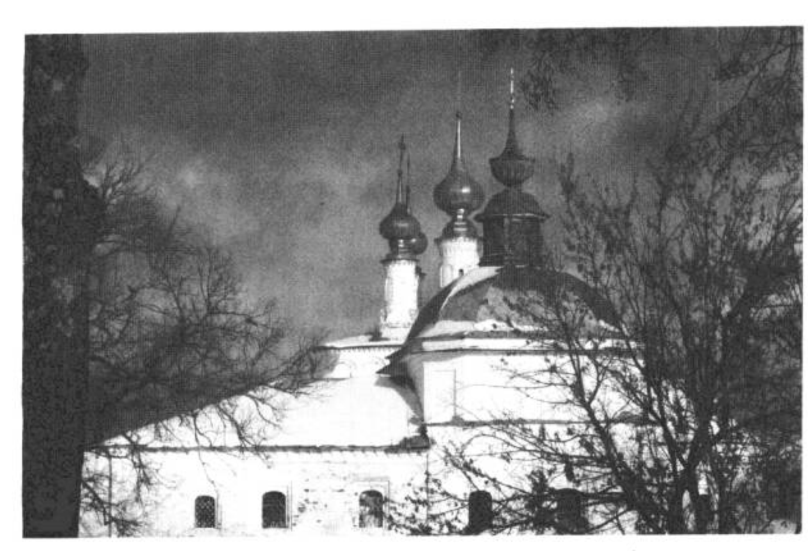
具体来讲，中欧各国都出台反危机政策以减少来自西边的连锁反应，或加大社会保护的福利政策，或动用一系列干预手段加大投资、增加就业、刺激消费，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保住工作岗位，刺激经济发展"。一般的做法是：生活（其实是消费）优先于生产、居民收入优先于财政收入。如以受到金融冲击最大的匈牙利为例，它的具体做法是下调个人所得税、延长退休年龄、增加贷款、扩大就业，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为匈牙利贷款251亿美元，政府减少财政开支2千亿福林。即便明知在2010年的议会选举中，他们可能面临下台的危险，社会党仍然承诺2010－2011年再分别减少5500亿和6500亿福林政府开支，并在2009－2010年连续18个月里向建筑行业投资80亿美元，当时的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在3月22日的党代会上说：处理危机和深化变革需要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支持，有人说我阻碍变革，没有获得多数，那我现在扫除这个障碍，我建议建立一个新政府，选出新总理，2008年1月我就对社会党主席团说过，如果一年内我们不能提高支持率就考虑新人选的问题，现在我们的支持率下降了。那么就由社会党提出新的总理候选人。匈牙利议会选举在2010年，现在的解决办法是不提前议会选举，而是由执政党社会党改推其他人任总理，久尔恰尼继续领导社会党。左派政府明知回旋余地十分有限，只能硬着头皮在民意声望剧减的条件下“挺过难关”。匈牙利社会党的久尔恰尼2004年任国家总理，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2006年连任，在他执政期间匈牙利的财政赤字大幅度下降，从2006年的9%降到2008年的3%，但是增税和削减开支使他的支持率降到18%的历史最低点，几乎完全重复了1994－1998年第一轮社会党执政时期搞“休克补课”的财长博克罗什的境遇。捷克在2009年2月16日通过总额达700亿克朗（31亿美元）相当于国内总产值的1.9%的一揽子计划，旨在防止经济衰退和保住5－7万个岗位，并用于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投资。波兰、斯洛伐克也出台相应的“救市政策”，为解决危机而“买单”。德国政府向证券市场提供5000亿欧元的经济援助，并投入4760亿欧元重组银

行，对资产在百万元以上的80万富人直接征收1.5%的税收。

另外也要协助西欧早一点渡过危机，在统一欧洲的共同利益下，使它们尽快摆脱危机、恢复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波兰原有人口3800万，现在减少到3600万，就是因为有200万人常年在西欧打工，他们的欧元收入是波兰相当一部分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和可观的外汇收入。在我们看来，入盟以后新欧洲和老欧洲的关系，就像同在一个大欧洲合众国里，有点像中国内地省份和东南沿海发达省份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资金与劳力互补的类型，中国由于出口业的萧条，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浪潮，中欧国家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打工难"的局面。概括起来看，受金融危机影响最甚的是匈牙利，接下来是斯洛伐克，波兰次之，捷克较轻。

与我们的交谈者中，很少有人把目前出现的问题归结于本国经济转轨制度设计以及入盟的结果，他们均认为现在的困难既不是内因问题，也不是当初策略选择的错误，在他们看来，新自由主义者的效率追求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公平追求是可以共存的，所以不会动摇融入欧洲向西靠的步伐和欧洲一体化的决心。他们举的一个例子是，俄罗斯不存在与"欧洲一体化"的问题，但是仍然未能避免经济下滑，其幅度之大超过中欧，2008年11月，仅一个月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就缩水了288.7亿美元，使卢布急剧贬值。2009年1月份俄罗斯工业生产值下滑16%，创历史新高，2009年前7个月俄罗斯的工业生产在去年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了14.2%。如果说新欧洲是因为融入老欧洲而受到"连带危机"，那么强烈反对"北约东扩"的俄罗斯又是受到来自何方的影响？难道也是老欧



▲ 俄罗斯教堂

洲影响了它？这只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在全球经济危机下谁也不要幸灾乐祸，这场危机既不是“历史的终结”，也不意味着传统左翼会获得大发展；第二，市场越大日子就越好过，只有像朝鲜这样的国家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它们面临的是另一种“危机”。正如捷克学者兹拉塔·切尔维娜所说，我们需要继承的是人类共同的遗产，而不是某个派别哪一种主义的传承，最小的代价最快的捷径是人们的一种理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任何民族在学习过程中都不可能一点“学费”都不交。

与"西边同志"价值观"错位"的中欧左翼

新欧洲的左翼既不同意西欧一些共产党认为这场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可以趁机提出一个"左翼纲领"，再掀起一个"重新国有化"高潮的观点，甚至无人知晓2008年11月底十次世界共产党国际会议上发表的《圣保罗宣言》中所说的通过这场危机证明了"社会主义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替代选择"的说法。正如我们在《十年沧桑》一书中曾经提到的，中欧国家原来由共产党改名重建的社会党，不仅已与原共产党的过去决裂，而且比起他们的西欧同志来，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更加趋同，他们自己已经不再使用"左""右"

▾ 德国左翼党会议厅



的概念，更反对使用“左派复兴”、“红三角”（指议会、总统、政府均为左翼人士）之类的概念。中欧“许多执政的前共产主义者比右派更急于实行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阿尔巴尼亚的社会党人纳诺所说：“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既不是为了迎合左派，也不是为了迎合右派，而是由现实的需要所决定的，我们必须在务实主义和平民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一来由于中欧国家的左派原来是共产党人出身，他们急于摆脱过去的“历史包袱”，生怕别人说他们无法与“苏联模式”划清界限。二来是巨额的赤字与空虚的国库使社会党无法实施其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计划，资本极度稀缺的状况也使社会党难以实践其劳动优先、节制资本的思想。在资本稀缺而劳力相对“过剩”的条件下，劳方在谈判时地位相对虚弱，左派政府作为社会协调人难以坚持“劳动高于资本”的原则，转型期间便出现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几乎所有社会党执政的国家，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的水平都很差，而至少在匈牙利这样的国家，社会党复出后这一水平甚至比右派执政时更差。

延续到现在中欧国家左右派互相体现的价值理念与西欧相反的奇特现象依然存在，比如在西德，基民盟赞成大学收费，社民党反对，基民盟坚持传统的家庭观念，社民党强调男女平等、支持堕胎和同性恋，基民盟追求自愿的福利政策，社会党希望实施公民保险，等等，不一而足，它们都表现的是一种传统的“左派争福利右派要自由”的价值理念。而与西欧国家社会党是“小人物的保护者”、是福利政策的倡导者不同，在中欧常常是左派要搞市场经济，右派在争福

利，或者说，左派说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实践的却是自由主义，而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旗往往是由一些具有教会立场的右翼组织高举。这方面匈牙利、捷克都十分典型，在匈牙利搞私有化最积极的不是与战前传统密切的右翼的安托尔政府，而是1994～1998年上台的社会党政府，霍恩政府"面向外资全卖光"的政策，一年里卖掉的企业远远超过前任的右派政府四年的总和，社会党政府也是"加盟入约"最积极的倡导者，甚至提出"谁耽误入盟谁就是国家的历史罪人"这样的口号。每一届左派政府上台以后，不是提高劳方的谈判地位，而是大搞货币财政双紧缩，大砍社会福利。

在捷克，右派体现左派价值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自由主义的典型的"右派"政权克劳斯政府，一方面私有化大刀阔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与"福利国家"的政策却超过东欧大多数"左派"执政的国家。在"大众私有化"时期捷克的失业率不升反降，在整个90年代前期维持在2%～3%左右，不仅为东欧最低，在全欧也为就业最充分的国家。这一时期，捷克以实际平均工资与人民消费均高达43%左右的增长在东欧拔了头筹，在克劳斯主政的八年里竟然没有一家大企业破产，社会福利事业为预算开支的最大项目。而奉行社会民主政策的"老社会党"上台后热衷压缩、取消前任的福利开支。新欧洲这些转型国家的"价值错位"、"阵线颠倒"、"角色互换"往往让很多人犯糊涂。2002年，当时的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就公开宣称："乔治·布什的政策就是我的政策！"听到这些言论不但令西欧的"社会主义同行"大跌眼镜，也往往出乎我们国内人士的意外，感



▲ 克瓦希涅夫斯基

觉他们不但不是“左派”，反而像一些执迷不悟的“大西洋主义者”。正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巴富瓦尔也感觉到的，“颇为荒谬的是，重新当政的前共产党人往往实施的被认为是来源于‘右派’或者‘中间派’政党的自由化政策”。[1]不论是在国内的政治经济转型问题上，还是在“回归欧洲”问题上，他们都比国内的右翼更加积极，即使是在金融危机过程中，这个决心一点也没有动摇，除了个别“新社会主义者”和极小的从来不可能进入议会的“斯大林派别”外，几乎没有一个左派组织反对过私有化、反对过“加盟入约”。

就入盟前后的比较来看，2004年以前在入盟问题上左中右高度的一致，甚至是“左派比右派积极，民间比政府积极”，但在这种急迫“入盟”心情下的社会共识不会永远维持下去。从1997年到2002年欧洲连续六年进行了各项指标的审查打分，入盟以后等于“定期考核评估”合格，努力的结果达到后整个社会都松了一口气，捷克学者兹拉塔·切尔维娜说，我们就像一个备考的学生，经过了长期准备考试被录取后的状况一样，有所懈怠是正常的，目标实现就不需要精神长期绷得那么紧，现在的状态是正常的，即便有金融危机也没有对这个努力有什么怀疑，先期入盟的国家被证明是符合1993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优等生”条件的，看看排在后面的南欧的巴尔干国家——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波黑、黑山等等就知道，想要迈入“欧洲大家庭的门槛”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匈牙利左派政府甚至把能从欧盟拉来资金作为考核政府官员的重要指标。

①（法）弗朗索瓦·巴富瓦尔：《从“休克”到重建——东欧的社会转型与全球化一欧洲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40页。



▲ 亚当·沙夫



▲ 哥穆尔卡

对"融入欧洲"的历史思考

现在人们对这些新欧洲国家的概括是，"一个国家、2～3大政党、5～6家（外资）银行、7～8家（外资）企业"，可以说工业生产、金融资产的80%被外国人买走，民族企业已无立足之地。对于这个说法当地的学者基本予以承认，他们强调中东欧国家都是小国，仅从一国的范围看市场和发展前景都是有限的，国民收入的很大部分需依赖外汇渠道创值，国家的建设需要仰仗大国的物质力量。用波兰著名学者亚当·沙夫的话说，这是一些需要"同别国结盟的国家"，是"依附别国的国家"。一直以来中欧都是一个走廊，一个政治的十字路口，一个地缘政治的"断层带"，是几大势力争夺的矛盾集中点，东西方对峙的前沿。中欧人都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为自己的独立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但很长时间以来不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就是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下，或者在沙俄帝国的统治下，1918年终于在凡尔赛体系下赢得独立自主地发展，但仍摆脱不掉欧洲大国的影响。二战前夕波兰沦为《苏德秘密条约》中的筹码，捷克成为西方绥靖政策的牺牲品，匈牙利的霍尔蒂政权因加入法西斯阵营的轴心国而在战后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可能，这些国家在《雅尔塔协议》的大国博弈下被强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成为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中"冷战策略中的棋子"。

采取哪种社会模式根本就由不得本国人民的选择，1947年波兰当时就是否要搞社会主义进行过全民公决，"只有7%的人投了赞成票"，哥穆尔卡也说：共产党在1945年以

前影响不大，缺乏社会基础，“波兰不能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1]但是苏联1948年强制推行的“莫洛托夫计划”根本就不顾及“东欧”国家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探索。正如亚当·沙夫所说：“很清楚，当时波兰根本不要这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所以后来波兰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不受欢迎的革命，况且这一革命来自对波兰进行了150年瓜分和奴役的国家。”我们“已经有了错误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所谓现实社会主义的垮台就是明证”。[2]“就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动”。[3]波兰人都知道著名的兰普遗言是：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在波兰将被推迟几代人的时间。历史上的亡国之痛，苏联强加给他们的斯大林模式这一历史积怨一直沉淀在民族意识深层。



▲ 戈尔巴乔夫

1956年和1968年，匈牙利人和捷克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力图挣脱苏联的控制，各国共产党也曾经为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的多样性做过努力，都被苏联人以“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分子”的罪名加以清洗。虽然在社会主义时期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仍无法和西欧的发展速度相比。不要说东欧国家，就是苏联自身的发展也无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据推算俄罗斯在1913年人均国内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28%，到1990年苏东剧变前为美国的25%，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这73年的发展和美国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所增大。这种苏联领导集团的道义危机终于在戈尔巴乔夫给东欧带来的宽松的政治氛围中爆发。这些国家二战以后处在苏联大党主义、服从苏联利益的不平等状况

①（波）《新路月刊》，1947年第1期。

②亚当·沙夫：《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新型社会主义》，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年第4期，第3-9页。2001年第1期，第3-11页。

③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5页。

下，必然会把摆脱苏联的控制与否定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

而他们认为，现在西欧是稳定的民主社会，在文化上与中欧又有一致性，向西靠的结果一定会强于原来在苏联体制下。文化上的归属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长达40年的受压制使他们向西靠的决心很大，这些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上纳入欧洲范畴，他们认为这是保持地缘政治稳定安全的保障，与欧洲实现一体化不仅是基于文化的考虑，也有政治经济上需求。在安全真空的情况下，他们担心自己被留在这个"已被抹掉的地区"，生存环境的毫无保障，东边的俄罗斯持有"核武器和能源"两大武器，随时都可以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沿着历史惯性向外寻找新的安全保护伞和支撑力，民众对加入北约的支持率和积极性之高超过政府。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格局下，波、捷、匈、斯这些第一方阵的国家都表现得很"亲美"，匈牙利为要求美国在其境内建立反导系统和雷达站而与波兰、捷克展开竞争。

虽然都强调"一体化"，捷克、波兰、匈牙利的表现仍有不同，俄国人以前就对这三个国家有过评论：波兰由于和俄国之间历史积怨太深，相互的不信任短时期内是不可能化解的，波兰人的"兴风作浪"决不是历史的巧合。捷克人很像德国人，冷静、理智、谨慎，没有想明白的事情不会盲目去做，一旦下定决心便会很投入。匈牙利做谁的学生都会很努力，当年的霍尔蒂被希特勒称为"好学生"，1948年拉科西自称是"斯大林最好的学生"，而如今谁都知道，匈牙利是欧盟中的"优等生"。

积怨甚深的俄、波关系

波兰人自己说，他们介于两个曾操纵世界命运的大国之间，好几次都濒临灭亡，但每一次都顽强地活了下来，靠的就是不屈不挠的英雄主义精神。亚当·沙夫说，每个波兰人都知道，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是：上帝、尊严和祖国。波兰民族的社会特性十分明显，贵族民主和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历史造就了波兰人造反派性格和个人主义特性，它很容易发展成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无政府主义，它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波兰诗人诺尔维德曾经这样评价过波兰人的民族性格："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和世界上最糟糕的社

▼ 毕苏斯基塑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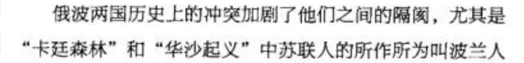


会。”波兰人以具有非凡的战斗精神在欧洲闻名，越是打压反弹性就越大。在历史上德国人也伤害过波兰人的感情，但是在波兰人看来，德国人在民主制度下已经有洗心革面的表现，而“俄罗斯尚未准备好接近历史问题的实质”，向西靠强过向东靠，向西可以寻找到安全和经济稳定，向东则要为自己的政治前景担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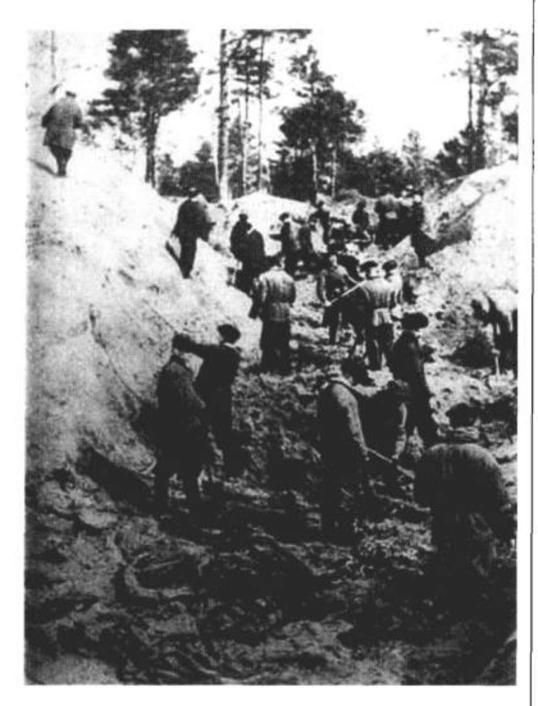
历史上沙俄的三次瓜分，抢走了波兰62%的土地和50%的人口，20年代的苏波战争中毕苏斯基在华沙城下痛击托洛茨基领导的苏联红军，使波兰人把毕苏斯基视为民族英雄和“国父”，而让斯大林对此耿耿于怀。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斯大林解散，30年代有2万波兰共产党人被苏联人杀害，因为在苏联人看来，一旦战争爆发，维护波兰利益的爱国主义者，很可能同德国人勾结而反对苏联，波兰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对苏联是十分有害的，必须把它们彻底根除。根据《苏德秘密条约》，1939年9月3日，希特勒从西面闪电战攻入波兰；9月16日，60万苏联军队从东面包抄波兰，导致了波兰第二共和国的灭亡。所以亚当·沙夫说，波兰的“社会主义是进口的”，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干部，是苏联人培养起来的，他们不可能具有群众基础，因此1980年团结工会兴起以后，一个几百万党员的党，好像一夜之间在平地上消失了。“当时统一工人党内的改革派试图接受反对派的民主选举原则，然而据非官方的民调机构反映，统一工人党大约只有3%的支持率，于是他们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卡廷森林”事件枪决令文件



俄波两国历史上的冲突加剧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尤其是“卡廷森林”和“华沙起义”中苏联人的所作所为叫波兰人



◂ 卡廷惨案

无法原谅。这些留在波兰民族记忆当中的历史成为抹不去的伤痛，波兰人说，西德的勃兰特能在奥斯维辛为德国人犯下的罪孽下跪，表示他们的忏悔，而苏联人从来没有为华沙起义、卡廷森林正式道歉，我们并非要现在的俄罗斯人为历史上的事件负责，历史无法改变但不应忘却。2004年俄总军事检察长萨文科夫向媒体公布说，在卡廷森林中枪决的人数是

180人，而不是1.5万人，关于种族灭绝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再次激起了波兰方面的强烈愤慨。历史宿怨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魔杖，苏东剧变已经20周年，但波俄之间的不信任没有根本性改变，在波兰人看来，重新审议历史是现实的基础，俄国人则坚持"不翻历史旧账"，双方在历史问题上仍有不小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波兰的亲欧洲、亲美国就是必然的，所以波兰积极支持美国在中欧建立反导基地，而且主动要求在本国领土上建立反导基地，2010年5月23日作为提高北约盟国防空力量的一部分，首批爱国者PAC-3反导防空系统抵达波兰。

21世纪后，两国之间的龃龉似乎也是有增无减，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参加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纪念活动，当时的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也没有参加5月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盛大阅兵活动，普京在讲话中也没有提及波兰人为战胜法西斯做出的牺牲和贡献，这在波兰民众中引起强烈的愤怒。作为回应，当时的华沙市长卡钦斯基要把一条华沙的街道改名为车臣将军"杜达耶夫"，莫斯科官员则威胁说，要把莫斯科波兰大使馆所在的街道改名为"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大街"（波兰1863年起义的镇压者）。波兰议会通过决议称："卡廷森林事件"是第三帝国和苏联人之间的共谋，为的是消灭"波兰最有价值的和爱国的公民"。2004年波兰积极涉足乌克兰的"颜色革命"，普京在该年底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波兰总统应该更加关注波兰的国内失业和国债问题，克瓦希涅夫斯基立即回应说：我无悔于我们对乌克兰所做的一切，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作为



卡廷惨案

报复，2005年6月，俄国国家杜马通过一项联邦法律，将每年的11月4日定为国家解放日，为了纪念1612年11月4日米宁和波扎尔斯基大公率领民兵把波兰侵略者赶出莫斯科。因俄罗斯禁止进口波兰肉类，当时欧盟轮值主席芬兰总理万哈宁前往华沙调停，未有成效，波兰否决欧俄谈判签署《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这种双方来回之间的外交动作表明，近年来俄、波双方之间仍无法消除分歧与隔阂。正是由于在波兰看来，俄罗斯这种苏联思维方式，不得不使波兰加速向西靠的决心，因此波兰的融入西方主要是基于外交、战略目的。

2010年4月10日，波兰总统卡钦斯基罹难，[1]这一“黑色星期六”事件使双方的关系有所改善，但愿他们能够放下历史上的恩怨纠葛有一个新的发展前景。

①参阅：《对话金雁：大空难后看波兰》，见《经济观察报》，2010年4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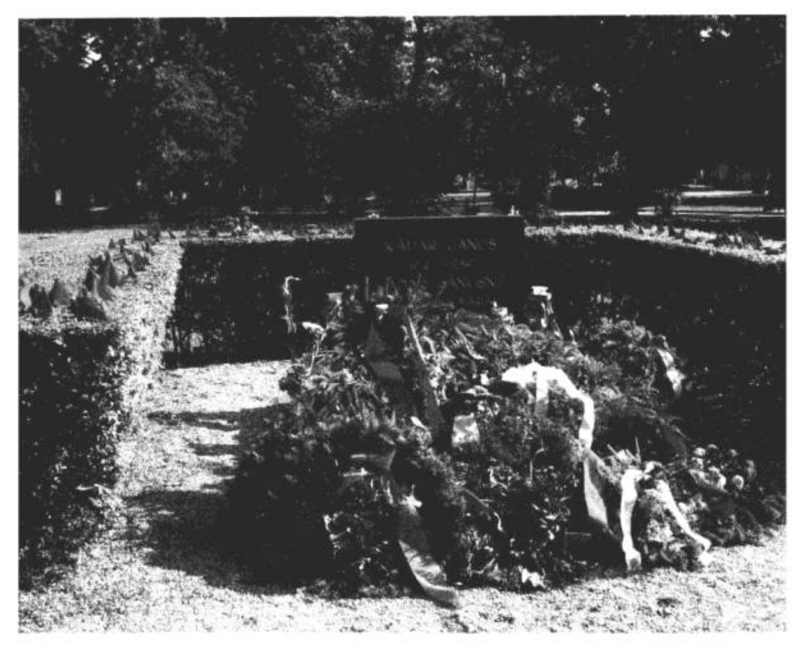
基于现实考虑的匈牙利选择

1989年剧变之前匈牙利就经历了几起几落的改革历程，而每一次都与国际政治环境休戚相关，苏联多次迫使已经启动的匈牙利改革刹车，他们深知外部条件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在临去世前接受记者提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摆脱别人，走自己的路"这一问题时说，外部环境太重要了，我们从来与苏联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千百万匈牙利人、党内反对派、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为此而奋斗过，我们无法做到在所有的方面是自由的"，[①]屈从于苏联是不得已的选择。卡达尔的临终心声虽然有为他自己在"1956年事件"当中的"反戈一击"行为辩护的嫌疑，但苏联的大量驻兵和压力气场使东欧的多少次改革

①参阅卡纽·安德拉斯：《卡达尔遗言》，报刊出版社，1990年。



卡达尔 ▸



▲ 卡达尔墓地

付之东流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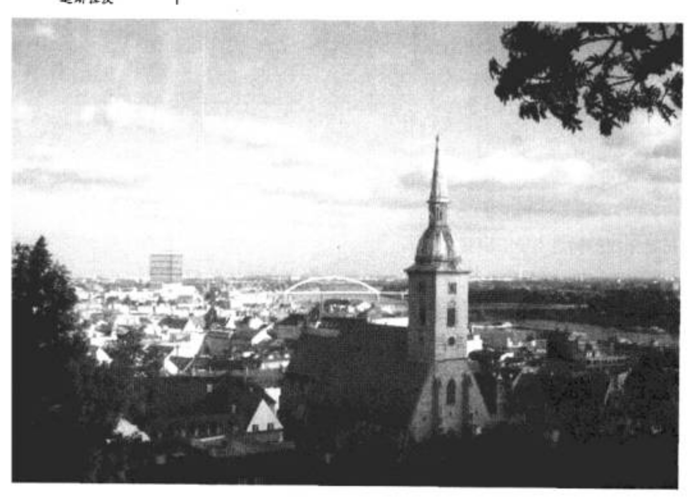
剧变后匈牙利很快成为经济上最彻底的“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的国家。在经济转轨时期采取的“面向外资全卖光”的战略，就如何看待国家利益方面，匈牙利也曾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坚持民族主义的右派政治家对此举仍心存疑虑、十分担忧，把国有企业全部卖给外国人，“匈牙利还是匈牙利人的么?”“匈牙利人还有自己的民族经

济吗？"他们担心以后匈牙利只能成为西方经济的原料加工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无异于沦为它们的经济殖民地，充其量只能从西方国家在匈的经营成果中分得一杯羹。另外，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政治上成为西方的附庸。但同时他们也承认这种一步到位地找到"最终所有者"的方式在经济改造方面是一种捷径。"左派"政府认为，根据共产党时期的教训，乘现在俄罗斯地位相对软弱提供的历史机遇，应尽快地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一体化，这样做不仅仅是加入欧盟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而且能尽早实现国家安全，[1]当时的总理、社会党主席霍恩甚至说："错过了机会将是历史性的犯罪。"[2]这种生存安全感逐渐成为趋于主导

① "匈牙利社会党纲领声明"，见《东欧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296-372页。

②（匈）《人民自由报》，1996年5月8日。

▼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



地位的社会共识。

匈牙利首先力争在立法方面与欧盟协调一致，这方面它在转轨国家中是最突出的，由于在共产党时期匈牙利的“偷偷摸摸的改革”以及转轨20年的努力，使匈牙利曾被西方人称之为“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愉快的屋子”，[①]现在匈牙利95%以上的法规法律达到了与欧盟趋同的标准。匈牙利社会党政府经济部长说，“市场开放最大的国家也就是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实行苏式计划经济，和外部的接触仅仅局限于和几个共产党国家进行被迫与扭曲的合作，结果造成了与世界经济隔绝的局面，并使本国的经济永远处于落后的状态。在加入北约、欧盟的大趋势下，融入欧洲是早晚的事，何况从历史上看，东欧这个走廊，不是向东就是向西，对外依赖性一直就很强，现在通过私有化过程提前进入欧洲“一体化”应视为好事。他们也愿意接受以国外资本为主导的国际分工、在全球化进程中被动定位。从过去接受“大家庭”分工到现在接受西方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反正都是分工，“观念转变并不难”。而且未来在大欧洲范围内，民族国家的淡化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匈牙利的向西靠是很明显的主动迎合，在他们看来，多元化、市场化、北约化是“三位一体”的。

①（法）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224页。

捷克："非共产主义化"的价值追求

对捷克来说，它不像波兰那样与俄罗斯有很多历史宿怨，也不像匈牙利人那样主动的靠拢，捷克人一直就以谨慎周全著称，与其他斯拉夫人相比，捷克人是以"冷漠、谨慎、现实、温和"的作风著称，哈维尔有一句名言："捷克人是没有热情的民族。"1938年德国入侵捷克，捷克人选择了不抵抗，因此1945年德军从捷克撤退时对布拉格老城没有进行任何破坏，使布拉格成为二战后唯一保存完好的首都，就连与斯洛伐克分家也是温和的"无过失离婚"，这和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之间残酷的种族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我们在《十年沧桑》一书中所强调的，捷克曾经有过发达的工业，曾跻身于十大工业国，可是1948年以后实行苏式计划经济的结果，到60年代便使其在世界工业国位次降落到第十二位，人均产量落到第五，生活水平已明显低于本来远不如它的奥地利。到了1989年，奥地利人均国民总产值达17820美元，排名世界第十二位，而捷克只有不到5000美元，它不仅不如奥地利，更落到了巴西、西班牙与韩国等之后，退出了主要工业国行列。



捷克国父马萨里克（1850－1939）与捷克特色的外交策略缔造者贝奈斯（1884－1948）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奠定了一种小国生存之道的"捷克模式"。马萨里克认为自己是"胡斯精神"的传承者，他创建了一种基督教式的人道社会主义。他于1887、1889、1910、1917年多次去俄国，两次访问过托尔斯泰，持一种靠近立宪民主党立场的社会民主理念，俄国二



▲ 马萨里克



◂胡斯像

月革命后马萨里克曾致电临时政府的罗坚科与李沃夫，并多次发表声明支持临时政府，反对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马萨里克在1920、1927、1934年三次当选捷克总统，被捷克人称为“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执政的哲学家、工人之友、人道主义者”。马萨里克也多次去过美国，他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苏俄与以“自由主义的语言”体现“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的美国作过比较，明显地偏爱后者，“美国模式”是他心中的理想，他把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捷克的实践相结合，试图探索一种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结合体，可以说马萨里克是最早的“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马萨里克提出的公正、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观念，可以称其为20－30年代的“社会民主党自由主义化”。因为亲眼目睹了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剪除异己的斗争手段，在他执政期间一直对“苏维埃化”和“布尔什维克化”保持高度的警

◂胡斯像

惕，因此在"马萨里克主义"里的"非共产主义化"色彩十分显著，而自称秉承了马萨里克思想精髓的"老社会党"在执政时期自然要与一切带有前体制的思想拉开距离，正是由于这种历史传统，捷克是中欧转轨国家中至今唯一的一个前共产党的后继党未能在民主制下"重新"上台的国家。

秉承二战以前马萨里克与贝奈斯的理论资源一直是剧变后捷克政坛的主流，当初克劳斯设计"证券私有化"就是牢记了"贝奈斯公式"的精髓，想给捷克留有余地，不要那么快地一头扎入西方的怀抱，他多次告诫捷克民众不要对西方的所谓"小马歇尔计划"过于当真，凡事应该基于自己的能力，况且还有苏台德问题没有解决，至今他还经常发表言论抨击当过欧盟轮执主席的托波拉内克对欧洲一体化过于热心，而且表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捷克不打算加入欧元区。2009年10月9日，克劳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自己批准《里斯本条约》的条件，要求确保不会导致二战后没收



捷摩共办公大楼 ▸



◂政券私有化持有人登记证内页



◂证券私有化持有人登记证封面

苏台德人财产的“贝奈斯法令”失效，方才批准《里斯本条约》，对此，欧洲媒体评论道：“在欧洲的政治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像克劳斯这样对欧盟进行毫不掩饰的批评。”所以克劳斯在新欧洲国家中被称为坚定的“疑欧亲美派”。捷克的选择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一直到2009年11月克劳斯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批准了《里斯本条约》。



▴克劳斯



拉贝河大桥上的"贝奈斯法令"

来自俄国的军事压力

这些国家一个共同的最大忧虑就是国家安全问题，他们的军队和武器装备在俄罗斯面前不堪一击。21世纪俄罗斯的核武器装备进入快速发展期，尤其是2008年8月俄格冲突，致使格鲁吉亚在2009年8月退出独联体。2009年俄国修改了《2007－2015年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要求提前到2011年完成纲要规划，并大幅度增加2009年度军费开支到500亿美元，比2008年增加27%。俄计划2015年至少建造7艘单价9亿美元的核潜艇。2007年7次军事航天发射，2008年6次军事航天发射，到2016年新型"伊斯坎德尔—M"系统装备5个导弹旅。目前971型（豹）核潜艇完成第一阶段的航行试验。新型"阿库拉"2级已开始海试。2008年第三代核指挥系统已完成

升级，智能系统已在炮兵服役。2009年首次亮相的S400射程可达400公里，该导弹在精确度和飞行速度上比美国的“爱国者3”更优越。空军计划批量装备“苏-35”战斗机，2008年7月在莫斯科郊外的茹科夫斯基飞行研究所机场进行了展示飞行，“苏-35”属于“4++”代战斗机，作战性能超过“苏-30”、“苏-32”、“苏-33”等“4+”战斗机，是国际战斗机市场上的尖端，俄空军计划在2010年批量装备空军，它作为俄空军从第四代向第五代的过渡机型。未来五年还要研发第五代战机，实现防御信息保证、杀伤、指挥控制三大系统的无缝对接。所有这些举动让中欧国家都不寒而栗，他们庆幸已进入“安全地带”，至少从理论上讲没有谁敢于进攻欧盟成员国。

▼俄罗斯“苏-35”战斗机



老欧洲的动力和阻力

欧盟的宗旨是"为欧洲人民日益密切的联合奠定基础"，并最终实现"人民欧洲"的目标。对1亿多欧洲新公民和约占欧洲1/3的新领土老欧洲也有一个发展认识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地张开双臂的，它经历过一个从"封闭关门"到转变立场"开门接纳"的"欧洲集体认同"的艰难过程。90年代初，当波、捷、匈、斯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提出"回归欧洲"的口号时，欧共体的态度是怀疑和警惕的，一直到1994年的时候，欧盟还专门规定，除信奉基督教的波罗的海诸国外，排除所有信奉东正教前苏联共和国入盟。正如波兰媒体人所批评的，老欧洲一直维持着它的封建架构，害怕"蛮族"占领它的地盘，自己打算退到"核心欧洲"的内城去。[①]只是当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战火在欧洲蔓延时，西欧国家发现"隔离政策"不是上策，这才重温起俾斯麦当年的策略："谁拥有了日耳曼人到俄国人之间的地带，谁就拥有了欧洲。"从此立场开始转变，对"统一欧洲计划"逐渐积极主动起来，并由此设立入盟标准、定期评估制度和"择优录取"。但即便如此，每个入盟国家都经历了入盟联系国、入盟候选国以及欧盟成员国三个阶段，波、捷、匈、斯经过从1997年到2002年连续六年的评估，到2004年才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欧盟有一整套帮助候选国改造其国内制度的政策，如果申请国有严重违反民主原则的行径将被推迟接纳，这无疑对想入盟国家的制度改造是一种激励。欧盟主席巴罗佐曾说，欧洲将更注重结果，而不是意识形态，它更少

① 参阅尤尔根·哈贝马斯等：《旧欧洲、新欧洲、核心欧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174页。



▲ 巴罗佐

一些理想主义，多一些现实主义。欧盟2007～2013年的文化大纲中把2008年定为“跨文化对话年”，注重“多样性的统一”、“文化整合中的合作”，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老欧洲也有意识地建构集体认同，培养年轻成员国公民对欧盟的归属感，这种积极姿态对新欧洲无疑是一种鼓舞。

从老欧洲的战略眼光看，新欧洲一方面是他们的屏障，老欧洲对军事实力强大的俄罗斯有所担心，因此他们需要新欧洲的入盟作为他们东部的屏障。但是正因为他们隔得比较远，在另一方面他们好像又比新欧洲对于俄国人的提防心理要淡得多。因为新欧洲就是原来的前东欧国家，由于受到苏联几十年的干预、控制和压迫，他们当然对这一段历史感受更深。他们往往觉得老欧洲国家还不足以保护他们不受外来的侵犯。新欧洲有一些国家对被老欧洲的出卖是有历史记忆的，比如说捷克人对于慕尼黑的这个事情是有很深的感受的，对欧洲的“不信任感”一直铭记在心，“胆小、妥协的欧洲”，一到关键时刻就会缩回到自己“乌龟壳里”的欧洲让他们对老欧洲又爱又恨。因此，新欧洲与老欧洲相比，他们除了对欧洲感兴趣以外，对北约，对美国，拥有比老欧洲相对而言更多的兴趣。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说这个新欧洲比老欧洲更亲美。

但是在整个欧洲统一的过程中，应该说这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那么欧洲统一在更深层次上，它意味着人类的组织，以及世界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探索。欧盟，大概是世界上现在唯一的一个纯粹基于自愿联合的过程发展起来的超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因为以往我们讲的，超国家的治理体

系，像联合国也好，更早的国联也好，其实都是建立在实力政治基础上的一种协定。它本身其实缺乏真正的治理能力。而欧盟不同，有些人说，它的前景就是发展为所谓的欧洲合众国了，尽管离这一步很远，但是欧盟的主权化倾向我们大家是看得很清楚的。

具有民族国家体制和观念冲突的问题，这个过程应该说一方面它可能是一个长远的趋势，另一方面这个过程肯定也是曲折的。包括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到《申根协定》，欧洲一体化好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最近几次欧宪公投受到挫折，又预示着今后的一段时间，可能这个欧洲一体化还需要消化已有的成果。今后的一段时间它的步子恐怕还不能迈得很快。民主国家在今天的这个全球化体系中，已经越来越面临着很多不适应，因此欧盟这个超国家治理体系，无论是成还是败，都对人类的未来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东欧和西欧的这个关系，乃至新欧洲的加入，应该是这个实验非常重要的一环。

跨国的问题需要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平台上来解决，人道主义干预、国际警察行动或经济援助需要通力合作，至于在“保护民族认同与一体化的矛盾如何克服”这个问题上，主动权在老欧洲，新欧洲更急于一体化，而老欧洲对“保护民族认同”担心更大，2005年，法国人、荷兰人就对“欧宪”说“不”！他们担心“欧宪”生效会造成民族和文化主题性丧失。由于有大量的非法国人进入，法国人在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从而使法国的民族和文化发生变化，德国也有同样的担忧，日尔曼人的生育率极低，甚至是负增长，而在德国的

土耳其人的高生育率将在不久的将来改变德国的人种。现在欧盟的27个成员国里，波、捷、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已经形成西斯拉夫人的文化体系。入盟是一个相互磨合的过程，它的内聚力与合作前景可能还会有反复，要使新老成员国都从一体化中受益，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共同体。正如欧洲50周年的《宣言》中所说，“不断的合乎时代要求变革的欧洲的政治构成”是欧盟未来的政治责任，它需要全体欧洲人共同智慧的探索和实践的检验。



03

“新欧洲”发展中的新动向



▲ 哈维尔

中欧国家加入欧盟以后，人员交流便利频繁，就像同处在一个大欧洲联邦里一样，他们在国际体系变动中对自己的身份认定是"欧洲国家"，因此普遍对"东欧"这个概念很排斥，更不喜欢"后共产主义国家"和"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这样的称谓，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就说："我承认，我越来越厌恶这种说法，对我们的这种称谓，即使只是一个前缀，也不要跟随我们一辈子，就像我们不能把美国叫做'前英国殖民地一样'。"他们希望尽快地融入欧洲，而目前一些老欧洲国家出现的问题在新欧洲也初见端倪，另有一些新欧洲自身带有时代特色的新趋势，都可能成为影响未来新欧洲走向的新风向标。

政治冷漠化与传统政党危机

目前新欧洲国家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政治冷漠化。中欧国家普遍出现组织危机、信仰危机、执政危机的现象，现在新欧洲国家与20年前的"泛政治化"现象发生很大变化的是"政治冷漠化"。剧变以后政治多元化，法理性权威只能从制度结构中获得合法性，它与原来的旧体制下集权体制不同，既不是依靠政治垄断，也迈过了个人魅力阶段，因此民



◀ 布尔诺集市

众对政坛人物的兴趣减弱，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对本国的政治人物熟悉程度远远不如我们这些“旁观者”。国家主义弱化的趋势使得传统政党组织的人数减少，现在整个欧洲社会的参选人数都有降低的趋势，政治冷漠化，公众参政意愿低，弃权者比率高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各中东欧国家从剧变初的80% - 90%的参选率降低到现在的40% - 50%，以保加利亚为例，1990年的投票率是90.6%，1994年减少到74.3%，1997年进一步降为62.4%，2009年7月5日的议会选举参选率达到60.2%，已经是近年来这些国家选举中最高的，波兰2005年的选举的投票率只有40.97%，2009年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斯洛伐克只有19%的投票率。

这一方面说明人们的政治热情降低，无所谓谁在台上，另外，在上述国家都经历6 - 7次议会选举和4 - 5次总统选举后民众的热情递减，向务实化发展，不看执政者高喊什么

口号，而是看他们怎样去做，老百姓已不热心什么各个党派的价值理念，而认为不论是哪个党派在台上，"社会公正"才是最重要的。在他们看来政党交替这么频繁，人员轮换像走马灯一样，党派的内讧和政治人物的摩擦不断令人生厌，在老百姓看来，反正又不是社会制度变更，只不过是一些政客之间的"游戏"，不值得去捧场。而目前中欧国家的左派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偏左，政治实践偏右"的特点，竞选时说的和上台后做的有区别，因此说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另外，宪政民主本来就会导致平庸的状态，过去热衷于政治的"泛政治化"现象是极权体制下导致的非常态，1989年剧变以后、尤其是2004年入盟，证明他们已符合老欧洲的《阿姆斯特丹条约》的入选国的政治改造标准，已经融入"欧洲价值"，在"人权、民主、宪政"的制度平台搭建以后，参政意愿降低将会是一个普遍趋势。

同时这些国家"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它在分享国家权力的同时也给传统的治理模式造成冲击。在当今的"媒体社会"中"国家无所不能"的时代结束，"强政府"时代结束，政府的频繁更换，使它从原来与国家重合的身份中剥离出来，入盟后更带来了"国家虚拟化"、"国家弱化"和"去权威化"的思潮，国家不再一言九鼎，不再至高无上，国家的控制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都大大减弱。社会上自治类型组织在逐渐填补以前政府所承担的某些功能。公民团体人数增加，比如波、捷、匈转轨国家的NGO都在呈几何数般地增长，且资金来源复杂化和价值取向个性化。主流政党受到不小的冲击，甚至对政党实践的评判标准都发生了改变，人



◂享受阳光的母子

们不再像过去一样靠参加某一个政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在多元文化下单一的核心价值已丧失魅力。以第三部门力量为主的“新社会运动”成为一个潮流，它的特点是数量剧增、短命、多元、转换快、混杂世界观的政治行为成为时尚，以前政治精英一直处于远离民众生活的地方，而现在的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嬉皮文化、摇滚乐文化、俱乐部文化、广场狂欢文化都在把政治诉求和娱乐文化融为一体，解构了原来政治的严肃性和传统政党的凝聚力，不但使其成为一种青年人追逐的时尚，而且也逐渐被整个民众所接受。

“网络时代”的强势劲头

现在网络政治大行其道，网络的快捷、立体、高效、强度大、频率高、传播广、成本低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威力，很快成为年轻网民参政、议政、问政的一个重要场所，

每个人既是意见表达的主体也是信息渠道的传播者，它已成为"信息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目前任何党派都无法忽略网民的话语，网络舆情成为一个把握社会脉搏，了解民情、民意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同时也获得了更宽阔的国际舆论空间。比如捷克在2009年10月的大选造势活动中，网络就是一个主要的宣传平台。捷克各主要政党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争取选民，他们通过网络发布其政党纲领、治国方针、新闻公告、消息发布、视频博客回答选民问题以及读取、跟随、综合舆情，再发布消息，使信息在短时间内无限地扩大，虽然传统的街头宣传手段也仍然在使用，但其资讯传播的手段、速度、规模和生动程度都无法与网络相比，政府传统的正襟危坐、板着面孔喜欢教训人的官方媒体被"边缘化"的趋势在所难免。

网络文化越来越在城市青年中普及，它打破了信息沟通的障碍，尤其是在精英阶层和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力，一般来讲在中右翼政党中更有基础，形成"右强左弱"的态势，比如捷克的公民民主党、波兰的"公民纲领党"、俄罗斯的"右翼事业党"，网络的普及率和调动能力都很高。网络使那些传统政党受到挑战，从目前看由于左翼政党更适应较封闭的社会环境，其群众基础又主要集中在年龄偏大的群体中，他们的宣传动员和造势仍然采取传统因循守旧的街头宣传方式，逐渐对年轻人丧失吸引力，另外，网络化程度的高低与政党的活力以及年轻化程度成正比，它将成为今后政党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当然网络非理性情绪宣泄的迅速传播也容易诱发一些非正常的事态升级，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像一些新纳粹组织就是利用网络与德国的组织遥相呼应、聚集闹事、遥控指挥。网络既是舆论监督的有利武器，也是民粹主义得天独厚的非理性诉求场所，网络既维护了大众的权利，也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生存土壤，因为网络是虚拟的，就像给现实中的个人套上了“隐身衣”，个人情绪的宣泄很容易突破法律框架和蔓延出社会秩序，而跨过公共领域去侵犯私人权利。

剧变时期和转轨期间出生的80后、90后政治诉求与上一代人有明显的不同，他们之间阶级界限、职业区别已经模糊。这些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外语好、热衷于网络交往，可以直接获取外界的信息，对传统政治缺乏兴趣，对来自于任何方面的强制都持一种敌视的态度。由于互联网无空间和地域的限制，以及视频、手机的广泛运用，为这类新型组织的存在提供了平台。网络与手机的触角可以覆盖这些国家的任何一个角落，发展势头十分凶猛。它的发展会削弱传统的政党政治，互联网时代新型公民社会的发展导致过去封闭的意识形态崇拜被打破，在价值取向的个性化的冲击下，人们不再用理想主义而是用实用主义来看待意识形态。在中欧这些国家，“意识形态认同”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旧体制的符号，既不可能“重塑”和“再造”，也没有了思想基础，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功利化使“崇高”、“超越”的光环一般掌握在教会的手中。

这类组织或活动大多是以情趣为主的自愿组合，没有强制色彩，既不以某种主义为目的，也不以获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特点是“快起快落”、“易聚易散”，有极大的随

意性，常常既没有纲领也缺乏常规的政党组织形式，很多连名称都没有，往往没有任何先兆就平地而起，而且渗透力很强。这类组织如果良性发展可以发挥多元力量的积极性，有利于社会自律和自治，充当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间人"。而它的弱点在于良莠不齐，其中混杂了一些有极端思想的"青年法西斯"和民粹主义组织，且其多元性增加了管理难度，现在的这类社会运动已经不以追求普遍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基础，而是以具体的问题为出发点，它可以因某个具体事件迅速聚集，也可以像水银泻地一般很快化为乌有，即所谓"来无影去无踪"。2004年的捷克反抗"世界经济论坛"的"布拉格之秋"就有这种社会运动的某些特征，经过五年的发展，这个趋势更加明显。从政府管理角度看，会认为难以掌握，因为政府在明处，公众在暗处，且网民众多，政府感觉这种社会趋势将会导致社会的无序化、碎片化和无政府主义化，但是从它们的发展趋势来说，已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对这类组织如何管理将是中欧国家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福利国家"的发展及其带来的问题

在中欧国家的选举中打"社会福利牌"越来越普遍。新欧洲经过20年的发展尤其是2004年入盟以后，欧盟的农业补贴和地区援助等项目使东欧国家普遍成为受益国，波兰2007－2013年将从欧盟中期预算中获得910亿欧元的援助。近

几年新欧洲的发展是老欧洲的平均水平的两倍，捷克2004年刚入盟时人均工资580欧元，现在达到900欧元，新欧洲国家以能源、环保、旅游、服务业为突破口，进一步完善欧洲共同市场，加紧与欧盟老成员国的纽带，现在他们的直接投资有60%－90%来自欧盟，75%－80%的商品出口欧盟，并在预算、立法等方面达到欧盟的标准，形成了政治上靠美国，经济上学欧洲，安全上依赖北约的局面。目前新欧洲的生活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50%－70%，现在已达到老欧洲平均生活水平的59%，人员的频繁流动，使他们在福利政策方面努力向西欧看齐，力图尽快缩小与老欧洲的福利差距。原来波、捷、匈、斯这些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形成了相当完备的“无自由而有保障的计划福利”体制，为数很少的农业人口也处在工业“反哺”农业的状态下，比如波兰在1972年就实行全国农民公费医疗制度，1978年实行农民退休制度，但那个时候是“以自由交换安全”的被动性“福利”，而现在他们要追求一种主动性的“欧洲福利”，尤其是2004年入盟以后像老欧洲国家一样“追求福利最大化”，是他们认为成为欧洲国家的重要指标。

过去的“东欧”虽有“福利”，但并非“福利国家”，因为在专制体制下“福利”是皇恩浩荡，有了你得谢恩，没有你也不许抱怨。在民主制度下“福利国家”才成为一种“公仆”必须提供的服务，提供了民众无需感恩，若不提供，“公仆”就有被“解雇”的可能。在民众看来，提供公共交通、免费教育、医疗保障、社会养老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所有的公共服务主张必须经过老百姓的同意，因为他们



▲ 捷克布尔诺的早晨

是国家税收的提供者，哪个党派的社会福利政策执行得好，哪个党派的支持率就高。尽管目前这些转型国家普遍缺乏强大的财政支持，但是近年来公民参与的协商机制的介入使社会保障体系较经济转轨初期更为完善，而民众对政府又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面对庞大的福利开支，西欧各政府都普遍感到力不从心，中欧转轨国家就更勉为其难。但是竞选条件下的议会民主制度需要讨好选民，故而许诺加大福利补贴便成为各政党的选举法宝，而福利项目一旦兑现，就很难退下来，在福利政策上只能加码不能削减，因为让民众把到手的东西再吐出来是要得罪人的，一旦国家遇到难题去触动老百姓的利益，

便会遭到激烈的反抗。有趣的是：在这类国家实行增加福利的是右派，减少福利的反倒是左派，与西欧往往相反。以匈牙利为例，正如我和秦晖在《十年沧桑》一书中提到的，剧变之初那里就是这样，现在也还是如此。例如几年前右派青民盟执政时，每年发放13个月的工资，社会党上台后，因财政赤字，紧缩政府行政开支、退休金和社会福利，2009年国家公务员实行固定工资制，当年第13个月的工资减少一半，2010年要彻底停发第13个月的工资，中央财政也要减少对地方政府的补贴，这些措施遭到社会上的一致反对，社会党的支持率也直线下降。而它的对手、对2010年选举志在必得的青民盟放出话来，他们上台以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年底的双薪制"。这种靠"打福利牌"、使用"福利杠杆"来争取选民的举动，固然会增加支持率，但是也会对其他政党的策略造成冲击。比如，如果要说中欧国家目前危机的原因，"超前消费"、"刷卡消费"无疑占了一定的比重。在国家债务严重、失业率增长、福利供需矛盾突出的状况下，如何制定有效长远的公共政策、适度地发展"福利国家"，也将是他们面临的严峻考验。

近年来很多人都感觉到已经绝迹数年的"街头抗议"又回来了，我国的一些研究者认为，现在的动荡是90年代转轨初期"街头政治"的回潮，这说明新欧洲国家的政治发展不成熟，或者有人说这是金融危机下群众抗议活动。但实际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虽然两者在表现形式上有些类似，现在的"街头活动"与90年代初最大的区别在于它追求的不是政治目的，而都是以追求经济目的和社会福利为诉求的，现在民

众认为向政府要福利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一般来讲都是在选举前活跃。因为选举政治需要讨好选民，各个政党在选举前往往都是最"和蔼可亲"的时候，也是他们最乐意倾听民众呼声的时候，选民们也知道，这是向政府提出要求的最好时机，所以只要是合理的经济要求也容易达到目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这恰恰反映了新欧洲与老欧洲"趋同"的特点。

新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

众所周知，民粹主义的出现是因为从旧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从强人政治转向常人政治，国家的控制能力减弱，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少部分人享受成果，大多数人承担代价，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公正缺位、贫富分化严重、腐败盛行、失业率上升、转型的痛苦期延长、浪漫主义希望破灭，原来的规则消失而新的规则又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独立无助的人群无法在新环境下获得安全感，于是便导致大众怀旧情绪弥漫，加之一些转轨策略失误，很多承诺没有兑现，就会出现一种逃避自由、呼唤铁腕的思潮或运动，人们就会提出平均再分配资源的要求和呼唤铁腕的"保护主义"。

民粹主义的崛起往往会打乱了以前左中右的政治分野，也使通常意义上所谓的"保守"与"激进"之类的概念失去了意义。民粹主义推崇卡里斯马的个人魅力政治、铁腕政治，它排外反犹、推崇整体主义，导致青年人的尚武精神，反对普世价值。它的盛行基本上可以视为对现存制度不满，



◀波兰的飞车党

却又苦于传统理想主义破灭后的无奈、浮躁与盲目情绪渲染。一般来讲民粹主义有如下特征：它是一种对危机的强烈反应，会趋向于“向后看”而敌视代议制民主；把他们所偏爱的群体理想化并以此作为辨识自身的依据；作为一种思想意识缺乏核心价值，又可称之为“空心化”；因自身的矛盾性具有明显局限；没有一定之规，正如伊塞亚·伯林所说，民粹主义具有“灰姑娘”情结，它要在“众多的脚中寻找水晶鞋的真正主人（灰姑娘）”，“易变性”是它的代名词。

中欧国家的民粹主义思潮整体要比俄罗斯和巴尔干国家弱得多，但是依然有其市场，也有一些组织存在，尤其是入盟以后社会共识降低，不满情绪有所上升，为一些民粹主义政党发展提供了机会，比如像捷克的共和党、匈牙利的约比克党、斯洛伐克的民族党、保加利亚的“进攻党”、罗马尼亚的“大罗马尼亚党”。这些右翼民粹主义组织的势力与活

动范围都有所扩大，他们或以极端民族主义的面貌、或以弱势群体代言人的面貌出现。正如保罗·塔格特所说，"民粹主义是一张晴雨表，透过它，我们可以诊断代议制实行的好坏"，从这些国家民粹主义情绪中我们就可以判断经济转轨的结果。

总体来说，前一个阶段中欧国家的经济改革比俄罗斯和巴尔干国家要规范，比较注重交易的合法性和公平原则，不论是波兰的"内部人私有化"、捷克的"证券私有化"、匈牙利的"面向外资全卖光"都比较顺利，波、捷、匈、斯等国家都经历了六七次议会大选、四五次总统大选各自两次的左右轮流坐庄，在多次的轮回中，基本上都实现了平稳交权，没有出现倒过来"清算"的社会情绪，也罕有"仇富仇官"和"排外"的"向后看"浪潮，不满情绪大多通过法律程序释放，整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不明显。怀旧的老人想念的是过去个人青春的理想主义和社会福利，并不是对体制的怀念，也不会上升为一种主导的国家评价体系。但并不是说民粹主义滋生的土壤就不存在了，因为"政治稳定"是加入欧洲的首要条件，为了完成入盟的夙愿，各派都力争达成共识，入盟以后目标实现的压力消失，而且横向比较尺度发生变化，与老欧洲比较的心理落差以及德国"新纳粹"的影响，民粹主义思潮的涌现将会成为中欧国家一个新的令人关注点。2009年7月匈牙利有2500名光头党上街游行，而转轨出现波折的保加利亚快速崛起的"争取欧洲发展公民党"，在2009年7月的大选中获得39.7%的选票和116个席位，成为第一大党，该党就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其象征性的人物、

现出任总理的是被称为保加利亚“普京”的鲍里索夫，他曾是保共领导人日夫科夫的贴身警卫，后来给国王西内昂二世当过保镖，又是强力部门内务部的秘书长，而且也像普京一样是一个喜欢“秀”肌肉和摆弄武器的猛男，鲍里索夫的施政纲领中就承诺要强化权威掌控、建立刚性政府、惩治腐败、建立社会内部的平等与和谐、注重本民族的传统价值，等等。



▲ 鲍里索夫

总之，新欧洲国家既有西欧的问题，又有自己的问题，它们孜孜不倦地追求所要达到的是在其发源地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的模式，所以有人称之为“同步性困境”，我则比喻为：一个考古挖掘现场的堆积面，每个层面的遗留物都有，既有过去的难题，又有未来的困境。新欧洲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并非一劳永逸，她注定仍将在摸索中行进。



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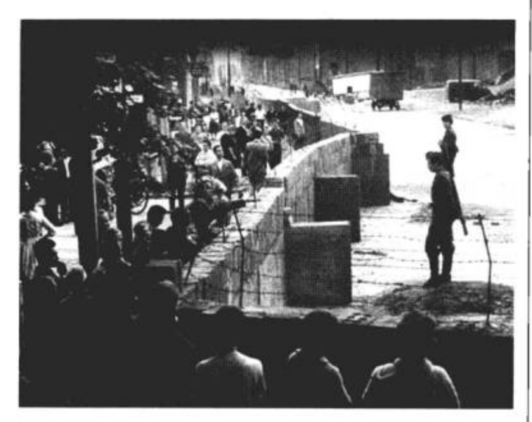
“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
柏林墙倒塌20周年札记

"根据东德法律也是犯罪"

1961年8月13日，前东德（"民主德国"）建立了隔绝东西柏林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从此勃兰登堡门内外的两个柏林成为两个世界：在墙的西边没有任何防御措施，老百姓可以一直走到墙根。而在东边，沿墙一线（包括途经原来柏林市中心的繁华地带和斯普雷河边的景观地带）宽一百多到数百米的建筑全部被推平铲光，形成一片严禁百姓接近的无人区（人称"死亡区"），其间有铁丝网栅栏、军车巡逻道、瞭望塔、钢筋水泥碉堡、自动信号报警和机枪自动射击装



吸引游客的柏林分界线



◂ 柏林墙

置、警犬巡逻线、探照灯和高杆式强光照明灯、车辆陷坑、松土地带、哨卡岗楼密布，完全是一个恐怖地带。面对西方的指责，东边官府最有力的辩护就是：这一切并不具有对西边的进攻性，它只是“防卫墙”，是防御性的。东德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自然有防卫的权利。

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进攻的功能。问题是它要“防御”谁？防御西边的“法西斯”？它的正式名称的确叫“反法西斯壁垒”。但奇怪的是，它防范的却是东边想去西边的人，柏林墙存在的28年历史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无论他是否“法西斯”，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在火



试图逃离东柏林 ▸

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显然，柏林墙并不是用来进攻西边的，也不是用来"防御"西边的。它其实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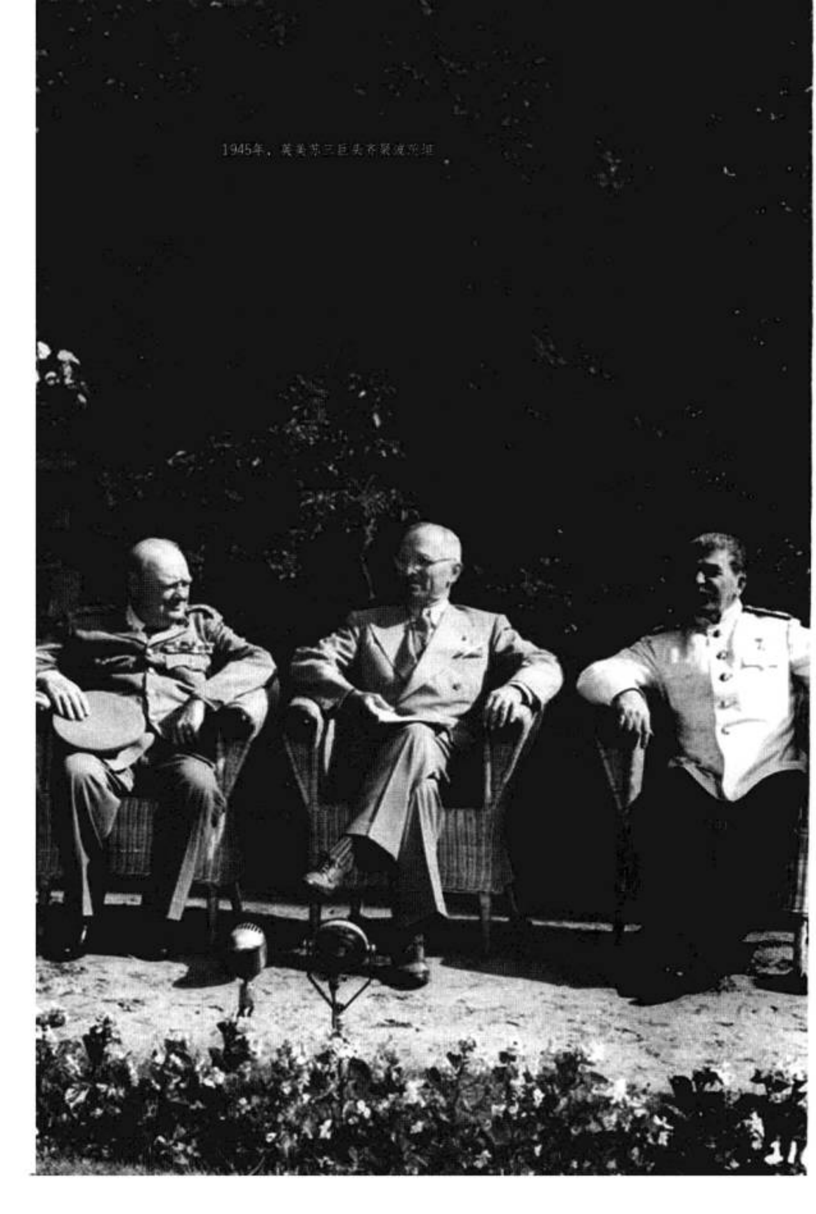
关于柏林墙的评价，我以为如下一段话堪称经典：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

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

的确，被这样的墙“保护”起来的东德不像一所巨大的监狱吗？但即便是监狱，对试图“越狱”者不加警告就射杀也被认为是残忍，而沿柏林墙的许多机枪自动射击装置就是干这个的。因此统一以后这种“对试图越墙者格杀勿论”之举被认为是一种需要审判的罪行。但是两德统一是协议实现的，对前政府的政治行为似乎也不应追究个人责任。当然，舆论的谴责是没法禁止的。而面对舆论谴责，一位前东德领导人辩解说柏林墙下的死亡只是执勤军人的随机应变造成，东德官方并没有下达“越墙者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因为“我们东德的法律也不允许”这样草菅人命。如果真有这样的命令，我们当政时也是要追究的！

然而他不说还好，不久，人们在东德档案中果真就发现了这样一份“格杀勿论”的正式命令，而且上面还有许多政治局委员的签字。这下坏了：按他们自己的说法，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这样的“格杀勿论”也是犯罪，下令者要承担责任。统一后的德国如果根据那时在东德并不生效的西德法律给他们治罪，那就有政治报复之嫌。但是如果统一前在东德境内杀人放火的刑事犯在统一后就没事了，恐怕也不符合常情。所以许多人认为，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属犯罪的行为，统一后并无免受追究之理，这被认为是纯粹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而且人命关天的案件时效也长，现在还没有过去。于是“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进行了审判，一些人为此受到了惩罚。笔者不想评价这种追究是不是合适，但“即使根据当时东德的法律也是罪行”的说法，无疑已足以



1945年，英美苏三巨头齐聚波茨坦

把柏林墙及其策划者钉在了耻辱柱上，而这个耻辱柱的道德基础，就是不分东德西德、姓社姓资、左派右派的人类基本正义！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1945年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英、美、法、苏之间的联盟关系因为对手的消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分割德国是它们共同的想法，在《波茨坦协定》中几国首脑就军事占领柏林进行协商，戴高乐说：各占领区“按照自己认为应当的办法，管理自己的占领区”。斯大林也说，谁攻占的地方，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它。两个德国就此产生。

1949年，苏占区民主德国成立，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东西占区成为两种制度较量的场所。苏联要把东德变成自己的卫星国，控制与汲取是主要思路。首先在战后赔偿问题上，各占领区实行完全不同的政策。苏联的策略是“榨取德国赔偿本国”，它向德国方面提出100亿美元的赔偿。战后的德国没有能力偿还这样巨额的战争赔款，那就拆除德国的工厂设备，利用德国的专家、技术人员和战俘无偿进行实物赔偿。为此苏联从它的占领区拆走了80%的重工业设备。到1948年，苏占区的1900家工厂被拆除，其中1700家是整体拆迁，由于大规模的拆除，东德的生产能力下降了50%。此后很长时期，东德的每7个工人当中就有一个为苏联人干活。此外还把大量的农产品运往苏联，据


▲ 乌布利希

统计通过这种方式，苏联大约从东德索取了价值150亿美元的赔偿，使东德如牛负重，长期无法重振经济。另外苏联把一些大型企业如法本、克虏伯、弗利克没收后改为苏联股份公司。东德还要支付约占全国收入的1/4的苏军占领费，苏军在民主德国有35万驻军，由于苏联苛刻的索取政策，使东德人均负债达2500美元，一直到1958年才结束生活配给制。这严重影响了东德国民经济的复苏和物质基础。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说，战后我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用来赔偿和克服战争的后果。本来战后的生活就十分艰难，还必须向苏联提供大量赔偿，有什么办法？

而西部德国是东西方对峙的前沿，在冷战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抵制苏联的势力，英、美、法与苏联的思路完全不同，开始实行经济扶植政策。西德只向西方战胜国提供了原定数额2%的赔款。1948年6月英美为成立联邦政府、起草德国宪法和占领法，在西占区实行币制改革。苏联为了反击，于6月24日全面中断通往西部的水陆运输，对西柏林进行封锁。美、英、法不计代价，耗巨资通过空中走廊飞行运输，给西柏林居民供应各种物资，前后持续达324天。在这将近一年封锁期内共空运140万吨物资，近20万航次，仅空运费就达2.5亿美元。在密集的运输中飞机失事24架，机组人员死亡48人。这一切如今都记载在了原柏林滕佩尔霍夫机场楼前竖立的"柏林大空运"纪念碑上。在那些日子里，柏林人看到的是这样对比鲜明的图景：苏联人从地面上把德国的东西一列车一列车地拉走，而英美则从空中一架接一架的用飞机把来自西方的东西源源不断送进德国，你说他们会有何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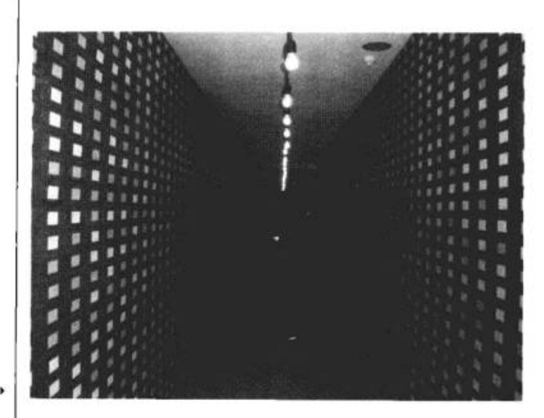


柏林大空运

与此同时，美国从1946年到1950年在西占区共发放16.202亿美元的救济款。1948年根据马歇尔计划，联邦德国获得近16亿美元援助。美国还在德国开设“特殊账目”用于国内的财政补贴，截止到1975年为该账目提供了大约110亿美元的贷款，这被称作是西德经济起飞的“第一推动力”。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赔偿之后在重建经济时，东德不能不完全照搬苏联体制，以强制性的国家计划调节扼杀了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和个人积极性，大搞集体化和重工业化。1945年到1948年，东德把3000多家私营企业变成国有企业，从1950年起推行农业集体化，虽因农民抵制一度放松，但从1958年起集体化步伐又重新加快，当年集体化的比例就从25%上升到58%，1960


当年空运的食品盒

年一下达到86%，这种集体化完全是强制性的。与此同时，由于大量没收没有按时交税的手工业者的资产，各种商品供应立即紧张起来，这在日耳曼民族中引起极大的反感。尽管计划经济可以让老百姓勒紧裤带尽量投资，使工业较快得到重建，但人民生活艰难。从苏东阵营内部看，应该说东德的经济是成功的。严谨而理性的德国人不搞"大轰大嗡"的运动，也没有想入非非、朝令夕改的狂热，在经济计划的"科学、周密、综合化与最优化"方面达到了整个苏东阵营的最高水平，也确实发挥了它的长处，到1970年代已经使东德经济成为"阵营"中最发达者，但即便如此它的绩效仍无法与西德相比。而且再"科学"的计划也无法解决人们的消费偏好和自由发展的诉求，1980年代后，"科学计划"潜力近于枯竭，经济出现停滞。1989年东德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昂纳克下台以后承认，苏联推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最糟糕的

计划，它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发展的”。

在西德则是另一番图景。美国人把西德的管理权很快移交给了德国人，1947年美国实行“复兴欧洲计划”（即马歇尔计划），大量资金注入西德。1949年6月通过“联邦德国宪法”，西德建立了既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注意社会平等、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超过战前的水平，从1950年到1965年联邦德国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促成经济高速增长，从此开始了15年的“莱茵奇迹”。1950~1965年间，进出口总额年平均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1960年代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1980年代西德已经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而早在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战后两个德国各自形成不同的经济体系，分别纳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圈。1950年民德加入经互会组织，70%的出口面向经互会国家进行“账面卢布结算”的“内部交流”，脱离国际前沿，缺乏竞争机制，走上封闭式的经济发展道路。而西德在1951~1952年分别加入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国际分工和国际资本的流动，为西德的经济开辟了广阔的市场。

而比经济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人民实际生活。战后东西两边都为应付时局艰难一度实行过配给制，但西德1950年就取消了配给，很快满街都是自选超级商场，市面繁荣，消费旺盛。而东德到1958年才取消配给，但商品的匮乏和单一依旧。在生活、住房、就业、医疗各方面都是西强东弱。为了

抵制西柏林繁华的选帝侯大街上高档商品花花世界的诱惑，东柏林大搞形象工程，建立了引以为自豪的东欧最高的电视塔。但却立即传开了有关此塔的两个政治寓言：一是“圣徒十字”传说，电视塔上部观光大圆球的玻璃在阳光下反射出醒目的十字光，被认为是对无神论的东德统治者不满；二是“斜塔”传说，据说由于人们在观光球上都挤在西边看那大墙阻隔的西柏林，把塔都压得向西倾斜了。



东欧最高的电视塔

6·17工人暴动与逃亡潮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东欧各国都长出了一口气，人们认为压在头上的“紧箍咒”应该松动了。但1953年5月，东德政府却以行政命令把各企业的劳动定额一律提高10%，并且不增加工资，还威胁要开除那些以罢工示威来反对提高定额的工人，要“把一小撮隐藏在工人队伍中的特务揪出来”。6月16日《论坛报》发表社论说，提高劳动定额是“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此举激起众怒。当天，建筑工人率先罢工，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在斯特劳斯广场举行罢工集会，工人们提出了罢工的9点要求：（1）不能降低单位定额工资的数量；（2）不能降低生活费用；（3）举行秘密和自由选举；（4）禁止迫害罢工工人；（5）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6）撤走苏联占领军；（7）释放全部政治犯；（8）遣返所有的战俘；（9）取消对人民的监视。6月17日，罢工席卷了整个东部德国，除柏林外，腾费尔德、哈雷、莱比锡、梅塞堡、勃兰登堡、德累斯顿、格尔利茨等地纷纷加入，总共有近272个区30万人参加罢工，一些知识分子、复员军人和警察也加入罢工队伍，甚至西柏林的部分工人也冲破警察防线前来声援东部的工人。有几个人登上勃兰登堡门把红旗换成了联邦德国的旗帜。结果苏军宣布戒严令，不允许三人以上在街头聚会，违者按占领国战时法论处，并先期出动了一个装甲师来驱散游行，在冲突中军警开枪，造成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6·17事件是东欧第一次表现出反对斯大林模式的工人起义，为了纪念这次起义，西柏林把通往勃兰



俯瞰柏林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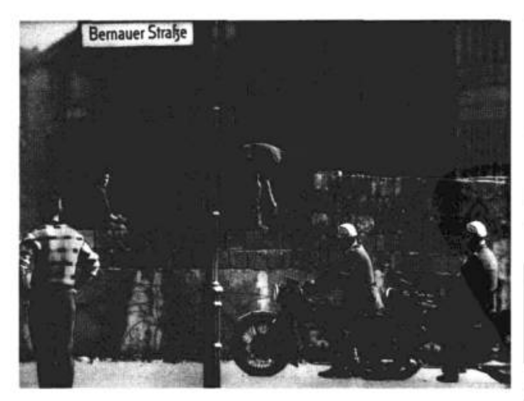
登堡门的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6·17大道"。

6·17事件后东德的逃亡潮愈演愈烈。1945年东德有人口1664万，1949~1961年间就有350万人逃离东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而这时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东德还算是最好的，经济发展速度最快，1958年达到8%，赫鲁晓夫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橱窗"。苏联不能容忍它成为"逃亡的橱窗"。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要接管前往西德的通道，结果导致"柏林危机"，反而更加加剧了逃亡潮。1959年逃亡14.4万人，1960年20万人，1961年建墙前每月就逃亡10万人，而建墙前的两个星期就有4.7万人逃走。据说由于技术人员和劳动力流失，东德的损失大约达到1200亿马克。在这种窘境中，1961年华沙条约组织开会批准建墙的决定，"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终于竖立起来。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1961年8月，东德的特种兵以“玫瑰行动”的代号迅速在东西德之间架起了一道铁丝网，后来被钢筋水泥所代替，墙高3.6米，每块预制板厚0.15米，重2.6吨，宽1.2米，顶端有一个个防止人攀爬的水泥圆管。从1961年8月13日建，到1989年11月9日拆，柏林墙一共存在了28年。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昂纳克说：“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但是靠高墙和火力拦截把人圈禁起来才能“捍卫”的“主义”，还是马克思当年梦想的那种人类理想吗？

柏林墙建成后人们的逃亡史变得更加血泪斑斑。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许多逃亡故事都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



◀ 正在修建的柏林墙



柏林墙上昂纳克和勃列日涅夫接吻的照片，至今仍保留着。

典，笔者也就无庸赘述了。只就柏林墙的隔离功效而言，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降到八九千之内。"德国之声"就此评论说："多少年来，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先锋队怀有深深的恐惧。"

人们在问，凭这么一道禁闭的墙，能最终战胜对手保护自己吗？1989年10月，昂纳克仍然强调说："即使再过50年、100年，柏林墙还将存在！"然而靠35万驻德苏军维持统治的昂纳克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1987年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1987年《苏联外交通讯》刊登戈尔巴乔夫的一篇讲话：他说："我们无权教导别人，苏联对盟国发号施令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切事情必须由苏共盖章批准的做法已经结束。"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8大和第19次代表会议上明确否定了苏联对东欧集团的控

制原则，他表态说，“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强加于人”都应该受到谴责。

在变革潮流冲击下，1989年5月率先实行多党制和民主化的匈牙利宣布匈奥边界自由通行，大批的东德居民通过到匈牙利旅游，然后取道奥地利再进入联邦德国，10月初就有近4万人以这种方式逃离东德。10月7日，是民德40周年国庆，第一个反对党——东德社会民主党就在此时成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权”，要求新闻自由和出境自由，第一次有人公开提出拆除柏林墙。10月9日，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民主德国作协主席赫·康德在《世界青年报》发表的公开信中说，“我们必须承认现实，失败就是失败”，“大批公民出走的原因，我们必须从自身寻求解答”。迫于四周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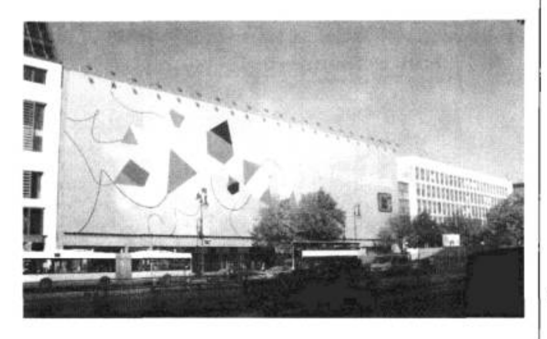
▾ 拆除柏林墙



邻的民主化浪潮，"禁锢政策"已失去意义。10月23日，政治局委员库·哈格在国家电视台宣布，所有东德居民均可获得申请护照出境，政府予以批准。1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开放边境，大批东德人借道捷克前往西德，一周内出走的人数多达50万，"出走潮"已成为无法阻挡的滚滚浪潮。9日晚，两德将过境站全部开放，人们从广播和电视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涌向西柏林、涌向西德，人们骑在墙上狂欢，人们手持各种工具奔向柏林墙，柏林墙坍塌了！边境开放的第一天，就有5万人离开东德，1670万人的民主德国，出入境管理处一下子就签发了1000万份私人旅行签证。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必要逃亡：不到一年，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不复存在，前东德地区与西柏林组成6个新州，正式加入联邦德国，两个德国的历史结束了。

转型20年众说纷纭

星移斗转，转眼柏林墙倒塌20年了。我们来到柏林，这里是一派庆祝气氛。勃兰登堡门东边，著名的菩提树下大街上装设了覆盖整栋大楼的节庆彩画。而在西边，勃兰登堡门前原来柏林墙的基址处竖立起一个由十余条游艇倒扣叠成的大型纪念装置，周围有许多讲述柏林墙历史的看板。出售"柏林墙纪念品"的摊贩生意兴隆，扮演当年边界检查站东、西双方军人的模特忙着与游客照相赚钱，一队孩子在墙址标志线旁认真地听老师讲解历史……



◀菩提树下大街节庆彩画

但是关于柏林墙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20年前东德地区的发展，还是众说纷纭。

2009年10月23日，我在统一后新修的柏林中央火车站——一座极其现代派的玻璃大厦——等车去慕尼黑，广播说列车因故晚点，而且要调换站台。在号称一贯严谨守时的德国也有这种事令我意外。这时一个站台值班的老职员莱因哈德先生看出我的焦躁，上前解释事故缘由。于是通过送行友人的翻译我们聊了起来。聊得高兴了，他还解下DB（“德国铁路”公司）的胸牌，抽出名卡后送给了我。他说他在铁路工作已经30多年，统一前在东柏林的车站，统一后到了这个新的中央站。

据他说，统一前他在东德的工资只有西德的一半，统一后已经与西德工资持平。但实际上，统一前东西德的铁路运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两边的铁路都是国营的，工作都是“铁饭碗”。统一以后前东德地区搞私有化，连西德原来的国营部门也波及了。现在DB虽然还是国家控股，但股份已



莱因哈德先生和秦晖留影

经多元化，私人股已经有1/3左右。而且公司进行了分拆，以便引入竞争机制。莱因哈德对这种转制似乎颇有微词，说是现在铁路的运行波动大，也不如原来守时。因为职工流动多了，业务素质不如从前。像他本人这样的几十年老职工还能拿到终身合同，但年轻人的合同年限就比较短，工作不稳定，也不如过去安心。由于失业率高，前途不确定，不少年轻人都不愿意成家。他的女儿27岁了，也还是单身，工作不断在换（说到这，他摇头叹息着）。他还认为，过去人们互相关心，交往密切；现在则是各顾各，关系淡漠多了——当然，现在各顾各，也就没人盯着你，打你的小报告。最后我问他，总的来说你觉得统一前好呢，还是统一后的情形好？他肯定地说，那当然还是统一以后好，否则我们不愿意，怎么统一得起来？

这位老职工的话很有代表性。事实上德国统一后，通过西部向东部的大量“输血”，东西马克1∶1兑换，全盘引进西

部的社会福利与劳工权益保障机制，东西德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了。就像那位铁路职工莱因哈德，统一后的工资就涨了一倍。但也恰恰因为东德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和其他廉价要素的“优势”，西部制造业资本宁可远赴中国，也不大愿意来东部投资。原来东德的制造业企业垮掉了，新的制造业却没能发展起来。而仅靠服务业和替代产业的发展虽然可以维持经济发展速度，却无法解决制造业衰落后留下的失业问题。这使许多东德人不满。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公共服务。德国的个人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是由联邦财政支持的，医疗、养老、失业保障都有全德统一的制度安排。但教育虽然也如欧洲福利国家的传统，是由政府来办（这与拥有发达私立教育体系的美国完全不同），然而却不由联邦、而归州政府负责。由于东部“新联邦州”财政普遍比西部老州拮据，教育也就不景气。像位



◂洪堡大学



▲洪堡大学校徽

于西柏林的柏林自由大学冷战时是西方的学术橱窗，为了抗衡东柏林的洪堡大学，西德不吝拨款。统一后东西柏林合并成新的柏林州，大学就归州财政管了。偏偏柏林州财政如今很困难，自由大学也不得不裁员缩编，很多机构被撤销，不复昔日盛况了。基层学校也受财政困境影响，据说许多地方由于教师工资不如西部，好教师都“走西口”去了。幸亏如今欧洲一体化，波兰等收入更低的转轨国家来了不少外籍教师，于是那里波兰老师教德国孩子就成了学校的常见景观，有人抱怨道：“我们孩子讲的德语怎么有波兰口音？”

这种情况能否避免？前东德的转轨过程是否犯了什么大的错误？20年后人们仍然有不少争论。由前东德执政党改组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如今已与西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拉方丹派合并为“左翼党”，但三方仍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对这一过程批评甚烈，他们认为统一过于急躁，由于实际上是西德接管，东德经济丧失了自我改造的机会，造成如今的制造业衰落。东德前执政党最后一任总理、现在也是左翼党元老的汉斯·莫德罗先生对我说：就是要私有化，也不能像托管局那样破罐子破摔，而应该像匈牙利人那样，先投资把企业改造得有个样子，再卖个好价钱。

牢骚归牢骚，厌恶就是厌恶

但是即便在前东德，很多人也不认为上述说法是可行的。如奥德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转型研究所的威尔戈斯教授就对笔者说：现在的问题的确很多，但他认为，柏林墙一

倒，如果统一拖延，东德人出走西德的大潮就会不可收拾。而要很快统一，不搞统一货币和东西马克1∶1兑换就无法安定东德民心。而搞了这个，东德也就基本没有了廉价劳动力优势，很难像中国那样吸引投资。所以他认为，现在的一些问题其实难以避免，而比实际做法更好的转轨方式只是说说而已，其实很难行得通。

但无论如何，如今前东德人对于统一20周年的心情是复杂的。他们一方面欢迎和庆祝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一方面对20年来的经历有很多牢骚。这后一方面最明显的证据莫过于"左翼党"在最近这次选举中的成绩。有朋友说，由于左翼党在柏林州是执政联盟成员，20周年庆祝活动还比较低调，否则就更热闹了。

不过正如那位前东德老职工莱因哈德所言，牢骚归牢骚，他们对统一前后的变化总的来说心里是有杆秤的。对现状的牢骚和对柏林墙的厌恶并不矛盾。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前东德民社党、西德社民党拉方丹派和西德共产党三方组成的左翼党主要的选民基础都在东部，但这个党内最"左"的言论，包括怀念柏林墙的言论却全都来自西部。西德共产党是1968年学生运动极左派建立的小党，在没有极权统治下亲身经历的西德，这些人的言论经常口无遮拦。如原德共成员韦格纳在州议会上就为前东德秘密警察和柏林墙进行辩护。但她的话立即在东部"同志们"中引起强烈反感，导致她被左翼党开除。如今的左翼党大部分成员来自前东德，但却奉来自西德社民党的拉方丹为党首（可堪对比的是：德国"右派"却选了个来自前东德的默克尔当旗手）。在我看到


▲ 拉方丹


▲ 克拉拉·蔡特金

的一份该党的背景宣传材料中，不仅绝口不提前东德的人物，连二战前的老德共如台尔曼等也不提，只宣传三个先驱：20世纪初社会民主党人、对党内斗争持调和态度的"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克拉拉·蔡特金，曾被昂纳克点名批判和禁演的前东德后现代剧作家海涅·米勒，以及大家都知道的法国思想家卢梭。该党议会党团领袖居西不久前声明：任何关于"专政"的思想都与我们党不相容，这显然也是针对一些西德极左派的言论。

的确，前东德老百姓、包括左翼党的选民对现状再不满，但他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没有谁比他们更明白柏林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西德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极左派其实根本不理解他们。今天在柏林墙保留下来的最著名的一段"涂鸦墙"（正式名称是"东边画廊"）上，有一幅很大的墙画最引人注目，它画的是各种肤色的一群人正在兴高采烈地拆墙，标题是"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纷纷在此留影，自然，我也在其中。



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



捷 克
告别“切卡德”年代

在我去过的所有中欧国家中，捷克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捷克首都布拉格享有"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城市"和"建筑史上的博物馆"的美名，其城区建筑从哥特式到巴洛克式和洛可可式，从文艺复兴时代的风格到后现代的各种流派，将沧桑厚重的历史内涵与超越时空的未来派浑然天成地融合在一起，能做到这一点的城市，似乎只有布拉格。穿城而过的伏尔塔瓦河将布拉格市区一分为二，在两岸的绿茵之中，红顶白墙层叠错落，民居多彩多姿，黑塔金顶的教堂形态各异，使人仿佛置身于一幅幅最具欧洲特色的油画之中。站在老城



布拉格 ▸



◀ 美丽的捷克姑娘

广场放眼望去，任何一个街道都有六七百年以上的历史，尤其是暮色下在波西米亚式的咖啡馆里一边品尝冰镇甘醇的比尔森啤酒，一边沉醉在极具文化魅力的氛围里，那种穿越历史与未来的体验让人回味无穷。

捷克历史上出过很多文化名人，如《好兵帅克历险记》的作者哈谢克，现代文学的开山鼻祖卡夫卡，在中国有广大读者的米兰·昆德拉，杰出的剧作家、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以及音乐家德沃夏克、斯梅塔纳等。捷克人自称他们是“无霸气而有贵族气的国家”，是“政治上的小国，文化上的大国”。昆德拉有句名言：“做小国人的优势在于，他可以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公民。”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这个最西边的斯拉夫国家的文化历史特点。



▲ 昆德拉



▲ 斯梅塔纳



布拉格教堂 ▸

纠缠在日耳曼历史中的斯拉夫国家

说起捷克，稍微要回溯得远一点。地处欧洲心脏的捷克与德国是近邻，彼此间有850公里的国境线，加之南边的奥地利，可以说捷克被说德语的人从三面包围。捷克人属于西斯拉夫人，在人种上与波兰人相近，但是他们的文化、民族传

统、思维方式、对现实的反应甚至饮食习惯，都和德国人很接近，以至被人称为“说斯拉夫语的德国人”。

10世纪时，西斯拉夫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捷克公国，后人一般称“波西米亚王国”。随着库纳特霍拉银矿的开采，捷克一跃成为欧洲的重要国家。在13世纪，捷克君主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七大选帝侯之一。在查理四世统治时期，布拉格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并于1348年拥有了中东欧第一所大学——查理大学。15世纪初曾任布拉格大学校长的胡斯，反对教皇兜售赎罪券，反对教会占有土地，主张用捷克语做礼拜。1415年胡斯被处以火刑，导致胡斯战争爆发。

1618年5月，以图伦为首的30名捷克人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对新教徒的迫害，拒绝接受哈布斯堡皇室的斐迪南大公为国王，起义者冲进王宫，将代行王权的十人小组中的两个成员扔出窗外，酿成了著名的“掷出窗外事件”，引发欧洲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三十年战争”，一直打到1648年。



卡夫卡博物馆前的后现代艺术



▲ 布拉格查理大桥

这场战争极为惨烈，上百万人丧生，捷克人口只剩下原先的1/4，拥护胡斯教派的知识分子有3万逃往国外，3/4的捷克土地被没收，此后便开始了历时三百年的“日尔曼化”时期。

这个阶段对捷克的历史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残酷的宗教战争和异族统治，使捷克人的生存哲学变得谨慎而现实，正如19世纪的捷克“复兴运动”领导人卡雷尔·哈乌里切克总结的，“别人是为了祖国复兴和强盛而死，而我们是为了祖国存在而活”。捷克在被并入哈布斯堡王朝后，其新教贵族大部分被流放和处死，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贵族占据了捷克的土地，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批的德国移民。捷克的民族精神受到打压，文化受到摧残，德语成为官方语言，街道、商店、交通路标都使用德语名称，在报纸、广播和电影中，德语都是优先语言。这一情况的长期持续，给捷克文化带上了难以褪去的德国烙印，一直到19世纪，从捷克人教会和学校

中涌现的知识分子才使独立精神得到复苏，捷克的国家复兴意识才再次萌发。

悬而未决的苏台德问题

我们此行不仅是一次历史文化之旅，而且是考察“新欧洲”国家转型之旅，所以设计的路线与常规旅游有很大不同，特意安排了一些游人不常去的地方。我们去了前东德的三个州之后，从德累斯顿坐船沿易北河逆流而上，进入捷克的苏台德地区，就是想要考察一下这个如梦魇般一直缠绕着捷德两国的“苏台德”问题。

所谓“苏台德”地区，是指捷克摩拉维亚北部边境的苏台德山脉所处的地带。二战之前日耳曼人一直住在这里，1938年希特勒支持这里以“回归德国”为目标的“汉伦党人”，以日尔曼人要同处在一个“大德国”为借口，为入侵捷克制造理由，而英法两国牺牲捷克的利益，在捷克代表缺席的情况下签订《慕尼黑协定》，将苏台德地区约2.26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万的一块土地划归德国。二战期间，捷克深受纳粹德国的蹂躏与奴役，有36万人丧生，另有80万人被掠到德国做劳工，德国给捷克造成了7000亿克朗（战前克朗）的经济损失，但是捷克是唯一没有得到德国赔偿的国家。



▲ 贝奈斯

1945年二战结束后，根据战胜国的协定和捷克总统贝奈斯的法令，苏台德的日耳曼人被没收全部财产，强制遣返，在因战争中蒙受巨大损失而导致的复仇心理驱使之下，捷克



苏台德地区 ▸

人对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民众实施了暴力掠夺和武力驱逐，迫使许多人丢弃所有家产仓皇逃离，而易北河对岸的美军禁止他们靠岸，无奈之下他们又返回原住地，但捷克士兵又将他们赶下冰冷的拉贝河（易北河的捷克名称），试图爬上岸的人又遭到机枪扫射，很多人当场丧命，成为非战争状态下的牺牲品。



▴ 被迫离开的人们

制定这个政策的人是被捷克人尊为"第二国父"的贝奈斯。

贝奈斯在一战时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委员会总书记，1921－1922年的捷克总理、1918－1935年的捷克外长，二战中在伦敦组成流亡政府并担任总统，二战后于1946年当选为捷克总统，1948年在苏联人的逼迫下退休，随即去世。贝奈斯为捷克的生存问题苦苦思索，并认为在夹缝中维持东西平衡路线是捷克的生存之道。他提出了"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贝奈斯公式"（50%面向东方，50%面向西方，而不是100%面向西方），从此奠定了对外政策上的"捷克模式"。[①]因为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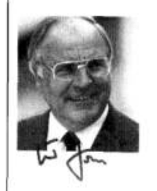
①СерапионоваЕ.П. Эдуард Бенеш иего иде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ства //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 1998, №1, с.14.

看到西方为了自保可以随时牺牲小国的利益，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就是明证，而且在苏台德问题上需要取得苏联人的支持，于是捷克提出充当“东西方桥梁”的思路，并认为同苏联“大叔”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东方不仅是个大市场，还是物产丰富的原料产地，完全排斥东方的“一边倒”政策是危险的。正是“贝奈斯特色”的外交策略为捷克赢得了苏台德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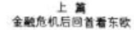
60年来，被遣返的日耳曼人一直要求返回家乡和获得经济赔偿，他们在1950年组织了“重返故乡”的“苏台德回乡运动”组织，年年举行游行示威，向德捷两国分别施压，提出赔偿1700亿马克和回到原住地的要求。东欧剧变以后的1992年，德捷两国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没有涉及这一敏感问题，苏台德问题一直悬而未决，成为二战后迟迟未能解决的“战争后遗症”。1993年捷克总统哈维尔与总理克劳斯分别出访德国，为解决这一敏感问题寻找出路，当时德国科尔政府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德国为纳粹期间受害的捷克人提供赔偿性的人道主义援助，作为交换，捷克与苏台德日耳曼人进行沟通对话，寻求解决渠道。捷克接受了科尔的提议，经过从1995年1月到1996年12月的谈判，终于达成《德捷和解公告》。德国就1938－1945年对捷克的占领进行道歉，捷克就二战后以极其粗暴的方式从苏台德地区驱赶日耳曼少数民族的行为进行道歉。《和解公告》决定，由德方出资1.4亿马克，捷方出资2500万马克，共同成立一个“未来基金”，协商解决苏台德问题。1997年初，德捷两国总统在声明上签字，两国议会随后批准。



▲ 哈维尔



▲ 科尔



似乎"苏台德问题"至此画上了句号，但实际上，由于"未来基金"的金额与苏台德日耳曼人要求赔偿的金额相差太大，而且"返乡要求"在现实中无法落实，苏台德日耳曼人要求返回原住地、讨还故土和财产的游行仍在年年举行。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台之后，仍像科尔那样与捷克总统克劳斯相互道歉，但都无法取得当事者的谅解，民间的对立情绪远远大于政治家的预期，这个深深影响德捷两国关系的问题依然没有完结。

我们从德国进入捷克后，首先拜访的是苏台德地区最大的城市乌斯季，这里曾经是捷克的"巨无霸"企业斯波莱克冶金化工联合体的所在地，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业重镇。我们在到达捷克边境以后，发现捷克与刚刚离开的前东德形成很大的反差，过时的企业厂区、矮小的楼房、陈旧的公共设施、道路上方横七竖八的电车线路以及老古董一般的有轨电车，让同行者大失所望，大家一致认为，若不是有些尖顶教



堂，这里就像是中国的某个乡镇城市，就连政府机关的办公大楼，也是毫无特色的苏式水泥灰板楼，好像转轨在这里陷入了时间停顿，唯一看到的改变是在“革命书店”上层树立起的“CASINO”（赌场）的醒目标志。我们特意去了驱赶苏台德人的拉贝河大桥，桥头立着一个醒目的铜牌，注明该桥被命名为“贝奈斯大桥”，以纪念二战胜利后对收复该地有功的贝奈斯总统。这下我们明白了，是什么导致了乌斯季停滞不前：看来在德捷苏台德“心结”彻底化解之前，乌斯季的发展势必要受到影响，房地产商、投资商、地方规划部门等都缺乏长远打算，在谁都无法确知未来的情况下，这里的经济恐怕一时难有大的起色。

被遗忘的角落：曾经的“切卡德”

在捷克期间，我们专门要求去赫赫有名的切卡德企业的厂区看一看，因为它不仅是奥匈帝国时代工业化的产物，也是社会主义时代捷克数一数二的巨型企业，最盛时有四五万工人，是捷克机械行业的龙头老大，也曾是捷克人的骄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出产的机床销往所有的由苏联牵头组成的“经互会”国家。上年纪的中国人熟悉的沈阳中捷友谊机床厂，就是捷克的切卡德厂援建的。

这个工厂之所以有名，不仅是因为它生产的精密机床闻名于世，而且还因为它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的鲜明态度以及在苏军占领下扮演的政治角色。1968年1月杜布切克



▲杜布切克

当选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提出建立具有"人道主义面貌的社会主义"，4月，捷共中央通过了反映改革策略的《行动纲领》，得到社会的广泛拥护，切卡德工厂的工人要求通过市场竞争实现经济民主化，反对指令性的管理方式，成为产业工人中的领头羊。"布拉格克之春"的改革浪潮触犯了苏联的利益，于是苏联在1968年8月20日以25万大军一夜之间占领捷克全境，要用克里姆林宫的严寒驱逐布拉格的春意，用坦克粉碎布拉格的改革浪潮，扼杀捷克人探索本国发展道路的努力。[①]杜布切克、斯姆尔克夫斯基、切尔尼克、克里格尔等捷克一线领导人被挟持到莫斯科，以此来毁灭东欧民众最早的民主化希望。[②]

在这个过程中，捷克民众发动过和平的抵制，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动作，就是在苏军的鼻子底下，在捷共改革派的所有领导人都被扣押的情况下，捷共内的改革派依靠切卡德工人的支持，于1968年8月22日在切卡德厂区秘密召开了捷

①参阅（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新华出版社，1983年。

②参阅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杜布切克回忆录》，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65-178页。



苏军坦克开进布拉格▶

共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躲过了苏军的严密监视，切卡德工厂的工人和布拉格的市民，将全国各地选出的1543名代表秘密护送到切卡德工厂，最后有1192名代表出席。大会通过一份《告全国人民书》，抗议苏军入侵和非法囚禁杜布切克等人，并选举被关押的杜布切克、斯姆尔克夫斯基、切尔尼克、克里格尔以及反对苏联的齐萨日、希克等人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号召全国掀起罢工，用各种方式抗议苏军入侵。这次会议在当时的影响非常之大，“切卡德会议”成为“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的代名词。很快，整个捷克成为一个没有门牌、没有路标的国家，苏军的行动陷入极大的困难。1968年11月7日，布拉格几万群众利用“十月革命节”的时机上街游行，焚烧苏联国旗。1969年1月8日，查理大学哲学系一年级学生杨·帕拉赫为抗议苏联入侵而自焚，几十万人为他送葬。3月，捷克冰球队在世锦赛中战胜苏联队，捷克举国欢庆。在这些行动的组织背后，都有切卡德工人的积极活动，所以“切卡德”成为工人队伍中“布拉格之春”的一种象征。后来胡萨克在苏联支持下上台，开始所谓的“正常化”时期，当时的捷克政府对“切卡德会议”进行了谴责，宣布它为“非法行动”，但是这次大会始终是捷克党内民主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

后来苏联对捷克进行了大清洗。1970年2月，捷共中央更换党证，50万人被开除出党，主席团和书记处50%以上的人被开除，70%的企业领导人被撤换，200万人受到株连，20万人流亡西方，其中2/3是专业的知识分子。[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捷克政治上万马齐喑，经济上走入死胡同，社会矛盾进

①刘祖熙主编：《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373页。



杨·帕拉赫的墓地 ▸

一步尖锐，终于导致了1989年的剧变。

也正是因为有"切卡德会议"，在东欧剧变之后，各国共产党中唯一没有改名的就是捷克摩拉维亚共产党（简称"捷摩共"）。捷摩共虽然不像东欧其他共产党那样改名、重建，转而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感



布拉格街头50年代的装饰

召力，至今仍是捷克政坛的第三大党，主要原因就是，该党的“十四大”资源在民众中口碑尚好，因为它在“布拉格之春”问题上采取了与亲苏的党内体制一刀两断的政策。在捷克剧变之前，捷摩共就已经宣布，他们要继承“布拉格之春”的传统，把亲苏的胡萨克集团全部开除出党，强调自己与切卡德工厂的捷共十四大路线是一脉相承的。

正因为捷共十四大的特殊地位，我们都很想看看40年之后又经历了经济转轨的切卡德现在究竟怎么样。接待我们的人感到很诧异：现在捷克的年轻人都已不知道切卡德了，远从中国来的客人还念念未忘。但是遗憾的是，那个时代已经结束，20年的经济转轨使切卡德化为乌有，它原来的厂区大多已被房地产商开发成住宅楼和商用楼。几经查找，有人帮我们打听到了在布拉格九区的“切卡德会议”的旧址（尚需进一步的确证）。我们随即来到那里，发现那是一个厂区，有一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四层的黄色厂房，整个地方



切卡德 ▸

杂草丛生，凋敝荒凉，所有的玻璃全都破碎，残破不堪，与远处的新建商业住宅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据介绍，因为这附近是工人居住区，工会力量强大但消费能力较弱，所以一直没有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基本上保持着剧变前的原貌，现在有部分厂区是中国人与越南人堆放批发货物的货栈。我绕着衰败的厂区走了很远的一段路，脑海中浮想着它当年鼎盛时的情景，心中有说不出的感觉。

捷摩共党内有一派理论认为，假如"布拉格之春"没有被极权主义的苏联摧毁，假如捷共当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能够走下去，也许就不会有1989年捷共丢失政权的"天鹅绒革命"。这种说法或许只是捷摩共的一厢情愿。在民主政治下，表现再好的政党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占据执政舞台。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实行民主政治，其实对于共产党而言，也不见得就是坏事。从整个"东欧"来

看，在完全西方式的选举中，从1993年底开始，各国共产党的后继者多次重新上台执政。有人评论说，这种自由选举的意义不亚于1989年的剧变，因为自由选举使前东欧的左派看到，他们完全可以不依赖强制，在民主宪政的条件下，通过选举和执政表现赢得民心，从而依靠人民的支持而非华约集团的坦克来得到政权和维持政权。从1994年开始的“左派复兴”给了前东欧左派很大的信心和力量。他们相信，在议会民主的规则下竞争，左派仍然有强大的优势。从这20年东欧的政坛变动规律看，除捷克外的轮流坐庄的左派，大部分都是前共产党的后继力量，竞选胜利的原因是他们有完善的组织资源，有比较多的从政经验，以及社会公平的理念，包括

▼布拉格之春集会的广场



二次分配的福利国家政策。总体上看，在新欧洲各国的议会政治中，虽然左右两派基本是四年轮换一次，但仍是共产党的后继者占据优势，因为在每一次轮换中，右派都是大换班式的重新组合，而左派始终是以前共产党人为主。

至于拥有1968年资源的捷摩共难以上台，原因很复杂，一是因为捷摩共的批评意见多，建设性操作性措施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捷克的"左派资源"主要被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在捷克政坛上叱咤风云的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所瓜分。在1948年共产党吞并社会民主党、结束"人民民主"时期后，这批人被迫转入地下或流亡海外，捷摩共没能像东欧各国的其他共产党一样改名，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就算他们改了名字，在捷克人的心目中，社会民主主义的"正宗"也不是他们，而是从马萨里克那一支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历史党"。

"逆向"信息的由来

进入捷克之后，通过实地观察，我们发现除了苏台德和一些"被遗忘的"角落以外，其他地方与20年前相比变化还是很大的。在捷克，曾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象征的大型重化工企业，经过转轨改制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旧工业时代的高污染企业得到改造治理；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向"小型化"、"迷你化"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旧厂区和剩余劳动力向绿色农业、旅游、服务业转移，捷波边境曾经重度污染的西里西亚地



▲捷克景色

区，现在转型治理成效显著，已成为环境良好的渡假地和农牧业区。尤其感觉明显的是道路质量上佳，又没有收费站，一路畅行在绿色的海洋中，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公路两旁一边是黄的向日葵，一边是白的食用罂粟，红砖顶的小房子夹杂其中，恍如童话世界，看来在注重环境问题和绿色增长这一问题上，捷克的确是下了功夫。

在捷克，我们非但没有感觉到金融危机下遭遇“沉沦”、“危机”、“滑铁卢”等等之类的景象，也没有发现如国内某些媒体报道的那样，捷克总理托波拉内克“被逼宫”，导致国家出现“内乱”迹象。我们看到的是政局稳定，民众生活井然有序，甚至可以说是“悠闲自得”。不论是与我们座谈的学者还是在街头巷尾随意交谈的民众，都没有对2009年上半年捷克议会通过对托波拉内克内阁的不信任案感到意外，他们认为


▲托波拉内克

这属于正常的政治运作，在野党社会民主党反对执政的中右翼联盟是议会政治的应有之义，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们更否认"中欧已成为金融风暴的中心"的说法。

于是我们首先想要搞清楚的问题，就从金融危机的影响，变成了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报道与所在国的国民感受不同？是什么原因导致实际状况和统计数字反映的情况不一样？这两个"逆向"印象是怎么形成的？几天下来，通过看电视和浏览报纸，很快我们就明白了，之所以会有这种偏差，首要原因是媒体的表达方式、思维心态及具体政治环境的不同。他们由于新闻自由和媒体的多元立场，负面报道较多，这既反映了批评的职责，又反映了追求轰动效应的行业习惯，在这一点上，倒是和我们的一些网络评论、网民跟帖一样，追求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

当然这些国家也有一些不实报道，比如2008年波通社报道说，在所有的转轨国家中，波兰之成就排名第一，立即遭到来自本国各方面的质疑和考证研究。正因为新闻自由和媒体的开放，与之相左的数字也大量见诸报端，可以说任何人都可以从中找到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而我们的一些媒体则倾向于取出对中欧不利的数据，所以国内看到的报道和这些国家实际的真实情况也许相差很大。

对中欧的考察不能单纯看统计数字，也不能单纯看媒体，最好要有综合因素的整体分析。比如，经过20年的发展，中欧政党政治经历过"多党林立"、"向左右整合"、逐渐"常规化、规范化"的几个阶段，与我们座谈的捷克科学院当代史研究所的科比赛克博士认为，目前捷克的政党政

治正在“从多党到围绕两大党的形成过程中，在向西欧的政治格局演进”。但是我们国内一些媒体信息中体现出的判断却并非如此，概因其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被报道国家的媒体，由于现在各党党内的分歧公开化、社会化，大量见诸报道，给人的感觉是左右各党内讧争斗不断，时不时就衍生出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党派，它们又时不时根据政治需要暂时联合在一起，所以中国的某些研究者与媒体得出的结论往往是：这些国家政党的发展不是“常规化”，而是“分裂加剧的碎片化”、“矛盾激化的无序化”。这些截然相反的结论，也许只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议会政治中党派矛盾可以在媒体的关注下见诸报道，本身就是一种政党“常规化”的表现，捷克人认为，比起旧体制下“高度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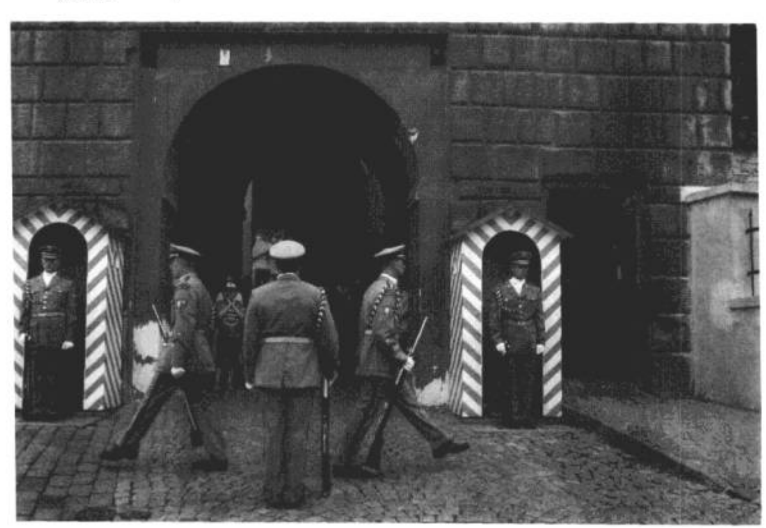


◂金雁与捷克学者

“坚不可摧”的党内团结来，现在的“乱糟糟”局面无疑是一种进步。

类似的情况还表现在我们关心的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问题上。在我们与查理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雅德维加·沙黛沃娜座谈时，她也提到，对于克劳斯以及他所搞的“证券私有化”，现在大家都在批评，似乎责备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几乎没有一个阶层是满意的，若是单看报纸和民调，似乎20世纪90年代的“证券私有化”已是“糟得不能再糟了”。但是到现在，“谁也无法证明有比那更好的方法”。当时捷克人的思路是，要让为国家的积累做过贡献的人平等

▼布拉格城堡前换岗的士兵



地得到国有资产，而且希望捷克人持有股份，而不是像匈牙利那样“门户大开”地卖给外国人。后来的实践证明，捷克人在管理上、外部市场占有的份额上仍不尽如人意，最后还是步匈牙利的后尘，将国有资产卖给了外国人。虽然是绕了一个圈子又走回了匈牙利的道路，但是如果缺乏前一个阶段，一开始就走匈牙利的道路，捷克人是无法接受的，因为捷克曾经以奥匈帝国21%的人口继承了80%的工业，这样的辉煌历史使他们有很强的自豪感，而且捷共执政时期对外收支比较平衡，既不需要像匈牙利那样靠变卖国有资产来还债，也没有波兰那样强大的工会要照顾企业的内部人利益，所以才有了全体国民平分的“证券私有化”的做法。这个出发点并没有错，现在大家批评的是“捷克模式”后来暴露的问题，那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混淆在一起。

我们在国内对捷克等转轨国家现状所形成的所谓“负面印象”、甚至让人觉得这些国家处于危机之中的另一个原因，是反对派对执政当局的批评很多，为了证明自己政治对手的错误，他们恨不能拿着放大镜到处寻找错误和纰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他们有自己的报纸、杂志和电视，时不时会爆出一些“猛料”，对老百姓来说，有这样的监督者存在，对约束执政者的腐败是有效的，应该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是当权者自己不说执政党好话，似乎就有点奇怪，这是因为轮流坐庄导致执政时期过于短暂，刚上台者要说明前人留下的烂摊子与自己的执政能力无关，临下台时又要为自己推卸责任，所以为自己说好话的时间委实不多。捷克学

者虽然在价值观上认同这样的定期选举制度，但也认为弊病不少："两头各刨去一年忙竞选，中间两年一年适应期，真正管事的也就是一年，还等不到大展宏图，就又面临选民选择，政府如不能像变戏法一样做到'吹糠见米'的政绩，又会让位于民众自愿选择的'新的排列组合'。"例如，金融危机实际上对中欧的威胁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但是政客们都倾向于夸大它的影响，因为这种外来的不可抗拒的因素便于他们推卸责任。短期执政的弊病在于，谁都没有长远打算，不愿意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从这方面讲，中欧的政治还不够成熟。虽然选举可以成为减压阀，使社会不满的可燃点大大降低，相对旧体制来说是一种进步，但要建立成熟的政党政治，捷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欧洲各国的投票率都有降低的趋势，人们对政治反应冷淡，公众参政意愿低，弃权者比率高，在德国有82%的人表示对政党没兴趣。进入21世纪后，欧洲的政党信任水平一直呈下降趋势，波兰2004年只有3%的人信任政党，8%的人信任议会，捷克和匈牙利好一些，分别达到10%、18%和13%、29%，接近欧盟的平均水平。2004年波兰的议会投票率只有41%，2007年因达到54%备受关注。斯洛伐克议会投票率在2006年达到55%，成为近年来的最高点。这一方面说明人们政治热情降低，另一方面也说明民众的务实化倾向。"民生、民主、宪政"的平台搭建以后，参政意愿降低是一个普遍问题。老百姓不热心什么"左派"、"右派"价值理念，"社会公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些国家，媒体不说好话，反对派不说好话，甚至执政党党内也批评不断，因此给

外人造成了很差的感觉，但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再者，中东欧民众的衡量标准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常常和1949年之前比，而中欧转轨国家多是以当代欧洲作为标准。在捷克的统计数字中，既没有以建国的1918年划线，也没有以1945年划线，而总是说在经济效率和福利等方面与相对发达的“老欧洲”有多大的差距，购买力占到其平均水平的多少，生产总值达到多少比例，等等。前东德、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明显。这些国家在加入欧盟之后，人员无国界、无限制流动，随时可以把别国的信息传送回来，因此在与邻国的比较中，放大别人的成绩和本国的失误，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匈牙利

导致政治体制变革的三个“累积层”

匈牙利是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由于前面不断地增加内容，越往后时间压缩得越少，不得已很多原定的内容都被精简掉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抽出半天时间专程前往布达佩斯东郊的新公墓去拜谒纳吉的陵墓。新公墓是布市最大的公墓群，绵延数十公里，在去之前就有当地朋友告诉我们说，一定要在墓区管理人员的带领下前往，否则墓区太大会迷路的。而我认为，我们要去看的"纳吉"是匈牙利现代史上的名人，其墓地肯定会非常醒目，应该不难找。一个显然是"70后"的墓区管理人员把我们带到一大片"1956年遇难者墓区"以后，望着无数相同的没有人名、没有生卒年代、没



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的遇害者墓地



◂纳吉墓碑

有墓碑、只矗立着系着国旗色的丝带的木桩的标志，他也茫然没了头绪，不知该如何寻找。

经大家多方寻找，终于在这一片墓区的东边找到了伊姆雷·纳吉的墓，这是一块横在地上二尺见方四尺之长的再普通不过的石碑，比我想象的要俭朴、寒酸得多，碑前没有雕像，没有装饰，墓碑上没有任何其他解说，没有生卒年代，只写着："伊姆雷·纳吉，匈牙利人的总理，1956年"，简单得令人不敢相信，和旁边的石碑墓穴没有什么区别。刚开始我还存疑惑，怀疑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纳吉的墓，众所周知，1956年11月4日当苏联坦克和重型火炮响彻布达佩斯市区时，纳吉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赫鲁晓夫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明白无误地记载，1958年6月匈牙利政府"按照苏联人意志，处决了纳吉"，而墓碑上为什么写的是"1956年"呢？突然一下我恍然大悟，"1956年"这个年份



▲1956年的部分死难者名单

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在匈牙利人心中还有比"1956年"更让人刻骨铭心的年代吗？至于纳吉真正死于哪一年已经不重要了，在生命面前，纳吉与无数没有姓氏的"1956年"死难者一样，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人。在匈牙利，"1956年"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它既是"定格"在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也是匈牙利政治变革的一面旗帜，更是1989年的先声，正如前匈牙利社工党政治局委员波日高伊所说，正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催生了1989年的"变革之路"，没有1956年，就没有1989年。①

难怪有人说，了解东欧现代史有三把钥匙，第一把是

①"匈党中央就重新安葬纳吉发表公告，称纳吉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代表人物"，见《人民日报》，1989年6月2日。


▲ 哥穆尔卡

“1947-1948年”，第三把是“1989年”，这两把钥匙是东欧国家共有的，至于这中间的一把，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年份，比如波兰是“1980年”，捷克是“1968年”，匈牙利是“1956年”。有了这三个年代就足以串联起东欧国家的现代历史，这三个年代其实就是一个因果链条上的三个转折点，就像考古挖掘上的“文化地层”一样相互叠加、互为因果，每一个后来事件的原因都可以倒推到上一个“累积层”，或者说，每“一个非正常结束的历史事件注定会成为下一个历史事件的开端”，[①]在这一点上，不但历史事件惊人的相似，甚至就连时间、过程、人数这些细节都像是前一次事件的重演，正是这三个“历史累积层”最后导致了1989年苏东地区大雪崩式的制度变迁。

风云突变的1947年

很多人对“中间年份”和“1989年的剧变”还记忆犹新，但不清楚1947-1948年是一个什么特殊的年代？为什么说这个年代在东欧现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环节呢？

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基本上都是“反法西斯民主政党”的联合政府，共产党在议会和政府中都不占有优势，[②]因此当时实行的是政治上多党议会制和经济上“混合所有制”的“人民民主制度”。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冷战”序幕，3月美国宣布奉行“杜鲁门主义”，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并向包

①1990年5月2日匈牙利剧变后通过的第1号法令就是为“匈牙利事件”平反。

②《40年代中后期的苏联与中东欧国家》，见（苏）《苏联斯拉夫学》，1991年第6期，第7页。

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各国发出邀请，苏联表示拒绝，也禁止东欧国家前往，斯大林明确说："马歇尔计划是直接打击苏联的。"作为对策，9月，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波、捷、匈、罗、保、南、法、意九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波兰西南疗养胜地弗罗茨瓦夫省的波伦巴小温泉举行会议。会议内容没有事先通知与会的各国代表，苏联突然提出要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要求在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各国立即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再允许各国实行通向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着眼于苏联的外交策略。这个提议遭到众多代表的反对，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质疑说："国际工人运动迄今的实践表明，这样的中心弊多利少。"南共代表卡德尔认为这会遏制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政策，捷克代表斯兰斯基表示抗议甚至中断参加会议，法共、意共的与会人员也觉得这种做法不符合社会主义政党的传统，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则以事先没有取得他们党中央的授权为由希望暂缓成立该机构，但是在斯大林强硬立场和遥控指挥下，会议当场通过了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决定。至此两个阵营的对立形成，在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下，根据"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东欧各国原则上只能保持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往来。


▲ 处在巅峰时期的日丹诺夫

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东欧各国都发生了几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导致他们停止已经开始的"自己发展道路"过程而被迫转向。因在情报局成立过程中苏联看到了东欧共产党的离心力，首先决定拿南斯拉夫开刀杀一儆百，指责"铁托集团"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是为了与"苏

联相抗衡的”，接下来在东欧各国激烈批判“民族主义”，展开清除“民族主义”的运动，凡是主张“本国国情论”的人统统被认为是“对苏联榜样的蔑视”，谁要谈独立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堕落到反苏立场”，“堕落到出卖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是“背离了马列主义的‘富农党’”，要予以清算。其次，中断从1944年开始的也得到斯大林首肯的“人民民主制度”发展道路，认为这种制度是“助长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违背和歪曲列宁主义的”，是“马列主义的叛徒提出的无视苏联历史经验的理论”，必须立即结束人民民主阶段，转向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三，日丹诺夫在情报局成立会议上指责社会民主党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向东欧共产党提出，工人阶级只有一个，共产党也必须是唯一的，工人阶级内部不允许有改良派与革命派之分，社会民主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能把社会民主党看成是最接近共产党的力量，不存在联合阵线的“大左翼”，并命令各共产党在1948年上半年快速完成兼并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尽快清除掉这个政治上的竞争者。

东欧各国共产党内一直就存在着在本国坚持反法西斯斗争游击战的“本土派”与前往苏联投靠苏共的“莫斯科派”之间的分歧，本来“本土派”就对“莫斯科派”随着苏联红军一道回来“摘桃子”的做法很不满，更对他们在建设时期拉大旗作虎皮，唯苏联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人后面鹦鹉学舌而丢掉了民族旗帜的治国路线极端地反感。这批人当中像波兰的哥穆尔卡、捷克的斯兰斯基、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匈牙利的拉伊科等在本国很有威望，二战中他

们在国内从事艰难的地下斗争，对本国本民族的实际情况更为了解，他们希望根据本国的特点，探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以后，对待苏联的态度便成为衡量这些国家共产党忠诚与否的唯一标准，这样便为那些依仗苏联权势拿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派”在本国耀武扬威地打击“本土派”提供了有力武器。“苏联派”认为东欧国家无权选择发展自我道路，必须照搬斯大林模式，东欧共产党的命运是苏联人给予的，敢不遵从苏联人的指挥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于是1948～1949年东欧各国都发生了破获“反革命集团”的案件，案件之多、涉及人数之广，以至于使苏联内务部的官员超负荷运转到国内无人的地步，东欧大批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和“本土派”的领袖都被网罗其中，他们或被捕入狱、或不经审判被处决、或被迫流亡国外，原来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民主党派均被取缔解散，留下来的也经过大换班而名存实亡了，从此听命于苏联“老子党”的东欧共产党一党制（东欧的政党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苏、阿、匈、罗、捷克为代表的一党制，另一种是波、东德和保为代表的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得以确立，再加上外有共产党情报局、经互会、华沙条约组织这样机构的管制，东欧国家从组织、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受到钳制，苏联模式被强行移植。1947年成为东欧战后历史的转折点，从而为后来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匈牙利1949年的“拉伊科事件”

就像提到1989年剧变，回避不掉1956年一样，提到1956年事件也就无法绕开1949年匈牙利的“拉伊科事件”。

匈牙利工人运动有它的独特性，建立在工人运动基础上的社会民主党要比共产党的历史长得多，因此在工人中有深厚的基础。匈牙利工人党成立于1873年，1890年改名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而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于1918年11月成立的，比社会民主党晚了40多年，1919年在库恩·贝拉领导下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社民党和共产党曾一度合并，5个月后政权被颠覆，两党分裂。1924年共产党在维也纳重建，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德国扶持霍尔蒂的“箭十字党”执政，共产党的活动十分困难，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匈牙利共产党也随之宣告解体，一部分人以“和平党”的旗号留在国内坚持斗争，党员只有2000多人，另一部分人跑到苏联组建了国外中央委员会，1944年在反法西斯战线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国内从事地下活动的人第三次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与国内并肩反抗法西斯的社民党再度合作，由于双方的价值立场相近，又有国内抗战的共同经历，两者关系比较密切，于1945年成立了两党联络委员会。而跑到苏联去的拉科西等人随苏联红军进入布达佩斯，与国内的中央委员会合并，“莫斯科派”因为有苏联人做后盾，顺理成章地成为党的主要领导，由1941～1944年担任国外委员会领导并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拉科西·马加什出任匈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当时共产党不能掌握社会力量的大多数，需要联合各民主爱国


▲ 拉伊科

力量，于是共产党提议与其他一些反法西斯党派组成"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由在国内民主派当中人脉颇望的工人领袖拉伊科·拉斯洛担任"匈牙利阵线"总书记，后来在"匈阵"的基础上成立临时国民大会和临时国民政府。

1945年，匈举行战后第一次选举，凡年满20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小农党取得优势占57%的席位，社民党略高于共产党获得17.41%选票，共产党获得16.95%的选票，全国农民党、公民民主党瓜分了剩下的选票，由小农党创始人蒂尔迪·佐尔坦组成联合政府，该政府采取了"既不执行左翼的政策，也不采纳右翼方针"的中派路线。1947年匈牙利修改选举法，限制右翼团体和个人参加选举，这次共产党获得了22.2%的选票，成为第一大党。1948年6月在日丹诺夫的提议下共产党兼并社民党后改名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由于是不平等的"吞食"，遭到社民党内部分人员抵制，很多人退党。此后"莫斯科派"的拉科西小集团独揽大权，拉科西一人包揽了国防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匈共总书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按照斯大林"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在党内排除异己，清洗"本土派"与兼并过来的社会民主党人。1948年，匈牙利拉开了"大清洗"的序幕，党内"老近卫军"都被以"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的罪名逮捕入狱，矛头指向在国内坚持游击战或被霍尔蒂政权监禁的"本土派"。在这次"清洗"中，拉伊科·拉斯洛首当其冲，另有19万人被清除出党。1949年结束党派竞选，其他党派消亡，形成一党制。

1949年6月16日，时任"匈南友好协会"主席、外交部

长、“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总书记的拉伊科·拉斯洛突然以“武装暴动罪”被捕。拉伊科·拉斯洛（1909~1949年）是匈牙利建筑工人协会的共产党最早的组织人之一，是1935年著名的匈牙利建筑工人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1941年被霍尔蒂政府监禁，1944年获释后从事共产党与工会、各工人组织之间的协调工作，因为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有深厚基础，拉伊科与社民党交往颇多，和社民党中的很多人私交甚笃，被社民党誉为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共产党人”，因此在1944年共产党与社民党合作中扮演了“穿针引线”的关键角色。拉伊科1946年任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1946年任内务部长、1948年起任外交部长。1949年9月16日，匈共中央指责拉伊科是叛徒，二战时充当德国法西斯的间谍，胜利后利用匈南协会主席的职务充当南斯拉夫的间谍，并勾结南斯拉夫蓄谋武装推翻匈牙利人民政权。10月份拉伊科被处决，与他同时被判刑的还有一批“本土派”领导人，凡是与他交往过的前社会民主党人统统受到怀疑，被扣上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帽子被开除出党或被捕入狱，受他的案件牵连有一大批被挖掘出来的“间谍反革命”案件相互交错，定性不断升级。1951年，有近50%的中央委员被撤换，20万人受到株连，百万人成为监控对象，导致冤案遍地，拉伊科案件的大规模政治审讯，破坏了法制和民主程序，降低了共产党的威信，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后来成为1956年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从人事上清除了“本土派”的障碍以后，拉科西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照搬苏联的重、轻、农的顺序和“五年



▲暮色中的多瑙河

计划"发展蓝图，不顾人民生活地拼速度、拼积累。1950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根据苏联的要求加快工业化的步伐，"一五计划"搞"大跃进"，把五年计划中原来工业增长90%提高到200%，重工业由原计划增长104%提高到280%。积累是国民收入速度的3倍，这种高积累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与1949年相比，1951年下降11%，1952年下降18%，1953年下降13%。[①]高征购和强迫集体化使农业生产陷入停顿，有1/10的土地抛荒，导致食品供应紧张，1948年，当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的纳吉就告诫说："强

①苏联统计局：《1976年经互会国家统计年鉴》，（莫斯科）1976年，第50-82页。

行实行集体化必然要以灾难而告终。”强力可以解决政治问题，却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这种状况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政治形势恶化，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日渐高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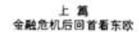
一个思想超前的改革者——纳吉·伊姆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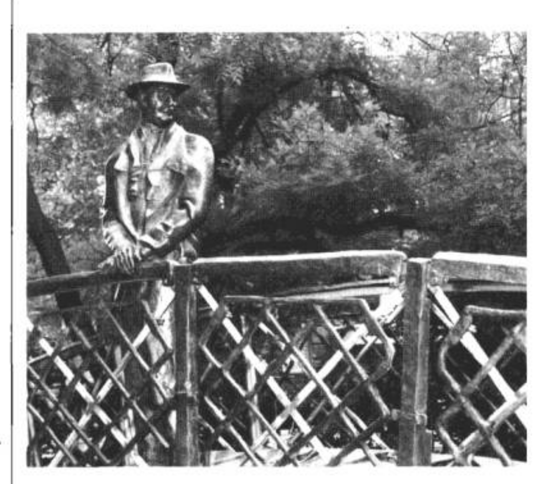
在布达佩斯多瑙河畔的议会大厦前矗立着一座纳吉·伊姆雷的雕像，头戴礼帽手拿拐杖的纳吉站在一座桥上，双手交叉，在桥的围栏上安详地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我问陪同我们的人说，为什么要塑造一个站在桥上的形象，答曰，据说“桥”的含义是体制的象征，在共产党人里面只有纳吉跨越了体制，走到了“桥”的中央。后来我们还在别处看到一尊纳吉1956年10月23日当天在议会广场上手拿讲稿的雕像，据我所知，剧变后东欧国家为前共产党人塑造雕像的只此一人，纳吉至今仍是匈牙利人民心目中的改革探索者，先知先觉的殉难者。

在前东欧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纳吉是一个另类，这并不是指他的政治观点和1956年当中的所作所为，而是指他的“出身”另类，一般来讲，东欧国家的“改革派”大多出自于“本土派”，只有纳吉是一个例外。与拉伊科、哥穆尔卡这些“本土派”不同，纳吉与拉科西一样是“讲俄语的”人，是一个典型的“莫斯科派”，他与苏联之间的渊源之深超过匈牙利“莫斯科派”当中的任何人。纳吉是1918年在俄国参加俄国共产党并加入苏俄红军的，1930年被共产国际委任在布哈林主持的“国际农学院”和苏联中央统计局工作，



▲ 纳吉在讲话的雕像





"纳吉在桥上"是一种象征

移居苏联长达十几年之久，正是这段学院的研究经历，使他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独立见解，并深受布哈林思想的影响，同时因长期在苏联国内，对斯大林体制的弊病也有清醒的认识。这个"莫斯科派"与拉科西只想讨好苏联人的做法完全不同，他从政以来就认为"民主化"、"法制化"建设是"社会主义道路最好的形式"，社会主义要想比"人民民主"时期更具有合法性，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利益。纳吉在到二战末期的1944年回国担任农业部长，负责战后的土改工作，1945年11月改任内务部长，1946年因为中央认为他的性格"太宽厚，不适应内务工作"，被改任为国民议会议长，1948年纳吉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匈中央全会指责纳吉"犯有布哈林倾向错误"，被免去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从

事农业研究，这是纳吉政治生涯上的第一次挫折。1951年他的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恢复，同时在政府担任副总理兼管农业。也许是那个自称为“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的拉科西紧跟苏联太过头了，[①]完全不顾匈牙利国情和民族尊严，在国内缺乏号召力，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赫鲁晓夫指定由副总理纳吉担任总理的职务，在苏联人看来，换一个同样是“莫斯科派”的温和者可能更符合“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气候。

1953年6月，纳吉出任总理后立即提出改革纲领，他说，“必须坦率地向国民承认，庞大的五年计划指标，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使我国生产力受到很大的压力，阻碍了福利事业物质基础的增长”。纳吉提出，匈牙利要接受苏联的教训，反对片面的高速度而要全面发展，要降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立即下马一批大型投资项目，发展轻工业，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要改善市场供应和职工福利，降低工业品价格，取消掉农产品流通的限制，不要过早地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中要允许退社，允许小私有企业合法化，取消拘留措施，关闭集中营，加强法制建设，设立检察院，审理违法案件，这些政策后来被统称为纳吉的“六月政策”。他之所以能够上台伊始便在匈牙利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除了纳吉个人的理论水平、勇于探索的精神、从匈牙利的实践出发以及对苏联经验的总结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苏联的马林科夫在斯大林去世以后颁布“新方针”，也在探索苏联的改革道路。纳吉的“六月政策”出台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但也使围绕在纳吉与拉

①阚思静：《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46页。


▲ 马林科夫

科西之间的党内派别矛盾公开化与尖锐化。

纳吉的改革政策得到了社会上的热烈欢迎，在"六月政策"的指导下，许多正在上马的大型重化企业纷纷搁置，全国有729个农业合作社解散，农贸市场开业、自留地遍地开花，背"小口袋"的个体交易者活跃起来。这种在当时看来是"资本主义泛滥"的局面在匈牙利党内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没有摆脱禁锢的匈牙利共产党感到纳吉步伐迈得太大，思想太超前了，于是形成了"反击纳吉"的保守派阵营，这时拉科西趁机到处收集纳吉的"黑材料"向莫斯科报告说，由于纳吉实行的"资本主义"政策，扰乱了国内的计划经济，使匈牙利正在迈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危机之中。1955年2月，苏共党内斗争的结果，主张改革的马林科夫失势，被免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作为对苏联方面的呼应，拉科西加大了批判纳吉的声势。1955年4月，匈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撤销纳吉党内外一切职务，由赫格居斯接任总理，同年12月，纳吉被开除出党，这是纳吉政治上的第二次下马。但他并没有停止思考，而是开始埋头从事研究理论工作，试图从僵化、教条的思想上有所突破，他从1955－1956年先后撰写了《关于共产主义》、《道德与伦理》、《当前的几个迫切问题》、《国际关系的五项原则和我国外交政策的问题》等著作。[1]那些"六月政策"的拥护者在纳吉身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体制外思想流派。

①纳吉·伊姆雷：《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人民出版社，1983年。

“裴多菲俱乐部”与1956年事件

1956年苏共20大《秘密报告》在东欧各党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各党内再次出现改革派的呼声，对匈牙利的党内斗争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纳吉认为从《秘密报告》中披露的资料看，自己的探索和施政方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就更坚定了他改革的决心。受苏共20大思想的鼓舞，匈党内的民主派和一些知识分子于1956年3月17日成立了“裴多菲俱乐部”，选择1848年革命时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松散的学术团体，其初衷是要以匈牙利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传统为目标进行思想探索，并没有组织反对派政党的考虑。但是很快对拉科西集团不满的社会力量就在这个旗帜下聚集起来，把“裴多菲俱乐部”推向了前台。形势的发展出人意料地迅速，裴多菲俱乐部已经成为改革派的智库与活动平台。3月30日，裴多菲俱乐部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数千人大会，批判拉科西在匈党内的错误路线，4月，俱乐部又举行了多场与20大精神有关的研讨会，被压抑了多年的民族情绪一下释放出来，布达佩斯处在沸腾之中。

6月份，也就是纳吉“六月政策”三周年纪念日时，裴多菲俱乐部的影响力达到鼎盛，6月27日这一天讨论题目是“关于新闻和媒体”，消息发布出去以后，原定下午7点钟开始的研讨会，从4点钟开始会场就挤满了人群，只好在附近的公园拉高架线设立分会场，会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数万名听众聚集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聆听着来自党内民主派和民间思想者的声音，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新闻部副部长罗松奇·盖



▲ 裴多菲俱乐部

佐，他讲述了1955年纳吉被贬黜的经过，使会场的气氛达到高潮，全体起立要求纳吉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纳吉·伊姆雷！""纳吉回来！""我们要纳吉！""我们相信纳吉！"的口号声与匈牙利以前的国歌《科苏特之歌》和《马赛曲》响彻在整个布达佩斯的上空。

1949年拉伊科冤案成为一个众人关注的问题，裴多菲俱乐部在拉伊科案件七周年时专门组织了一场报告，由拉伊科的夫人作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审判员和律师问题》的演说，她向听众讲述了拉伊科受迫害的前前后后以及自己在狱中六年的遭遇和一大批受牵连者的悲惨的处境，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迫于形势的压力，新上任的第一书记格罗开始着手拉伊科的平反问题，当在乱坟岗里挖出了拉伊科遗骸的纪录片播放以后，全国为之震惊。10月6日，为拉伊科等四名原劳



拉伊科下葬

动人民党的领导人举行国葬，布达佩斯有30万人为之送行，接下来国内平反的浪潮接连不断，到此都在为屈死的冤魂重新安葬，全国弥漫着难以名状的悲愤情绪。

10月14日，匈《自由人民报》刊登了中央政治局恢复纳吉党籍的决定，格罗认为，拉伊科已经平反，纳吉也恢复了党籍，国内的局势理应趋于平缓，便出访南斯拉夫希望寻求邻国铁托的支持。10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改选，与纳吉命运相同也曾遭到罢黜的哥穆尔卡复出当选为波兰第一书记的消息传来，匈牙利学生深受鼓舞，高呼口号要求让“匈牙利的哥穆尔卡——纳吉”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向中央提出十点要求，同一天布达佩斯学联也向政府提出十六点政纲，这二者的主要内容都是要求重新回到纳吉“六月政策”的道路上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改革，对拉科西的错误进行清算，维护匈牙利民族尊严，反对苏联大国主义。纳吉已经成为改革的精神符号和政治领袖，附加在他身上的期望开始超越体制的边缘。由于军队警察对群众运动的同情，管制措施无法到位，自发的群众运动开始失控，愤怒的人群把矛头指向国家机关和军事单位。

10月23日，示威活动继续在扩大，在1948~1949年整肃当中被取缔的民主党派和社会民主党也纷纷亮出旗号，要求回到议会政治的“人民民主阶段”。中午12点，布达佩斯科苏特电台播送以内务部长皮罗什名义发布的一道禁令，宣布禁止任何公共集会和游行，违者将受到严惩，对按照苏联КГБ秘密警察制度建立起来的内务部极端反感的布达佩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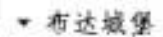


布达佩斯的斯大林雕像被推翻

高校的学生，无视内务部的命令，继续沿着多瑙河岸游行示威，学生队伍举着匈牙利国旗和波兰国旗，扛着声援波兰和要求纳吉复出的横幅。因党内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出现分歧，加上同情学生的军事院校学员也加入游行队伍，内务部在下午2点宣布取消禁止游行的命令，在游行者看来，这种出尔反尔的举动只能证明了统治者的理亏心虚，越发鼓舞了民众的士气，各行各业的人群相继汇入游行大军，尤其是产业工人队伍的加入，更加壮大了示威者的声势，涌上街头的人已达20多万，激奋的群众呼喊的口号在不断升级，民族主义和反苏情绪交织在一起，"释放政治犯"，"苏联人滚出去"，"解散秘密警察的内务部"等等，街头政治逐渐出现了非理性的趋势。

傍晚时分，纳吉出现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以他一贯

温和、理性的态度向群众讲话，他说“我向到场的人们致以热烈的致敬，我向你们民主的匈牙利青年表示崇高的敬意，以你们的热情，定会排除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我们将通过党内谈判和讨论问题的途径来解决目前的冲突。”随后他要求群众克制，特别强调“我们要捍卫宪法、秩序和纪律，政府将快速做出决定”。他要求大家相信政府、维护秩序、防止坏人钻空子。显然，这是一个旨在平息事态的讲话，既没有煽动，也没有威胁。纳吉冷静、理智的态度让对他期望值很高的游行群众感到失望，纳吉讲话完以后没有人鼓掌赞同，没有人响应，而是一阵意想不到的冷场，纳吉请求群众一起唱国歌，唱完国歌以后纳吉就离开了现场。



▼ 布达城堡

晚上8点钟，匈党中央第一书记格罗讲话，他首先就否定了这场运动，把匈党摆在群众的对立面，一口一个"敌人"、"资产阶级"、"敌对势力"、"暴徒"，并反复强调苏联人的"解放"和无私帮助。格罗的讲话如同火上浇油，使激奋的群众更加无法控制，事态很快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部分警察和部队倒戈，把武器发给了群众，和平示威成了武装暴动。出现了打砸抢活动，焚烧红旗，占领电台、报社、兵工厂、武器库等。在危急的情况下，匈党中央委员会举行有纳吉参加的紧急扩大会议，纳吉临危受命，立即被恢复了政治局委员和总理的职务——但是这次复出的政治生涯只有不到十天。会上前总理赫格居斯提议邀请苏军来进行军事镇压，纳吉同意实行紧急状态的戒严令，但反对使用武力镇压。后来南斯拉夫的铁托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批评了邀请苏军出兵的决定，他说："当示威还在进行的时候，匈牙利党把苏军请来，这是一个致命的陷阱，请别国的军队来教训自己国家的人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个举动更进一步激怒了人民，因此，发生了自发的暴动。"

10月24日，纳吉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他呼吁群众：停止战斗，停止流血，恢复秩序，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给政府时间。他说："凭借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我们将以我1953年6月提交议会的纲领为基础，在各个方面有系统地实行民主化。"但是这样的许诺为时已晚，纳吉复出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他的声音被淹没在群情激奋的人群中，暴动在向全国蔓延。24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乘装甲车抵达布达佩斯，准备以武力解决匈牙利的事端。而纳吉仍想



◂上街游行的民众

做最后的努力，他认为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由匈牙利人自己来解决问题、平息事件。由于苏军第一次进城受阻，苏联人同意由纳吉、卡达尔等人尝试以和平手段恢复秩序，并且撤换格罗，向群众实行让步政策。

经过领导层的紧急磋商并征得苏联同意（后来表明这一同意只是缓兵之计，苏军实际上已在准备再次出兵），纳吉等人决定进行东欧前所未有的改革。已经声名狼藉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宣布解散，改组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并由卡达尔出任第一书记。在10月底的几天里他与作为政府首脑的纳吉似乎配合默契地在全力平息事态。他们向全国宣布“10月23日事件”是“民族民主运动”、“人民爱国运动”，并表示要结束一党专政，解散内务部下属的国家保安局，让苏军立即撤军，回到人民民主制度上来，举行自由选举，组织由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前小农党、社民党、全国农民党参加的联合



在激烈的巷战后留下的苏联军官尸体及被摧毁的坦克

政府。但是局势仍未能控制住。10月30日，暴动者冲进布达佩斯市委大楼，市委书记麦泽·伊姆雷被杀。此时卡达尔在苏联暗中策动下终于与纳吉分道扬镳，"失踪"后出现在苏军控制区并宣布另组新政府，"邀请"苏军再次出兵镇压，并对"十月事件"定性为"反革命"[①]。11月1日，苏军坦克进入匈牙利境内，纳吉至此也被逼上梁山，宣布与苏联决裂，退出华沙条约组织。11月4日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进

①《纳吉·伊姆雷及其同谋者的反革命阴谋》，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7页。

行镇压，终于摧毁了匈牙利人的抵抗，近万人死亡，15万人出逃。纳吉进入南斯拉夫使馆政治避难，这是他的第三次下台，这一次纳吉再也不可能再复出了。

1957年4月，他被押送回国审判，1958年6月16日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处决。临终前的纳吉表示：“在我的一生中曾三次试图挽救社会主义的声誉”，他指的是1953年的“六月政策”，1956年的复出与其后的与苏联决裂，但是三次都被“强大的外部势力”破坏了。据说他临刑前高呼：“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匈牙利万岁！”需要指出的是，七年前的6月16日是拉伊科以“武装暴动罪”被捕的日子，“历史累积层”巧合到叫人不可思议的地步。

“要变革就无法绕开1956年事件和纳吉问题”

苏共28大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改变，严格控制东欧的传统被放弃，苏联人的变革之风令东欧的民众感到欢欣鼓舞，东欧的改革力量和民主势力再次萌动起来，历史似乎又一次回到了1956年事件的起点上，只是这一次苏联的坦克再不会出现了。

1988年，纳吉的女儿同其他四位与纳吉一同遇难者的遗孀组成一个“历史公正委员会”，要求为1956年事件的所有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1988年6月16日，在纳吉被处决的30周年纪念日，有几百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为匈牙利

事件平反，立即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支持和响应，政府出动警察抓人，激起强烈的民愤，呼吁开放党禁的声音再次响彻布达佩斯上空。如何看待“1956年事件”是整个社会的关键环节，是无法回避的历史问题，所有的人都知道，在匈牙利如果不触及1956年事件，就不可能改变党的形象，就不可能与过去的错误划清界限，不可能获得主动权。正如政治局委员波日高伊所说的，“要变革就无法绕开1956年事件和纳吉问题”。长期以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社工党”）在匈牙利人心目中就是一个“屈从外来压力”，“残酷镇压要求自由、民主的人民起义”的形象。为了改变这一形象，7月，社工党中央成立由波日高伊和15名专家组成的“重新评价‘1956年事件’委员会”。

1988年10月23日，匈牙利事件32周年纪念日，匈牙利的《新镜》周刊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纳吉·道马什的文章，他首先提出，1956年匈牙利爆发的是一次人民起义，他还透露道，新的中央领导准备重新评价这次事件，重新评价纳吉，“这一工作已经开始启动”。党内关于“1956事件”是“人民起义”，是“一次反对蔑视整个民族的寡头统治的起义”，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国内的各个角落。1988年底“舆论俱乐部”宣告成立，它的宗旨就是继承33年前的“裴多菲俱乐部”，为党内民主派和体制外知识分子建立一个沟通的平台。

1989年1月，匈政府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匈政府准备重新安葬纳吉和同案人，1月28日，波日高伊向记者宣布，由他领导的“重新评价历史委员会”根据调查得出的结

论是，“1956年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反对当时正在使国家蒙受耻辱的寡头统治的人民起义”。2月6日，13个群众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拥护“人民起义”的结论，并强调只有公正地对待历史，政府和民间才有对话的可能，否则“将加深政治危机，丧失国家振兴的有利时机”。2月10 - 11日，匈共中央提前召开中央全会讨论“1956年事件”的结论问题，在这次会上斗争十分激烈，党内明显分为两派，最后双方协商向外公布的结论是：“1956年由于匈共领导在改革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政治性群体事件发生，10月以前是真正的人民起义，10月以后运动失去控制，一些复辟力量、社会残渣余孽混杂进来，使运动的性质发生改变。”而这时各种政治团体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原来蛰伏地下的1948年前组织也出来活动，多党制要求的政治体制改革便提上议事日程，民主论坛双周刊杂志《信念》发出一封向社工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说：“在民族的圆桌旁，每一个想以宪法的手段达到目标的人都应有一席之地。”

历史的轨迹又一次回到了1956年，纳吉在1956年提出的“多党制、外交中立、退出华约”这些纲领性的问题再次摆在社工党面前，他们已经意识到，1956年苏军出兵的局面不可能重演了，如果不主动顺应潮流，就可能被人民抛弃。于是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几个迫切问题的立场》的决议，决定开放党禁，文件指出，“要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新模式，改变一党制，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存在反对派的运动和政党”，执政的社工党“愿同一切合法存在的组织就新的执政方式进行双边和多边会谈”。总书

记格罗斯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的党不仅支持和赞成多党制，而且还倡议实行多党制，我们要建立一种新的最符合匈牙利情况的社会主义模式。"允许反对党存在，成为共产党意识形态一次突破性的转变，这也是社工党的最后一次倡议，此时，它已经丧失了动员能力了。

1989年3月15日，是匈牙利青年节，社工党呼吁与其他团体联合纪念这个节日，遭到拒绝。3月15日，纪念活动分两处举行，官方的活动是在贝姆广场，民间的活动是在裴多菲雕像前，结果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官方的活动是凄惨暗淡人影稀疏，民间由31个政党组织的活动声势浩大，呼吁为匈牙利事件平反，要求苏联撤军，反对一党制，实行言论、新闻、宗教自由的发言接连不断，最后全场一致通过把1956年匈牙利事件高潮的10月23日定为民族节日。通过这一次活动检验，证明了社工党的威信已降低到了极点。5月9日，社工党就重新安葬纳吉发表公告，"中央委员会认为，1989年6月16日安葬纳吉和他的战友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社工党对纳吉作出了迟到的评价："纳吉·伊姆雷是1945年以后匈牙利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他的一生同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他是社会主义改革的象征。""他早就认识到，要改变与匈牙利的传统格格不入的、没有生命力的政策，党的政策必须体现人的价值，必须体现匈牙利的民族特点。"中央委员会根据"重新评定历史委员会"公布的全部材料得出结论，1958年6月审判的纳吉案件是"捏造的政治案件，判决是非法的"，"政府要坚决同过去的错误、同不止一次地违反宪法的政治决定划清界限，同1956年以来



◂纳吉葬礼

的报复性措施划清界限”。

1989年6月16日，在布达佩斯举行了为纳吉及同案人重新安放骨灰的“国葬”仪式，这一天像1956年为拉伊科举行国葬一样，有30万人参加了吊唁安葬活动，只是这两个安葬日之间已经跨越了33年。匈牙利社工党的时代结束了。7月，匈牙利总理亲手剪断了把匈牙利和奥地利分割并象征着东西方对立的铁丝网，从此匈牙利就像剪断绳索的风筝义无反顾地脱离了苏联类型的社会制度。





东欧到底发生了什么?

金雁和我合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一书2004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本来，按照惯例出版后应当由别人来写书评。可是本书的出版正碰上"郎咸平旋风"，争论的双方都打起了"俄罗斯牌"：一边说，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俄罗斯化"了。另一边反驳道，我们没有俄罗斯化，因为我们没有把公共财产公开分给老百姓！看到这样的争论，不由得使我产生了"毛遂自荐"的冲动：什么叫"俄罗斯化"？俄罗斯真的把公共财产分给老百姓了吗？俄罗斯的困境就是因为它把公共资产公开分给了老百姓？如果不是，而是"非公开"地"卖"给了官方认定的某些"能人"，或者干脆不改革，仍然实行"国有官营"，是否就会更好？俄罗斯如今的情况究竟怎样？俄罗斯能代表中东欧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的一般情况吗？我们从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进程中究竟应当汲取什么经验教训？

这些问题，我想不仅研究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人关心，一般公众也都会关注，尤其是在我们的国企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的今天。因此我请人们听听我们的一家之言。

金雁的专业就是苏联东欧研究，自1978年读研究生时起她搞这一行已经30多年了，她在波兰华沙大学的两年正好是经济"休克"的最困难时期，当时写过一本书叫《新饿乡纪

程》，以后她还发表过多部关于前苏联东欧问题的著作。与如今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我不同，她一直是东欧左派的同情者，《十年沧桑》一书中的"思想变迁"部分实际上讲的也主要是东欧左派的思想变迁。但是我想不管左右，只要实事求是，在一些基本的底线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不难。至于我，本来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关注东欧只是客串。但是关注之后也有点感想。我们都觉得，咱们看东欧时的一些"想当然"怕是靠不住的。

▼ 德国易北河畔



我们需要了解一个真实的东欧

许多人认为"剧变"后东欧各国都已宣布要搞"私有化"，没有所谓意识形态障碍。那处置国有资产一定是顺理成章，大刀阔斧。起码比我们这里要容易得多。其实恰恰相反，虽然私有化的确不仅是剧变后当局明确的行动目标，至少在"剧变"初期社会情绪一面倒的情况下也几乎是全社会的普遍想法。但是，即使大家都赞成私有化，这只是在"要不要分家"这方面达成了共识，真正的问题还是"如何分家"。而在这种问题上达成共识谈何容易，各阶层各利益群体都会力争对自己有利的方案，没有任何地方是可以回避矛盾的。而他们既然已经是民主国家，谁也不能独断专行，所以中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无不经过一个利益有关各方反复讨价还价的"分家谈判"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这个过程远远比那些口称不搞私有化实际上却可以以铁腕方式随意处置公共资产，而公众不仅无法参与甚至无法知情的做法要复杂得多。

在中东欧各国，除了前东德由富裕强大的西德国家为了统一拿出巨资把一切包下来而化解了矛盾，捷克以公平、周密的安排实行了国有资产全民初始分配而解决了矛盾之外，其余诸国的私有化过程都拖得很长。一些国家像波兰，由于剧变前当局搞的权贵私有化在剧变后被清查，私有化进程还曾一度慢于前政权末期。在东欧各国，不仅私有化立法要经

过左右派争论、议会辩论乃至全民公决，立法之后私有化的具体实施也十分复杂。许多企业的私有化谈判经年累月，尤其是与工会的谈判更为艰巨。波兰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谈了五年，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矿谈了十二年，这样的例子并非罕见。用我们这里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他们这样的“民主私有化”“交易费用”太大。事实上，与那种所谓“休克疗法”的剧烈变化造成破坏的似是而非的说法相比，“民主私有化”的谈判过程长、交易费用大，倒的确是他们的转轨过程支付的“代价”之一。

在这方面，咱们的体制优越性可就太大了。许多地方只要领导人一跺脚，立马就“全卖光”、“全送光”，产权马上就“界定”了。工人说赶走就赶走，资产想给谁就给谁，土地说圈了就圈了，谁敢说个不字？记得不久前媒体上广为宣传的“仇和现象”：一个地级市在“几个月内”不仅全部企业齐步“转制”、而且连学校、医院与幼儿园等公益性资产也稀里哗啦“全卖光”。而这位父母官因为改革成效显著又升为省级官员了。德国媒体曾经说，匈牙利的“全卖光”政策让西方国家（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其实也有私有化问题）都有的可学。要是与这个地级市相比，只怕是匈牙利人也有的可学呢。当然实际上无论西方人还是匈牙利人他们都学不了我们——匈牙利对于实现国有资产变现价值最大化是非常重视的。而在那个地级市，考虑到“首长”只能对“卖方”而不能对“买方”下令，可以想见这种命令交易下不可能有正常的讲价气氛，所谓全卖光实行起来差不多就是“全送光”了。而这个地级市人口五百多万，在中东欧（含中亚、蒙古）28个转

轨国家中人口规模超过它的也不过半数左右。

许多人都说中东欧的转轨是"激进"的"休克疗法"，而中国的改革则是"渐进"的。其实像上述那个规模相当于中等转轨国家的"地级市"搞的才真正是"休克疗法"，而且其"激进"程度超过什么"五百天计划"之类东欧人所能设想的最激进方案。当然，剧变后尤其是初期，东欧新上台的不少领导人不仅价值观上追求转轨，言论上很激进，方式上也确实想尽快解决问题。但是在剧变后的民主制下，并不是他们"心想"就能"事成"的。相对于"只做不说"、"少说多做"的实权者来说，他们实际做到的是否真那么"激进"，大可怀疑。

许多人都认为越是"右派"越主张"休克疗法"或者激进的转轨战略，越是"左派"越反对这种做法。其实在中东欧的许多国家中恰恰相反，左派的转轨方式往往比右派激进得多。这是因为东欧剧变前激进的反对派大都具有反苏的民族主义或反世俗化的宗教背景，对普世性的"全球化"和"物欲横流"的自由市场未必很热衷，还有的反对派出身草根，崛起于工运农运，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带有更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或工团主义色彩。剧变后他们这些"右派"反共的确坚决，走向"自由市场"就不免有些左顾右盼了。倒是那些出身"前共产党人"的左派，过去长期受国际主义教育，权力意识虽强，民族、国家意识往往并不怎么强。就像一家匈牙利媒体揶揄的：过去欢迎东方的坦克（tank）与如今欢迎西方的班克（Bank，即银行，泛指外资），不就一个字母之差吗？加之他们多为剧变前的精英阶

层，资源多门路广，即使民主制下无法弄权，在公平竞争的市场转轨中他们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所以在中东欧的不少国家都出现了“左派复兴”后转轨进程反而加快的现象。波兰的大众私有化立法在四届右派政府时期都未通过，左派上台后很快就通过了。匈牙利的国有资产主体在剧变后第一届右派政府执政的四年中基本未动，左派上台后四年就基本卖光了。类似情况在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等国也存在。

许多人都认为东欧人迷信美国，他们的转轨方案都是洋顾问给搞的，并不考虑本国国情。还有的认为东欧的转轨主张是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属于“市场原教旨主义”，建立的是所谓“新自由主义”的那一套。其实你想想这可能吗？民主国家又不是“伟大领袖指航向”的“理想实验场”，连自己国家领导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民，何况那些无权无势的外国学者？中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方向虽然一致，具体做法依各国国情却有很大不同：

匈牙利剧变前政府留下了全欧最高的人均债务，国家财政破产，急需变现国有资产以还债。所以几届政府无论左右都实行“只卖不分”。而且由于公开竞价，多数出价高的都是外资公司，于是就出现了“面向外资全卖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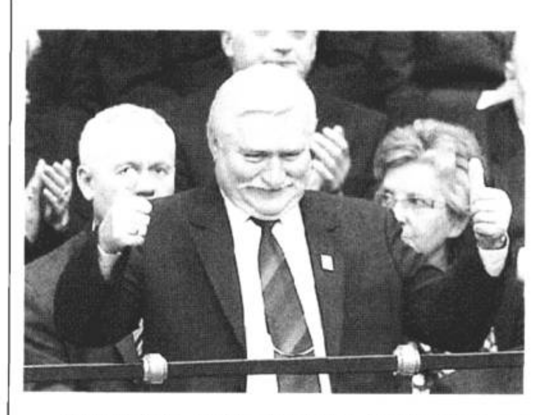
而捷克的国家财政状况较好，国民又不愿意外资收购，而且该国历史上社会民主传统浓厚，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于是便出现了与匈牙利相反的“只分不卖”，即把国有资产的价值主体以投资券形式公开、平等地在国民中分配。然后由他们在开放性的股市选购国企股票。同时为了保护“大众股民”利益，防止股市风潮与庄家操控，并考虑到多数公众对

投资不在行，因此发展了代理投资的中介机构（IPF）。

波兰的特点是工会的力量特别强大，无论什么样的私有化都得经过工人这一关。许多波兰企业初始阶段都实行过职工参股乃至“雇员买断”制（即EBO），在初始私有化以后，股权在二次交易中由于外部投资进入和内部经理层收购逐渐向“能人”手中集中，EBO逐渐变成MEBO（管理层与雇员共同买断）和MBO（管理层买断），但是这个过程相当长。在所有调查企业中，私有化四年后内部人资本份额平均已从95%降至75%。其中管理者股份从22%升至30%，非管理者雇员股份从73%降至45%。必须指出，波兰的管理层控股必须在私有化之后的民间交易中按纯粹自愿原则以市场价格从小股东（包括本厂员工）那里收购。由官方宣布经理是“能人”而把企业的全部产权或至少是控股权直接交给他（这是我们这里对MBO的通常理解）的做法，在剧变前的“体制内改革”中曾经有过，剧变后完全被废止了。

显然，中东欧的私有化不管成效如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不同的国情下，各利益有关方面讨价还价反复博弈的结果。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与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多大关系，也不是当权者、更不要说外国人能够包办的。剧变后的东欧统治者无论左右可以说都是自由民主派，但未必都是“新自由主义者”。加上环绕中东欧的西方欧陆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本来就多是社会党经常执政的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原本就不如英美盛行。中东欧国家争相加入的欧盟也有浓厚的福利与保护主义色彩，入盟谈判都包含“劳工条款”、“福利门槛”。想依靠任意“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优

势挤进去，你想欧盟那些高工资高福利的老成员能同意吗？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是不折不扣的新自由主义者，在转轨期民主政治的多方博弈中能够实现的也七折八扣地变成福利国家或“准福利国家”了。在这方面捷克的克劳斯政府堪称典型，克劳斯本人可谓标准的新自由主义者了，他不仅是留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科班出身，而且执政后也以直言不讳地表达“主义”著称：他鄙夷“社会市场经济”、“福利市场经济”之类的提法，经常把“不带任何限制词的市场经济”和“标准的资本主义”挂在嘴边。但他的这种“主义”也就过过嘴瘾而已。实际上，在克劳斯执政的8年里捷克搞的是高税收高福利、反兼并反破产、实行企业保护与“过度就业”，连邻国波兰的左派政府副总理都觉得过分！这几年捷克竟然没有一家大企业破产、失业率不升反降，从1991年的4.1%降至1995年的2.9%，而且是欧洲极少几个在这一时期退休金增长比工资增长更快的国家。平均退休金占平均工资额的比重从1993年的43.4%升至1996年的47.8%。1995年捷克的社会福利事业为预算开支的最大项目，占预算总收入的1/3以上。无怪乎国外媒体称他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的美国学友萨克斯劝他学学亚洲，不要搞那么多福利。他的回答是：“我们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亚洲的水平！”笔者的朋友、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教授在西方是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但他在东欧诸国中对标准新自由主义者克劳斯治理的捷克却评价最高。他曾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有好坏共四种，苏联是“坏社会主义”，美国是“坏资本主义”，而捷克则是“好资本主义”！



瓦文萨

捷克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波兰的瓦文萨一再呼吁加快私有化，但他自己出身的格但斯克造船厂连续几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否决，一直拖到“前共产党人”出身的民主左派“重新”上台执政，该厂才因拖延转制陷入资不抵债而终于破产。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位专家在考察了波兰现行法律后深为波兰企业家叫屈：“现行《劳动法》所保护的利益，不是劳资两利，而是侧重于保护被雇佣者。”他认为这是波兰经济搞不好的“教训”之一。在长期由“工会掌权”的波兰，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基金高速增长，从转轨初期相当于职工工资的58%，到2001年已超过90%。如企业职工实际工资为300美元，则业主须支出约570美元。以至于“工会吓跑投资者”和国家福利负担导致的财政危机使波兰经济在世纪初陷入困境。尤其让中国农民瞠目结舌的是：波兰农民（自由小农！）也享有高水平福利保障，为维持农民的公费医疗、退休金等等，国民经济各行业每个就业者每年

需平均转移支付约415美元。

罗马尼亚的日乌河谷煤田早在剧变前当局要关闭亏损矿井，就受到矿工工会的抵抗，剧变后矿工工会愈发了得，多次发动数万矿工进入首都导致政府危机，彼得·罗曼政府为此下台。而议会中的大罗马尼亚党议员团则成为矿工利益的代言人。经过十年谈判，矿工们的要价已经"降低"到要求恢复矿井、工资（当时已为罗全国平均工资的两倍）再提高30%，并在失业保障金之外再给每个下岗工人1万美元外加两公顷土地的"补偿"——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府对此都无可奈何。

而我们虽然至今仍然把"私有化"列为禁忌词汇，实际上在"产权明晰"、"国资退出"的名义下正如一些媒体所说，无论怎样化公为私都"可以，可以，也可以"。

▼ 团结工会



中东欧与中国的三大区别

这些年来，有关东欧转轨不顺利和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即所谓"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的话题几乎主宰了国内外的"转轨经济学"界。从西方经济学本身长期争论的传统问题——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的对垒中形成的古典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两大家把他们的争论延续到转轨经济学中，形成了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但他们双方似乎又有个"共识的共识"，即都说中国渐进、东欧激进。只是一方说中国渐进就对了，而东欧激进则是犯了过分市场化的错误。另一方则认为：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而东欧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现在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从长远看，将来会得益。然而上面的分析说明：恰恰是这个"共识的共识"可能根本是个误识。如果不谈政治改革，仅就经济转轨而言，中国渐进东欧激进之说本身就难成立，据此来进行褒贬就更不得要领了。

源自西方的两派转轨经济学有三个共同的毛病：第一是"问题误置"，老把他们自己的问题，"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或者"自由放任还是福利国家"当成转轨经济中的问题，而且似乎是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问题。于是一派把错误都归咎于"市场原教旨主义"，而另一派把错误归咎于"国家干预主义"。但他们不管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因为这不是"经济学问题"；他们也不大管"如何分家"，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种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计划经济”的概念简单化，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只要不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而且，计划经济就是福利社会加科学主义。于是转轨的全部问题就变成了放弃多少福利和是突然还是逐渐地让企业不再听命于“科学家一官员”。虽然有经济学家讨论过非理性非市场的“习俗一命令经济”问题，但那只属于古代或经济史的范畴。人们似乎没有想过某些“非市场经济”可能比市场经济的福利与科学还少，走出这样的经济也许面临的是另类困惑，而放弃福利或“科学主义”对于他们而言可能并非真问题。两派转轨经济学喜欢对不同“转轨目标”的可行性评头品足，而对转轨前不同的“非市场经济”的“可放弃性”有极大差异，则不大考虑。

第三个问题是“重言不重实”。他们都以为领导人满口“新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就一定是在搞“激进的经济转轨”，而只字不提“私有化”，就证明那个国家是“渐进”的。他们不理解关于“只说不做”和“只做不说”的“东方智慧”。

其实东欧与中国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都非常大。像东欧两个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同出自前苏联的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就几乎是两个极端：爱沙尼亚“激进”得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岂止“渐进”，简直就是不进，根本就没什么改革，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中国也是，像温州几乎全部是私有制，而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保持“一大二公”的地方。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改革以来虽各有春秋，总的来说还都在增

长。而那边的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过长短不等的经济滑坡。显然这根本不是激进或渐进的问题。

实际上，中国和东欧相比较，真正的重大区别有三点：

第一，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中国和东欧改革前都是计划经济，但改革的方向不同，不是"姓社姓资"，也是"凯恩斯与新自由"。然而实际上这两者的方向差异主要是政治性的，经济上谁更"市场化"倒很难说。两者其实与其说是"走向……"的不同，不如说是"走出……"的不同。所谓"鞍钢宪法"和"马钢宪法"之别倒是象征性地看到了一点，实际上，苏联东欧在历史上搞的是现代工业文明扩张"科学主义"的一套理性计划经济体制。而中国搞的是一种不把"计划"当回事的、"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文革"时期尤其如此。打破理性计划经济体制，势必要破坏计划平衡，但市场平衡又无法很快建立，就造成混乱，这个代价无论渐进激进都难免。但在中国，改革开始就是从无平衡的混乱中走出来，不仅市场平衡可以增加效益，引进理性计划平衡也可以增加效益。邓小平说改革最初就叫"整顿"，"整顿"并非走向市场，而是恢复"修正主义"。其实就是放弃了大轰大嗡，搞了点苏式计划；放弃了点"鞍钢宪法"，搞了点"马钢宪法"。这经济马上就有改善。而在本来就是计划均衡的东欧，当然没法搞这种招数。而他们那种"科学"的计划，一放弃就乱套了。换言之，越是"科学的"计划，改革前比大轰大嗡的胡闹效益越好，但放弃它的代价也越大。而大轰大嗡的那一套是可以无代价地放弃的。

人们往往指责东欧国家追求"自由市场乌托邦"，而

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十分现实主义。其实“乌托邦灾难”只是在专制国家才有的现象，宪政民主国家由于思想自由从来就盛产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但因其不具有强制性而不会造成灾难。像捷克的克劳斯，说他有“自由市场乌托邦”思想，大概不假，但这个乌托邦在捷克固然并未实现，却也没有造成灾难，也不影响捷克依据自己国情决定的转轨逻辑实际上成了个“准福利国家”。真正重要的是：不同的“非市场经济”其“可放弃性”（不是应不应该放弃，而是可不可以无代价地放弃）会有极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于转轨国家而言也许比转轨目标的“可实现性”意义更大。总结东欧各国转轨中的错误和教训是重要的，也是《十年沧桑》一书的重要内容。但是像俄罗斯式的“坎托罗维奇体制”，不管采取多么高明的策略，要想放弃它而不付重大代价决无可能。这与中国走出“文革”式的混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一个非自由的经济共同体结构势必有两个职能，即它对人一方面是一种束缚，另一方也是一种保护。因此摆脱这种共同体也意味着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前者是好处，而后者就是“代价”。从逻辑上讲，这种束缚—保护关系应当是均衡的，因而脱离这种关系，不管是突然脱离还是逐渐脱离，都是既有代价也有好处的事。但历史现实中，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束缚和保护并不是对应的，因而好处与“代价”的配比也完全不同。

譬如，我国农民在改革以前处于“被原始积累”阶段，和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农民处境差不多。而苏联后来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基本形成了工业化的都市社会，因而在20世

纪60年代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1966年起，苏联农村已全部实行国家银行统包的"有保障的工资"制。因此苏联农民一方面受到体制束缚，另一方面得到体制保障的程度也相当高。但中国就大不一样，改革前人民公社的特点是束缚功能强大，保护功能却很小。因此，中国农民在摆脱束缚的时候，基本不需要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

与中国相反，波兰、南斯拉夫当年就没有搞过集体化。他们的农民本来就是家庭农场主，拥有我们的农民在改革后才得到自由。但这些国家在旧体制下给了农民很高的社会保障，波兰全国农民1972年就实行了公费医疗，1978年又实行了退休制度，度假制度，等等。因此他们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改革中摆脱的束缚没有多少，但会失去很多保护。对他们而言这代价怎么会不大?

而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在改革初期中摆脱了严酷的束缚，却没有什么保护可失去的。这就形成了中国改革初期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也是中国那时经济发展很快的重要原因。

用经济学"行话"说，改革前中国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人人无利，只有受损多少的过程），走出这个过程的任何变化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人人无损，只有得利多少的过程）。而改革前东欧人所处的是"非帕累托过程"（甲得利乙受损的过程），走出这种过程的改变通常意味着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乙得利而甲受损）。这两者的差别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两点都属于"走出……"之别。对于改革初期中

国何以避免了东欧式的“代价”，这两点基本可以解释。但是“走出……”之别的影响是随时间的推移而递减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比中东欧经济增长更好的优势就需要第三种解释了。而这个解释决不是什么“休克疗法造成灾难”、“激进不如渐进”。恰恰相反，东欧无论渐进还是激进的国家经济无例外地都一度受挫（其实在那里渐进受挫的程度总的来讲往往还大于激进受挫），而在中国，无论仇和式的“休克疗法”还是南街村那一套都能（至少迄今仍能）维持经济增长，直观上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中东欧各国都出现了民主化，而中国没有。

民主条件下搞私有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用我国一些学者喜欢用但却未必合乎科斯原意的说法，就是要付出极大的“交易费用”。共产党人仇和搞的“休克疗法”能够成功地把所有公产包括学校、医院、幼儿园一塌刮子“全卖光”，而标准新自由主义者克劳斯在捷克折腾了8年却搞出个“准福利国家”，这个对比还不够鲜明吗？说什么东欧“激进”？关于“民主分家”过程中的公共参与、多方博弈、筑室道谋、无穷谈判，上面讲了许多，《十年沧桑》一书中有更多的例子。它们确实消耗了这些国家许多精力，损失了不少时间。这是造成中东欧经济转轨困局、而中国能够避免这种困局的又一个原因。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民主化使国家权力受到限制的同时，国家责任却很难推卸。与政府对绝大多数国民即农民没有福利责任的改革前中国相比，中东欧国家原来涵盖城乡的福利保障就发达得多。民主化之后国家任意调配资源的权力不复存在，但福利责任在民主条件下却不是

统治者想卸就能卸掉的。很多外部"左派"批评中东欧简单化地实行"国家退出"，不如中国强调国家作用。其实国家在两者的转轨中都是无处不在，区别只在于中东欧国家"权力退出"易，"责任退出"难、而中国恰好相反。讲责任的时候让你"不找市长找市场"，弄权的时候就是"市场不找市长找"了。即便"左派"最喜欢开骂的俄罗斯，如今社会保障方面的"社会主义"仍然随处可见，非黑土地带许多农民甚至根本不种田却拿国家的保障金买粮吃。相比起前些年传媒"正面报导"说我们某个根本已无劳动能力的百岁农妇向政府踊跃交纳"合理负担"，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才好。西方两派转轨经济学家都认同民主，都不会建议东欧回归专制，同时他们的经济学也有不谈政治只就经济论经济的规则（在政治权力很少干预经济的西方这种规则也很自然），于是便王顾左右而言他，去辩论起什么经济上的激进渐进来了。

所谓"东欧困境"与"中国奇迹"的对比就是基于以上三点。

但是，"民主分家"虽然付出了相当的"交易成本"，从长远看它却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使命：给"分家"的结果提供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起点公正。不管是捷克式的"全民资产公平地分配给全民"，还是匈牙利由民主政府在反对派盯着之下搞的公开、公平竞价拍卖，或者是波兰式的从EBO公平过渡到EMBO和MBO[1]，都具有"分得起点平等，卖得透明公正，委托代理清楚，公平分家然后自由交易，谁是'能人'那时自见分

[1] Maria Jarosz(ed.), Polish Employee-owned Companiea in1995. Warsaw 1996.p87-94.

晓”的特点。这样的合法性首先是合乎自然法——公正性。而这是任何人为的成文法无法代替的。

二是代理公正。正如笔者指出的：国资交易的难点表面上是定价问题，实际上是作为国资所有者的国民与作为资产看守者的官员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委托—代理关系的问题。没有真正而不是自称的委托，“看守者交易”就难以成为合法的代理交易，无论怎么定价，都难免有盗卖公产之嫌。近代民主制产生的基础并不是什么纯粹理念的东西，而就是“无代表，不纳税”的逻辑。这个逻辑用在转轨问题上就是“无代表，不卖（分）产”。中世纪早期西方的“国王”自食其采邑，基本没有全国性税收，民主与否无所谓。后来税多起来了，你收这税拿去干什么？就不跟我们商量？没有我们或我们选出的代表同意，你凭什么征税？事实上，民主化之后通常税不是征得少了，而是更多了。但是纳税人就愿意！同样，转轨以前的体制犹如一个大家庭，子弟们不能挑选父亲，但父亲也不会“解雇”儿子。现在父亲可以解雇儿子了，儿子还能不挑选父亲吗？还能不过问家产的处置吗？事实上，民主化之后即便国企卖价不是高了而是低了，国民也认可，这与民主制下纳税更多人家也情愿是一个道理。在东欧，往往同样是卖企业，甚至是同样的价钱，剧变前卖就引起众怒，被斥为盗卖公产，剧变后在民主制下卖，大家就没话说。

三是协商公正。“分家”兹事体大，即便明确了委托代理，通常也只是具备了私有化民主立法的合法性基础，具体分家进程中的种种利害冲突还是要由利益有关各方谈判协

调。同时民主制也有个健全、完善过程，在民主制尚不健全、"代理公正"仍有缺陷时，各方协商更成为程序公正的关键。即便最后的配置差别不大，有没有商量仍是大不一样的。中东欧的经验证明："吵在前头"比"秋后算账"有利。波兰在1991～1993年间因私有化进程中的具体问题发生过频繁的请愿、示威、游行和罢工，[1]而俄罗斯这种事情就少得多（那时俄国公众的公共参与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是私有化实现后波兰人就安静了，在转轨前和"如何分家"的谈判中极为活跃的工会，当年的"军管"都镇压不下去，但正如《十年沧桑》一书特别指出的：在"分家"有了公正结果的波兰许多私有化企业中，工会几乎无疾而终，特别是跨企业的社会性、政治性工会大都在这些企业"自行消失"。当年呼风唤雨的工运领袖、首届民选总统瓦文萨也因没了听众而黯然走下了政坛。"工会吓跑投资者"的所谓"波兰病"如今大有改变，近年来波兰吸引外资已经赶上匈牙利而居于中东欧榜首。反观俄罗斯，则由于产权配置缺乏公信力而导致资本外逃严重，清算寡头更使许多大企业无法稳定经营，造成巨大损失。[2]

由于"民主分家"的上述功能，尽管在言论自由环境下媒体可能"怨声载道"，实际上公众对改革结果的认可程度决不低。最明显的是十多年来在民主竞选中各国执政党多次更迭，左右派轮番上台，转轨结果都得到公认。主张走回头路的政党尽可以公开存在与宣传，得到的选票却越来越少。总的来看，中东欧国家已经实现了通过"民主分家"建立公正的产权结构并维持稳定的过程，这对未来的发展是极为重

①参阅克里斯蒂娜·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49页。

②博戈莫洛夫：《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发展前景》，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5期。

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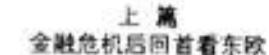
总之，尽管各国情况不一，但总体上中东欧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所谓经济转轨太“激进”而导致“休克”，而是“民主分家”的高交易成本有时反而导致拖延损失，民主化造成的国家责大权小也恶化了转型期财政困难。但是从长远看，这种成本是值得的。事实上如今中东欧地区经济复兴最早最快、转轨“代价”总体上最小的几个国家，恰恰都是“分家”最民主也最公正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

“分”之罪？不分之罪？关于俄罗斯教训

中东欧诸国中，俄罗斯转轨中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无论在效率上还是公平上都如此。于是一些人一谈中东欧就是俄罗斯，似乎波兰、捷克等等都不存在。“俄罗斯化”成了争论中指责对方的一个说辞。而对俄罗斯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所谓休克疗法，二是“证券私有化”。关于俄罗斯的所谓休克疗法，《十年沧桑》一书中有详细的分析。不管这种主张是好是坏，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早在苏联末期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普京上台之际。而搞“休克疗法”的盖达尔执政仅半年，从切尔诺梅尔金上台起就说要放弃“浪漫主义改革方式”。长达十余年的衰退都归咎于那半年，说得过去吗？在前苏联范围内，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取过盖达尔的方式，比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就没有。但是他们现在的状况还不如俄罗斯。



▲ 普京



由于俄罗斯经济搞得不好，我们经济学界的"左""右"双方都拿俄罗斯的"证券私有化"说事。"左派"说俄国人一分了私有化证券就拿去换酒喝，有人乘机收购大量证券，于是便霸占了国有资产成为寡头，这多不公平！可见这家千万分不得，自由主义罪该万死，还是让大家长管着好。"右派"则说俄国人就是穷讲究什么公平，要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结果股权极度分散，造成公司治理不好效率低下，要是把产权交给经理就好了！可见分家就是要依靠强者，平民立场罪莫大焉。

其实这两种说法本身就互相抵销：如果证券私有化造成产权极度分散，何来寡头之说？如果它使产权集中于少数老板，又何来公司治理问题？更有甚者，有的批评根本就是颠倒的，如说私有化证券不值钱，又说企业定价太低，几张证券就可以换走大企业，还说俄罗斯只分不卖是大错，这几种指责在逻辑上怎么可能同时成立？如果只分不卖，所谓资产定价就只与私有化证券发行额有关，而与通货膨胀无关。如果以通货膨胀为理由把企业提价，同时私有化证券的发行额又是固定的，并不随通货一起膨胀，那私有化证券怎么还能换到产权？有些人口里说人民至上，实际上把人民说成傻瓜，说他们一拿到证券就换酒喝了，因此就不该向他们分配资产。其实由于当时官方并没有真把多少资产拿出来分，私有化证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确也就等于废纸，拿它"换酒喝"还应当说是聪明之举。俄罗斯还有1/5的证券根本就没有兑换成股票（哪怕是垃圾股），白白作废了呢。而拿"酒"换了一些废纸的那些人倒多当了倒霉鬼，哪个成了"寡头"？



▲ 叶利钦

《十年沧桑》以实证研究证明：当时叶利钦政府实际上是借通货膨胀和资产重新定价之机赖掉了原先许诺的资产分配。主要的国有资产根本就没有“分”。“私有化证券”只能换一些垃圾股，大量收购这些证券的人后来基本上都破产了，根本没有变成“寡头”。后来的寡头恰恰是在1994年俄国私有化“改分为卖”之后，一些权贵通过“内部人交易”（这恰恰正是中国现在流行的做法）把国家耍赖没有拿出来分给老百姓的那些资产（而不是分给了百姓但他们不知珍惜又拿去换了酒喝的资产）攫为己有的结果。寡头们根本不是通过收集私有化证券发迹的。也就是说，如果当时俄国像捷克那样认真地通过“证券私有化”搞了资产的公平分配，后来的经济发展肯定是另一个样子：能不能更快增长不说，至少不会有寡头之弊。

这并不是说捷克式分配就十全十美没有缺陷，也不是说就不能“卖”。《十年沧桑》一书在肯定捷克式的“起点平等”的同时也指出其“投资私有化基金”（IPF）的后期运作有问题，影响了公司治理。而“卖”如果像匈牙利那样规范地操作，公平出售国有资产并用所得充实社会保障与公益福利基金，也是可以的。问题在于，俄罗斯说“分”又没真分，“卖”又卖得很不光明正大。但是由于这个真相很少有人了解，某些人就老以俄罗斯“平分国有资产导致经济失败”为借口主张直接把公共资产私相授受。因此《十年沧桑》一书澄清俄国“证券私有化”的真相是非常必要的。俄罗斯的问题根本不是“分”了以后由于“证券自由买卖”造成了寡头，而是政府口头说“分”实际赖了账，然后把赖着



俄共宣传画

不“分”的资产私相授受给了“内部人”。作为中国人，我们究竟应当从中汲取怎样的教训？

如今，“非主流”指责中国的私有化是“俄罗斯化”，“主流”回答说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搞证券私有化把国有资产分给老百姓！问题是俄罗斯难道就真的把资产分给过老百姓？没有公开地给老百姓，这不恰恰正是暗地给权贵了吗？俄罗斯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左右两派共同把人搞糊涂了。

其实，俄国私有化没有捷克那么公平，原因之一是俄国的民主化水平本身不如捷克的民主化，它的私有化过程因此也就不如捷克公平；其次，民主化是私有化能够公平进行的必要条件，但未必是充分条件，民主国家的私有化不一定公正，但不民主的私有化一定是不公正的。然而，正是由于俄罗斯毕竟还是有一些民主，政府处置公产还算是具有委托—代理的合法资格，而社会有关利益各方在这过程中也有过不

少谈判，经历过相当激烈的讨价还价与妥协，最后这样的结果虽然令人不满，但并没有多少人主张推倒重来。如今我们这里有人主张“先私有化后民主”，其根据居然就是说俄罗斯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但也没有导致清算。这不是惊人的逻辑颠倒吗？俄罗斯难道是“先私有化后民主”的例子？它的私有化尽管不公平却也没有导致大清算（其实小清算还是有的，例如如今普京对待霍多尔科夫斯基），难道不恰恰是民主先行一步的结果？如果反过来，戈尔巴乔夫时代权贵们就先在体制内的黑箱里瓜分掉了公产，然后再出现叶利钦的民主化，那还了得？那时被追究的还能仅仅是那几个“政变分子”？

如今争论双方都拿俄罗斯说事，一边说如今的改革就是“俄罗斯化”，另一边说否，我们比俄罗斯搞得好。然而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方案可是不仅经过左中右各派的自由辩论和民主的立法程序，还通过了全民公决的。而今天看看，我们的国资改革经过了全民公决吗？更重要的是：它经得起全民公决吗？

俄罗斯国资改革导致的财富分配是否比我们的更不平等，已经是个疑问——不少数据表明，如今中国的基尼系数（城乡综合）超过俄罗斯，如果这点还有疑问，那么超过匈牙利、波兰（8.28北京讨论会上支持郎咸平的发言者一再提到的反面案例）等东欧国家是毫无疑问的。

而我们如今的产权配置的合法性——包括法律合法性和道义合法性——比俄罗斯（更不用说比东欧）又如何？必须指出，不平等与不公正（没有道义合法性）并不是一回事。



• 卡西亚诺夫

仅仅是基尼系数较高并不说明公正性更低。洛克菲勒富可敌国，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公。而周正毅、赖昌星之富比洛克菲勒差得远，但国人皆为之切齿。俄罗斯的国资改革显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如今普京收拾"尤科斯"是很得人心的。但是据普京采取反寡头行动后俄罗斯的民意调查，73%的被访者支持普京，而同时对行动表示不满的前总理卡西亚诺夫仍有39%的被访者支持。[1]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得知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一事的受访者中，有54%的人对这一行动持赞同态度，4%的人坚决表示反对，而多达42%的人态度含糊或不置可否。[2]

而今天你看看我们的网上民意，强国、人民这些比较"左"的网站就不说了，新浪、搜狐等普及型网站的几个数字都表明，强烈支持郎咸平的高达90%以上！虽然网民并非全民，但是俄罗斯的那两个调查也是通过网络进行的，因此还是有相当可比性。要知道俄罗斯向寡头发难的可是当今的铁腕总统，比郎咸平这么个民间学者（还不是大陆的）的号召力难道不大得多么？可是它激起的民意支持还远不及我们这次的"郎旋风"！可见俄罗斯公众对国资改革的不满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公众对国资改革不满的一面倒程度。尽管我们这里许多人喜欢渲染俄罗斯的危机，但不客气地讲，这些年来俄罗斯人民虽然有怨气，但"革命形势"绝对没有。而中国如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改革由于公正性危机而翻船的可能性，比俄罗斯要大得多！

①http://finance.qianlong.com/26/2003/11/03/206@1686495.htm
②http://www.southcn.com/news/international/gjkd/200311070084.htm

中篇
波兰独立之路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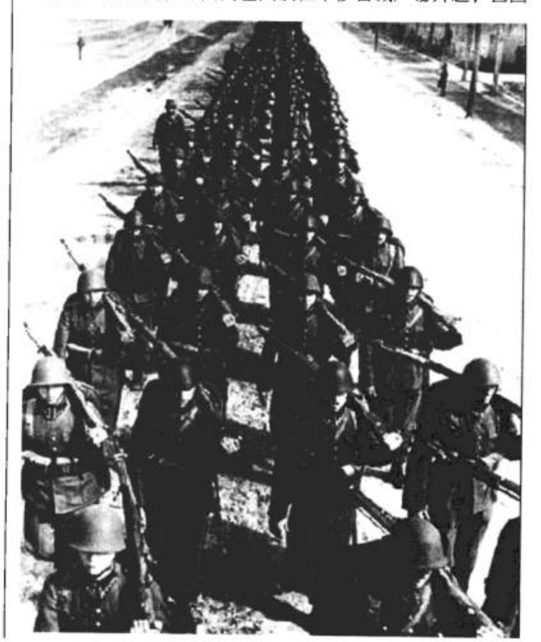



欧洲不死的勇士

历经磨难的“波兰独立之路”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东欧民主的策源地"

1918年11月11日，波兰的俄、德、奥属地区合并，成立独立的波兰共和国，红白两色国旗在华沙古城广场升起，亡国



开赴前线的波兰步兵



▲ 波兰古城克拉科夫

123年的波兰正式复国了。自此11月11日独立日与5月3日宪法日并列为波兰国庆节。1939年波兰遭到纳粹德国和斯大林苏联的“第四次瓜分”再度亡国。1945年波兰光复后依附苏联成为“大家庭”成员，国庆节也换成苏军解放日。直到1989年波兰“剧变”后才又恢复了原来的传统。到2008年恰恰是波兰独立90周年大庆。11月11日波兰驻华使馆隆重举行招待会，“波兰独立之路”的横幅醒目地置于会场上方。“只要我们一息尚存，波兰就不会灭亡……”，随着《波兰军团战歌》（波兰国歌）的旋律响起，在场的人们浮想联翩。

现在的波兰很少为国人所关心。有人说：在世界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东欧在我们面前却越来越模糊了。除了“剧变”之初的负面报道外，我们的媒体近来频频报道的主要是波兰、捷克等“新欧洲”国家如何比“老欧洲”更亲美反俄，基调也是负面的。基于今天的意识形态与国际政治背景，这并不难理解。

然而如果我们透视历史的纵深，就会发现今天有人非议的这种状态在波兰已经有200多年历史。而当年在"老欧洲"，对波兰人这种态度最为赞赏的思想家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祖师马克思与恩格斯。马、恩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最反感的就是专制的沙皇俄国，经常张口闭口"俄国佬"。而在尚无"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知道马、恩泉下有知，对后来的苏联会怎么看）的当时，对于"资本主义"各国他们最欣赏的（至少是批评最少、赞扬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我们都知道马克思曾如何热情洋溢地祝贺林肯当选，称这位美国总统为"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在痛斥欧洲一些工人运动人物与当局合作的同时，马、恩却支持他们的密友、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创建者魏德迈加入美军，直至成为林肯麾下的圣路易斯军区司令。

同样很自然地，在欧洲各国中，马、恩对波兰的支持与赞赏也是最热情的，并与他们对沙俄的反感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恩格斯曾称赞波兰是"东欧民主的策源地"，[①]说波兰人到处传播民主，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份进行战斗的民族"。[②]马克思更在纪念波兰抗俄起义的专文中高度赞誉波兰人民是"欧洲不死的勇士"，称赞波兰人历史上对蒙古人、奥斯曼帝国与沙俄的抵抗拯救了欧洲。[③]"欧洲的人民群众在他们能够自由呼吸的时刻记起了波兰对他们的恩情。"[④]

另一方面，马、恩都多次批评"旧欧洲"列强对俄国实行迁就与绥靖政策、没有对波兰人的抗俄斗争给予应有的支持。1866年，马克思为第一国际临时中央委员会写的"就若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2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31页。

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强调通过帮助“民主波兰”复国的途径来“消灭俄国在欧洲的影响的必要性”。“民主波兰的存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了。没有民主波兰，德国就一定会变成神圣同盟的前哨；有了民主波兰，德国就会同共和制的法国进行合作。在这个重要的欧洲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工人运动总会遇到障碍，遭受失败，发展也将延缓。”[①]他还强调：“对欧洲来说，只能有一种选择：要么是以俄国佬为首的亚细亚的野蛮势力像雪崩一样压到它的头上；要么它就应当恢复波兰，从而以2000万英雄为屏障把自己和亚洲隔开，以便赢得时间来完成本身的社会改造。”[②]

持类似态度的当然不只是马、恩，当时欧洲许多进步人士都有类似言论。1848年革命中著名的德国民主派政治家阿尔诺德·卢格就说：波兰人“是全欧洲自由的传播者”，“加在波兰身上的暴力，使波兰人散布在欧洲各地；他们到处流散，因为遭到非正义行为而充满了愤怒，……波兰精神在法国和德国成了更合乎人道的精神，而且纯化了，因为波兰的流亡者成了宣传自由的人”。“我尊重波兰人在全欧洲表现出来的那种手执武器宣传自由的可敬的志向……，他们到处以急先锋的姿态出现。”[③]卢格当时与马、恩矛盾甚大，他的这番话也招致了恩格斯的批评。但恩格斯批评什么？他嫌卢格的赞赏还不够，他说卢格你为什么只夸奖“波兰流亡者”？难道留在故土的波兰人争取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不是更加可歌可泣吗？

显然这些进步人士在《支持波兰》（恩格斯一篇文章的题目）的问题上简直是争先恐后。他们为什么这样赞赏波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9页。

③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22-423页。

兰？波兰的独立之路为什么这么坎坷？“民主波兰”为什么这么重要？让我们从头说起。

“贵族民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007年的《大国崛起》电视片使英国中世纪贵族限制王权的“大宪章”作为近代英国宪政的源头活水而广为人知。应该说，欧洲宪政的确与贵族政治的传统有关，但贵族政治本身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又构成障碍，而贵族强大往往以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存在为基础，这种关系也不是近代文明所能认可的。都铎王朝时期在“市民与王权”联盟的基础上克服贵族政治的弊病（其实也就是在某种意义上破坏“大宪章”），对英国后来宪政之路的影响，并不亚于“大宪章”本身。可以说，没有贵族对王权的制约，英国就会变成拜占庭式的“东方专制帝国”，但不克服贵族政治的涣散，英国也不可能走出中世纪。

而在这两个方面，波兰都比英国更为典型。

波兰是欧洲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966年，西斯拉夫人的皮雅斯特王朝的梅什科一世统一波兰，并接受基督教，从此波兰文明与西欧沟通。其后200年间由于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和外敌的入侵，国势一直不振，直到14世纪皮雅斯特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卡什米尔国王再度统一波兰，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波兰一跃成为中欧大国。1364年，在克拉科夫召开的“中欧君主会议”标志着波兰的崛起。14世纪末，波兰


▲ 齐格蒙特三世



◂华沙的齐格蒙特纪念柱

联合立陶宛对付条顿骑士团，1386年，波兰女王雅德维加与立陶宛大公雅盖沃联姻，波兰—立陶宛合并成一个国家，波兰历史进入"百年辉煌"时期，建立了贵族共和民主政体。

雅盖沃王朝的几位国王从一开始就是外来户（比如匈牙利的路易和立陶宛的雅盖沃），他们为了取得合法性、巩固王权，向贵族作了很大的让步，实行多数决定的贵族议会制。那时波兰所谓的贵族绝大多数是小贵族，其中许多就是自由农民而已，大概除了农奴外就算贵族，因此人数众多。有人说占人口1/10，也有人说占1/5。而当时一个"自耕农"式的小贵族与拥有数千农奴的大贵族，投票权是相等的。这些贵族比"大宪章"下的英国贵族还要神气，他们在政治上掌握着议会，军事上掌握着民团，几乎没有哪个阶层能与贵族抗衡。除了教会有权势，接下来就是贵族了。

波兰贵族享受着当时任何欧洲国家都比不上的广泛的民主自由权。15世纪，贵族就首先使用波兰文的"共和国"（Rzeczpospolita）来给自己的政体定型。贵族议会的权力高于一切，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增加税收、不能动用军队、不能批准法律。到雅盖沃王朝结束时贵族政治更进一步发展为"自由选王"制和"协商一致"原则，国王不能世袭继承，王族血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国王是由贵族会议选举产生，议会分上下两院，而小贵族组成的下院权力更大。这是欧洲最早的两院制"贵族民主"政体。在这一体制下原则上每个波兰贵族都有当选国王的可能，但是由于彼此差不多的人之间不容易摆平，所以波兰国王反而是从邻国的王族中产生的较多，这个时代法国王子、瑞典王子、特兰西瓦尼亚



◀波兰古都克拉科夫的圣玛丽亚教堂

大公等等都当选过波兰国王，欧洲当时尚无“民族国家”概念，“外国人”当国王在各国都是见怪不怪的。

贵族议会初时在限制王权、规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尊重公民权利、发展市民文化、促使城市自治、繁荣社会经济方面有积极的影响。1364年成立的雅盖沃大学是中欧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哥白尼推翻“地心说”的《天体运行论》也是在那个时代产生。而在波兰成长为中欧文化重镇的同时，它的国力也一度强盛。当时波兰贵族主要是能征善战的小贵族，他们人数多达人口的10%～20%（可以比较：同时期的俄国贵族仅占人口的1%），不易形成寡头，多数决定就能形成决策，因此行动能力较强。15世纪时波兰已成为中欧强国。与立陶宛合并后的雅盖沃王朝一度统治着包括今天白俄罗斯、乌克兰大部、匈牙利、捷克乃至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地的庞大地区，在北方于1410年坦宁堡之役打败条顿骑士

团，1525年迫使骑士团归附为受波兰册封的世俗领地普鲁士。在东方于1514年奥尔沙之役打败莫斯科大公国，以后还一度进军莫斯科，先后扶植两个"伪沙皇"建立依附波兰的政权。众所周知，后来由普鲁士统一起来的德国和由莫斯科大公国发展起来的沙皇俄国成为波兰的两大克星，但曾几何时，当初这两者都曾俯首称臣，成为波兰的附庸。

但是"贵族民主"后来就走向没落了。首先是连年征战导致小贵族衰落，大贵族兴起，他们成为互不相让的寡头，多数决定的民主制蜕变为我行我素的"自由否决权"制，任何决定非经"协商一致"不能做出，议会里每个代表都有否决权。这种"一票否决"的后果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各

▼波兰人大战条顿骑士团



有外来势力背景的贵族中取得绝对一致几乎不可能，于是任何议案的生效都难乎其难。1652－1707年的半个世纪中波兰议会召开过55次，其中就有48次一个议案也没有通过。加上自由选王制下当选者多是外来者，1572－1795年的200多年里的11个国王有7个是外国人。这些外来因素使邻国纷纷插手波兰政务，导致波兰中央政权衰弱，贵族割据，政治混乱不堪，国势也江河日下。

一般来说，“贵族民主”衰落后的出路不外乎两个：一是建立专制独裁，二是结束贵族政治变成近代的宪政民主。很多国家，包括“大宪章”与近代宪政之间的英国都曾经过一个王权强大的专制主义（现在一般叫“绝对主义”）阶段，它先结束了贵族政治，然后才是市民战胜王权建立近代民主。波兰其实也有这样一个阶段，然而它却是以波兰亡国的形式出现的。波兰人似乎比英国人更强烈地喜欢民主自由，她自己内部并没有形成君主独裁的气候。而是周边的三个君主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尤其是最为专制的沙皇俄国灭亡了贵族的波兰，正如恩格斯所说：“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小贵族民主制的崩溃，也就是大贵族在小贵族内部的产生。这是前进的一步，因为它是摆脱过时的小贵族民主制的唯一途径。但它的后果是什么呢？是历史的铁蹄即东方的3个专制君主粉碎了波兰。”[①]

而波兰人从此就把两种斗争——反抗外来专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对内改变贵族传统、建立近代民主的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可以说，直到1989年的剧变，这“二合一”的斗争一直是波兰历史的主线。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07页。

《五·三宪法》：抗俄斗争与民主改革的结合

波兰在东欧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它是俄罗斯的西邻，历来被后者视为面向欧洲的屏障，对俄罗斯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波兰作为中世纪大国，长期与俄罗斯处于敌对状态。一些俄国人认为他们自摆脱蒙古人自立以来遇到过三大外敌：波兰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其中德国希特勒逼近过莫斯科，法国拿破仑短暂占领过莫斯科，但只有波兰人不但曾占领莫斯科，还扶植过傀儡政权。今天红场上最著名的铜像就是米宁和波扎尔斯基两位抗波英雄的。但17世纪中叶以后，俄转强而波势衰，俄国转而西侵。1654年，俄国沙皇以哥萨克首领赫梅尔尼茨基请求为由，把原属波兰的德聂伯河东岸8万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并入俄国，此后俄国军队就没有离开过波兰。从18世纪末起更在一百多年里与日耳曼列强连续四次瓜分波兰，致使波俄两国人民间形成长达数百年的民族仇恨。

俄国一方面把沙皇专制强加于波兰，另一方面极力保持波兰人内部一盘散沙的贵族传统以便其渔利。因此在波兰亡国前就不断干涉波兰事务并阻挠其改革。1764年，波兰举行新国王选举，俄国女王叶卡特琳娜二世便要求：新国王“必须是对俄国有利的人”，最后施压使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情夫斯塔尼斯瓦夫·博尼亚托夫斯基当选。当时波兰议会准备通过限制“自由否决权”的法律，也遭到俄国的阻挠。1772年，俄国在镇压了波兰农民起义后与普鲁士、奥地利在彼得堡签署瓜分波兰条约，使波兰丢掉了1/3的领土（21.1万平方公



▲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的雕像

里），这期间波兰的贵族和知识界痛定思痛，经过四年艰苦的议会辩论（史称“四年议会”），终于在1791年5月3日通过了《五·三宪法》，在建立近代民主宪政的进程中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

210多年前出现的《五·三宪法》的精神即便在今天仍然有生命力。它废除了外国人担任国王的传统；改“自由否决制”为“多数表决制”，实行三权分立；废除贵族特权，实行“市民参政权”；废除农奴制，改行“自由农民”制；并提出让农民也享有各种“受到国家保障的权利”。用恩格斯



油画《五·三宪法》▸



▴科希秋什科

的说法，在"贵族民主"的废墟上波兰人要建立"农民民主制"，而沙皇要建立专制独裁。[①]《五·三宪法》还宣布，天主教虽为国教，但与宗教宽容精神并行不悖。全体公民是"民族独立自由的捍卫者"，在国家受到侵犯的时候"任何阶层都可以拥有军队"。在18世纪末世界史上的"宪政突破"中，这部宪法具有很高的地位。现在不少学者都把1791年的波兰宪法、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宪法视为近代民主法治的三大开山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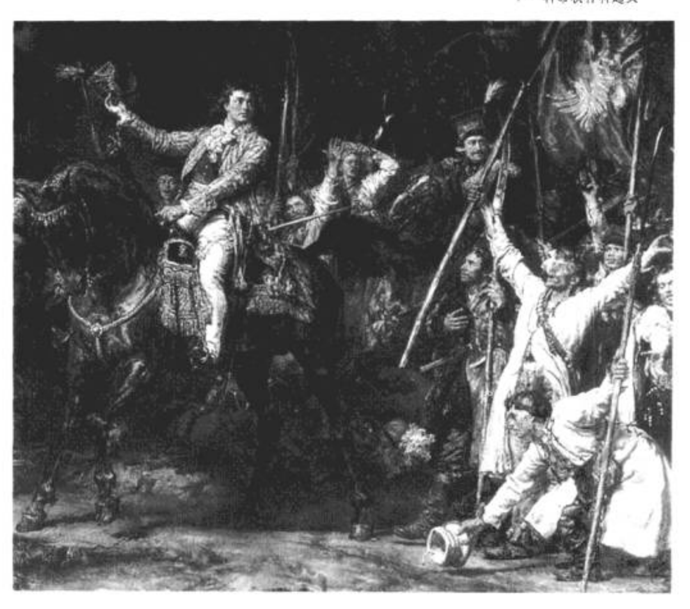
但《五·三宪法》的通过却引起了专制邻国的强烈反对。1792年，俄国伙同普鲁士以波兰帮助"法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为借口出兵波兰，对波兰进行第二次瓜分，《五·三宪法》被废除，"四年议会"的决议被取消。1793年，波兰议会在俄国军队的刺刀下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整个会议无一人发言，气氛悲愤，成为史上著名的"无声议会"。波兰至此只剩下20多万平方公里，400万人口。面对危难中的祖国，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的科希秋什科秘密潜回克拉科夫，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史称"科希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08页。

秋什科起义”。起义军以教堂作为据点，靠变卖教会的银器为经费，起义最后被俄普联军共同镇压。1795年，波兰第三次被瓜分，国家彻底灭亡，地图上已不存在波兰了。

1815年，俄国在反法战争胜利以后，成为欧洲专制势力镇压民主浪潮的“神圣同盟”的盟主。俄国把原来的普、奥两国控制的占领区攫为己有，建立了一个由沙皇任国王的“华沙大公国”。波兰反对占领者的斗争实际上主要就是抗俄斗争。1830年，华沙发生起义，5万人的波兰起义军与12万

▼科希秋什科起义



人的俄国正规军殊死拼搏。1864年，俄国成立"波兰王国事务委员会"，其旨意是要抹煞掉一切有关"波兰"的记忆，比如禁止波兰人讲波兰语，禁止学校讲授波兰历史，当时唯一可以公开使用波兰语的是教堂，所以教会成为波兰人心目中的"地下政府"和精神依托。1863年在教会的策划下，波兰民众以在教堂内用波兰语祈祷和高唱波兰圣歌来反对俄国的奴化政策，从而开始了波兰亡国期间最大一次抗俄起义，即1863－1864年起义的高潮。这些起义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是有力地支持了欧洲民主潮流。所以才有了卢格的著名说法：民主在波兰的失败换来它在欧洲的胜利。

"全欧洲自由的传播者"：波兰的民族主义与普世主义

波兰民族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她酷爱自由，在整个亡国期间前赴后继一次次发动起义，不愧为"欧洲不死的勇士"。复国后头一仗就是苏波战争，内战中所向披靡的苏联红军在华沙城下遭到唯一一次大败。在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是牺牲人口比例最高、流血最多的国家，战前的1938年波兰的人口是3500万，二战中死亡22%（六百多万）。而且波兰人的抵抗不是拿老百姓做炮灰，而是精英率先赴难。二战中波兰教会神职人员死亡三分之一，知识分子死亡38%，都明显超过一般居民的死亡率。著名的雅盖沃大学甚至全体教师都被德国人杀害。人口仅有中国1/18的波兰，



◂奥斯维辛集中营

牺牲人口几乎达到中国的1/3，一直到1970年代波兰人口才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波兰在整个沦陷时期一直由德军控制，没有出现伪政府、更没有伪军，甚至德军设在华沙的总督府也不敢雇用波籍雇员。面对二战中出了150万"伪军"的苏联，波兰人骄傲的说："我们没有波奸，更没有'解放军'（按：由苏军降将弗拉索夫上将率领的最大一支俄国伪军名为'俄罗斯解放军'）。"就连华沙的美人鱼塑像也与丹麦著名的哥本哈根美人鱼温顺的形象不同，是一个一手拿剑一手拿盾的美人鱼，一副大义凛然保卫民族独立的写照。作为老对头的俄国人深知这个民族性格刚烈，苏联时期因此也让她三分，苏联与南斯拉夫闹翻后在东欧各国掀起大"肃反"，杀了几十万的"铁托同党"，但在波兰基本没有下手。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本是当时东欧自由之风的始作俑者，后来的匈牙利事件起初就是为声援波兰人而发动的，但是苏联在匈牙利出



华沙的美人鱼塑像

动大军大开杀戒，对波兰最初也想出兵，后来却在波兰人的强烈反应下止步，改而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波兰民族的自尊自立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然而另一方面，波兰人又是十分突出的普世主义者。今天的世界语就是波兰人柴门赫夫创造的，它虽然未能在世界上成功推广，但"世界主义"的精神影响很大。波兰文化十分开放，天主教来自西方就不用说了。在文化传统上，法国对波兰的影响甚至大于俄德奥三个宗主国，无论宗教还是民主理念，波兰均类似法国，二战前她在欧洲一直有"斯拉夫人的法兰西"之称。波兰近代的几个最著名的文化精英，如肖邦和居里夫人等都与法国有不解之缘。如果说波兰精英特别亲法，那么一般波兰民众对美国更有好感。由于历史原因，波兰左中右都亲美，在美国有300万波侨、1000万美国人有波兰血统。波兰学者兹纳涅茨基与美国学者托马斯合写的



▲ 肖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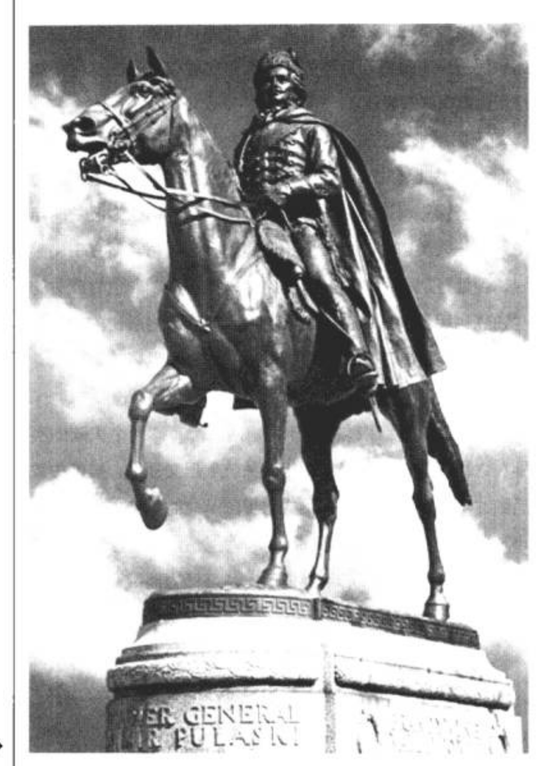
名著《欧美波兰族农民》开创实证社会学传统，它对波兰普通移民——不是肖邦那样的名人而是庄稼汉——的文化桥梁作用也有很好的表述。

18世纪末波兰走向亡国，同时世界却迈向民主。在此过程中，大批波兰人抗争失败后漂流四方，因失去祖国成为“世界公民”，造就了一大批民族英雄。他们认为波兰的自由只有在人类自由的背景下才能实现，因而摒弃孤立主义眼界，到处打抱不平，为超国界的“人类正义”、也为波兰的“独立和民主”浴血奋战世界各地，成为卢格所说的“全欧洲自由的传播者”和马克思所说的“唯一为世界革命而战斗的民族”。可以说，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波兰人。

K.普瓦斯基和T.科希秋什科，两人都有“两个大陆的英雄”之称。普瓦斯基是1768年波兰抗俄起义领袖，抗俄失败后到北美参加独立战争，又成为美国革命的英雄。他于1777年成为美军骑兵司令，又深入英军后方组织“普瓦斯基军团”开展游击战，1779年阵亡后，华盛顿为他撰写了碑文。



◀ 波兰上演的《美国》的剧目



普瓦斯基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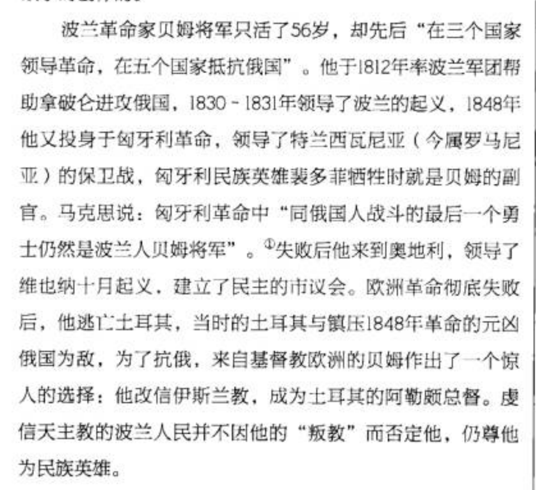
科希秋什科则是先率领波兰志愿者在美国革命中一举成名，然后回到波兰，领导了1794年抗俄起义。

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中，大批波兰志士组成“波兰军团”为保卫革命法国而战，他们军装的袖口上写着“普天下

自由的人们是兄弟”，体现了强烈的普世主义理想。《波兰军团战歌》在剧变前后一直都是波兰国歌，前南斯拉夫国歌也是采用它的旋律修改填词而成的，但这首歌却不是在波兰国内创作，而是波兰军团的维比茨基在意大利参加抗奥地利战争时创作的。



▲普瓦斯基



波兰革命家贝姆将军只活了56岁，却先后“在三个国家领导革命，在五个国家抵抗俄国”。他于1812年率波兰军团帮助拿破仑进攻俄国，1830－1831年领导了波兰的起义，1848年他又投身于匈牙利革命，领导了特兰西瓦尼亚（今属罗马尼亚）的保卫战，匈牙利民族英雄裴多菲牺牲时就是贝姆的副官。马克思说：匈牙利革命中“同俄国人战斗的最后一个勇士仍然是波兰人贝姆将军”。[①]失败后他来到奥地利，领导了维也纳十月起义，建立了民主的市议会。欧洲革命彻底失败后，他逃亡土耳其，当时的土耳其与镇压1848年革命的元凶俄国为敌，为了抗俄，来自基督教欧洲的贝姆作出了一个惊人的选择：他改信伊斯兰教，成为土耳其的阿勒颇总督。虔信天主教的波兰人民并不因他的“叛教”而否定他，仍尊他为民族英雄。

贝姆之后的又一名波兰民族精英梅洛斯拉夫斯基，16岁时就参加了1830年波兰大起义，1848年他先后参加了普鲁士的三月革命、西西里岛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起义，1849年，他又参加了欧陆革命的余波——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并领导巴伐利亚—巴登地区的起义。最后他回到波兰，又领导了1863年起义。

波兰人在各国热心于据说是姓“资”的民主运动，也热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5页。



▲ 贝姆将军

心于姓"社"的工人运动。波兰人参与了第一国际的建立。1871年，有600多波兰志愿者成为巴黎公社的保卫者。曾经参加过俄国民粹派运动的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和符卢波列夫斯基流亡法国，又成为巴黎公社军队的两个主要将领，分别领导西线与南线的防御。东布罗夫斯基阵亡，成为最著名的公社烈士。而符卢波列夫斯基在公社失败后继续成为第一、第二国际的活动家。

亡国后的波兰人还大批卷入了宗主国的反对派运动。俄国的民粹派、德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不少波兰人参加。而当时的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英特纳雄耐尔"普世主义倾向，因此尤其吸引波兰精英。投身于德国工人运动的波兰人卢森堡，投身于俄国工人运动的拉狄克、捷尔任斯基等人都是代表。

当时俄罗斯帝国境内犹太人、波兰人和格鲁吉亚人是社会主义精英最集中的三个少数民族，在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上层中，这三个民族的人远比俄罗斯人多。但是耐人寻味的是：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后来的"俄罗斯化"，这三个民族的革命家几乎都被清洗出局。就波兰人而言，除早死的捷尔任斯基外，不但以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狄克、乌克兰共产党创建者柯秀尔、白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博古茨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波兰族布尔什维克后来都在苏联死于非命，就是复国后在本土从事亲苏共运的波兰共产党，也于1938年莫明其妙地被共产国际说成是"奸细"控制的党并被下令解散。当时波苏关系紧张，该党由于亲苏在国内受到迫害，领导层几乎都流亡在苏联，结果在苏联大肃反时全

部被杀。斯大林屠杀流亡苏联的外国共产党人并不稀奇（中共的俞秀松等人就是这样遇难的），但整个党被解散的，只有波兰共产党一家（后来执政的统一工人党是二战末期重建的）。当时整个波共政治局所有成员中只有在国内“反动派”的监狱坐牢的兰普一人活了下来。兰普于世界大战爆发后出狱到苏联，1943年逝世前留下著名的“兰普遗言”：“如果靠苏联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在波兰将会被推迟几代人时间。”

总之，民族自尊与普世价值在波兰人那里显得非常协调。上面提到的那些名人在波兰被视为民族英雄，在他们为之“争取自由”的那些国家也享有很高声誉。笔者曾在美国的哈佛广场上看到下面摆着鲜花的普瓦斯基纪念碑与科希秋什科纪念碑。唯一遗憾的是那些为“英特纳雄耐尔”而献身的波共冤魂，他们后来虽在1950年代得到平反昭雪，但波苏两边的共产党当局都不太愿意提及这难堪的往事，剧变后他们在波兰与俄罗斯似乎都被遗忘了。20世纪初波兰共运起源于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的波兰社会党和国际主义传统较浓的波兰与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两党素来就有矛盾。后来由两党各自的左翼合并成立了波兰共产党，这两大传统似乎应该能结合起来了。然而不久就出现了更加血腥的一幕：波兰人把波共视为“共产国际支部”而加以排斥，而苏联人又说他们是“波兰的奸细”而残酷屠杀，真是令人浩叹！



▲ 硬币上的普瓦斯基肖像

宽容的十字架：波兰的宗教文化与信仰自由

尽管欧洲各国普遍信仰基督教，但波兰生活中的宗教氛围之浓厚仍然极为突出。波兰人口中90%以上是天主教徒，而且其中大多数经常参加宗教活动。教会作用之大、威信之高令人吃惊。神职人员的构成相当年轻则是波兰教会的另一个特点，尤其在基督教各分支中较为"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波兰神父们的年轻化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波兰教会的地位有悠久的渊源。历史上天主教是民族之魂，在抗击蒙古、奥斯曼土耳其、瑞典、德国、奥匈帝国与俄国人的历次斗争中，天主教都起了巨大的民族凝聚作用。圣城岑斯特霍瓦的明山大教堂，曾是波兰人抗击瑞典入侵的组织核心。克拉科夫的圣玛丽亚大教堂上，当年抗击蒙古人进犯的报警号角至今还作为一项著名传统仪式而定时吹响。尤其在亡国的123年里，面对信奉东正教的俄国统治者和信奉新教的德国统治者，天主教信仰成为波兰人民族意识的支柱，教会以其在波兰人民中的威望，实际上成为影子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国家（如东欧的克罗地亚与斯洛伐克）的天主教会曾与纳粹占领者合作，但波兰教会始终坚持抵抗立场，大量的教士慷慨赴难，有1/3的神职人员牺牲。他们的鲜血换来了民族的尊敬。[①]

由于教会深得人心，即使在苏联控制下的时期，当局也让它三分。当时波兰统一工人党是东欧共产主义执政党中唯一党纲中不写入无神论、并正式允许教徒入党的。在波党领导的波军中那时仍然没有军中教堂和随军神父，波军总政治

①参阅阿·留科斯：《天主教与波兰社会主义政权》，见（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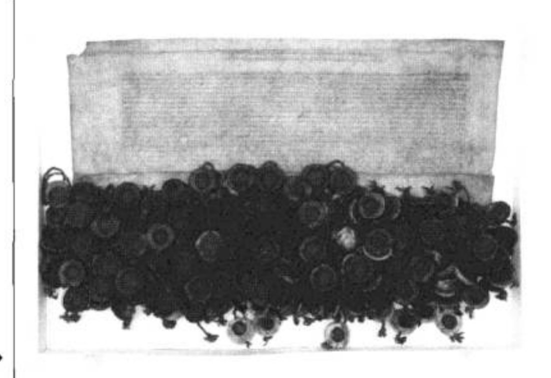
部甚至还设有副部长级的总神父（由党员教徒担任）。这在全世界无论是执政的还是反政府的共产党军队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事。

所以波兰人中能出现著名的天主教世界领袖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过去我国往往简称保罗二世，这是不对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15世纪另有其人，并不是偶然的）。他是450年来第一个非意大利籍教皇。他于1978年当选后，曾应邀访问过波兰，当时出现了万人空巷的狂热欢迎场面，但几乎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波兰人传说是当局有意如此，希望发生混乱，损害教会声誉。但是几十万欢迎者自觉地维护了现场秩序，据说事后广场上干干净净，连一朵花都没有被践踏。有人认为，正是这事使民间看到了自己的能力：没有现当局，我们也过得下去。于是人们有了转轨的信心……教会人士的这种说法我们当然是姑妄听之，不过教会在转轨过程中的影响是大家公认的。



▲ 教皇约翰·波罗二世

然而对于近代文明来说尤其可贵的是：波兰一方面是个几乎全民信教、宗教氛围十分浓郁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基督教世界最早确立宗教宽容、信仰自由原则的国家。这也与当时波兰独特的政体有关：1572年国王西格蒙德二世去世，来自欧洲各王室的5个人竞争波兰王位，其中来自法国的安茹公爵亨利呼声最高。但亨利被认为在法国曾参与策划屠杀新教徒的“圣巴托罗缪惨案”，遭到波兰新教徒的抵制。新教贵族在波兰人数很少，但是按当时的“自由否决权”制度，没有他们同意亨利是无法当选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天主教贵族同意与新教贵族达成协议，在选举前的1573年1月28


华沙公约

日，全体世俗议员都签署了关于宗教宽容的《华沙公约》。它规定所有波兰贵族都享有宗教自由。后来当选的国王也宣布尊重这一公约。

过去人们往往把中世纪的异端审判仅仅归罪于教会。其实一般情况下教会的权力只能把"异端"革除教门，真正对异端动用刑罚是要世俗权力来干的。中世纪以火刑残害异端的地方通常世俗王权十分狂热，"异教徒"被宗教法庭革除教门后世俗法庭再判处火刑。而宗教迫害最严重、火刑最泛滥的西班牙，恰恰是世俗王权最强大、教会完全屈服于王权，以至于宗教法官由国王任命、而不是按惯例由罗马教廷任命的结果。波兰的国王既然承认信仰自由，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1573年《华沙公约》使波兰成为欧洲很少几个既无异端审判、又没有遭到宗教战争蹂躏的国家。而这个时期，宗教迫害的火刑柱在南欧到处树立，西欧也爆发了一系列"神圣之战"：胡格诺战争、胡斯战争、三十年战争、再

洗礼派运动、清教革命……

而《华沙公约》的宗教自由原则到1791年又被《五·三宪法》重申。因此400多年来，波兰的各种少数派教会在天主教的绝对优势下一直保持着生存与布道的权利。波兰对犹太教的相对宽容（当时欧洲排犹相当普遍，波兰并非完全没有），使她在纳粹占领前长期成为欧洲最大的犹太人聚集地。笔者旅波期间，在赫尔姆参观过东正教堂，在切钦进过新教教堂，它们都正常活动。据说波兰还有喇嘛教的寺庙活动。今天在波兰，宣传无神论、抨击教会的言论不会惹来任何麻烦，尤其是《论坛报》、《今天》等左派报刊经常刊登文章，揭露教会神职人员的奢侈与腐化、反对教育宗教化倾向。我想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自由，波兰教会尽管影响很大，却仍处在舆论监督下，不可能像路德抨击的中世纪教会那样发生体制性腐化。而这又反过来维护了教会形象与人民的宗教热情。

在自由环境下，人们不可能以标榜信教来谋取权力、获得世俗利益，因而信仰动机比较单纯，也不会因政治气候变化而看风使舵。这种信仰经得起时间考验。同时在现代社会，信仰是个人的事，他人也不能以信仰为由任意干预你的私生活。笔者曾与一位从教堂做弥撒出来的华沙大学女生交谈，她赞成堕胎自由，而天主教会是反对堕胎的。有趣的是，国民如此虔信天主教的波兰，今天却是欧洲堕胎率较高的国家之一。

看到过波兰人欢迎约翰·保罗二世那种热烈场面的中国人几乎都会想起“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但波兰人从不像红

卫兵那样狂热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宗教热而不狂，信仰与理性兼容、宗教热情与宗教宽容并重，是波兰民族的传统。波兰人尊重教会，但反对政教合一；没有“信仰真空”，但不会扼杀世俗理性。在转轨时期，波兰人的宗教信仰为社会伦理规范和精神秩序提供了宝贵资源，而宗教宽容传统又使宗教极端势力与教权主义难成气候，这些都很值得称道。



渡尽劫波终见岸
波兰从复国到转轨的坎坷历程

德苏"第四次瓜分波兰"



▲国内战争时期的苏波战争宣传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革命、德奥战败使波兰的三个宗主国先后崩溃，根据《凡尔赛条约》东欧一大批国家纷纷独立，被瓜分长达123年的波兰宣告光复。被称为"波兰拿破仑"的社会党人毕苏斯基从德国监狱回国当选为国家元首。1920年苏波战争爆发，托洛茨基领导的苏俄红军直逼华沙城下，被毕苏斯基领导的"民族军"重创。1920年波苏签定《里加和约》，历史上属于波兰的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今乌克兰西部的里沃夫等5州）重归波兰。[①]但波苏关系一直不好。

同时波兰与西邻德国也因"但泽走廊"等历史悬案关系紧张。"但泽"即今天波兰的波罗的海港口格但斯克，中世纪时波罗的海沿岸是条顿（即德意志古称）骑士团领地，后来在贵族民主波兰强大时，骑士团归附波兰，成为藩属普鲁士，波兰人也进入这一地区。以后普鲁士强盛，反客为主，通过统一全德、瓜分波兰成了主人。但泽也就成了德国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波兰复国，《凡尔赛条约》规定旧普鲁士所属波罗的海沿岸大部分地区仍归德国，而波兰有一条狭长的领土通向波罗的海，使波兰拥有出海口。由

① ЯжборовскаяИ. С. Между Киевом и Варшавой. // Открывая новые страницы .М.,1989. с.2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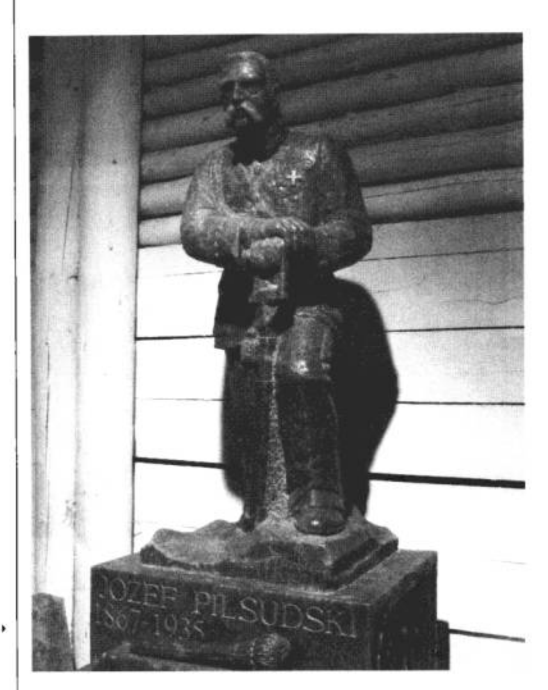




▲16~18世纪华沙全景图

于这条"走廊"末端的海岸线很短而且无良港，又规定走廊东边的但泽为自由港，虽为德国城市，但由国联治理，波兰可以使用港口。这样的安排使波、德都不满。对波兰来说她

的出海问题并未解决，对德国来说这条“走廊”把德国领土切成两半，走廊以东的普鲁士成了与其余国土不相连的“飞地”，而且但泽由国联治理，德国视为“失地”，波兰却觉得使用仍不便。再加上国际政治中的其他背景，双方矛盾加剧。纳粹在德国上台后，更利用这些矛盾煽动民族情绪，要以波兰作为突破口来推翻凡尔赛体系、为上次战败“复仇”、建立纳粹称霸的世界秩序。这最终导致了对波发动战争。



波兰维列奇卡盐矿用盐作的毕苏斯基的雕像

由于苏联也对波兰怀恨，战前的1939年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就搞了个秘密议定书，确定了两国在东欧的利益范围。苏联同意德国占领波兰，德国也认可苏联从波兰手里“收复”西白俄罗斯与西乌克兰（即当时的“东波兰”）。现在这被认为是两国“第四次瓜分波兰”。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以闪电战进攻波兰，波兰军队抵挡不住向东撤，9月17日苏联军队从背后又捅一刀，不宣而战攻入波兰东部，击溃了猝不及防的东撤波军。在苏德两强的夹击下，弱小的波兰很快战败，二十余万军队向苏联投降，没有执行投降令的军队退入罗马尼亚和立陶宛。

卡廷森林惨案

被苏联人俘虏的波兰军官被编成146个战俘营，从1940年3月开始隔一段时间就有100人被送离苏联的集中营，总共送走了1.47万波兰军官以及1.1万波兰公民。此后苏联对外声称，俘虏营已被取消，允许波兰战俘回国，还向他们发了通知。从此以后这些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年后苏德开战，加入了反法西斯阵营的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成为盟友，波兰将军安德斯从苏联监狱放出来后找斯大林要这批人，斯大林说，他们都跑了，可能是跑到满洲里去了。1942年波兰方面再次要人，斯大林说我们把所有的人都释放了，他们可能在德国占领区。1943年，德军在俄罗斯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八个埋葬着万名波兰军官


华沙街道 ▸

尸体的大坟场，苏联组织的国际委员会坚持说，这是德国法西斯的罪行，1946年苏联还在卡廷树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纪念1941年被希特勒匪徒枪杀的波兰军官。"但波兰人和国际社会一直认为这些人是苏联杀害的。纽伦堡审判时法庭就没有采纳苏方就卡廷事件指控德国人的诉状。

这个悬案一直到苏东剧变以后才揭晓：卡廷森林的集体屠杀是根据斯大林下达的绝密指令执行的，当时苏联的政治局委员们还在指令上签了字以示集体负责。文件公布后，1990年4月13日塔斯社发表声明，正式承认这21857名波兰人是被苏联内务部杀害的，还说这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卡廷事件之谜终于真相大白。因为斯大林对1920年苏波战争耿耿于怀，遂在卡廷报一箭之仇，消灭波兰的军事精英，免得他们将来与俄国作对。



▴ 卡廷森林

所以在波兰人看来，1945年的胜利并不真正意味着解放，仅仅是更换了占领者，而1989年才是二战真正的结束。

1990年12月，在华沙贝尔维德宫举行的新任波兰总统的就职仪式上，伦敦流亡政府总统将波兰第一共和国国旗、宪法原件和总统印信交给了剧变后的波兰总统瓦文萨，表示了历史合法性的继承关系，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让波兰的历史回避了作为共产党东欧阵营的51年。1995年，这些军官的遗骸被运回华沙，他们终于可以在祖国的土地上安息了。

华沙起义的悲情遗恨

另一件挫伤波俄民族情感的是华沙起义。1944年6月，苏联红军发动夏季反攻。7月30日，苏军打到与华沙市区一水之隔的维斯瓦河东岸，离华沙市中心仅6公里。苏军在此广播号召波兰人民起义，并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地下武装“国家军”使节进行了接触，答应给予支援。于是“国家军”揭竿而起，华沙全市响应，很快占领了2/3的市区，当时华沙是德军的交通枢纽，有5个精锐师把守，有大批德军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等精良装备，而起义的波兰国家军只有2.5万人，其中只有10%的人有武器装备，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发动起义主要是相信苏联人会支援。起义爆发以后波兰人期盼着苏联红军的到来。

不料此时斯大林却借口华沙起义是“冒险行动”，是由一批反苏分子发动的，苏联塔斯社声明此次起义与苏联毫无关系，拒绝支援，反而在河对岸停止了攻势，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是由苏联扶植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年7月

由斯大林倡议成立）成立一个亲苏联的政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与苏联已经达成协议，苏军进入波兰境内后，战地最高权力由苏军总司令掌握，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在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境内后，对于军事行动区域内与交战有关的事务，由乌克兰第一、白俄罗斯第一和第二方面军司令负责，民政事务则由上述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总体负责，苏军占领区域维持公共秩序、人口调动等有关事宜皆应经由这些机关，其他政权机关，包括伦敦的流亡政府都不予承认。"在长达两个多月之久的时间内按兵不动，名副其实地"隔岸观火"，坐看德军屠杀起义者。只有一支由苏军中波兰人组成的小部队实在看不下去，擅自渡河去支援同胞，结果几乎全部牺牲。苏军不仅不支援起义，盟军从英国给起义军空投补给希望使用苏占区机场，也被断然拒绝。致使盟军只能从西线横穿整个德国远距离空投，代价惨重而且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战前波苏有宿怨。尽管这时双方已成为反法西斯盟友，但是当波兰即将成为囊中之物时，斯大林是不允许流亡政府东山再起的。借德国人之手消灭流亡政府的地下力量以便扶植新的共产党政府是他的如意算盘。

到最后起义坚持了63天，终于弹尽粮绝伤亡殆尽。10月2日，起义军放弃抵抗。此役国家军1.8万人战死，加上伤、俘，基本上全军覆没，而居民死亡20万，全城化为废墟。当时华沙城内有居民80万，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牺牲者。起义失败以后全波有35万人被送到德国做苦工，1.2万人在奥斯维辛被处死。波兰人称已向苏联正式通知准备发动起义的情况，为什么得不到援助？莫斯科1944年7月的广播中还号召波兰人

民起义。苏联人事后说，这个广播只是一般性地呼吁人民拿起武器。1944年8月13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一篇声明，强调苏联与华沙起义无关，起义方事先没有与苏联商量过，苏联对此一无所知。这种解释怎能令波兰人信服呢？事实上，华沙起义的幸存者后来在苏联控制时期还受到迫害，因为苏联人说起义是“资产阶级流亡政府”的阴谋，他们想抢夺苏军的胜利果实。但就连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中的很多人对这种说法也极为不满，到1960年代以后，华沙起义才逐渐得到肯定。

华沙起义并未抢夺“苏联的胜利果实”，但苏军为等待德军消灭波兰人而停止进攻达两个多月，却为西线盟军的进

▼华沙起义纪念雕塑





勃兰特下跪

展赢得了时间。如果苏联人当时一直进攻，苏军最后与英美盟军会师可能就不是在易北河，而是在更西边的莱茵河，整个德国将成为苏占区，也不会有后来的西德了。所以后来波兰人说，西德总理勃兰特1970年代在华沙那著名的下跪，固然是为纳粹暴行表示德国人的忏悔，但也何尝不是为西德人对波兰人的感谢呢！

哥穆尔卡与"波兰道路"

在自古就缺乏专制传统的波兰，剧变前的旧体制本来也比其他东欧国家温和。斯大林死前波兰统一工人党虽也搞内部清洗，但没有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大批杀人。斯大林死后东欧出现"非斯大林化"，但这一潮流在匈牙利、捷克、东德都被镇压，只有波兰的哥穆尔卡站住了脚。

哥穆尔卡二战时在国内参加抵抗运动，于1943年就任波党总书记，根据战后的国际局势，他在1940年代末就曾提出要走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波兰道路”。但当时在冷战的大气候下斯大林强制推行苏联模式，哥穆尔卡以“右倾民族主义”罪名被捕入狱，“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随之夭折。

1956年后，苏联开始“非斯大林化”，对历史有所反思，同时也由于苏（俄）波关系的敏感性，对波兰开始表现出较为宽容的一面。1956年波兹南事件后，哥穆尔卡复出执政。这与匈牙利事件时原先在斯大林时代受迫害的纳吉的复出，性质本来很相似，而且起初苏联对纳吉的接受程度还超过哥穆尔卡——纳吉本是长期流亡苏联，二战结束时随苏军回国的“苏联派”，而哥穆尔卡则是苏军到来前就在国内搞地下活动的“国内派”。当时东欧政治的一般常规都是“苏联派”比“国内派”更得苏联人的信任。但是由于苏联在匈牙利出兵镇压，纳吉终于被逼上梁山与苏联翻了脸。而在波兰，赫鲁晓夫本来也想出兵，考虑到波兰人的反应后终于放弃，改而对波兰采取了妥协政策，承认了哥穆尔卡执政，并允许他在一定范围内走自己的路。但是在事关“阵营”基本利益的问题上，苏联对波兰的控制又十分强硬，为此不断与波兰人发生冲突。

波兰的经济学界一直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大本营。二战前波兰左派思想界就在世界上首先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式的设想，当时旅美的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卡列茨基等都以此成名，并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卓有建树。战后社会主义时期兰格等人



▲ 奥斯卡·兰格



▲ 盖莱克

回国，又培养了W.布鲁斯等一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家，主张实行模拟市场、有限计划等经济改革政策。虽然在斯大林模式下这种"离经叛道"的理论时而受到压制，但自哥穆尔卡的"波兰特色社会主义"搞起来后，总的来说它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宽容度仍是东欧国家（南斯拉夫除外）最大的，尤其在1980年代体制内改革气候形成后，"市场社会主义"更逐渐成为波兰剧变前经济思想的主流，并对波兰经济产生实际的影响。

盖莱克时代

哥穆尔卡时代，"波兰道路"取得了相当成果。但是到了1968年，捷克改革"出轨"，苏联出兵镇压，对东欧的控制也再度收紧。不久哥穆尔卡因波罗的海三城事件引咎下台，继任的盖莱克开始了第二次"波兰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哥穆尔卡相比，盖莱克"改革"不如，而"开放"过之，他主要采用向西方大借外债的方式搞"高投资、高消费、高速度"。结果经济确实加速了，人们的收入与福利也有提高，但财政危机却越来越严重。

人们往往在经济政策上分所谓"左""右"。如果按通常的说法，盖莱克似乎比哥穆尔卡"左"一点儿，哥穆尔卡有点"市场化"，而盖莱克更注重搞福利。但是在政治上相对于其他苏东国家而言不那么专制的波兰，无论"左"还是"右"都有它的特点：以农业为例，哥穆尔卡时代终止了集体化，农民增加了一些"自由"。盖莱克给农民搞了公费

医疗和退休金，增加了一些“福利”，却并没有恢复集体化。自由与福利轮番推进的结果，老百姓是得到好处的，但政府所“取”渐少、所“与”渐多，到一定时期财政就难以为继。由于没有民主授权的合法性基础，政府只能靠“多与少取”来建立合法性，一旦经济形势迫使其改为“多取少与”，就会碰到合法性危机。而那时如果不下辣手，或者辣手失灵，合法性危机就凸显为政治危机了。

盖莱克的政策搞到1970年代末，财政已经支持不住。不得不提高物价，却再度引起工潮。1980年代初，工潮发展出团结工会。政治危机加深。一年多时间内波党几度换马，从盖莱克、卡尼亚到雅鲁泽尔斯基，三易其主，仍未能控制局势。作为“大家庭”家长的苏联勃列日涅夫政权不满波兰当局的温和，再次考虑出兵占领波兰。当时的波兰雅鲁泽尔斯基政府赶紧主动实行军管，用铁腕镇压反对派，才把苏联



◂ 乡间摊贩

安抚下来，避免了匈牙利事件和捷克“布拉格之春”后那种被占领的命运。但是波兰政府却因此留下为虎作伥的骂名，合法性丧失殆尽，成为它后来在“苏东波”中首先倒台的原因。在剧变前的40多年历史中，波兰形成五年一小事，十年一大变的周期性动荡局面，并且最终使波兰成为导致“阵营”解体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团结工会的崛起

团结工会发源于波兰北部最富有工人运动传统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1970年这里发生“波罗的海三城（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事件”，引起大规模工潮，当时已经有了民间工人组织的雏形。1976年拉多姆事件后，以华沙大学一批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纯经济利益驱动的工潮开始与大范围的社会变革运动发生联

格但斯克造船厂



系，并与知识界思潮产生互动，[1]后者使工潮的思想性与组织性明显提高。1980年波罗的海沿岸工潮再起，并迅速蔓延全国。在罢工委员会的基础上，"团结工会"终于在工潮发源地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成立，并且于1980年8月31日与较开明的格但斯克当局签订了承认有限工会自治的《格但斯克协议》。该协议使团结工会一度合法化，顿时成为波兰工人的希望，"标志着历史性的突破"[2]。到这年年底，会员发展到1000万人，占全国职工的80%，大量基层企业工会成建制地加入，使得官方工会濒于瓦解。

1981年9月，团结工会召开"一大"，通过改革决议，年底发动全国总罢工，走上了与当局对抗的激进道路。在苏联威胁要出兵镇压的情况下，波兰当局于1981年12月13日宣布军管，取缔团结工会，逮捕其领导人。头一年，共有10100多人被拘禁，破获了677个秘密组织。瓦文萨等团结工会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但是波兰人又一次表现出"欧洲不死的勇士"性格，工人们选出第二、三梯队，组织团结工会全国协调委员会转入地下继续对抗。他们在军管期间组织了大小罢工240多次，出版地下刊物500多种，小报100多种，加上无数的传单。"地下印刷业"居然盛极一时，竟使军管后波兰纸价上涨10倍，被政府破获收缴的地下印刷机多达1196台，仍在运转的印刷机却似乎越缴越多。1982年12月31日，历时一年的军管取消，但团结工会仍处于非法状态，时起时伏的工潮也一直未能停止。

①（波）亚当·米奇尼克：《通往公民之路》，崔卫平译（2004年内部交流版），第218页。

②（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33页。

圆桌会议与"半自由"选举

这时的波兰当局其实已经意识到计划经济搞不下去，很急于试探市场经济。波兰早在1956年后就终止了集体化，农民早已是家庭经营，到了1980年代不可能再像中国那样从农村改革中取得突破。国企改革是要工人付出代价的。其实从当局方面讲早就有了这种改革的意愿：那时当局与工会对峙，就是不考虑经济绩效，仅仅为了在政治上压制工会的势力，当局也乐于让"自己人"当老板，使企业有"强化管理"的积极性，让经理可以随意解雇工人。但是在军管中失去了道义合法性的当局已经不可能说服老百姓承担"改革代价"，也不敢动用铁腕去搞这种改革。梅斯内尔政府任内开始暗中鼓励管理层承包企业，一些部门还搞了"不明不白的私有化"，但这反倒加剧了社会的不满。同时，老百姓也不允许当局推卸社会保障责任。1970年代以来几乎每次物价上涨都引发抗议浪潮。政府的财政补贴负担也因此越来越重。

在权力越来越受限（虽然制度上尚无制衡，但实践中弄权动辄惹祸，权力也就逐渐失灵了），而责任却越来越难推卸的情况下，当官已经越来越不好玩了。从1980年雅罗谢维奇辞职后到剧变前，9年换了7个总理，形势在逼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就权责对应进行讨价还价。1988年当局推出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付诸全民公决，结果却遭到绝大多数票的否决，梅斯内尔总理为此辞职。到了此时，焦头烂额的当局实际已经无心恋栈。

同时，此期间苏联也已走向危机。经济困难已经使苏

联越来越难以帮助“大家庭”中的小兄弟渡过难关，而戈尔巴乔夫时代日渐开明的苏联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动辄出兵镇压，或者逼迫小兄弟自己搞“军管”了。国内外环境的大势所趋，使1989年波兰当局终于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并签订圆桌会议协议，举行“半自由的”大选。

这一大选规则本来仍是要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现体制的：它规定国会大部分议席分配给执政党联盟，但具体人选须经选举确认；只有小部分议席与新设立的参议院（席位较少）同反对派实行自由竞选。两院议席总数中分配给当局的席位仍占多数，即使自由选举失败，当局仍然可以在两院稳获控

▼ 波兰团结工会创始人瓦文萨发表演说



制权。瓦文萨在大选前就曾公开表示，团结工会不可能在这样的选举中掌权，他们只想做“建设性反对派”。政权轮替只有指望下一届实行真正的竞选才有可能。

但选举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当局在自由选举中竟一席未得，创下了世界竞选史上执政势力得票的“零的纪录”。而且在分配给当局的议席中，当局的候选人绝大部分也在第一轮就被选民否定。团结工会不得不出面呼吁选民第二轮投票让他们过关，使他们得到按圆桌会议协议分配给他们的议席。在这种难堪局面下“当选”的执政方候选人为维护个人名誉，纷纷在大选后宣布退党，执政联盟中的盟党也宣布与主党分手而与团结工会结盟。于是“半自由选举”保证执政者得到的多数议席便失去了意义。旧体制下最后一任总理基什查克放弃组阁，雅鲁泽尔斯基总统宣布由团结工会方面组织政府。于是剧变“意外地”提前发生，从此开始了连续四届“团结工会政府”执政时期（1989—1993）。

“工会掌权”的波兰

团结工会政府是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奇观：它的政府成员大多是当年团结工会的专家顾问或支持团结工会的知识分子。他们虽已成立政党，但这些党影响不大，其社会基础还是靠工人选票，而向它授权的议会成员多数为工会活动家。它要完成“在工人阶级支持及民主参与下建设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似乎十分悖谬的任务，这就决定了它面临极为复杂的利益博弈。政府经常由于议会的不信任案而更换，四届政府

平均任期只有一年。导致其下台的不信任案通常并非“反对派”——由“前共产党人”构成的左派——提出，而是由“自己人”即团结工会议员提出。许多议员甚至上午对议案投了赞成票，下午作为工会领袖又走在反对议案的示威队伍前列。当初物价一涨就上街抗议的工人，现在对“自己的政府”一下子放开物价却投下了赞成票。然而他们的耐心也有限，一年半载未见成效，这怨气就凝结成了下一个不信任案，再换一个“自己人”。

就这样这几届政府完成了转轨初期最困难的任务，同时也成为民众的出气筒。马佐维耶茨基、别莱茨基、奥尔舍夫斯基、苏霍茨卡四届政府就是这样由团结工会送上台又撤下台的。1993年9月又是团结工会的议员把“自己人”赶下台后组织了第一次“完全西方式的自由选举”，很多人认为，下一个上来的还会是“团派”。结果再次让人大跌眼镜：当初在“半自由选举”中本来不指望上台而指望在这次“自由选举”中成功的“团派”，四年前“意外地”提前上了台，这次却“意外地”大败下台。而当年在半自由式选举中输得极惨的“前共产党人”，这次在纯西方式竞选中反而获胜，使波兰出现了东欧第二个（此前只有立陶宛）“左派复兴政府”。

可见，有人说是“西方式民主”使波党丢了政权，这个说法有问题。事实上导致波党下台的1989年选举最多只能说是“半西方式的”。而真正第一次像西方那样竞选却使团结工会下了台，使波党（当然已重组为社会民主党）上了台。现在不少波兰人认为，1993年大选的意义不下于1989年导致剧变的那场选举。这不仅因为它是1939年以来第一次完全意义



▲卡钦斯基

上的"竞选"，更因为它使左派看到：原来民主并不可怕，只要尊重民意，认真办事，靠票箱掌权比靠枪杆子掌权心里踏实得多。事实上，由于"前共产党人"组织资源、人才储备与行政经验毕竟更为丰富，在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剧变以来近20年的民主政治中虽然时有上下，总的来说还是共产党的"后继党"占优势的。

经过四年左派政府时期的反对派生涯后，1997年大选中"团结工会选举运动"再次击败前共产党人的"民主左派联盟"，开始了第二次团派执政。到2001年再次下台，总计剧变以来团结工会方面人士执政长达8年。然而正是这8年，把团结工会折腾得精疲力竭，几乎到了消亡的边缘。2001年大选失败后"团结工会选举运动"宣布解散，愿意从政的另行组党，而工会本身回归到企业中为工人争取权益，不再打算坐江山了。2006年团结工会出身的卡钦斯基兄弟上台，但是他们已经靠的是政党得票，与工会无关。波兰至此结束了"工会政治"的过渡形态，转为一般宪政条件下的政党政治了。

民主"分家"麻烦大

不过，1989年后的多次政党轮替，对转轨的大方向并无影响。"前共产党人"组成的左派不仅同样要搞私有化，而且他们没有工会背景，上台后私有化反而加速。倒是团结工会最"右"的一翼一方面与教会结合，对人心不古的世俗化批评甚厉，另一方面有太强的清算意识，总想追究剧变前旧体制下权贵私有化的老账，反而推迟了私有化进程。而团

结工会过去力量越大的那些巨无霸工厂，如华沙乌尔苏斯工厂、西里西亚煤矿和团结工会的摇篮格但斯克造船厂等，私有化的谈判越艰难。事实上，剧变后人们争论的已经不是要不要私有化的问题，而是在民主政治的博弈中各个利益群体关于怎么“化”法对自己更有利的复杂的讨价还价。

波兰剧变的主力是独立工会运动，团结工会所代表的产业工人组织程度高，而且作为工会运动天然具有强大的工联主义倾向。在剧变前工会自治是颠覆旧体制的主要力量，但到了经济转轨时期，工会力量的强大却使得转轨中的搏弈过程变得极为复杂。“工会吓跑投资者”是波兰转型期的突出现象。波兰许多大企业的私有化方案往往反复多次，都不为工会所接受，使产权改革过程极为艰难。今天波兰经济学家一般都不承认他们搞的产权改革是“休克疗法”。虽然转轨之初这个说法很盛行，在物价放开方面确实也基本上是一步到位，但要说到私有化，却是“立法容易实践难”。有些国家私有化可以从不立法，在黑箱里就可以把活儿都做了。波兰却相反，要“分家”的共识早就有了，但“如何分家”的共识却极难建立。因为没有意识形态障碍，私有化立法很容易。但要在一个个具体的企业落实，却有扯不完的皮。在民主国家，“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能行得通吗？

波兰经济转轨是在工会力量强大、民主传统浓郁、很高的社会参与度和较浓的平民主义色彩的背景下进行的。正面的经验与反面的教训都与这一点有关。由于民众的广泛参与和配合，波兰较顺利地度过了转轨之初的“休克”阶段。但此后的企业改制过程中为各方无休止地讨价还价付出的“转



小镇的集市 ▸

轨成本"也较大。所谓"冰棍效应"的一些案例也十分典型，如格但斯克造船厂就是因为转制争论十年不决，而最终拖得资不抵债，遭到破产清理。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样的"成本"并非白付，正由于产权改革中广泛的民众参与和充分的讨价还价，使得波兰改革后的产权配置具有充分的道义合法性。像俄罗斯普京那样拿"寡头"开刀树威（尽管是有选择的，现在俄罗斯寡头并不比叶利钦时代少）的事在波兰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如今的波兰尽管富人不少，靠弄权起家的寡头却没听说过。也没有什么人谈论资本的"原罪"或者"大赦"的问题，政党轮替了那么多次，也没有谁要"清算"什么。只有对剧变前一些"不明不白的私有化"，有的"极右派"还嚷嚷着要追究。但是随着时过境迁和现实生活的改善，热衷于算老账的人越来越少。尽管波兰私有化速度实际上相当缓慢，但经济增长成绩却比私有化速度更快的捷克、匈牙利要高。

走向“新欧洲”

波兰经济在1991年下半年就出现回升，在整个前东欧地区仅次于被西德接管的前东德，是最早回升的国家，从1992年开始，年度经济即转为正增长，1995年底超过剧变前水平，这些也都是东欧最早。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标准，则转轨的经济成效更明显。[①]制度转轨前波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计算约为4000美元，到2001年已达到9000美元左右，翻了一番多。1989年，波兰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5－38美元，现在是400－600美元，增加了约16倍。当然一般消费品物价也提高了约7.5倍，但收入增长还是远远高于物价增长。波兰人的生活水平无疑是提高了。1989年波兰居民家庭平均食品支出占收入的46%，而到1996年只占37.8%，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剧变前波兰平均每10人有1辆家庭轿车，1996年每10人已有2.1辆。到1999年波兰2/3的家庭有私车，其中35%的家庭有不止一辆。波兰人的消费水平已由剧变时的电视普及时代跨入如今的轿车普及时代，提升了整整一个档次。由于生活改善，波兰人均寿命也普遍提高。剧变前男子平均寿命为69岁，到2001年已提高到74.5岁；妇女平均寿命也从73岁提高到78岁。

市场经济要讲竞争，就难免有贫富之别。但波兰的贫富分化程度在转轨国家中是较低的。从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来说，1987－1988年度到1998－1999年度，波兰历经11年转轨，基尼系数只提高了0.02，[①]而俄罗斯提高了0.23，捷克提高了0.07，匈牙利也提高了0.025。至于我们中国的情况，大家都

①格·科沃德科：《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第86页。

知道了。

波兰产权改革初期的特色就是"工人民主"色彩浓厚的内部人均股，或者说是典型的雇员股份制，再通过后续的交易使产权适当集中、优化。在这一过程中"工会吓跑投资者"的问题也逐渐化解：进行过雇员所有制改造后的企业，其员工倾向于把自己企业的利益置于工会政策之上，越来越难以积极参与社会上的跨企业工人运动。在一些企业中工会组织甚至被雇员股东会议所代替而发生"工会消亡"现象，所谓"成也工会败也工会"。剧变之初波兰就通过了欧洲标准的《劳工法》，我国曾有学者批评说这个法只讲工人权益不讲劳资两利，会拖了波兰经济的后腿。但是在波兰加入欧盟的过程中这个法还是很起作用的。而入盟对于波兰经济的好处也很明显。

今天的波兰作为新加入欧盟的8个原东欧国家之一，已成为"新欧洲"的一员。而"新欧洲"与"老欧洲"的差距在明显缩小。2001年"新欧洲"人均GDP仅为"老欧洲"（原先的欧盟15国）的46.2%，2006年已经达到54.4%，明显超过了入盟时预期的"每年以一个百分点追赶老欧洲"。

尽管波兰目前还有失业率偏高、投资率偏低等一系列问题，如今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对其产生影响。但是与过去90年来波兰历尽劫波的旅程相比，已经进入了发展的顺境。我们预祝波兰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①W. Kolodko, Incomes Policy, Equity Issurs,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September 1999. Vol.36.No3.



米洛舍维奇

铁托的背叛者与南斯拉夫的掘墓人

"忠于南共的米洛舍维奇"？

2006年3月11日，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宣布，目前正在受审的原南联盟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当天在荷兰海牙附近的联合国监狱里去世。此事立即引起很大反响。盖棺定论，米洛舍维奇的政治生命成了议论的焦点。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国舆论对前南问题与米氏也议论纷纷。人们对米氏的评价明显两极化：有人说他是推行恐怖专制的独裁暴君，"巴尔干屠夫"，死有余辜的战争罪犯。有人却称赞他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我国一本流传颇广的米氏传记称他"对南共表现出少有的忠诚与坚定"。而他与西方的矛盾则是因为米洛舍维奇作为"欧洲最后一个拒不归顺的布尔什维克"成为西方的眼中钉。我国的网上甚至有些帖子表示"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米洛舍维奇"。



▲ 米洛舍维奇

显然，前一类判断流行于西欧和塞尔维亚本部以外的前南地区。前南境内的非塞族人把米氏斥为屠夫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就塞尔维亚内部而言，按民主政治高度发达的欧洲标准，米洛舍维奇对塞尔维亚本部的统治固然可以说是专制，但在世界范围内与真正的独裁暴君如萨达姆者流相比还



◂贝尔格莱德塞族人悼念米氏

是不可同日而语。米洛舍维奇时代虽然有压制、有政治舞弊、乃至有"红色贝雷帽"（政治警察）的暗杀，但是在1990年代的大潮流下，不管米洛舍维奇自己愿意与否，塞尔维亚毕竟还一直存在多党制，与苏联式的专政还是有所不同。套用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句名言：政治自由在米氏时代是多少的问题，在斯大林时代是有无的问题。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应该说本来就比苏联集团国家要开明些。米洛舍维奇又是在"第三波民主化"的背景下上台的，他虽然想要独裁，但在这种背景下也很难为所欲为。所以把米氏看成斯大林式的人物是很不准确的。

实际上，尽管有下面要谈到的重大区别，但从总体上讲，米洛舍维奇与上世纪90年代的许多东欧国家领导人一样，属于推动"剧变"、搞垮了旧体制的人物。说他"坚定地忠诚于南共"简直是笑话。今天在其祖国，米氏的支持者

会称赞他忠于塞尔维亚，但要说他忠于南斯拉夫（指铁托的南斯拉夫，而非“前南”解体后的小“南联盟”），那就与说叶利钦忠于前苏联一样滑稽，更不用说忠于南共了。把他描绘成“拒不归顺的布尔什维克”大概只是我国一些沉溺于意识形态的人在闭目塞听之下所作的文学遐想。

“铁托主义”与“切特尼克主义”：南斯拉夫与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问题

尽管按欧洲标准米氏在塞族人中也可以算是专制者，但他当然不是因此被关押在海牙的。他被指控为搞了“种族清洗”和种族屠杀，而另一些人则赞扬他是塞尔维亚的“民族英雄”。可见无论褒贬，他的强烈民族主义都是人们评论的主要对象。

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光谱。在当代中国与俄罗斯，民族主义或许使人产生“左”的联想。但在绝大多数东欧国家，由于剧变前的体制基本上是“二战”后苏联军事占领状态下从俄国人那里移植的，因此都打“国际主义”旗号。于是那里的民族主义一般都具有反苏联霸权、反苏式体制的诉求，通常都属于“右派”，是推动“剧变”的力量之一。

南斯拉夫的情况稍有不同，虽然南共也曾是“共产国际支部”，但后来被斯大林革除教门；二战时苏军也曾入南，铁托时代说南共完全是自己打天下，未免言过其实，但比起

完全由苏军“解放”的一些东欧国家，南共还是有自己的本钱；在战后初期的东欧，铁托原来是移植苏式体制最积极的，[1]但与斯大林闹翻后，逐步摸索出自己独特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2]在所有这些与苏联抗衡的问题上，铁托是高举独立、主权这类民族主义大旗的。


▲ 铁托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铁托的民族主义是“南斯拉夫民族主义”，[3]而不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这两者不仅有区别，而且在铁托时代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立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把南斯拉夫与苏联作个比较：

这两国都是以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可以概括为“一党专政下的‘民族平等’；党领导下的‘自由联合’”）为依据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联邦”；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构成复杂，历史积怨多；作为“老大民族”，塞尔维亚在前南斯拉夫与俄罗斯在前苏联的地位有点类似；两国也都曾长期由非“老大”出身的领袖（克罗地亚人铁托与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当家。但两者不同的是：首先塞尔维亚族（占解体前南总人口三分之一强）不像俄罗斯族（占前苏联人口一半多）那样在联邦中占有人口优势和经济文化优势。其次，与前苏联继承的是俄罗斯本身历史上长期扩张形成的沙皇帝国不同，塞尔维亚民族虽然勇敢好战，毕竟太过弱小，它的地位更多地是靠国际政治下的列强博弈来确定。19世纪塞尔维亚本身的立国都是列强瓜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柏林会议上确定的。后来以塞尔维亚王室为首的多民族南斯拉夫国家又是凡尔赛会议所造就，而众所周知，这次会议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瓜分战败的奥匈帝国。在这样的国际背

①参见哥特瓦尔德：《永远和苏联在一起！》，见（苏）《近现代史》，1988年第4期，第28页。

②《南斯拉夫资料续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149－160页。

③ 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энциклопедия.М.,2007. с.409.

景下形成的南斯拉夫，其内部的塞族霸权之基础更为脆弱，更易为其他民族所不服。

而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传统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传统在历史上的冲突，远比苏联共产主义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冲突严重。[①]

在苏俄历史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传统与革命者中比重很大的犹太成分也曾经与俄罗斯民族主义产生严重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主张的"使本国政府战败"当时更被其政敌斥为俄奸。但是，布尔什维克夺权后很快转向了"革命护国主义"，苏俄事业的主体基本上还是俄罗斯人，东正教的"第三罗马"传统与"第三国际"意识形态也有更多的同构性。于是上述矛盾很快被化解。早期犹太革命家群体在苏联立国后不久就被清洗，而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在支持大俄罗斯思想和镇压非俄民族主义、包括格鲁吉亚民族主义方面比俄罗斯人还极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俄罗斯民族主义或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早已融入苏共的意识形态主旋律，两者后来基本上是融合了。因此，苏联末期推动变革的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非俄罗斯各族的民族主义，基本上看不到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作用，像日里诺夫斯基那样的俄罗斯非共民族主义是在1993年以后崛起，很快被其他党派瓜分，也成不了大气候。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随着苏共与苏联的崩溃遭受重创后，它再次兴起已经是在普京时代了。

南斯拉夫则大不一样。战前塞尔维亚人与以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主要是阿尔巴尼亚人）为主的其他民族矛盾极其尖锐，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南共则是坚决反民族主

①（美）乔治·霍夫曼：《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11-412页。

义、尤其是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其领袖铁托在“一战”时作为奥属克罗地亚人还曾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对塞尔维亚作过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发生极端惨烈的民族仇杀。当时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组织“乌斯塔沙”亲德，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组织“第二普里兹伦同盟”亲意，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代表则是“切特尼克”（塞语“义勇军”），后者支持流亡英国的战前南斯拉夫王国塞尔维亚王室，属于反法西斯盟国阵营，但它与克族、阿族和南共武装都誓不两立，结下血仇。而且它作为战前塞尔维亚强势铁腕集团与沙文主义传统的体现者，与它的对手克罗地亚乌斯塔沙一样具有反民主自由的极右翼极端色彩和种族恐怖主义色彩，在屠杀“异族”方面声名狼藉，西方各民主国家对之均无好感。这也是后来铁托严厉镇压切特尼克时，西方虽然不满他以此建立南共一党专政，但也并未实际支持切特尼克的原因。

而南共战士虽以塞尔维亚（当时南各族中传统上最反德的民族）人居多，其最高领导层却绝大部分是非塞族的国际主义共产党人，包括铁托、卡德尔（斯洛文尼亚人）、吉拉斯（黑山人）、兰科维奇（塞尔维亚人）与巴卡里奇（克罗地亚人）等，其中只有兰科维奇一人是塞族。在战争期间南共武装虽然与上述所有各族民族主义组织都是仇敌，但实际上由于亲德、意的克族、阿族组织随德、意的垮台而自然解决，南共没有太花力气，而与切特尼克的冲突却因为是在反法西斯阵营中争夺“正统”而持续时间最久、流血也最多。最后以切特尼克首领米哈伊洛维奇1946年被南共政权抓获并



▲ 吉拉斯

处决而告终，南共取得了镇压塞族民族主义武装的全胜。此后"切特尼克分子"在整个铁托时代一直被视为十恶不赦，对其的清洗也有甚于清洗非塞族的民族主义分子。

因此，如果说苏共政权后来在某种意义上常被视为"新沙皇"的话，在上述背景下产生的战后南共政权则根本不同于由传统塞尔维亚王室统治的南斯拉夫王国。战后南斯拉夫联邦没有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保留非共反法西斯政党并实行多党合作统一战线，而是立即实行南共的一党制，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彻底消灭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其他民族的主要组织都因亲德意而已经消失）。加之后来铁托与斯大林闹翻，南苏矛盾一直大于南斯拉夫与西方的矛盾，"情报局分子"成为那时首要的"内奸"，传统上亲俄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因此也更受猜忌。

由于所有这一切原因，整个铁托时代南斯拉夫虽然既打击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打击其他各族的民族主义，但总的来讲是重在前者。战后南共五人领导核心中，后来倒了台的恰恰是来自塞尔维亚与黑山的两位。其中吉拉斯是因为"自由化"，而兰科维奇正是因为塞族民族主义。尤其是1966年起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上世纪70年代，据说有4万塞族干部因此被整肃。

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抑制塞族强权的（或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压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



◀战后的科索沃

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二战前“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两个“自治

省"，并授予其与塞尔维亚几乎平起平坐的"联邦主体"地位——除去这两省之后的"塞尔维亚本部"，就已经退回到1878年柏林会议确定的塞国独立时版图内了。

除了从塞族中划出新民族、缩小其版图以外，铁托还别出心裁地设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励人们放弃原有族群认同而去改宗这一新的群体。到1981年，人口调查中填报这个"新民族"的已达121万人，占全南人口5.4%。人们不能设想苏联会设立俄罗斯族以外的"苏联族"，中国会设立汉族以外的"中国族"，铁托时代这样做，明显是要把"南斯拉夫"认同与塞尔维亚认同分开。经过这种种措施，塞尔维亚人的认同不断弱化。战前南斯拉夫王国时塞尔维亚人（当时马其顿人与波斯尼亚人都算塞尔维亚人）占绝对优势，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认塞尔维亚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为36.3%。

铁托时代的这些做法，对于压抑战前南斯拉夫严重的塞族强权、维护民族平等和联邦稳定起了作用。但是在一些民族情绪强烈的塞尔维亚人中却积累了很大不满。1980年铁托去世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出现反弹。1981年5月间塞政府在清洗科索沃党政领导层时开始大反"联邦主义"，即攻击阿族人自以为是联邦成员而不把塞尔维亚放在眼里。显然，一些塞尔维亚人对铁托时代非塞族拿联邦的扯大旗作虎皮来"压"塞族积怨已久。米洛舍维奇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虎儿得道反咬猫：米洛舍维奇与斯坦鲍利奇

不少事实表明，米洛舍维奇对铁托时代的做法久已不满。出生于1941年的米氏，父母都是铁托时代的牺牲品：他的父亲斯维托查·米洛舍维奇是一位东正教神职人员，1945年南共在贝尔格莱德掌权不久，他便离开自己在首都郊区的家庭而独自隐居到黑山，1962年在那里自杀身亡。米氏的母亲是小学教师、共产党人，于1974年也自杀身死。没有资料解释她的自杀原因，但该年正是南共清洗塞尔维亚干部的潮头。一些塞族人说是铁托的政策使他们家破人亡，米洛舍维奇自己倒没这样说，但他多次提到：家庭的不幸对他的人生道路有着重大影响。

虽然如此，父母的不幸似乎并没有影响他从铁托时代开



◂米洛舍维奇狂飙



▲ 巴尔干屠夫

始从政。在讲究人事背景的党国政治中，米洛舍维奇本来并没有"出身"优势。但他的妻子米拉·马尔科维奇却出身名门并与党内高层很熟。通过她的介绍，米洛舍维奇得到了伊万·斯坦鲍利奇的赏识。

斯坦鲍利奇只比米洛舍维奇长5岁，但政治上绝对是后者的教父。他的叔父皮塔·斯坦鲍利奇是铁托的老战友、战时任塞尔维亚人民解放军司令员，铁托死后曾继任南联邦主席团主席，属于最有权势者之列。小斯坦鲍利奇作为"太子党"也是"铁托身边的人"。但他与当时许多塞尔维亚干部一样，对铁托过分约束塞尔维亚的政策颇有意见，因此与米洛舍维奇一见如故，引为知己。

此后在长达20多年间，米洛舍维奇一直追随斯坦鲍利奇。两人关系铁到这种程度：米氏几乎每次升迁，都有斯坦鲍利奇力排众议的引荐，而斯坦鲍利奇则多次把自己升迁后留下的位置交由米洛舍维奇接任。斯坦鲍利奇担任察尔石油化工公司党委书记，他把米洛舍维奇召到该公司。斯坦鲍利奇升任塞尔维亚共和国计划与经济委员会主席时，米洛舍维奇便接掌察尔公司。斯坦鲍利奇调任南斯拉夫最大的国家银行行长时，米洛舍维奇再次来到他身边。斯坦鲍利奇当了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便推荐米洛舍维奇当贝尔格莱德银行联合会主席。1984年斯坦鲍利奇再升塞尔维亚共盟中央主席，他又荐举米洛舍维奇接替他那首都市委书记的大位。1986年5月，斯坦鲍利奇改任塞尔维亚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即共和国总统）——他一生最后一个高位时，又把塞尔维亚共盟主席的交椅交给了米洛舍维奇。最后，他的塞尔维亚总统位置也

由米洛舍维奇接任了。——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不再是他引荐米洛舍维奇，而是米洛舍维奇借助街头的“大民主”把他赶下了台。

事实上，米洛舍维奇虽然富有演说才能与政治魅力，但因作风粗暴也得罪不少人，更由于他在民族问题上越来越出格的言论屡屡使铁托传统下的党机器大惊失色，因此他的最后几次体制内升迁，阻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1986年米洛舍维奇当选塞尔维亚共盟主席的大会上，米氏开始时曾遭到多数与会者的反对。是斯坦鲍利奇以前任主席身份“连续三天作了筋疲力尽的说服工作”，才使米洛舍维奇在这次据说是“塞尔维亚共产党历史上最紧绷的选举”中以微弱多数勉强过关。

然而，这是米洛舍维奇最后一次求助于斯坦鲍利奇了。仅仅两年后，斯坦鲍利奇就领教了米洛舍维奇“用‘内情外泄’、发动场外示威的手法在许多高层会议上发动‘突然袭击’”的厉害。他与党国体制下“挑选接班人”游戏的许多失败者一样，尝到了“猫儿对虎把道教，虎儿得道反咬猫”的苦果。

原来，斯坦鲍利奇作为塞尔维亚领导人虽然对铁托时代“自治省”权力过大不满，但作为米氏后来抨击的铁托时代“机关权势分子中的遗老”，他基本上还是希望在铁托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不打算搞他斥之为“再版的切特尼克政策”的大塞尔维亚极端主义。在实际政策上，斯坦鲍利奇也曾努力维护塞尔维亚利益，早在铁托去世不久的1982年，他就提出要保护科索沃塞族与黑山族居民的合法权利，并表

示不害怕为此被对手扣上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帽子。此后他又在1986年南共联盟13大上率先提出修宪建议，按照他的想法，“科索沃自治权过大”的问题可以在协商的基础上先在塞尔维亚议会形成决议，提请联邦议会修改宪法的有关条款，即通过合乎法理的渐进改革方式来解决。但他反对抛开联邦、由塞尔维亚擅自取消科索沃自治，尤其反对把当时正在兴起的民主化潮流引向极端民族主义的群众性歇斯底里，以免导致铁托遗产的彻底丧失。

而米洛舍维奇呢，他想的却是借助塞族人对铁托民族政策的不满发动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不但彻底压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和（伏伊伏丁纳的）匈牙利人，还可以顺势把共和国高层那些“因循守旧的老官僚”和“软弱的机关权势分子”一锅端了，来个政治大换血。进而发动塞族“改造”联邦，清除“袒护”非塞族的领导层，从而使塞尔维亚人不但对下可以摆平科索沃，对上可以控制联邦，在全南斯拉夫“当家做主”，彻底出出铁托时代所受的鸟气。而且凭借如此功劳，他也可以赢得塞族人的喝彩，从而在即将到来的民主化大潮中顶住自由派的压力而占据主动。

这种实质上是颠覆铁托体制的大塞尔维亚主义“革命”当然是斯坦鲍利奇无法容忍的。于是这对20多年师徒与朋友的反目成仇便不可避免了。

1987年冬，科索沃再次发生塞阿两族冲突，斯坦鲍利奇向联邦建议让米洛舍维奇前去做安抚和调停工作。没想到米洛舍维奇到了科索沃，却在塞族大会上发表了震惊全国的“科索沃波列演说”。他批评过去联邦压制塞族偏袒阿族，

并表示将发动全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来声援科索沃塞族的反自治斗争，“塞尔维亚人再也不会被别人打败，他们将打败别人”！



▲米洛舍维奇

米洛舍维奇的如此作为使许多高层人士怒不可遏。于是在塞尔维亚共盟八中全会上，以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德拉吉萨·帕夫洛维奇为代表的不少人指责米洛舍维奇“轻率许诺激进的解决办法”。米洛舍维奇则骂帕夫洛维奇软弱，要求撤帕的职。斯坦鲍利奇这时破天荒地第一次没有支持米洛舍维奇，而是对两人进行调解。但是自认为羽翼已丰的米洛舍维奇这次不依不饶，在连续30个小时的会议上没有占到便宜后，米洛舍维奇竟然让人在电视台上广播了会议发生分歧的消息，号召塞尔维亚人起来抗议把他们的利益“出卖给阿尔巴尼亚人”的官僚们。结果在示威群众包围下，会议被迫罢免了帕夫洛维奇和所谓保守派（其实就是铁托派）的一批领导人，几天后斯坦鲍利奇本人也被迫辞职。

这场近似政变的“逼宫”闹剧后，斯坦鲍利奇与米洛舍维奇的关系彻底破裂。眼看米洛舍维奇的政策把国家拖入深渊，斯坦鲍利奇逐渐由沉默变为米氏的坚决反对派。十多年前声称不怕被对手说成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他，现在公开宣布自己是“反民族主义者”。他在贝尔格莱德组织反战团体，谴责塞族武装的暴行。更为轰动的是在波黑战争期间，斯坦鲍利奇不顾风险，出现在塞族武装包围与轰击中的危城萨拉热窝，对波斯尼亚人民表示声援。他被暗杀后，著名学者康斯坦丁诺维奇著文悼念：“感谢这位塞尔维亚贤人，伊万（按：即伊万·斯坦鲍利奇）的血与斯雷布雷尼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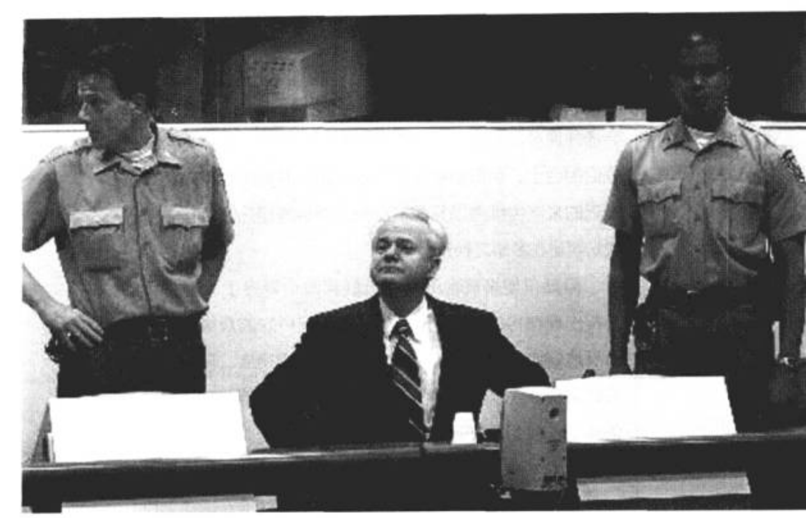
（按：惨遭塞军屠城的波黑穆斯林城市）儿童的血流在了一起，与武科瓦尔和萨拉热窝被狙击手打死的孩子们的血流在了一起，伊万在这些孩子们中，伊万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都是民族的孩子！"

1995年，斯坦鲍利奇出版《走向绝境》一书，他不但严厉抨击米洛舍维奇的几乎一切作为，也谴责米氏的反对派阵营中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斯坦鲍利奇说他的使命是要告诉塞尔维亚人民："在米洛舍维奇之前，有一个完全别样的塞尔维亚"，那就是铁托的南斯拉夫联邦中和平和繁荣的塞尔维亚。这些话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人对米洛舍维奇断送"铁托遗产"的痛惜。但他也谈到，正是因为旧体制缺少合理的政治结构，才使铁托的一些错误无法纠正；人治式的推荐干部（例如他自己对米洛舍维奇的推荐）之弊，导致不负责任的野心家上台；正常的代议制和宪政程序欠缺，使得公众在被迫沉默和被利用的歇斯底里之间陷入怪圈。

2000年大选前，对米洛舍维奇深恶痛绝、对"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反对派也极为不满的斯坦鲍利奇一度计划出山参选。他胜出的机会虽不大，但作为左派候选人他将会有效地分掉一部分社会党的选票，对米洛舍维奇非常不利。于是就在后来导致米洛舍维奇下台的这次大选前一个月，斯坦鲍利奇神秘失踪。有人看到他被"红色贝雷帽"绑架。3年后他的遗体被发现，绑架、杀害他的秘密警察供出了米洛舍维奇夫妇。这时米洛舍维奇已经下台并被海牙国际刑庭关押，塞尔维亚



▲ 遇害前不久的斯坦鲍利奇



▲米洛舍维奇在荷兰海牙出庭受审

法院遂传讯米氏夫人米拉·马尔科维奇，后者逃亡莫斯科至今，以至2006年米洛舍维奇死后她也无法参加在塞尔维亚举行的米氏葬礼。我国一些同情米氏的网民对此十分不平。不能参加丈夫的葬礼当然很不幸，不过塞尔维亚舆论更多的却是另一种批评，即米氏夫人一直逍遥法外，说明塞尔维亚现当局实际上无心追究此案，当局认为这不过是“前共产党人”司空见惯的内部残杀，他们关心的只是米氏对非共人士的暗杀。如此看来，斯坦鲍利奇才真是冤透了。

无论如何，斯坦鲍利奇与米洛舍维奇这两位由友而仇的冤家，在前南解体后的政治风雨中都以悲剧告别了人生。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相会时将如何了结那些恩怨呢？

"米洛舍维奇狂飚"与南联邦的解体

"谁是米洛舍维奇?"——1985年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全会会场外许多人问道。在这次塞共和国与两自治省领导人发生争论的会上，因斯坦鲍利奇举荐而新任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的米洛舍维奇以其激情澎湃的演讲博得热烈掌声，一颗政坛明星在多事之秋升起了。

但真正使米洛舍维奇在全联邦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转折出现在1988年4月，他在科索沃波列的群众集会上慷慨激昂地煽情演说，掀起了一场全南范围内塞族、黑山族人声援科索沃塞族、声讨"联邦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并且创造了一种动员数万塞族群众在各城市、各共和国间进行大串联、大"进军"的运动方式。就在这次风潮中，过于"温和"的斯坦鲍利奇被自己一手提拔的米氏以群众运动手段一举推翻，同时倒台的还有帕夫洛维奇等一大批中委。

此后的一年内，群众性大示威、大串联与逼迫罢官之风在塞尔维亚全境愈演愈烈。先是由于米洛舍维奇煽动、组织数万名外地塞族、黑山群众"进军"伏省首府举行"抗议阿族迫害"的示威，遭到伏伊伏丁那自治省领导人的批评与抵制，结果这些人被米氏动员的群众所推翻，自治省共盟主席团集体辞职，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的伏省成员克鲁尼奇也被罢官。紧接着此风蔓延至黑山、科索沃，又刮回贝尔格莱德。在导致黑山、科索沃等地党政议会几套班子全部大换班之后，米氏又把矛头指向了全南党政领导层，包括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联邦政府总理马尔科维奇、联邦主



▲米拉·马尔科维奇



◂ 米洛舍维奇煽情演说

席团主席德尔诺夫舍克等。

在使联邦党政机构瘫痪，从塞共和国、自治省直至市、区各级执行铁托时代民族平衡政策的原领导几乎全部换成塞族强硬派之后，米洛舍维奇又想对各共和国下手。他组织了10万塞族与黑山人发动“向卢布尔雅那进军”，宣称要“直接向斯洛文尼亚人控诉塞、黑公民在科索沃所受的迫害”。此举震惊全南！读者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科索沃与斯洛文尼亚分处南联邦南北两端，这次横贯全南的“大进军”显然不仅要冲击斯洛文尼亚，途经的克罗地亚、波黑等共和国也会受影响。斯洛文尼亚当局立即采取防范措施阻止这股歇斯底里的“米洛舍维奇狂飚”。而塞尔维亚当局则抗议斯洛文尼

亚的措施"破坏人权与自由"，并下令塞所有经济组织与机构和塞人控制的联邦企业对斯实行经济封锁……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当局在米氏的主持下，公然撕毁1974年联邦宪法，不与联邦机构打招呼便废除了科索沃省自治权，强行解散并接管了科索沃政府和议会，尽管这届政府和议会正是不久前才在米氏发动的"群众运动"中新更换的。这样对待一个联邦主体，自然引起了同为联邦成员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等共和国的抗议，引起了马尔科维奇总理等联邦领导人的反对。后来斯、克等共和国走向独立之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防止本国"科索沃化"。

的确，如果一个共和国能够单方撕毁联邦宪法而剥夺另一个联邦主体的权利，那谁还敢与它联合?

于是短短两年内，铁托等老一代南共领导建立的南斯拉夫联邦土崩瓦解了。客观地讲，导致联邦瓦解的原因很多，仅就民族主义而论，也是几乎每个共和国都有，每个共和国都做过有损于联邦的事。但直接导致联邦大厦倒塌的，无疑是米洛舍维奇煽起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群众运动，是米氏对科索沃自治权的剥夺。平心而论，在东欧当时的大气候下，南联邦很难避免解体的命运，就像苏联、捷克斯洛伐克联邦也未能避免这种命运一样。但它解体得那么快，那么残酷而血腥，则无疑与"米洛舍维奇狂飚"有关。

米洛舍维奇是个"运动群众"的高手。应当说他实际上并不相信什么自由民主。但如果说到对原来"主义"的态度，则米洛舍维奇与叶利钦一样都是"主义"的背叛者，只不过他们的背叛朝着两个方向：叶利钦走向民主派，而米洛

舍维奇走向极端民族主义。而且两人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走向权力峰巅的。正如南《今日》周刊所说，“已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领袖的米洛舍维奇”提出了“复兴塞尔维亚国家的思想”。米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他把铁托时代“多年来塞尔维亚民族的冷漠变成了高涨的塞尔维亚热情”。而铁托传统的维护者则对他的行为气愤万分。1989年2月南《信使报》刊登了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苏·穆罕默德巴希奇的公开信，信中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你滥用了科索沃塞族人与黑山人的悲惨命运，你抓到政权后就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你推行的政策危险地毒害着各族人民的关系，……已把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你推行的是分裂、搞派别活动的政策，是反铁托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革命的名义，你下台吧！”

当然，“米洛舍维奇狂飚”能够掀起决不能仅归之于米氏的个人魅力。铁托时代的民族平衡政策在维系了40多年的



米洛舍维奇和马尔科维奇在一起

各族团结的同时，也在塞尔维亚人中积淀了强烈的不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凸显了旧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为了巩固权力就需要寻找新的合法性资源。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只能在两个地方：一是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一是极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这两者的代表是叶利钦与日里诺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则是以舒瓦尔、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联邦末代党政领导与米洛舍维奇。当时南共联盟中央委员德鲁日奇曾形象地把南共联盟中央比作两列开往不同方向的火车，一列火车的火车头是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另一列火车的火车头是塞尔维亚共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米洛舍维奇。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在俄罗斯成功的是依靠民主派的叶利钦而不是煽动民族主义的日里诺夫斯基，而在南联邦则相



鲁戈瓦在投票现场

反，倾向普世价值的舒瓦尔遭到失败，鼓吹“大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成功了。

米洛舍维奇宣称：在南斯拉夫各族中，只有塞尔维亚具有最悠久的国家传统。而在联邦中，塞尔维亚长期受压抑、受欺侮、受剥削，而南共联盟却对它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国的权利，使塞尔维亚成了唯一一个丧失了必要国家特征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民族主义从来是柄双刃剑，米洛舍维奇越是强调塞尔维亚在联邦中受压，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们在塞共和国中受压。米洛舍维奇在1991年初声称：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则认为所有的阿族人也应当这样。

米洛舍维奇用“群众运动”一连搞垮了科索沃的两届共盟政府，搞掉了南联邦议会前议长科索沃代表库尔特希，逮捕了科索沃共盟省委领导人弗拉西和省政府主席泽伊努拉呼。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三人可以说都是十分“传统”的。米洛舍维奇搞掉他们，阿族就成立了“共和国”，并选举作家鲁戈瓦为总统。“巴尔干的甘地”鲁戈瓦坚决主张独立，但同样坚决反对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它。但“巴尔干的甘地”却没有遇到“巴尔干的蒙巴顿”，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鲁戈瓦一直呼吁米洛舍维奇对话，却一直被置之不理，还数次被逮捕。“甘地”的被禁锢使他失去了政治作用，由“科索沃的曼德拉”德马齐为首的“科索沃解放军”便应运而生，他们想用武装斗争来逼迫米洛舍维奇成为“科索沃的德克勒克”。这时候米氏纵使愿为“蒙巴顿”也难了。



▲ 鲁戈瓦



▲ 库昌

"铁托第二"，还是"切特尼克第二"？

至今还有许多人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厌恶米洛舍维奇，是因为他是东欧唯一未垮的"前共产党人"政权的代表。其实，如果就出身而论，剧变后东欧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前共产党人"，甚至执政党也是"前共产党"的后继党。仅就前南地区而论，斯洛文尼亚的库昌、马其顿的格利戈罗夫与黑山的久卡诺维奇也同米氏一样，不仅是"前共产党人"，而且后两人也是作为前共产党的后继党（社会党）候选人当选的。

今天我国一些传媒说米洛舍维奇是"铁托第二"。而塞尔维亚公认的第一号"铁托分子"斯坦鲍利奇却认为米洛舍维奇是"切特尼克第二"。我们看到，米洛舍维奇镇压敢于违抗他的铁托分子，即便是像斯坦鲍利奇这样有大恩于他的人，也毫不手软。而米洛舍维奇主持制定的塞尔维亚社会党《纲领》也毫不掩饰他对铁托体制的不满："在（南斯拉夫）整个时期内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特别损害了塞尔维亚和塞尔维亚人民。"[①]如前所述，米洛舍维奇时代塞尔维亚存在着多党制和反对派，从形式上看如果不是按照欧洲的"严格标准"，似乎也有点自由民主，至少比一些亚非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差。但是米洛舍维奇的"多党"和"反对派"只是对民族主义者而言，尤其是对"新切特尼克"而言。对于像斯坦鲍利奇和托马舍维奇这样的"铁托派"，米洛舍维奇体制的不宽容程度完全可以说是专制独裁。

但由于从组织资源上讲米洛舍维奇领导的社会党是南共

①《塞尔维亚社会党纲领（1992）》，转引自甄鹏：《塞尔维亚2008年大选与社会党政策的转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1期（总第99期），第54-55页。

组成中的塞尔维亚共盟的后继党，同时从成员角度看也是个年龄结构偏高的“老人党”，为继续获得怀旧老人的支持、维持他日渐减少的组织资源，米洛舍维奇对历史基本保持低调，并未公开指名骂铁托或者赞扬切特尼克。而铁托传统与切特尼克传统的一些共性（例如它们都排斥宪政民主）也为他提供了模棱两可的空间。然而在今天的塞尔维亚，他其实无法回避在这两个传统中作出选择。不久人们就看到了他是如何选择的。

2002年8月，米洛舍维奇下台后首次塞尔维亚总统竞选活动开始。已在海牙身陷囹圄的米氏开始想东山再起，指令社会党再推他为候选人。按“前南国际法庭”的规定，未被定罪前的嫌疑人是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但塞尔维亚选举委员会宣布，鉴于米洛舍维奇此前已经两次当选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根据宪法他无权第三次参加竞选。社会党于是改提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瓦尔特的老演员、社会党人日沃伊诺维奇为候选人。谁都知道，“瓦尔特”形象就是以铁托为原型的，社会党显然是想打“铁托牌”。不料海牙狱中的米洛舍维奇听说后大发雷霆，指令社会党如果不推他，那就不要推本党任何人参选，而必须支持塞尔维亚激进党主席舍舍利作为在野党的唯一候选人。

舍舍利何许人也？他是当今既极端反共、又反“西方自由民主”的极右翼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领袖。他认为南共时期是塞尔维亚的耻辱，发动过要求平毁铁托墓的运动。他也是高调赞扬切特尼克、誉米哈伊洛维奇（被南共处决的切特尼克首领）为塞尔维亚民族英雄、自命为其继承人的角色。



▲ 日沃伊诺维奇



▲ 新切特尼克首领舍舍利

他的“塞尔维亚激进党”建立时原来就叫“塞尔维亚切特尼克运动”。其民兵武装的军服、军衔与军徽都仿效二战时的切特尼克军队制式，而其对非塞族人的清洗和屠杀更与当年的切特尼克一脉相承。在米洛舍维奇与西方恶斗时他支持米氏，被米氏委任为副总理，形成反西方、镇压前南非塞族的“统一战线”。对此，一般社会党人是作为米氏的统战策略来理解的。

可是现在不是舍舍利加入社会党的统一战线，而是要社会党为舍舍利抬轿子。这自然为一般社会党人无法接受，如果这样，已经不太像样的“铁托党”岂不完全变成“切特尼克党”了吗？于是塞尔维亚社会党最高执委会进行表决，以多数票否决了米洛舍维奇的主张，仍决定该党将从本党成员中提名总统候选人。社会党最高委员会随即批准了执委会的决定。

这下可不得了！米洛舍维奇龙心大怒，他立即从狱中发出指令：解除该党代主席马里亚诺维奇的职务，任命贝利察取而代之。并“以党主席身份”指定了33人组成“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的组织—政治委员会”，以取代党章规定的领导机构最高委员会。一向屈从于米氏家长淫威的社会党人忍无可忍，当天日沃伊诺维奇就向媒体发表声明说：“米洛舍维奇不准提名本党成员作为塞尔维亚总统候选人，而是让本党支持激进党主席舍舍利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定，使他同塞尔维亚社会党产生了距离。”这样下去米洛舍维奇迟早会与党分手。8月27日，社会党最高委员会执委会举行会议，一致拒绝米洛舍维奇作出的违反党章的决定。会议指出，最高委员会

执委会根据党章规定尊重米洛舍维奇作出的更换党的代主席的决定。但是，他擅自组建“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的组织—政治委员会”违反了党章，“这种在政治和道义上无视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会议呼吁全体党员在即将举行的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选举中坚决支持本党唯一候选人日沃伊诺维奇。随即，社会党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委员会也以多数票表决结果，否决了米洛舍维奇对该委员会主席的任命，拒绝米氏指定的泽切维奇，而民主选举米尼奇为“六大”筹委会主席。

至此，尽管出于对狱中的米洛舍维奇的同情，社会党尽量给米氏留面子，承认他指派的代主席，但他是“铁托第二”，还是“切特尼克第二”，已经毋庸置疑了。

政治上米氏以大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搞垮了铁托体制，经济上米洛舍维奇上台后搞私有化也比多数东欧国家包括前南国家更积极。早在1992年底，塞尔维亚的3700家公有制企业已有2500家，即2/3，开始了所有制改造，其中的一半已完成改造进程。到1993年，塞尔维亚已有私人企业95881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4.8%。人们很少提到塞尔维亚搞“休克疗法”，那是因为战争与制裁带来的困难掩盖了转轨的“激进”。实际上许多观察家注意到：至少在全面战争之前，塞尔维亚的私有化进程一直遥遥领先于据说是“亲西方”的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等国。

邀宠不获的“反美斗士”

米洛舍维奇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正如合理的个人利益不是靠鼓吹自私自利，而是靠维护“群己权界”的制度规范来保证一样，民族、国家（国民）的真正利益也不是靠什么“主义”，而是靠维护国民权益的民主制度来保证的。不管米洛舍维奇的民族主义主观上是否真诚，客观上他的统治不仅伤害了前南的非塞族人民，而且也伤害了塞族。今天塞尔维亚执政的是米洛舍维奇的反对派，他们正如斯坦鲍利奇所说，是“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但是由于后米洛舍维奇时代塞尔维亚宪政民主进程的推进，“民族主义造成民族灾难”的危险降低，而民族主义与国民利益的契合度增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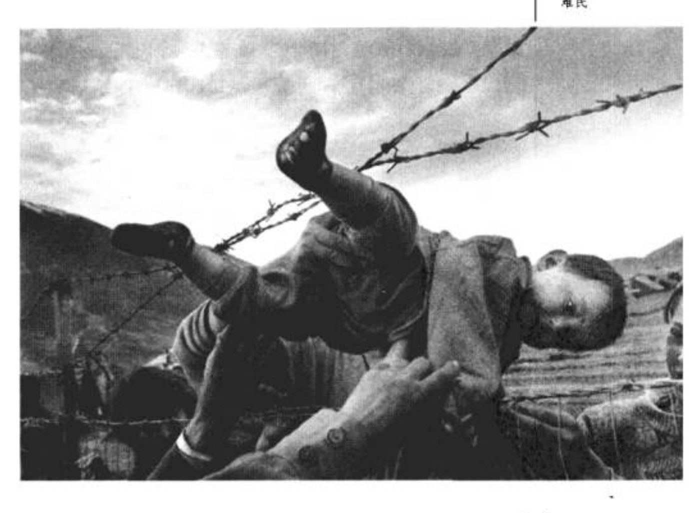
然而在米洛舍维奇时代，非塞族的人权和利益受践踏自不待言，即便是塞族的“民族利益”，事实上也必须服从米氏的个人权势欲，并没有真正的“神圣”可言。

与所谓米氏是“反美斗士”的宣传相反，上台之初的米洛舍维奇不仅没有表现出一点反美反西方的样子，而且还指望美国能为他搞独裁撑腰，因此一度成为整个东欧最亲美、亲西方的领导人。当南联邦解体、米洛舍维奇成立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时，他不仅推举著名的亲美政治家乔西奇为首任总统，甚至还专门从美国请回了美籍塞尔维亚富豪米兰·帕尼奇来担任总理。尽管实权仍在米洛舍维奇手中，但是让一位美国公民当本国总理仍然堪称奇观。当时在东

欧，外籍人士参加竞选的还有加拿大籍波兰人蒂明斯基竞选波兰总统，但并未成功，只有在米氏专权的塞尔维亚真能办成这种事。

当然，米洛舍维奇这样做只是为了向美国和西方示好，他不会把自己的权势真的交给别人，不管这个别人是美国公民还是塞尔维亚公民。后来米氏发现讨好美国不成，也就把帕尼奇搞掉了。然而把国家“公器”向外人私相授受的事却并未终止。科索沃危机爆发后，面临西方军事干预的强大压力，米洛舍维奇转向俄罗斯一面倒，不仅提出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南联盟三国结盟，最后甚至建议三国争取合并为“俄白南联邦”。尽管当时俄罗斯基于传统联系和现实地缘政治利益需要而坚决反对西方干预，但俄舆论对米氏的人权与民

▼科索沃危机中的难民



族政策、乃至对米氏的为人也批评颇多，不愿被米氏拉下水去和西方对抗。因此任凭米氏投怀送抱，俄罗斯始终坐怀不乱。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俄罗斯接受了这种建议，塞尔维亚乃至“南联盟”还有独立、主权可言吗？“俄白南联邦”不会把首都设在贝尔格莱德、让塞尔维亚人当总统吧？对于这样一个为了维护自己的权欲，今天可以请美国人来当总理，明天可以把整个国家都送给自己的庇护者的人，哪怕他的“民族主义信仰”再虔诚（我们姑且相信米洛舍维奇真的认为他与塞尔维亚二位一体，保住他就是保住塞尔维亚），能相信他的无限权力真的有助于民族利益的增进吗？

米洛舍维奇不是铁托分子，不反私有化，至少在西方反对他之前也完全谈不上反美反西方。至于说他是民族主义者，那么亲西方、也受西方支持的“民族主义者”多了，例如至少在“铁托分子”斯坦鲍利奇看来，米氏的反对派和取而代之者科什图尼察等不也是民族主义者吗？还有人说塞尔



科什图尼察出席抗议集会

维亚作为东正教民族与西方有“文化冲突”，这更是不经之谈。在前南争端中受到西方保护（塞族人认为是“袒护”）的波黑穆斯林和伊斯兰阿尔巴尼亚人与“西方”的文化差别，难道不比同为基督徒的塞尔维亚与“西方”的差别更大吗？还有更为奇怪的说法：有人注意到“斯拉夫”一词在古代西语中有“奴隶”词义，于是说西方反塞尔维亚就是因为他们对斯拉夫人有种族歧视，企图把后者当奴隶役使。其实拉丁语“slave”一词有奴隶之义固然是常识，也的确与古罗马人以斯拉夫俘虏为奴有关，但罗马人抓异族为奴的多了，不但有斯拉夫人，也有日耳曼人、高卢人等，用这个概念来套今天的国际关系，等于说今天的意大利人要把英法德美俄当然也包括塞尔维亚人都当奴隶来役使，能有比这更荒唐的吗？前南问题上与“西方”站住一边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穆斯林、马其顿乃至前南以外的保加利亚等国不都是斯拉夫人国家吗？西方为什么就不去“奴役”他们——或者他们为什么就不反抗“奴役”？

可见用意识形态与冷战思维来图解国际政治是要患上“色盲”的。那么为什么米洛舍维奇会与“国际社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这说来话长，应该是我们另一篇文章的内容。这里要说的只是：今天的国际政治当然不是什么“理想”政治，但也已经不是“炮舰政策”、“蛮族征服”和“春秋无义战”的时代。道义与利益，强权与公理，都是国际政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因素。也许“双重标准”这一概念比较近于现实：它意味着国际政治不是毫无道德标准的“战国”游戏，但是大国实力与利益的因素也使得这些标准在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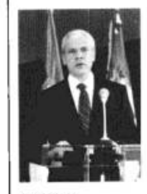
践中还无法"一碗水端平"。米洛舍维奇的所作所为、乃至比米洛舍维奇更恶劣的所作所为如果发生在非洲也许就会被忽视和姑息（正如在卢旺达、刚果和苏丹等地发生的事一样），但在欧洲人们就难以容忍。这种"双重标准"当然令人遗憾。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是努力使非洲发生的罪恶也能够像在欧洲那样得到制止，还是努力使欧洲发生的罪恶也能够像在非洲那样得到姑息？

走出阴影：2008年的社会党"大转变"

以上基本上是笔者于2006年米洛舍维奇死亡时所写，为的是感到鉴于当时被误导的我国媒体上充斥着对前南斯拉夫事态的无知和对米洛舍维奇的盲目颂扬，有必要讲出真相。这种误导不但蒙蔽了公众而且也影响了我国的决策层，致使我们不断在前南问题上作出误判。最典型的就是在2000年大选前米洛舍维奇已经众叛亲离时，我们许多人还认为他在塞尔维亚深得人心，而把宝完全押在他身上。以至于对他的垮台瞠目结舌不知所为。但是由于文章篇幅太长，当时在报纸上只发表了一部分，很多人仍不知道。以至于几年过去，最近笔者在一次会议上又提及这些事时，一位德高望重而且以思想敏锐著称的前辈还大为惊讶："就在今天上午前，我还以为米洛舍维奇是作为最后一位顽强的共产主义者而被西方推翻的呢！"他并且劝我把这些情况都发表出来。

更有意思的是：2008年大选后，塞尔维亚社会党一反米

洛舍维奇时代的做法，不仅跟米洛舍维奇依靠的“新切特尼克分子”即塞尔维亚激进党彻底分了手，而且跟科什图尼察领导的塞尔维亚民主党（简称塞民党），即斯坦鲍利奇所说的“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也分了手，却与所谓最“亲西方”的、主张摆脱塞尔维亚沙文主义并加快融入欧洲的塔迪奇领导的民主党结了盟。而在此以前，米洛舍维奇固然与激进党长期沆瀣一气，社会党与塞民党也曾有短暂合作，民主党却是米洛舍维奇的不共戴天之敌，两者只有对抗，从未合作。因此社会党的这次“大转变”引人注目。



▲ 塔迪奇

不仅如此，2008年以后社会党与民主党两党的合作还发展很快，尽管这个政党联盟中其它伙伴不断闹意见，但社会党与民主党一直稳定地携手，在绝大多数争议问题上保持一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社会党不仅与米洛舍维奇划清了界限，而且比那些“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走得更远。他们不再反对向联合国 前南法庭 移交犯罪嫌疑人；不再要求停止对米洛舍维奇家人的起诉；不仅放弃了“大塞尔维亚主义”，而且在民族问题上比塞民党更温和；同时他们也比反对派更“亲西方”，不仅推动与欧盟签署的《稳定与合作协议》，甚至还主张与曾经轰炸南联盟的北约签署安全协议；等等。用观察家的话讲，该党已经“由民族主义政党演变成为一个亲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塞尔维亚社会党的这种变化使我国一些专业研究南斯拉夫问题的学者也表示难以理解，并颇有微词。

但其实，只要我们看清了米洛舍维奇先前对于铁托传统的背叛和对"铁托分子"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如今这一切其实顺理成章。实际上，真正的"大转变"是米洛舍维奇对铁托体制的颠覆，社会党如今只是摆脱米氏梦魇而在某种程度上"回归"了铁托传统而已。事实上，前述的斯坦鲍利奇等"铁托分子"对米洛舍维奇的态度正逐渐成为今天社会党人的主流态度，而前述2002年大选时社会党领导机构与米洛舍维奇的冲突也预示了2008年的变化。

从历史上看，尽管铁托在南苏决裂前其实是个典型的斯大林主义者，而决裂后也没有完全放弃一党专政等斯大林主义遗产，但毕竟他在南苏决裂后探索建立的"自治社会主义"总的来讲还是个比苏式社会主义更开明、自由度也更大的模式，尽管这个模式没有成功，但从这个模式转向"民主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应当说是有基础的。前南其他共和国的共盟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完成了向社会民主党人的转变。只有塞尔维亚共盟被米洛舍维奇引向了切特尼克式独裁的道路，如今的变化应该说只是回归主流而已。

另一方面，铁托一贯强烈反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虽然从民主宪政角度看他采用的方式未必妥当，反得也有点过分，但与米洛舍维奇搞的那一套恰恰是截然相反。铁托靠镇压切特尼克起家，而米洛舍维奇骨子里恰恰是个"切特尼克主义者"。今天塞尔维亚要"融入欧洲"，主要的障碍当然是"切特尼克主义"，而铁托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倒是个助力。因此如今社会党与民主党的合作，除了议会政治中的实用主义考虑外，从价值层面看也是有基础的：它既可以看成

是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清除独裁（无论是斯大林主义独裁还是切特尼克式的独裁）流毒、推进宪政民主问题上的合作，也可以视为“欧洲主义者”与铁托式“族际主义者”在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推进普世价值方面的合作。

余论：告别梦魇的“铁托分子”和仍在梦中的某些人

最近笔者读到了巴托. 托马舍维奇著的《生死巴尔干》一书，这本由前新华社贝尔格莱德分社首席记者达洲先生翻译的中译本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于2002年，但流传似乎不广。在我国，近年来关于南斯拉夫问题出版的上百种著作与译著绝大多数是一面倒地偏向米洛舍维奇，极少数则是站在国际社会（实际即西方国家）的立场来批评米氏，只有这本《生死巴尔干》是“铁托分子”的作品。作者是1943年参加铁托游击队的老共产党人，而且几乎整个家族都投身革命，有人牺牲，有多人在后来的铁托政权中担任要职。托马舍维奇本人在铁托时代长期从事外交、新闻、出版工作，1990年时是联邦总理马尔科维奇授意建立的“南斯拉夫电视”（Yutel）台台长，这是当时仍在联邦手中、未被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当局控制的少数媒体之一。联邦解体后它成为对米洛舍维奇与同样持民族主义立场的塞尔维亚反对派都进行抨击的“铁托派”独立媒体。该台在贝尔格莱德被塞尔维亚当局关闭后又迁至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直到1992年5月遭塞军破坏被迫停止播出。托马舍维奇在逮捕与暗杀的威胁下也流亡国外，米



▲ 图季曼

洛舍维奇垮台后才返回。

本书前面大半部分是作者在铁托领导下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与切特尼克的斗争和建立南斯拉夫联邦等历程的回忆录，其中充满着一个"老革命"的自豪。后面小部分谈到铁托时代和铁托以后南斯拉夫从危机到解体的全过程，一直叙述到2001年米洛舍维奇被捕。托马舍维奇对这一切的看法基本与前述的斯坦鲍利奇相似，他对铁托时代过分压制塞尔维亚也有批评，尤其是对整肃兰科维奇等塞族领导人和把二战时逃离科索沃的塞族、黑山族居民的土地交给阿族颇有微词。但他对铁托时代相对于苏联体制而言的宽松和自由十分赞赏，并认为解决"后铁托"时代危机的办法是实行民主，"回到西方"。他借用联邦末代总理马尔科维奇的话说：

"我们的路必定是朝向西方，走向进步，而不是朝向东方，回到过去的神话和黑暗。如果我们真诚地向百姓说话，他们，特别是几百万跨民族通婚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会接受我们的主张。还有几百万像你我这样的人，他们爱自己的民族，但同样也爱我们这个大家庭中其他各个民族。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在文明世界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们不成功，数以百万计的人就会成为有毒的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对于南斯拉夫解体悲剧，他也批评了非塞族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但对波黑、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的领导人评价不错。而他最尖锐的抨击对象，就是米洛舍维奇及其控制的塞尔维亚当局。他对米洛舍维奇颠覆斯坦鲍利奇领导的塞尔维亚共盟铁托派政府、发表煽动民族仇恨的科索沃演讲、发动"反官僚运动"推翻黑山、伏伊

伏丁那和科索沃的共盟政府、组织冲击斯洛文尼亚等共和国的“向卢布尔雅那进军”、搞垮联邦政府并封杀“南斯拉夫电视”，都给予了强烈谴责。当然，尤其鲜明的是，他认为米洛舍维奇就是发动战争的罪犯，而他对科什图尼察等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反对派的批评，就在于他们只是谴责“米洛舍维奇在战争中失利”，而不是“谴责他发动了战争”——这与斯坦鲍利奇批评反对派“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态度很类似。

托马舍维奇认为米洛舍维奇时代是“塞尔维亚历史上最可耻的13年”。他由衷地为2000年米洛舍维奇的垮台和2001年米洛舍维奇被捕而高兴，认为这“最可耻的13年”的结束意味着塞尔维亚的新生，“不仅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欢迎，也受到全世界的欢迎。”而对于未来，他认为希望在于塞尔维亚人的自我反省，就像德国人反省自己当年一度支持希特勒一样。只有当大多数塞尔维亚人谴责米洛舍维奇发动战争、而不是责怪他打了败仗时，这个国家才会有前途。而在此基础上，他希望前南地区能够融入欧洲，“许多人怀念原来的多民族南斯拉夫，他们希望有朝一日共同的利益会把这个裂痕累累的地区变成欧洲联盟这把保护伞下的一个松散的主权国家联盟”。

读过这本“铁托派”的著作就不会对今天所谓“塞尔维亚社会党的大转变”感到惊奇。托马舍维奇与斯坦鲍利奇一样都是没有加入米氏社会党的反对派铁托主义者，但今天的社会党正逐渐靠近他们的主张。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从斯坦鲍利奇对米洛舍维奇的斗争、2002年社会党与米氏的

冲突，直到2008年社会党的彻底改弦易辙，标志着从铁托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坎坷历程，尽管米洛舍维奇"切特尼克化"的13年一度阻断了这一过程并且留下了太多的创伤，但是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社会党人和铁托族际主义理想的继承人终于走过来了！当然他们的看法对不对，我们可以见仁见智。不过指出一个事实还是有趣的：托马舍维奇本人对中国极有好感，他曾11次访华。他认为由于米洛舍维奇之流的倒行逆施，铁托的理想不幸在南斯拉夫失败了，但令他宽慰的是"这些理想仍然体现在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

可是这个国家中的许多人却认为铁托理想的继承者是米洛舍维奇，并且为米氏的失败而惋惜！这到底是我们不了解他们，还是他们不了解我们？今天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社会党和"铁托派"都已经走出了米洛舍维奇的梦魇，我们这里一些人却仍然沉醉于这个梦魇中，这是令人遗憾的。

当然，铁托那种"一党专政下的'民族平等'；党领导下的'自由联合'"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包括托马舍维奇在内的"铁托主义者"们今天实际上也不认为这种模式可以复活。但在独裁体制下改行相反的民族政策，即切特尼克式的废除自治、实行大民族领导人的集权专制，结果却更加可怕：不但没能保住多民族国家，反而使国家解体得更加彻底和血腥！那么多民族国家究竟在什么体制下才能实现民族和睦、国家统一和政治稳定？这恐怕是比南斯拉夫案例更带有普世性的重要问题。



聚焦黑山

论黑山独立与“南斯拉夫遗产”的最后终结

2006年5月21日，黑山21个选区的1120个投票站迎来近50万选民的"是否希望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国家"的公决，23日，公决委员会公布86.49%的登记选民参加的投票，其中55.5%的选民表达独立的意愿。使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这个面积仅如北京市、人口少于门头沟区的巴尔干小国。

黑山人："比塞尔维亚人还要塞尔维亚"

黑山（旧译门的内哥罗，即Montenegro，或切尔纳果腊，即**Чёрнаягора**，两者分别都是拉丁语和斯拉夫语"黑色的山"之意，今意译黑山共和国）位于前南斯拉夫联邦的南部，濒临亚得里亚海，西北、东北和东南方分别接壤波黑、塞尔维亚与阿尔巴尼亚，西部滨海地区与克罗地亚也有10公里的一小段边界，全国面积13812平方公里，人口65万人，首都波德戈里察（前南时期名"铁托格勒"）。黑山民族就人种来说和塞尔维亚是同种同源，就文化而言与塞尔维亚也是同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同文（基里尔字母）又同教（东正教），他们是怎么成为两个民族，又怎么走到一起，并且坚持到联邦解体后成为前南最后两个未分手的成员，而今天又为什么终于分道扬镳？黑山的独立意味着什么？这些年来我国媒体对波黑、科索沃等前南斯拉夫地区发生的事态



▲ 黑山

应该说是高度关注，给人的印象是前南“分出一国，血战一场”，这样的历史在黑山还会再现吗？这些都值得一谈。

一般认为，古代黑山人与塞尔维亚人都是南部斯拉夫人的一支，6～7世纪从北方迁入今地，和当地的一些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通婚定居，9～10世纪时这里出现一些小公国，如杜克利亚、泽塔等，其中泽塔公国被今天的黑山国家视为祖源。但是过去一般不把这些小公国作为黑山的前身，因为今天的黑山和塞尔维亚境内当时有很多的小公国，他们都只是塞尔维亚没有统一前的小邦，后来塞尔维亚形成国家，就是11世纪建立的奈马尼亚王朝，当时黑山的这些小公国都成为王朝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黑山先民那时还是塞尔维亚人。

他们形成单独的民族是塞尔维亚被土耳其人征服的结果。14世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向北扩张，1389年科索沃战役后，塞尔维亚终于被奥斯曼帝国并吞。一部分塞尔维亚人坚

持不屈，从1366年起，在南部的这片山区依托险要地形闭关自守，保持自立达500多年之久。期间土耳其人虽曾进兵此地，但从未能建立统治，于是这里成为整个东南欧—巴尔干地区仅有的一小块从未臣服土耳其之地。就在这闭关自守、与土属塞尔维亚隔绝的几百年中，这里的人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心理特性和民族认同。从1435年起，他们以黑山之名见于记载。黑山的几个著名君主如彼得一世、尼古拉一世等都是政教合一的长老，据说文化素养很好，既是神学家又是诗人、美术家等，在黑山建了很多博物馆、美术馆，还保留不少中世纪的古堡。如今成为令人自豪的文化遗产和有待开发的旅游资源。

可以说，在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各自的征服时期，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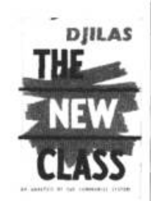


波德戈里察东正教堂



◀黑山圣奥斯特格罗东正教堂

代塞尔维亚人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部分人在奥匈帝国统治下接受天主教和拉丁字母，形成了克罗地亚人；一部分人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皈依了伊斯兰教，形成现在的波斯尼亚人，或叫波黑穆斯林；另一部分人没有皈依伊斯兰教，但还是接受了土耳其人的政治统治，这就是现在的塞尔维亚人；而最



▲《新阶级》封面

坚决保持独立、在宗教上与政治上都保持自己传统的那一部分族群就是现在的黑山人。因此有人说：黑山人实际上可以说是"比塞尔维亚人还要塞尔维亚"的一群人。

在这几百年间，他们在坚持独立的情况下，为适应土耳其人统治区四面包围中的长期抗争需要，逐渐形成了兵民合一、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大主教兼黑山王成为这个神权国家政教合一的统治者，同时父系氏族公社（札德鲁加）也成为黑山民族社会特性中非常突出的特点。那时的黑山，基本上就是一个坚持在南部山区独树一帜的东正教教团—氏族酋邦。当时的黑山也比现在要小，领土只限于内陆山区，今黑山亚得里亚海的沿海地带巴尔、科托尔等地当时还是几个隶属于威尼斯的商业自治城邦。

几百年来黑山人形成了复杂的特点：一方面是非常热

▼黑山科托尔



爱自由，反对外来统治，有山地民族的强悍精神，土耳其人把他们称作“东正教蛮族”、“南部斯拉夫人的哥萨克”确是其来有自。他们反对帝国、反对任何霸权，铁托在反对斯大林的时候，是得到黑山人支持的，但黑山人同时也反铁托的霸权，所以一度支持了米洛舍维奇的反铁托政策。南斯拉夫最早的党内自由派名人吉拉斯就出自黑山，他写的《新阶级》一书在中国也是著名的启蒙读物。然而另一方面，长期闭关自守的黑山内部又有封闭、保守的一面。黑山的政教合一制度以近代欧洲的中世纪遗存闻名，黑山的“札德鲁加”家族公社成为人类学中著名的“活化石”，实行大家长主持下的土地和财产共有经济。吉拉斯另一本著作《没有公道的国度》就对黑山的传统大加批判，说那是个“血腥的、野蛮的、背叛的环境，在那里人的尊严曾和贫困、无知及过甚其词的个人主义进行过无休止的战争。人们中没有存在过政治民主，也没有过政治民主的概念”。

密切的塞、黑联盟

作为“比塞尔维亚人还要塞尔维亚”的民族，黑山在南斯拉夫的几个民族中与塞尔维亚的传统关系比较密切，19世纪，塞尔维亚出现反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独立运动后，一直坚持抗土独立的黑山自然成为塞尔维亚的盟友。在东南欧东正教诸国的反土联盟中，黑山是国家最小、反土最坚决、也最“好战”的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两次巴尔干战争



黑山风景

中都是黑山首先对土耳其宣战，其他三个东正教国家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接着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土必须接受黑山的条件，否则就参战。于是小小的黑山成为巴尔干地区东正教和穆斯林打仗的先锋。除土耳其外，黑山与另一穆斯林民族阿尔巴尼亚也打过好几次，还一度占领过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斯库台等地。

于是，从塞尔维亚反对穆斯林、反对土耳其人开始，塞黑两族就一直保持联盟关系。欧洲基督教国家当时都支持黑山，但以东正教、斯拉夫诸国为甚，而西欧诸国则在支持黑山的同时也不愿这个"好战的"的东正教酋长国过分扩张。1878年3月俄土战争土耳其战败后签订的《圣斯特凡诺和约》中，根据俄罗斯的要求规定，黑山的版图大为扩充，但同年

7月在欧洲列强瓜分土耳其帝国的柏林会议上，《圣斯特凡诺和约》过分的“斯拉夫特征”被抵制。这次会议在国际法上正式承认塞尔维亚和黑山两国分别独立，黑山的领土面积比《圣斯特凡诺和约》建议的小了不少，但仍然比对土战争前扩大了近一倍，因阿尔巴尼亚反对，其南部疆界到两年以后的1880年才确定。也就是在柏林会议上，把巴尔港附近的地区划入黑山版图，使这个内陆山国成为滨海国家。

自柏林会议塞尔维亚建国后，黑山一直与之结盟，在随后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和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塞、黑也是盟友。一战末期，南部斯拉夫各族在协约国支持下签订《科孚岛宣言》，宣布联合，塞、黑都是该宣言的倡议者。一战后成立的南斯拉夫国家最初叫“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联合王国”，其中没有黑山，因为这时塞黑已经合并，所谓的塞尔维亚中就包含黑山，等于黑山不仅加入了联邦，而且加入了塞尔维亚。“比塞尔维亚人还要塞尔维亚”的黑山人似乎已经“认祖归宗”了。1929年，塞—克—斯联合王国改为南斯拉夫王国，黑山地区这时成为南王国塞尔维亚境内的采蒂涅省（后改为泽塔“巴昂辖区”）。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南斯拉夫的几个民族发生大规模种族仇杀，而塞黑两族仍然立场一致。当时总的来说，阿尔巴尼亚人比较亲意大利，克罗地亚人比较亲德，塞黑两族则都站在反法西斯盟国一边。

二战胜利后，以克罗地亚人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因为不喜欢塞尔维亚势力太大，便在南共领导的联邦中又把黑山从塞尔维亚独立出来另立共和国，当时原来的塞尔维亚



▲ 黑山港口鸟瞰图

被分割成好几块：以讲塞语的穆斯林为主成立波黑共和国，讲原来所谓马其顿方言的人成立了马其顿共和国，又把黑山恢复为另一共和国，剩下的塞尔维亚共和国中还建立了享有联邦成员地位的两个"自治省"，从而埋下了日后的诸多矛盾。但就在这种情况下，黑山和塞尔维亚仍然最为亲近，可以说，塞、黑这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要远远好于塞尔维亚与自己共和国内两个自治省的关系。在南斯拉夫的诸民族中，塞尔维亚与黑山也是关系最好的。

这除了历史传统外，也是因为塞、黑互相需要。黑山毕竟太小太穷，人口还不如塞尔维亚的那两个"自治省"，需要更广大的经济依托。而塞尔维亚没有出海口，以前出海都是走克罗地亚的，这里没有里耶卡、斯普利特等南斯拉夫最

大的几个港口，但毕竟路途较远。20世纪70－80年代，南联邦大力发展巴尔港，并新建了从贝尔格莱德穿越崇山峻岭经铁托格勒到巴尔的电气化铁路，这是整个南联邦时代最重要的基本建设项目之一，从此黑山的港口便成为塞尔维亚最便捷的“世界之窗”，联邦解体后更成为塞尔维亚唯一的出海口。而滨海地区的开发对黑山不仅经济意义重大，文化上也有极大价值。如前所述，传统的“老黑山”是内陆山区，沿海地区历史上是威尼斯模式的自治的商业城邦，只是在柏林会议后才归属黑山。这里的开发明显改变了黑山封闭、自给自足的传统。此外，南联邦时代根据黑山的资源条件还重点发展了采矿冶金工业，在工业新城尼克希奇和铁托格勒等地建设了大型炼铝、钢铁和有色冶金企业。这一切完全改变了“山民之国”的面貌。但是，这些矿冶企业和巴尔港一贝巴铁路等都是以南联邦与塞尔维亚作为市场与腹地的，只有60万人的黑山自己哪用得了这些。

与米洛舍维奇势成水火

由于以上的渊源，在南斯拉夫解体危机中，黑山与塞尔维亚曾经保持了基本一致的立场。事实上铁托时代被认为“歧视塞尔维亚”的政策也让黑山人反感，一些不愿臣服于铁托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甚至跑到黑山隐居，就像当年不愿臣服土耳其的塞尔维亚人在黑山“坚守传统”一样，米洛舍维奇的父亲斯维托查·米洛舍维奇神父就是这样隐居到黑



久卡诺维奇

山乃至在那里自杀的。吉拉斯当年与铁托闹翻当然并非由于民族主义，但也与桀骜不驯的"黑山人性格"有关。尤其是与穆斯林民族的矛盾，黑山人历来有打头阵的传统。所以当1980年代末米洛舍维奇发动大塞尔维亚主义"狂飚"时，黑山人曾经积极响应。当米洛舍维奇推翻塞尔维亚的斯坦鲍利奇"铁托派"统治后，正是黑山人接踵而起，以大示威推翻了黑山的"旧"领导，并推倒铁托像，把首都铁托格勒恢复旧名波德戈里察（甚至还一度动议要把首都迁回当年黑山公国的古都采蒂涅）。其后黑山人又响应米洛舍维奇的"大进军"号召，与塞族人一起到黑山境外的科索沃、伏伊伏丁那等地搞"群众运动"，直至参与所谓十万塞、黑人"向卢布尔雅纳进军"。所以毫不奇怪，南联邦解体后只有塞、黑还在一起组建了"小南斯拉夫"（即所谓的南联盟）。

但是这期间，黑山人与塞尔维亚人的矛盾也在逐渐积累。这首先是由于黑山人对米洛舍维奇的作风越来越反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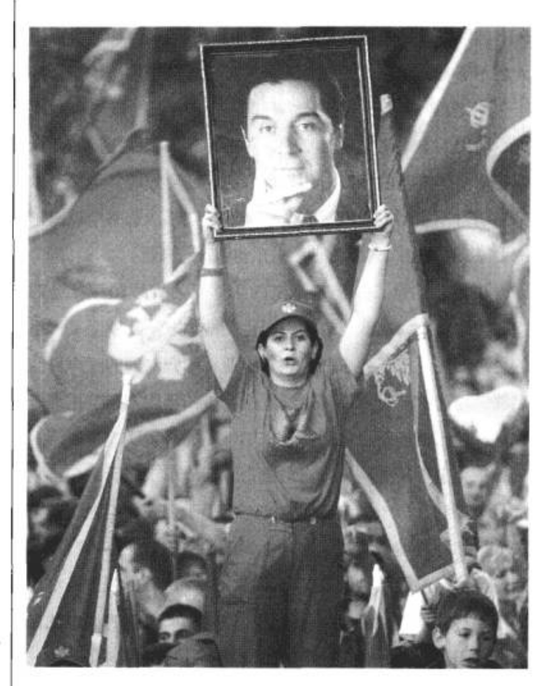
米洛舍维奇太过霸道，不断插手黑山内部事务。他总嫌黑山人还不够听话，在黑山拉一派打一派，支持布拉托维奇，打压久卡诺维奇，使这两个本来同出一党的人物最终势成水火。黑山人本来就吃软不吃硬，对土耳其人和铁托是如此，现在米洛舍维奇的压制对他们也只能起逆反效应，结果是本来影响力不如布拉托维奇的久卡诺维奇在几次选举中越来越占上风，而黑山与塞尔维亚的关系也就渐行渐远。



▲ 布拉托维奇在波德戈里察参加投票

更重要的是，米洛舍维奇的所作所为招致国际社会对南联盟的制裁，在联盟内的黑山也受池鱼之殃，蒙受了沉重的经济损失。于是要求摆脱塞尔维亚、回归欧洲的呼声日益高涨。事态的转折点是科索沃危机。1990年代末布拉托维奇败选，久卡诺维奇上台后就对塞尔维亚的科索沃政策表示不满，认为黑山不能再被米洛舍维奇套在战车上。后来在科索沃战争期间，久卡诺维奇对塞的态度趋于强硬，拒绝南斯拉夫人民军在其境内布防，实际上等于在塞尔维亚与西方以及西方保护下的穆斯林的冲突中保持中立。这对历史上经常在与穆斯林的冲突中打头阵的黑山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也就在这个时期，久卡诺维奇的黑山政府提出了独立的诉求。

后来导致米洛舍维奇最终下台的2000年大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黑山的态度。黑山当时提出，如果塞尔维亚人继续让米洛舍维奇在台上，他们就坚决独立。如果塞尔维亚换了人，塞黑关系还可以坐下来商量。总之黑山人能否接受塞尔维亚如果说还可商量，但他们已经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米洛舍维奇。久卡诺维奇甚至声称，如果米洛维奇当选，黑山马上宣布独立，哪怕为此开战也在所不惜。结果米氏下台，



久卡诺维奇的支持者

矛盾暂时缓和。以后久卡诺维奇和塞尔维亚新的科什图尼察政府谈了好几年，在欧盟的调停下，最终在2003年达成协议：终止联邦性质的南斯拉夫联盟，改建实际上属于邦联性质的塞尔维亚和黑山联盟，塞、黑两国基本上已经半独立：他们各自有自己的海关、货币、税收、警察乃至边防系统，只是在国际法上保留一个实体，有共同的国防和外交。2003年通过的《塞黑联盟宪章》中还明确规定：现在的联盟只是

一个为期三年的过渡形式，三年以后两国各自进行全民公决，以全民投票来决定塞、黑两国的最终关系。

历史性的“终结”与“开始”

2006年的全民公决就是按这个规定如期举行的。黑山的公决结果公布后，塞尔维亚总统塔迪奇和总理科什图尼察在5月23日分别表示“尊重公决结果”，并呼吁在未来各自的发展中“密切合作”。此后塞政府发表宣言，正式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平离婚”。可以说，从2003年以后双方都已经有了这种思想准备，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

正如舆论所说，塞、黑最终分手不仅最后终结了铁托建立的南斯拉夫联邦，而且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立、延续近90年的南部斯拉夫各族共同国家的最后痕迹。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这一终结对于人们反思南联邦历史和近代民族联合历史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契机。

但是人们也许没有给予充分注意的是：塞、黑分手也终结了前南解体过程中那种“分手即敌，反目成仇”的传统，终结了“分出一国，血战一场”的恶性循环，有可能开创平等协商双方关系、友好分手、建设睦邻合作的新关系。无疑，黑山独立后仍然会有矛盾，主要是黑山内部反独派与支独派的矛盾。但是前南解体前后的实践表明，如果没有外部的插手，各国内部的党派矛盾不可能变成恶性冲突。今天的塞尔维亚显然已经不可能像在克罗地亚、波黑和科索沃那样出兵出人去打仗，即便将来黑山的“反独派”通过民主程序



黑山选民参加公投

重新上台再与塞尔维亚重建某种合作（这种可能很小），那性质也与以前的关系完全不同了。

更重要的是，塞、黑分手不仅是个"分"的过程，实际上塞、黑双方都在努力活动争取早日加入欧盟。因此在这"分"的表象下还体现了更为宏观的历史进程中"大欧洲"理想的号召力。与过去不一样的是，以前米洛舍维奇和欧盟闹翻后实际上是想联合斯拉夫东正教国家与西欧对着干，前南的很多矛盾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现在塞尔维亚的态度有很大转变，从这一点看，如果塞、黑"离婚"后分别以平等身份各自加入欧盟的愿望能够最终得以实现，那么这将不仅彻底终结前南民族关系的一团乱麻，对整个历史上堪称"欧洲之癌"的"巴尔干火药桶"、对两大洲三种宗教几大帝国千年纷争造成的民族仇杀历史，也有希望能够在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划上一个一劳永逸的句号。

谨以此良好希望，祝福塞、黑人民。



坎坷千年路沧桑十三秋

乌克兰民族独立之路与04年大选风波

2004年11月22日起，东欧大国乌克兰因“大选舞弊”激起大规模政治风暴，由此直至年终重选、2005年初宪法法院裁定，40多天的乌克兰大选风波吸引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一时间人们都在问，乌克兰怎么了？有人说乌克兰问题完全是外生的，是西方与俄罗斯斗法的结果。有人说乌克兰问题是转轨失败的典型，这些都有些道理，但失之简单。乌克兰走到今天这一步，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而乌克兰的未来则与过去的历史以及乌克兰人在如今这个关键时刻的选择密切相关。

“乌克兰”，还是“小俄罗斯”

现今的乌克兰领土60万平方公里，居欧洲第二，人口4800万，居欧洲第四。苏联时期乌经济总量曾相当于意大利，在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中属于发达地区，人均产值、收入与生活水平均超过俄罗斯，更超过全苏平均水平，乌克兰的钢产量曾居世界第五。而在刚独立时，前苏联留在其领土上的庞大核武器库，还曾使乌克兰一度成为仅次于俄美的“世界第三核大国”。如此重要的一个国家，在国际大家庭的年龄却只有13岁，可是作为这短短十三年的背景，乌

克兰民族的历史已长达千年。

今天的乌克兰领土是东斯拉夫文明的发源地。公元9世纪这里出现了最早的东斯拉夫国家：基辅罗斯。现今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大民族都是从它分支演变而来，而在基辅罗斯作为罗斯古都声名远播时，今天俄罗斯的中心莫斯科等地还是草莱未辟。

13世纪罗斯分裂，蒙古东侵，全罗斯绝大部分都臣服于蒙古金帐汗的铁蹄之下，只有西南边陲的加利支—沃伦公国在波兰等欧洲基督教国家支持下保持独立。这里于是便在罗斯世界中有了“乌克兰”（在古俄语中**крайна**“边区”与**украйна**“乌克兰”是同义词）之称。罗斯臣服蒙古人200多年，社会、文化与国家组织都发生变化并逐渐分化为东北罗斯（后来的俄罗斯）、西北罗斯（其一部分成为白俄罗斯）与西南罗斯三支。而“乌克兰”之名也由加利支—沃伦“边区”一隅扩展为整个西南罗斯。从这段历史中不难看出：今天的西乌克兰（当年的加利支—沃伦地区）不仅是乌克兰民族特性的发源地，而且它与其他两支罗斯文明的关系一开始便带有西方（当时是基督教欧洲）与东方（当时是“鞑靼化”的东北罗斯）对峙的色彩。今天这场大选风波中这种色彩不是仍然隐约可见吗?

14世纪以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东北罗斯依靠蒙古人的支持，“挟大汗以令诸侯”逐步扩展成为俄罗斯强国，而西南罗斯则分别归属于立陶宛、波兰与后来的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乌克兰的民族性在西南罗斯土著反抗波兰—立陶宛统治者的过程中逐渐成型，而在此后对俄罗斯统治的抗争中



基辅大饥荒纪念碑 ▸

臻于成熟。

17世纪既是乌克兰民族觉醒、也是俄罗斯控制乌克兰这两个过程的转折点，而1648年开始的、后来被苏联史学家称为"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的事件成为这一转折的标志。1648年，乌克兰哥萨克首领赫麦尔尼茨基起兵反抗波兰受到

镇压，在军事失利的状况下他求助于俄罗斯。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与俄签订《别列亚斯拉夫协定》，宣布接受俄罗斯保护。在后来的俄罗斯历史书中，这个协定被视为“俄乌合并”条约。实际上，赫麦尔尼茨基当时只是波属乌克兰的一位造反者，远不能控制全部乌克兰，而且他也并不像俄国史学家说的那么亲俄，原本他起兵之初是求助于土耳其人及其盟友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只是在土耳其人抛弃了他之后才转而又投靠到俄国人的门下。但俄依据这个协定得以发起与波兰争夺乌克兰的战争，终于在1667年夺取了德聂伯河左岸的东乌克兰。而右岸的西乌克兰则到1795年才随着波兰在三次被瓜分后亡国，而最后归入沙俄的版图。但波属乌克兰的加利西亚（即当年“乌克兰”之名缘起的加利支）地区则在瓜分中为奥匈帝国所得，成为奥属波兰的一部分。



▲ 哥萨克士兵

无论是属俄还是属波，乌克兰民族受压迫的处境并没有改变，沙俄时代统治民族自称“大俄罗斯”，而把乌克兰人称为“小俄罗斯”。但乌克兰人却不甘心做“小”，他们的民族自主要求在俄国统治下与在波兰统治下同样强烈。在蒙古征服后的二百年里，西南罗斯的乌克兰人与东北罗斯的俄罗斯人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语言上的俄、乌之别尚在其次，社会组织形式则更加明显。在乌克兰起源的西部地区，历史上并不存在俄罗斯式的村社组织，独立农民与自由领地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而在后来成为乌克兰中心地区的德聂伯河流域，乌克兰人主要以自由哥萨克的方式生活。“哥萨克”原为突厥语“自由自在的人”之意，是指15－17世纪俄罗斯农奴化过程中不愿为奴、而逃亡到“边区”去谋生的人，

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盲流"。这些"边区"土地上的"自由人"形成了军民合一部落形式的自治体，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头领"）均由选举产生而不能世袭，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这种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的集体一致，与尊重个性的近代自由制度和公民社会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为前近代传统它与俄罗斯本土的农奴制和帝国官僚制也十分抵触。至于西边传入的天主教（尤其在西乌克兰）与俄罗斯东正教的矛盾，就不用说了。

事实上，即使在1667年后作为俄罗斯势力范围的东乌克兰，帝国的控制力也很有限，盖特曼自治维持了很久，而且多数盖特曼都像先依靠土耳其后依靠俄罗斯以反抗波兰宗主的赫麦尔尼茨基一样，有借助外力反抗俄国宗主的倾向。赫氏之后的盖特曼维戈夫斯基就发动了一场与其前任方向相反（即联波反俄）但同样是追求乌克兰自立的起义，只是结局不像前任那样幸运。此后的盖特曼马泽帕也曾与波兰和瑞典密约，并乘俄瑞战争之际联瑞反俄自立，失败后逃往土耳其。马泽帕之后的盖特曼老斯柯罗帕茨基也企图独立。直到1722年沙俄废除了盖特曼自治，派军进驻东乌克兰并成立"小俄罗斯委员会"直接统治该地，所谓的"俄乌合并"才真正实现。

然而这时历史已经进入近代的门槛。乌克兰人的自主愿望并未随着盖特曼自治的被取消而终结，而是接续了近代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薪火。这个运动受到沙皇当局镇压，却得到俄罗斯反沙皇的左派、尤其是持国际主义立场并主张民族自决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情与支持，这反过来也使

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带有左翼色彩。沙俄后期主要的两种左翼反对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与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人，其在乌克兰的分支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成分。后来由社会革命党人格鲁舍夫斯基领导的乌克兰中央拉达与社会民主党人彼得留拉领导的执政府，虽然都被已夺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称为“白匪”，实际上以现在的标准看，他们都是



彼得留拉像

左派。而自由主义传统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反而没有那么大。

昙花一现的初次"独立"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俄罗斯帝国在革命与战争危机中一度分崩离析，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乘势发起了独立运动。从当年3月到1920年9月，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从自治到独立：中央拉达

1917年3月，民族主义者在基辅建立了乌克兰中央拉达，"拉达"为乌克兰语议会之意，相当于俄语"杜马"。中央拉达本来只要求乌克兰自治，但是当时俄罗斯政局动荡，各派对乌政见不一，布尔什维克在掌权前唯恐天下不乱，也唯恐乌克兰不"独"；临时政府其实并非像苏联时期官方史学所说那样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是在帝国垮台后混乱时期产生的前后四届短命政府的总称，这四届政府政党背景与政治立场不一，对乌政策也朝三暮四，7月间的一届政府与中央拉达会谈达成协议互相承认，8月间该届政府倒台，新的一届临时政府便推翻前议不承认乌克兰的拉达政府了。如此出尔反尔失去了乌克兰人的信任，而俄政府实际上又并无对乌控制能力，于是中央拉达便于11月20日宣布乌克兰独立，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二、斯科罗帕茨基盖特曼政府

1918年2月，德军攻入乌克兰。4月，德国占领军强行解散中央拉达，乌克兰奇吉林哥萨克大会按传统方式推举哥萨克首领、前沙俄军官斯科罗帕茨基为“盖特曼”，建立了亲德的盖特曼政权，改国名为“乌克兰国”。同年11月德国战败，盖特曼失去靠山，12月，不满斯科罗帕茨基亲德政策的前中央拉达支持者以彼得留拉为首发动起义，推翻了盖特曼政府。

三、执政府

1918年12月起义恢复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二月革命中的士兵领袖、前拉达政府军事领导人彼得留拉成为共和国“执政内阁”（即执政府）首脑，他指挥下的乌克兰国民军一度控制了相当大部分的乌克兰领土，并与波兰结盟抵抗苏俄。1920年11月彼得留拉最后战败，率残部退入波兰后被解除武装并被扣留。独立运动至此最后失败。

在中央拉达、盖特曼与执政府这三届乌克兰民族主义政府中，中央拉达与执政府都是在“社会主义者”控制下，其中，格鲁舍夫斯基的社会观点属于社会革命党，该党在俄国的左翼曾与社会民主党左翼（即布尔什维克）是共同发动十月革命的“同志”。而彼得留拉更具有与当时许多草根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类似的经历：他出身贫苦，投身左派，在战前就长期从事反抗沙皇政府的革命活动，1914年他被征入伍，在世界大战的军中从事反战运动，革命中作为士兵领袖（众所周知，十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反战的士兵革命）


▲ 邓尼金


▲ 弗兰格尔

而崛起，先为中央拉达军事部长，后为执政府首领和军队司令。只有斯科罗帕茨基政治上属于十月党（君主立宪派，当时属自由主义右翼）。但是不论这些乌克兰人政治上是左还是右，他们都既与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也与沙俄在乌克兰的将军们邓尼金、弗兰格尔之流为敌。当时在乌克兰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白军"阵营，苏俄的反对派从极左到极右、从民族独立斗士到帝国传统捍卫者，完全是一盘散沙而且彼此敌对，这是他们成不了气候的最大原因。

中国人很熟悉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反应，这部小说站在苏联的立场上把抵抗外敌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律斥之为"白匪"。乌克兰独立后这种评价标准发生了翻转，除乌共外，一般乌克兰舆论无论左右都视保尔·柯察金代表的苏俄红军为"侵略者"，而"彼得留拉匪帮"则是为捍卫民族独立而战。尤其彼得留拉本人更被视为民族英雄，在今天的乌克兰享有极高声誉。对其他两人的评价则较复杂：格鲁舍夫斯基因晚年向苏俄忏悔并回苏工作而受到非议，斯科罗帕茨基今天受到指责则主要不是因为他"亲德"——如上所述，借助外力反抗宗主国是乌克兰的老传统，在今天的乌克兰人看来斯氏借德反俄并不比赫麦尔尼茨基借俄反波或彼得留拉借波抗俄更可指责，但是斯氏革命前是沙俄军官（不像彼得留拉与格鲁舍夫斯基早就是反对沙皇的"老革命"），其执政又是否定拉达的民主共和体制而实行传统哥萨克军事统制，并因此成为共和派民族主义者的革命对象，形象自然就远不如既是民族主义又是民主主义双重老革命的彼得留拉光彩了。



◀ 列宁检阅军队的油画

其实布尔什维克对乌克兰曾经有过与“保尔”全然不同的态度。掌权前的列宁是如此敌视“俄罗斯爱国主义”，以致连“在两国统治者的战争中我们应守中立”的主张也不接受，而大力呼吁要“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他连当年历史上的“俄乌合并”也否定，认为1654年《别列亚斯拉夫协定》“使乌克兰文化遭到摧残”。[1]那时他的“乌独”立场甚至比中央拉达还激进：早在拉达发表自治宣言之前，列宁就于1917年6月7日的《真理报》上说：“我们认为波兰、芬兰、乌克兰及其他非大俄罗斯的土地都是俄国沙皇和资本家侵占的土地。”[2]不久中央拉达和彼得留拉为主席的全乌克兰军人代表大会于6月11日发表关于乌克兰自治的《宣言》，列宁成为这个宣言在俄罗斯最高调的喝彩者。当时俄国自由派的《言语报》攻击中央拉达“擅自”发表“公然违法”的宣

①《列宁全集》1931年俄文第3版，第16卷，第689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73页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312－313页。

②《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1995年，第3卷，第80页。

言应该受到"严厉制裁"，列宁断然驳斥了《言语报》这种"凶相毕露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攻击"。他指出中央拉达的宣言是"完全合理的"，并且主张"无条件地""完全承认乌克兰的权利，包括自由分离的权利"。[①]而这时中央拉达还根本没有要求这种权利。6月28日，中央拉达成立具有乌克兰政府性质的总书记处，俄国临时政府先予承认，后又于8月间推翻前言，不承认总书记处的合法性。列宁又严厉谴责了临时政府的出尔反尔。[②]

但是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对乌克兰的态度立刻变得暧昧起来。十月革命后不久，中央拉达于11月20日宣布成立"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苏俄近一月之久没有公开反应，而暗中指望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够控制拉达，直到布尔什维克在基辅夺权失败后，才于12月18日发表了一个内容矛盾的《告乌克兰人民书》，一方面宣布"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



1917年苏联布尔什维克装载两挺重机枪的轻型汽车

认它有权同俄国完全分离”，“无保留无条件地承认有关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一切事项”。但同时要求中央拉达在对德与对卡列金的问题上与苏俄保持一致，并要拉达同意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还以最后通牒式的口气要求在48小时内答复。[①]

12月24日，苏俄一方面在哈尔科夫成立与中央拉达对立的乌克兰苏维埃政府，另一方面又派苏俄政府邮电人民委员、亚美尼亚族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普罗相为代表与拉达领导人格鲁舍夫斯基举行谈判。这对谈判对手很有意思：他们都是非俄罗斯族，都是社会革命党人，或许这样选择代表本身就是一种姿态。拉达方面本着与苏俄善处的愿望提出双方协议的基础：苏俄“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拉达“承认卡列金及其帮凶是反革命”。苏俄政府随即于1918年1月1日作出《关于同拉达举行谈判的决议》，对拉达方面提出的协议基础表示首肯。[②]但不久，苏俄羽翼渐丰，便于1月13日发表声明，认为拉达的答复“含糊，模棱两可，简直近乎嘲弄”。于是中断谈判而对拉达发起军事进攻。但这个声明同时又再次表示：“乌克兰人的民族要求，即他们的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已得到苏俄的“全部承认，不会引起任何争执”。[③]

当时苏俄攻击乌克兰拉达政府的主要口实是卡列金事件。卡列金是顿河哥萨克首领、沙俄右派将军，十月革命前他就参加了右派反对临时政府的科尔尼洛夫叛乱，革命后他逃回顿河再树叛旗，成为最早反抗苏俄的“白匪”之一。卡列金并非乌克兰人，作为保守派将军他维护沙俄帝国传统，

①《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40－142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86页。

③《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15－21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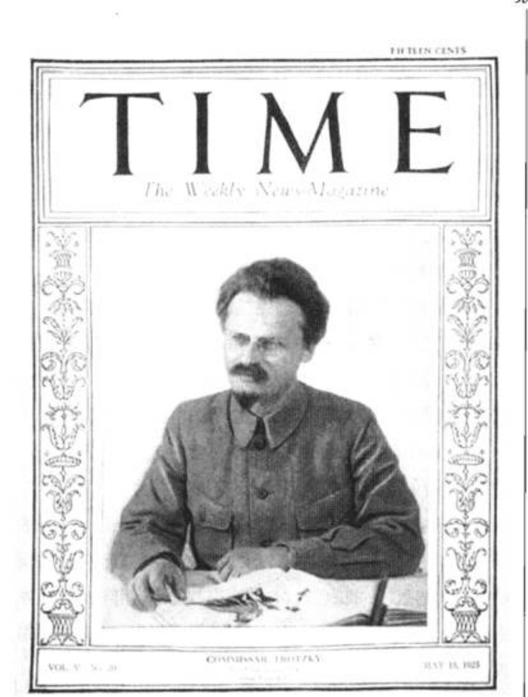
不承认乌克兰独立。因此拉达并不反对、而且愿意配合苏俄剿灭这一"反革命"势力。但是苏俄借此要求拉达听命于自己，把权力交给自己扶植的苏维埃，并允许苏俄军队入境。拉达政府当然不能中这种"假道伐虢"之计。实际上，卡列金很快失败并于1918年1月29日自杀。然而苏俄并没有因此改变敌视拉达的态度。不过以苏俄当时的力量，要征服乌克兰还是力不从心。

这时苏俄与乌克兰拉达都在布列斯特与德国进行和谈，德国乘机扮演了俄乌之间的调停人角色。一心要与德国达成妥协的苏俄接受了调停，托洛茨基代表苏俄承认了中央拉达代表团的合法性。俄乌双方各自分别在布列斯特与德国单独媾和。1918年2月，德军以调停的名义出兵乌克兰，苏俄虽然暗中支持乌克兰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势力进行了轻微抵抗，但苏俄自己并未卷入。此后乌克兰的主要矛盾一度变为德国人及其支持的盖特曼政权与拉达民主派的冲突。而苏俄则对得势者一概承认，还请求德国协助苏俄同乌克兰签定和约并划定双方的准确国界，1918年6月12日，苏俄同盖特曼乌克兰国双方共同签署了这项和约。正如索尔仁尼琴后来评论的："列宁的这一行动表明，他完全容忍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甚至容忍乌克兰在分离出去后成为君主国！"

这一时期，苏俄及其在乌克兰的支持者实行的剥夺农民的余粮收集制激起了普遍反抗，[1]而斯科罗帕茨基则废除了这种制度，列宁当时多次承认斯科罗帕茨基此举深得民心："人民已经疲倦了"，"他们去做某种蠢事，甚至去投靠斯科罗帕茨基，因为大多数人民是愚昧的"。[2]1918年7月15日，

①C.A.巴甫留切尼科夫：《农民的"布列斯特"》莫斯科1996年，第25-26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34卷，第439-440页。



• 《时代周刊》封面上的托洛茨基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五大上所做的报告也承认，乌克兰人民正“饿得甚至投向斯科罗帕茨基”，[1]以至于列宁需要提醒其支持者把农民与斯科罗帕茨基分开：“认为这（指反对斯科罗帕茨基）是同农民的斗争，那是不对的。”[2]

然而列宁对乌政策的出发点完全是实力至上，乌克兰政权是“左”还是“右”，是否得到人民的认同，甚至对外政

① Волков С. В.Белое движение 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ий дом //русс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998,т1,№2.с74.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34卷，475页。

策是否与苏俄协调，都是次要的。1918年11月德国战败，盖特曼政府随即垮台。尽管继之而起的拉达民主派执政府与盖特曼相比既不那么亲德，又具有更多左的或"革命"的色彩，而且此前苏俄也曾承认他们。但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布尔什维克的那点实力比彼得留拉的力量稍微大点了，——布尔什维克马上越过了他们承认的边界线，把自己的政权强加在乌克兰的兄弟们身上。"

实际上，苏俄这时的乌克兰政策仍然极为"灵活"。1919年初协约国军队在黑海登陆后，乌克兰执政府对其进行了抗击，双方在敖德萨地区发生冲突。苏俄判断"乌克兰的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决不会与协约国合作，又想利用执政府了。当年1月4日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提出："现在插手乌克兰事务从军事上讲不适宜并且十分冒险。"因此要乌克兰的亲苏俄势力暂停反执政府的游击活动，并表示苏俄"要设法同乌克兰执政府达成协议"，直至"同彼得留拉之流结盟"，即便这"会使乌克兰的工人群众感到困惑不解"。[①]但是协约国一撤军，苏俄马上又对执政府大举进攻。

应该说这种列宁式对外政策的模式我们中国人十分熟悉，当年苏俄处境艰难时两次发表《卡拉汉对华宣言》，信誓旦旦地许诺要归还沙俄从中国割去的大片领土，但它的处境稍有改善，立马就不认账了。我们后来把这归罪于"修正主义"，其实苏俄"一阔脸就变"明明是列宁领导时的决策。超脱点看，这种基于利益的谋略外交对于苏俄的生存与壮大确实很有成效，后人不必责之太深，但由此而来的乌克

①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5－167页。

兰归属苏联的道义基础显然不太稳固，后来的一切也是其来有自了。

在这个混乱时期，现今乌克兰土地上的“东西对立”也已见端倪，此前从未建国的乌克兰历史上无所谓版图，三届民族主义政府也从未控制过今天的乌克兰全境，但相对而言他们的势力中心始终在西、中乌克兰。而在今天的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工业区，苏俄1918年就在那里扶植建立了“顿涅茨克—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央拉达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抗衡。后来的苏维埃乌克兰政府也是首先成立于东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而不是乌克兰民族的政治文化中心——基辅，并且直到1934年，苏联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首都也一直设在哈尔科夫。至于俄罗斯人为主的克里米亚虽然并无苏维埃的根基，但在内战中也是沙俄白卫军如苏利凯维奇、弗兰格尔等的根据地，而从未认同乌克兰民族主义政权。

“面包换自由”的失败：苏联时期的乌克兰

1924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苏俄从此变成了“苏联”，乌克兰成为首批4个加盟共和国之一。

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和全苏乃至社会主义世界后来的几个联邦制国家一样，实行一种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独特的“集权一党制下的‘自由国家联盟’”制度。一方面，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联盟宪法和共和国宪法均规定了自愿加盟、自由退出的原则，正如前苏联国歌的歌词中唱的“伟大

俄罗斯，永久缔联盟，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为此，布尔什维克不但没有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中央"政府，还在国际社会张扬其形式上的"主权"，直至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与苏联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苏联当时不顾一些国家的反对坚持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贪图其"一国占有三席位"的特权。而另一方面，这种"联盟"在全境实行一党制，而且党内高度集权统一，加盟共和国党对联盟党中央而言完全是下级，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并且也不存在反对党。这样，执政党的集中统一便使联盟成员在法律上的自由退出权成为不可能行使的虚假权利。例如在1970年代，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只因在其所著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中按苏联口径颂扬乌克兰人反德反波的功绩时调子高了点儿，就被打成"民族主义"而被撤职。当时谁要有异心，他在党内立即就会被干掉，根本不可能在政府或议会的层次上提出"退出"。

但这种状况却以党国不分和党内集权为条件，一旦"党国"体制有变，联邦成员本来就合法的自由退出权便由虚转实，使"联盟"的解体变得难以避免。在中东欧转轨过程中，三个这样的"联邦"国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都解体了。但没有实行这种"联邦"制的其他几个多民族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尽管也有民族问题，也实行了民主化变革，却没有损害国家的统一更没有导致国家分裂解体。因此今天看来，民主化绝非导致联邦解体的原因，但那种设置了自由退出权的"联邦"体制，却使这种联邦在"党危机"中难免解体的命运——即便没有民主化，只

要党内斗争失控导致党的分裂，哪怕是分裂成几个各自同样集权而丝毫也不"自由化"的党，国家的统一也就完了。

当然理论上讲，如果没有民族矛盾，"自由退出权"在转轨中也未必一定会行使，毕竟统一国家的好处是谁都明白的，尤其是苏联这样一种中央计划体系下全联盟经济高度一体化、专业分工与协作体系非常发达的状况下，联盟解体、协作链条中断与分工体系崩溃对经济的损害要比市场化体制变革中的所谓"休克疗法"打击更大。但是，问题在于民族矛盾在苏联时期的乌克兰一直没有解决。

这一矛盾首先与领土变迁有关。1920年内战结束后乌克兰的西部边境是根据苏俄与波兰的《里加和约》划定的，这一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说法是"俄波瓜分乌克兰"的条约把西乌克兰（今乌克兰西部的里沃夫等州）划归波兰，而这里正是乌克兰民族性最强烈的地区。1939年，苏联按《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趁纳粹德国闪击波兰之际出兵"东波兰"（如今史称"对波兰的第四次瓜分"），把这一地区并入苏联乌克兰版图，接着又从罗马尼亚手中夺取了乌克兰人居住的比萨拉比亚与北布哥维纳，将后者建为苏联乌克兰的切尔诺夫策州，二战结束时苏联又把原属捷克斯洛伐克的罗塞尼亚地区吞并，划为乌克兰的外喀尔巴阡州。

这样，苏联在二战前后的几年里把乌克兰的边界大大向西扩展，所并入的新领土都是乌克兰民族情绪最强烈的地区，而且有些地区（如罗塞尼亚）此前无论沙俄还是苏俄都从未控制过。在此过程中苏联军队受到当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谓班杰拉分子）的猛烈抵抗。班杰拉游击队对德国、

波兰与苏俄军队都给予重创，苏军名将、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京大将与波兰共产党政权首任国防部长西维尔切夫斯基大将都在班杰拉游击战中死亡，苏军伤亡之惨重可想而知。而苏军对班杰拉分子乃至一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镇压之酷烈也不难想象。此后苏联借二战胜利之威，在新领土上搞强制集体化，不愿集体化的乌克兰农民都被当作"班杰拉分子"遭到残酷清理，使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运动严重地扩大化，留下深刻的历史创伤。

而在此之前归属苏联的乌克兰其他地区，斯大林时代的镇压也十分惨烈，尤其是"全盘集体化"后的几年，苏联发生"人祸"性质的骇人听闻的和平时期大饥荒，饿死农民据说达800万以上。[①]乌克兰作为苏联粮食征购的主要地区首当其冲，富饶的平原上饿殍盈野，人口减少十分之一。[②]后来的史家称："乌克兰农民身负两重灾难：作为农民和作为乌克兰人。"[③]在党内斗争中，"乌克兰民族主义"也常常成为大规模整肃的口实。乌克兰历任的党政一把手，从斯大林时代的埃何、波斯蒂舍夫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谢列斯特，常常不得善终。然而也有从这一位置上飞黄腾达的，例如经乌克兰而成为苏联领袖的赫鲁晓夫，但这必须以强硬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为条件。

当然，乌克兰在苏联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之巨大也是不容置疑的。尽管沙俄时代乌克兰已经是帝国境内的经济先进地区，但它的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之完成无疑是苏联时期的成就。除了计划体制在工业化原始积累中的优势外，苏联统一计划经济空间的存在也是乌克兰发展的重要促进因

①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агенство, ИА, REGNUM. http://www.regnum.ru/news/711020.htm.

② Шейла Фицпатрик Сталинские крестьяне. М.,2001,с.279.

③ 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 Famine. University of Alberta Press, 1983. p.3

素。而苏联领导层虽然严防“乌克兰民族主义”，但在全苏范围内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作为“斯拉夫三兄弟”，与其他非斯拉夫民族相比，却也有其特殊地位。正如我国历史上元代的色目人、清代的蒙古人一样，乌克兰人在苏联各民族中作为“老二哥”也还蛮有面子，这也是今天一些乌克兰人怀念的。

而且仅就俄乌关系来讲，苏联时期乌克兰也不是没有便宜可占。原来，苏联类型国家民族政策的特点之一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它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仅仅是根据领导人的喜好，有时固然搞强制同化，有时却也搞人为的“异化”。只要你在政治上听话，别的什么唱歌跳舞、传统民俗、年节礼仪乃至语言文字之类的“民族特色”不仅可以保留，而且往往还很被提倡，乃至被提倡得过分。尤其把一些特别弱小的民族“文化”当成珍稀古董给予大熊猫式的特殊“保护”，甚至人为地阻断自然融合，强化民族差异。例如前南斯拉夫的“穆斯林族”就是在铁托体制下从同种同文同语的“信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给生生拔高成新“民族”的。苏联的白俄罗斯也有类似的情况，白、俄差异历史上本来比俄、乌差异小得多，过去许多语言学家都把所谓白俄罗斯语视为俄语的一种方言，历史上白俄罗斯也没有发生过乌克兰那样的独立运动。所以有人说，白俄罗斯作为民族是被苏联“惯”出来的。在苏联时期，白俄罗斯被确定为不同于俄罗斯的另一民族，政治上不许有异端，“文化”上却提倡有“特性”，还把白俄罗斯送进联合国占了把交椅。然而人之常情却是：排他的特性认同一旦形



波黑战争波黑战场运尸体车

成就难以逆转，而缺乏人权导致的不满却不会因为"文化"的受保护而消失。奴隶并不因可以唱歌跳舞就不想自由，而从唱歌跳舞中成长的排他性认同反而成为争自由的纽带，一旦有机可乘，"文化"上如此受抬举的穆斯林族、白俄罗斯族不但照样反水而去，有时还更加反目成仇——如前南斯拉夫的波黑战争。

乌克兰不同于白俄罗斯，其民族认同并不是苏联"惯"出来的。但是，在东南部俄罗斯人聚居区（克里米亚与顿巴斯等地）划归乌克兰后，乌克兰文化在当地影响的增加却的确是苏联当局鼓励的。乌克兰人并不会因此感谢苏联，俄罗斯人却因此埋怨苏联。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做法不但使两边对联盟都增加了疏离感，造成政治高压消失后的联盟更难维系，而且也助长了独立后乌克兰的"东西矛盾"。

这类国家民族政策的又一个特点是"以面包代替自

由”，对被统治民族在严防政治异端的同时，有时也给予经济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赐，甚至牺牲“统治民族”的利益来实现这一点，而这样做无需征求“统治民族”人民的同意。克里米亚归属乌克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克里米亚半岛在地理上虽与乌克兰有地峡相连，然而在



雅尔塔海边的城堡

历史上与人文环境上却与乌克兰联系甚少。这里的土著是穆斯林鞑靼人，长期与土耳其结盟对抗俄国。18世纪沙俄征服该地后大量移入俄罗斯人，使这里成为俄罗斯控制黑海与亚速海的咽喉重地，黑海舰队重兵屯驻，雅尔塔等地则布满沙俄皇家与俄罗斯贵族的离宫别苑。全半岛的人口也以俄罗斯族为主。但在1954年，主政苏联的赫鲁晓夫为纪念"俄乌合并300周年"，一高兴便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割出，送给"兄弟的乌克兰"作了礼物。但如此"慷俄罗斯之慨"，却未能买到乌克兰人之好。因为人之常情是："自由"固然不能当饭吃，但面包也不能代替"自由"，吃得再饱的奴隶照样会有不满。40多年后乌克兰一独立，克里米亚俄罗斯人被割断与俄罗斯本国的联系，从此作为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地区不断与乌克兰中央产生摩擦，成为俄乌关系中的一大难题。当年领袖的即兴之举，落得个俄罗斯、乌克兰与克里米亚三方皆苦不堪言的结果。

过去有种说法：俄罗斯族人列宁最反对大俄罗斯主义，而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却比俄罗斯人还要大俄罗斯主义。其实，无论列宁还是斯大林，他们都既非俄罗斯也非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者，而应当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族际主义者。本来这应当有利于搞好联邦国家中的族际关系。然而在非民主制度下，他们"代民作主"镇压非俄民族的账被算在了俄罗斯人的头上，导致非俄民族怨恨俄罗斯，连带怨恨联盟。但他们"代民作主"慷俄罗斯之慨赐利于非俄民族却不会使后者感谢俄罗斯，反而使俄罗斯人也怨恨联盟，认为联盟使我们吃亏："土耳其、鞑靼人没有夺去我们的克里米亚，苏联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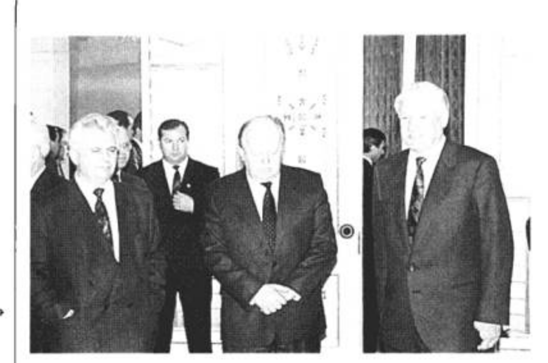
▲乌克兰独立十周年的纪念邮票

使我们失去了克里米亚。”在两头不落好的情况下，联盟怎么能稳固？

“渐进式失败”：独立之后的转轨危机

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借苏联“政变”之际宣布独立。是年年底苏联解体，乌克兰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当时乌克兰人是一片欢腾，这除了民族感情外，也有十分世俗的期望：那时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风”有个规律，越富的共和国越想甩掉“穷亲戚”，因此独立也就越积极。全苏最富的波罗的海三国早在“8·19”政变以前已经宣布独立，而最穷的中亚国家则是在俄、乌、白三个斯拉夫老大哥宣布苏联解体后才无可奈何地“独立”的。乌克兰那时生活水平仅次于波罗的海三国，因此独立也很积极。在全民公决时，全乌83%的公民投了票，90%以上的票赞成独立，连俄罗斯族占绝对优势的克里米亚，甚至黑海舰队官兵都多数投了赞成票。苏联解体之际，乌克兰一片兴高采烈，笔者当时在基辅，听到不止一个乌克兰朋友说：“过去我们受苏联拖累，现在好了，几年之后我们就是又一个芬兰。”芬兰原属俄罗斯帝国，当年整体状况和乌克兰差不多，十月革命后脱离俄国独立，经济发展很快，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

那时的乌克兰人说话“牛”得很，尤其是对俄罗斯。独立后不久，俄乌两国总统互访，俄总统叶利钦与乌总统克拉



叶利钦（右）和克拉夫丘克（左）

夫丘克在电视直播里就斗起嘴来，叶利钦说：乌克兰如果在前苏联遗产分割中损害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就不向乌克兰提供石油。克拉夫丘克马上回敬：你不给我石油，我就不给你粮食！叶利钦不吃那一套：你不给我粮食，我就不给你天然气！克拉夫丘克负气答曰：你不给我天然气，我就不给你钢铁……两人就这么“你不给我，我不给你”地斗了好几个回合，把电视机前的观众听得直乐：两个大总统争论，就像小孩吵架似的。

但是这种“你不给我我不给你”的游戏一旦当真，双方都受害不浅。而俄罗斯经济毕竟更加“大而全”，统一经济空间的解体对乌克兰的打击更大。独立两年之后，乌克兰的经济状况和居民生活已经下滑到俄罗斯的水平之下。现在有人套用“休克疗法导致东欧困境”的调子，把乌克兰也作为“休克疗法”失败的例子，但其实，政局混乱中的乌克兰根本没有搞过任何“疗法”。至少与俄罗斯相比，乌克兰的经济体制变革完全谈不上“激进”。

财政货币双紧缩是“休克疗法”的第一个特征，但当俄罗斯大搞紧缩财政时，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政府却在财政、货币上都实行放松，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升至27.1%。结果导致比俄罗斯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1993年底通胀率高达10256%，被世界银行冠以全球之最。这一经济灾难是导致克拉夫丘克提前下台的主要原因。

由于府、院对立，乌克兰一直没能通过“大私有化法”。而1994年以后，左派三党更利用议会成功冻结了国家私有化计划。当然，尽管如此，乌克兰的产权改革还是有所动作。乌克兰也曾学俄罗斯发放了“私有化证券”，但俄罗斯拿出来分给公民的国有资产本来就很少，乌克兰更是只发证券而几乎没有资产供给。结果这些证券除了一部分用于住房私有化外，都贬值得一钱不值，对企业私有化根本没起作用。乌克兰可用于购买国企的民间资本比俄罗斯更少，外资又进不来。1996年时，乌克兰实现非国有化的企业只是在第三产业占有较大比重：商业、饮食和服务业企业占65%，而工业企业只占12%，农业和建筑业企业约占10%。[①]而第三产业恰恰又很不发达，在乌经济总量中分量很小。因此总的来看乌克兰的私有化进度不如俄罗斯，更远不如波兰、匈牙利等转轨国家。

可见乌克兰政局整个来说要比俄罗斯更“传统”，其转轨的进度也更慢。但是乌克兰经济滑坡无论就幅度还是持续时间而言都明显超过俄罗斯，更远远超过波兰等中东欧国家。无怪乎它被转轨经济学家视为“渐进式失败”的典型。[②]早在独立前的1990年，乌克兰经济已经下滑，国民总

①马贵友等：《乌克兰的昨天和今天》，第四章《经济》，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所网站。

②W.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产值比上年下降了2.4%，国民收入下降了3.6%。1991～1993年，经济又持续下降，到1994年，在中东欧多数转轨国家已经走出谷底转入回升的情况下，乌克兰反而加速下降，出现前所未有的"雪崩"危机，当年GDP滑坡幅度高达24%。1995年、1996年两年下降幅度仍达两位数，分别为12%、10%。1997年，独联体其他国家的经济在连续多年的下滑后恢复增长，而乌克兰经济仍继续下降了3.2%，此后又在谷底徘徊了两年，直到2000年，乌克兰经济才止跌回升。

于是，如果说独联体国家整体上转轨绩效不如中东欧国家，那么乌克兰又是独联体国家中最差者之一。乌克兰的绝大多数企业过去都在苏联一体化经济结构中运作，原料、能源来自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而产品除了供应他们外，自己消费与向国际市场出口的能力都很低。独立后的"你不给我我不给你"导致这些企业陷于瘫痪，尤其是重工业、大型国企集中的乌克兰东部、南部地区，过去经济更发达、生活更好，但因一体化程度更高，独立后经济滑坡更甚，偏偏这些地方是历史上属俄时间最久、俄罗斯人最集中、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最紧密的地方。尤其是以俄罗斯人居多数的顿巴斯和1954年才被苏联领导送给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这里的人民原来在俄在乌都堪称富裕，苏联解体时本来是期望更富才支持独立的，没想到"又一个芬兰"没当成，却成了"又一个玻利维亚"。政治上他们受到西部的压制，经济上临近的俄罗斯地区原来不如他们，现在却比他们过得好，这叫他们怎么能不"亲俄"呢？

尽管如此，千年以来乌克兰人历经反蒙（金帐汗）、

反波、反德、又反俄的斗争，民族主义薪火相传。现在好不容易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岂能让历史车轮轻易倒转？尤其是乌克兰西部地区，这里是乌克兰民族精神的发源地，属俄时间最短，居民中乌克兰族的比例最高，历史上反俄斗争最激烈，苏联时期吃苦最多，而苏联当局“慷俄之慨讨好乌克兰”又主要优惠的是东南地区，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投资大多集中于那里，西乌克兰各州在苏联时期工业化程度较低，生活也不如东部，但正因为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苏联解体后受影响相对较小。而他们相邻的波兰、捷克与匈牙利又恰恰是中东欧经济转轨最成功的国家，经济复苏快，人民生活好。特别是历史上长期作为乌克兰宗主国的波兰更是转轨国家成功的典型，这不能不对西乌克兰人产生吸引力。如今在利沃夫这样的西乌克兰城市，成为“另一个芬兰”的高调已无人再讲，但成为“另一个波兰”还是非常令人憧憬。

在文化上，过去西乌克兰虽然工业经济不如东部发达，却一直是乌克兰民族的精神中心。苏联时期虽然在东部也办了许多大学，但这些大学多以理工科见长，文科教育仍以基辅大学、利沃夫大学称最。因此西乌克兰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的水平高于东部。基辅与利沃夫的许多乌克兰知识分子看俄罗斯，犹如英法人看美国，即便富了也是没有文化的暴发户，并不让人服气。同时，历史上由西方传入的天主教，教徒如今占乌克兰总人口的10%，集中在西部。15世纪俄罗斯东正教脱离拜占庭牧首分立后，非俄属的乌克兰地区东正教徒大多仍然忠于拜占庭，并在拜占庭陷落后形成乌克兰自主正教，它以利沃夫圣彼得大教堂为中心，参与了乌克兰脱俄



▲ 利沃夫

自立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沙俄与苏俄时期惨遭镇压而潜入地下，独立后复兴很快。如今乌克兰自主正教信徒也仍以西部居民为主。西部自主正教与天主教和东部的俄罗斯东正教，也形成了一定的隔阂。

这样，乌克兰人亲西疏俄、羡慕波兰、渴望加入欧盟乃至北约、对俄保持独立自主的倾向、融入西方的倾向，便在西部尤为突出。而乌克兰内部的东西矛盾便日益明显了。

府会之争、左右之争与东西之争

独立十三年的乌克兰，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与族群问题及国际关系问题一直互为因果，反馈震荡。因经济危机导致的人民不满引起了政治动荡，经济、政治的不稳定又使国内的东西族群对立加剧，继而引发国际上西欧与俄罗斯对乌克兰影响的较量，而这些矛盾又进而影响到经济治理，使乌克兰经济衰退延长、复苏乏力、改革受阻、积弊日深，成为一个难以摆脱的怪圈。

独立以来的乌克兰政局一直不平静，13年来换了十届政府，虽政治斗争的焦点有所变化，总的来看呈现出三个阶段：

一、府会之争、制宪冲突

乌克兰独立时，受剧变初期大气候的影响，政治钟摆右倾，上下均认同独立，左右矛盾与东西矛盾均未突显。但是，主导乌克兰独立的“鲁赫”（“乌克兰人民改革运动”的简称）本身是一个派系复杂倾向多元的统一战线组织，独立后很快因为权益问题发生分化。直到1996年前，乌克兰的新宪法一直在争论中难产。苏联时期的1978年宪法仍未失效。但是这个“党国”时期的宪法并不适应因剧变后“三权分立”的现实，尤其是无法在总统与议会间明确划分各自的权力，于是便激发了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之争。出身苏共旧官僚而在剧变中倒戈受到鲁赫支持的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在剧变之初沿袭苏联传统，拥有很大权力，但很快便因经济危机、鲁赫分裂而受到强烈挑战。1994年在严重的政府危机中

被迫提前下台。当年大选上台的总统库奇马与议会矛盾更加尖锐，国家也因总统、议会的对立而几乎瘫痪。这一年政府的决策在议会通过的比例不到1/3，经济滑坡则创下负24%的空前纪录。在总统和议会双重领导和影响的情况下，乌政府两头受气，难有作为。议会动辄发起倒阁，从1992年至1997年，5年中政府总理7次更迭。

这一时期的政争中，意识形态与地区的背景均不明显。后来的"强人"库奇马是中部切尔尼戈夫州人，毕业于东南重工业带的德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大学，作为火箭、航天专家，他应当说具有东部军工企业背景，但他于1992－1993年当总理时因权限问题既与总统、也与议会严重矛盾并被迫辞职。后来作为乌工业家企业家联合会主席兼"跨地区改革联盟"主席是以加快改革的姿态当选总统的。当选后他便学叶



库奇马（背对镜头者）拥抱代总理叶哈努罗夫

利钦，力图强化总统权力，而同时受到议会中左派的乌共和右派的鲁赫双方的反对。但他施展手腕，合纵连横，终于在1996年6月28日使议会通过了以总统制为基本原则的新宪法，从而结束了乌独立6年来混乱的局面。新宪法明确了政府对总统负责，从此直到2004年，库奇马成为乌克兰的强势领导人。这一强势使他能够稳定局势，制止经济滑坡。但也使他成为争议的中心。



▲ 季末申科

二、左右之争、“议会革命”

制宪危机过后，议会挑战总统的问题缓解了。议会中“左”“右”共反总统的局面虽然还存在，但原先成为政治主流的右派“鲁赫”，首先由于其作为主流应为这几年的危机负责而声望大降，其次因分裂而势力减弱，再次因既反总统又反共而在逐渐形成的两极政治中被边缘化，最后，“鲁赫”主流派民族主义色彩强于其自由主义色彩，甚至一度反对乌克兰非核化，主张保留核武器以使乌克兰成为“强国”，这种立场既为西方也为俄罗斯所反感，因此在国际上也陷于孤立——由于以上原因，1996年后右派势力一度大减，不再是库奇马的对手。

而另一方面，以乌共、社会党为代表的左派势力却在这几年中大为发展。乌克兰历史上一直有左的传统，连民族主义者在社会经济问题上也往往有左的色彩，加之转轨后乌克兰的现状还不如俄罗斯，政治钟摆“向左回摆”因而也比俄更明显。在1994年乌克兰议会选举中，乌共取得96个席位，占议员总数（410）近1/4，加上农民党的19席，社会党的25

席，"左派联盟"三党共占有1/3以上议席，社会党主席莫罗兹成为议会议长，议会多数委员会也由左派领导。1998年议会再选，因经济危机持续导致社会政治更加左倾，乌共大胜，得票率达到约25%，党团议席123席，连同选区议席总共占有174席，即占议会全部议席的40%，比上届议会中多获58席。而右派的"鲁赫"只获32席，比上届席位减少了60%。这样，连同盟友，左派控制的议席已达半数。达到了"成（自己的）事不足，败（总统的）事有余"的程度，成为独立以来乌克兰政治"左倾"的最高点。于是，库奇马总统与议会的矛盾再度激化。与此前不同的是：这种矛盾带有了明显的"左""右"对峙色彩。

这时乌克兰左派的力量似乎比俄罗斯还强，而库奇马虽然拥有宪法规定的强势，毕竟既没有扭转危机，不能以治绩自夸，又不是开国总统，没有俄罗斯"独立之父"叶利钦那样的资本。许多人认为他过不了1999年总统选举这一关。不料他不仅在次年胜选连任，而且紧接着成功地发动了"议会革命"，一举打下了左派的风头！

2000年1月，库奇马挟连任之势，支持议会内11个中、右党团联合成立议会多数派，发动"天鹅绒革命"，通过改选程序，一举剥夺了左派在议会的议长、第一副议长和各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左派失去议会控制权后又发生分裂，很快一蹶不振。同月，来自西部的自由派经济学家尤先科于1月组成"志同道合"改革派政府，议会通过激烈辩论后通过了其行动纲领，并承诺一年内不对政府提起"不信任案"。4月16日，库奇马又就扩大总统权力发动全民公决并获胜，左派受



▲ 尤先科

到进一步挫折。2002年3月乌克兰举行第四届议会选举，中右的“我们的乌克兰”联盟获112席，“争取统一乌克兰”联盟100席，而乌共只得66席，远少于前两届，而且由第一大党降为第三，可谓空前大败。

导致这一切的关键还是俄乌关系。作为政坛老手，库奇马不仅善于在国内政治中、而且尤其善于在国际政治中搞平衡。1998年以后他在国内仍然坚持左派不喜欢的转轨政策，在国际上却明显变得“亲俄”，在前南斯拉夫危机、北约东扩、车臣冲突等问题上偏向于俄罗斯的立场，并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一起积极推动独联体内“斯拉夫三兄弟”的“一体化”进程。这样，他不仅从叶利钦、普京那里得到了有力的政治支持，而且因俄乌经济联系的恢复拉动了经济复苏。加上这些年来“渐进改革”的效果缓慢浮现，使得乌克兰总算走出谷底。在库奇马连任的1999年，工业首先回升4.3%，次年经济终于全面回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6%，而且货币保持稳定，居民福利逐渐改善。2000～2002年三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超过20%。

由于这种回升很大程度上是俄乌经济一体化所拉动，东南部率先受益，使得当地与其说“亲左”不如说“亲俄”的民意明显改变。左派在当地的基础因之动摇。而对于作为左派核心的乌共而言，这种变化更是致命的。因为在今天的乌克兰，乌共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吸引力，它能在1998年前后形成那么大的气候，在内是由于独立后吃尽苦头的东南部“亲俄”选民的支持，在外则是因俄共的大力撑腰。实际上，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的“传统共产党”与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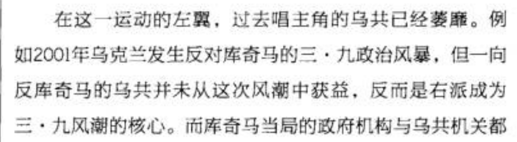
共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苏联式的，前者必须与后者保持一致。然而，俄共本身在这些年里虽然给人以日益僵化的印象，这僵化却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大俄罗斯主义的，与其说是反"资本主义"不如说是反"西方"。正如法国《费加罗报》讽刺地写道：其主张已经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是"全世界斯拉夫人联合起来"。因此库奇马的"亲俄"转向不仅受到叶利钦、普京的支持，也得到俄共的赞赏。这就把以反库奇马起家、又依赖俄共支持的乌共置于极端尴尬的境地。

三、东西之争，大选风波

库奇马虽然打出"亲俄"牌瓦解了左派阵营，但暂时支持他的"中右联盟"只是面对左派压力的暂时联合，很快再度分化。首先是库奇马不断强化总统权力弱化议会的做法在国际上受到西方关于"民主倒退"的批评，议会内也再度出现抗争。但这种抗争不再带有明显的"左""右"分野。这首先是因为库奇马"亲俄更亲资本"的政策虽然迎合了东部亲俄倾向，却打击了左派"反资"愿望，左派因而继续反对库奇马。同时亲俄太甚引起具有反俄传统的西部"右派"不满，"民主倒退"更引起中右的自由民主派和中左的社会民主派共同反感。于是乌克兰又出现了"左""右"混合的反对派运动。



▲ 亚努科维奇



在这一运动的左翼，过去唱主角的乌共已经萎靡。例如2001年乌克兰发生反对库奇马的三·九政治风暴，但一向反库奇马的乌共并未从这次风潮中获益，反而是右派成为三·九风潮的核心。而库奇马当局的政府机构与乌共机关都

在风潮中受到冲击。直接原因是：库奇马近年来推动乌克兰向俄国资本开放，而俄国资本从苏联时期起就有依靠权力运作的“传统”，如今也有相当一部分俄资与俄共关系密切，因此俄共与普京政权虽然敌对，两者却都支持“亲俄”的库奇马。而乌共与俄共又保持着苏联传统式的依附关系。于是在这场反库奇马的“革命危机”中，这个最早反对库奇马的极左党如今既提不出针对库奇马“亲俄”政策的纲领，又因按莫斯科的调子朝三暮四而被指责为投机，还因风暴中把反对的矛头从库奇马转而指向“反库的革命者”而惹了众怒，结果落了个在库奇马政权与反对派之间里外不是人。

于是社会党成为反库奇马运动的左翼，而右翼则是从“鲁赫”衍生的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2001~2002年间，先后出现“记者失踪案”、“总统录音案”等政治风波，尤先科总理与库奇马分手后，议会中右多数派也分化成亲总统和亲总理两个阵营。强烈反对自由派总理尤先科的乌共这时倒似乎成了总统的盟友，带头发动倒阁迫使尤先科下台。但是乌共并未从中得分，乌工业企业家联盟主席基纳赫出任总理数月也被免职，2002年11月，库奇马任命来自东部的“亲俄中右派”顿涅茨克州州长亚努科维奇为总理并组成新政府，在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2004年必须交班的情况下，库奇马开始培养亚努科维奇为接班人。而俄罗斯对此给予大力支持。终于在2005年的“总统大选之战”中，形成了库奇马、俄罗斯支持的东南部势力（以亚努科维奇为候选人）和反库奇马的“左右联合反对派”在西方国家支持下形成的西部势力（以尤先科为候选人）的激烈对垒。

"大选舞弊"风波与国际干预

2004年大选的选前民意调查一直是尤先科领先，而且10月31日的第一轮选举尤先科也以微弱优势领先于亚努科维奇，但是11月21日的第二轮投票，亚努科维奇却反以49.7%比46.7%的微弱优势领先尤先科。这个数字一出顿时招来国内外的强烈抗议，由此导致轩然大波。

在各国民主选举史上，因票数差距接近而引起输家不服输的事并不鲜见。但是这次乌克兰选后争议的"一面倒"却是很罕见的：一边是理直气壮，不依不饶，另一边则表现得异常"心虚气短"，连连"告饶"。乌克兰国内议会与宪法法院先后否定了这轮选举，尤其是宪法法院的裁决以完全合乎法治的程序肯定了反对派的控告。而国际上西方固然是一片指责，俄罗斯也只是说舞弊双方都有，不敢为亚努科维奇



乌克兰小镇 ▸

表清白。那么到底反对派抓住了什么把柄?

无疑，这种把柄太多了。例如东部俄语区第二轮投票率高到96%，远远超过全国投票率79%，这叫人如何相信？无怪乎当记者与国际组织的观察员称，东部工人们“被老板强迫进行缺席投票”，选票在他们的工作地而不是在投票站收集，许多东部选民至少投票2次，亚努科维奇政府的竞选组织让他们在家乡投完后又集体坐车到首都投票，等等，舆论普遍认为这些指责有道理。

而我国学者姜长斌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撰文指出：库奇马操纵选举早在2003年春就开始了。已经连任两届（1994年、1999年）总统的库奇马依宪不能再任，但他并不甘心、或者说由于某种原因害怕下台。最初他想通过修宪达到连任或者延长任期的目的，于是指使议会中的总统派提出库奇马1994年第一任总统在前，制定宪法在后（1996年），因此库奇马的第一任期应由1999年算起，亦即他还可以参加2004年大选。结果导致反对派的大规模抗议，库奇马被迫放弃上述设想，转而全力为总理亚努科维奇助选。但上述举措已经大大损害了他的威信，并且殃及了总统派候选人亚努科维奇的声望。而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却人气大涨。2005年1月一项联合民意调查显示，民众拥护库奇马连任者寥寥无几。支持尤先科为下届总统者占24.5%；支持乌共领导人西蒙年科者为10.2%；支持现任总理亚努科维奇者仅为9.8%。其他多项测验也都表明，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不超过7%，而尤先科的支持者都在20%以上。在此窘境下，库奇马为保障亚努科维奇上台竟然不惜改组乌中央选举委员会。2004年由15名成员组成



▲乌克兰民众在最高法院前示威支持尤先科

的乌中央选举委员会恰有12人任期届满卸任，库奇马为了控制未来大选，向议会提交的一份12名替补者名单清一色是总统派。其中一人原为委员会秘书（委员会领导人），本来这次应当换届离开。库奇马故意提前解除其职务，以便其重新进入委员会再次担任秘书。这个一面倒的机构根本谈不上中立，由它控制的选举事务出现种种怪事自不足奇。事实上，中选会重组后的民意调查表明，只有4%的民众还相信2004年的总统选举将是民主与公正的了。

国际媒体由此判断，大选肯定存在舞弊现象：选程和选票都被人做了手脚——起码在东部和东南部如此。

俄罗斯方面的参与也是广招非议的问题。应该说在"抗

议舞弊”风潮发生前，西方对乌克兰大选的关注只是一般性的。俄罗斯基于地缘政治给予更高的关注也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干预达到如此全力以赴、急不可待、赤裸裸的程度，的确授人以柄。俄政府不仅开动本国宣传机器为亚努科维奇宣传，派出政府、议会官员频频访乌造势，直接出资支持亚努科维奇的四个竞选策划机构并派出大批“政治学家”参与出谋划策，还由总统亲自出马，在大选期间普京两次高调造访乌克兰与亚努科维奇会面，并通过乌克兰3家国有电视台大肆赞美亚努科维奇，还与其一起参加阅兵式，完全是一副站台助选的态势。11月间莫斯科的主要街道甚至悬挂出亚努科维奇的画像，俄官方媒体更公然攻击亚的对手尤先科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11月22日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刚宣布99%选票的统计显示亚努科维奇领先，普京就公开祝贺亚努科维奇当选，俄政府紧接着发去贺电。而此时中选会还未公布正式结果，连库奇马也还未有所表示。如此迫不及待已经是非常失态。及至抗议潮起，俄更一度显得气急败坏，25日俄罗斯传媒甚至曾援引乌克兰电视台的报道，说俄罗斯“勇士”特种部队已分乘两架飞机降临乌克兰首都基辅国际机场。似乎事态已经发展到军事干预，令世界大吃一惊。

俄罗斯的这些做法的确是明显出格，不仅后来使俄罗斯自己非常被动，而且实际上给亚努科维奇帮了倒忙。俄本国舆论后来也纷纷提出批评，如《消息报》便指出：“如此明目张胆的洗脑，结果是适得其反。许多乌克兰人之所以投尤先科的票，就是因为莫斯科过分地向他们推销亚努科维奇。”[①]相比之下，西方当然支持尤先科，但在11月21日前这

①M. 尤辛：《乌克兰大选之后：俄罗斯还需长期努力“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俄）《消息报》，2004年12月28日。

种支持不仅比俄罗斯的做法含蓄得多而且完全是民间性的。11月22日后支持急剧升温而且官方开始表态，但其主力仍然是欧洲而不是美国。正如俄罗斯《独立报》的一篇文章所说：莫斯科在力保自己对乌克兰的影响时，冲突的对象与其说是美国，不如说是联合起来的欧洲。华盛顿当然对乌克兰感兴趣，但这首先是欧洲该关心的事。美国更关心的是全球问题，如恐怖主义、核扩散、新的世界秩序、中东、伊拉克和阿富汗等。[①]

①尤·达维多夫：《夹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乌克兰》，（俄）《独立报》，2004年12月22日。



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举行集会

病树前头万木春

千年以来，或至少自17世纪乌克兰哥萨克反波斗争以来，这个民族的历史一直多灾多难。而其内部的“东西之争”和对外关系中“借助外力反宗主”都是其政治发展进程中频频出现的现象。明乎此，我们就不会对当前乌克兰政治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作出过于轻率的评判了。

地处“民族迁徙走廊”、文明交会通道上的乌克兰，历史上一直存在“东西乌克兰之别”，“左岸右岸之别”，内部纷争又历来都有外部势力介入。尽管国际关系规则中有“不干涉内政”之说，但古今中外的地缘政治竞争中从来就没有排除过国际政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可以是纯利益的，也可以含有道义成分，但从来没有纯道义的。要说“进步”的话，那只能是影响的方式与手段更“文明”罢了。从赫麦尔尼茨基招俄军来驱逐波兰宗主，马泽帕引瑞军攻俄，直到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引苏俄军打拉达，拉达引德军驱俄，这种“影响”都表现为赤裸裸的暴力，多次导致乌克兰原野尸横遍地、血流成河。相比之下，如今俄罗斯与西方在民主政治规则下“影响”乌克兰选民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弊病较小。

如今我们这里许多文章讲外界扰乌，大都责西不责俄，在西方各国中又责美不责欧。但平心而论，今天外部势力对乌克兰选民施加“影响”的用力，美不如欧，欧不如俄。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即便俄罗斯那种几乎是直接参预“选战”的做法，比起其前辈之所为还是要文明进步得不可同日

而语。

我们知道，当年在乌克兰出现中央拉达民主政体时，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也曾一度参加并在拉达中组成自己的党团，而拉达方面的民主派也曾参加全乌克兰苏维埃"一大"（因他们在大会上占了优势，后来布党宣布退出并另搞了个独家自演的苏维埃）。如果当时的苏俄布尔什维克当局不是公然出兵攻灭民主乌克兰，屠杀反对布党的乌克兰人，而是像今天的普京当局那样只是为乌克兰布党站台助选，"影响"乌克兰选民投布党的票，那我们大家都该为之烧高香了！

尽管今天的乌克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主权国家，但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相关，俄罗斯力图施加影响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影响的方式不太出格（例如不涉及对尤先科下毒这类事）人们也不必深责。但同样，对另一方不也应该如此看吗？此次西方社会对乌克兰反对派的经济支持在我们这里被大加渲染，其实这种事在他们那里本属稀松平常，例如与当年他们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支持力度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是今天如果有人还把"波兰人民的选择"（这是我们官方的说法）看成西方"收买"的结果，那也太弱智了吧？而与另一方从俄国与乌克兰现政府那里得到的权力支持、行政资源的支持相比，又该怎么说呢？

如所周知，上述经济支持基本都来自西方各种民间社团和基金会，即所谓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但是我们的传媒强调这些基金会有国家（议会或政府）的财政拨款支持，因此等于西方官方干预乌克兰大选。其实研究过第

三部门的人都知道，第三部门的性质虽然是以民间资源办公益为方向，但由于其公益职能扩张导致资源不足，国家财政支援一般都必不可少而且有比重渐大的趋势。相对来说奉行自由市场的美国算是最少的，这种支援占第三部门财政资源总量的2/3，而民间资源（捐助与义工）为1/3。奉行福利国家的欧洲尤其是北欧就更多，国家财政资源往往要占90%。同时，自从当代西方出现“福利国家危机”后，那里也出现一种趋势，即由国家直接投资办公益的福利国家政策，转变为由民间第三部门办公益而国家给予资助。国内的环保、扶贫、弱势群体援助和其他公共服务是如此，第三部门的跨国活动也是如此。就连中国的香港，2004年年底印度洋海啸救灾活动中特区政府也拨款1400万给宣明会、乐施会等NGO组织从事救灾，这完全是国际NGO活动的惯例，难道这能证明乐施会这类组织代表香港官方？在法治国家，第三部门的民间性和独立性是法律确定的，并不会因受政府资助就听命于、隶属于官方。这和一些国家“民间”组织徒有其名，官方一毛不拔却可以对第三部门实行严格控制形成鲜明对比，也是后者所不易理解的。

当然，外界影响总是有弊病的，即使影响的方式比较文明、弊病较小，指出其弊也是应该的。但是究竟利弊几何，恐怕最终也还是只有乌克兰人自己有资格判断。我们不是常说：“尊重××人民的选择”吗？这其中也包括他们接受不接受以及接受谁的“影响”这种选择吧？

当初苏联的解体、乌克兰的独立并不是美国煽动的。相反，尽管当时美国基于其价值观支持“民主化”，但并不

支持"乌独"，因为基于自身利益，美国害怕苏联解体导致核武器失控，所以即便它可以对波罗的海无核小国的脱离苏联幸灾乐祸，也不愿看到部署着大量核武器的乌克兰自行其是，而乐见戈尔巴乔夫控制局势继续领导"民主的苏联"。直到1991年8月乌克兰宣布独立前夕，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还对乌独的主张"嗤之以鼻"，他借访乌之机在基辅的乌克兰议会演说时，教训乌克兰人"'独立'与'民主自由'不是一回事"，警告乌克兰人不要搞"自取灭亡的民族主义"。当时乌克兰的人心无疑比今天更浪漫更"亲美"，但是老布什亲自出马的"影响"也未能阻止他们走向独立。13年后历经坎坷的乌克兰人决没有当年那样浪漫天真，要说他们反而会不辨黑白地盲目接受西方"影响"，未免过于小看乌克兰人民的智慧。

至于说美国掏6500万美元就收买了乌克兰选民，那就更近于对乌克兰人民人格的侮辱。5000万乌克兰人如今至少一半是尤先科的支持者，如果每人平均2个多美金就能收买了他们，俄罗斯又何惜十倍的价钱！当年赫鲁晓夫不是把整个克里米亚都送给了乌克兰吗？怎么也没能"收买"了他们的人心？仅就这次大选而言，与此间被大肆渲染的所谓"西方出了几千万美元资助反对派"相比，俄罗斯不仅直接为大选投入的财力惊人，而且近一年来为了给现执政的亲俄候选人营造"政绩"不惜血本，以致影响了本国经济的发展。正如俄传媒抱怨的：普京"把俄罗斯各大石油公司的附加税供奉给乌克兰国库"，"为两国的友谊付出了高昂代价"。[1]这种"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优越性"遗风岂是西方那些

①B．采普里亚耶夫，A..科列斯尼琴科：《乌克兰的苦日子结束了》，（俄）《论据与事实》，2004年12月29日。

资本主义吝啬鬼学得了的？更何况俄国这些援助都是赤裸裸的政府行为，不像西方那点钱据说还要“披着民间外衣”而有劳我们来“揭露”了。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西欧之关切乌克兰甚于美国，而西欧的关切也是越远越递减的，他们对乌克兰的关切远没有对中东欧如波兰匈牙利等国大，这些国家剧变后的历届大选多次出现左派上台、前共产党的后继党执政——如今这些国家的现政府大多数就是这种背景，奥地利近年还出现极右准纳粹政党胜选上台，西欧对此也担忧也施加过影响，但并不能阻止这些发展。怎么在乌克兰他们就那么有能耐？亚努科维奇政治上属中右，并非共产党及其后继组织中人，他的社会背景则是东南部富裕区的工业寡头。我们有些人特别喜欢借痛骂寡头来渲染“东欧灾难”——尽管大多数东欧国家并没有寡头，可是真正临到乌克兰这种具体场景怎么又变得如此“亲寡头”了呢？而乌克兰的左派两党中，乌共这次态度暧昧并不支持亚努科维奇，共产党的后继党之一社会党这次倒属于尤先科阵营。西欧凭什么就特别青睐尤先科而一定要“颠覆”亚努科维奇？我们这里有人说乌克兰事态是“和平演变”的继续，难道西方想把乌克兰往“左”里“演变”不成？

可见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是看不到真相的。平心而论，国际政治既有道义原则也有利益层面。道义上讲支持民主是世界潮流，利益上讲各国却都在不同程度上搞“双重标准”，事涉利益就无绝对的是非。我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处在俄罗斯那样的利益相关地位，自然也会尽力与西方一争



支持尤先科的议员们欢呼胜利

高下。但如今我们在乌克兰完全是局外人，毫无国家利益可言，有些人歪曲起乌克兰事态来却比与西方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俄罗斯还极端得多，无论从道义，还是从我国自身利益而言，这都是不可取的。

乌克兰的事态虽然复杂，总体上看人们没有理由过于悲观。从这次风波的全过程看，尽管双方的对抗十分激烈、矛盾十分深刻，却一直遵循和平和非暴力原则，并未导致局势失控。这与乌克兰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相比实在是文明进步多了。正如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卡拉加诺夫所说：

“虽然对立严重，但双方都不会把事态升温到流血。这两派都经历过长期的民主斗争，他们不会任意践踏斗争的成果。乌克兰人要比俄罗斯人务实和克制，他们虽然经常集会，却很少发生冲突。”

而国际社会也很少可能为乌克兰掀起一场新的“冷战”。正如卡拉加诺夫所说：“我们本来有权对某个候选人表示好感。但是我们却犯了许多错误。我们的媒体进行的活动连乌克兰的俄罗斯同道者也感到愤怒。我们的政策制订者甚至把俄罗斯最高领导人也扯进了这场游戏，从而削弱了我们对乌克兰形势施加长期影响的可能。……我们没有对白俄罗斯发生的事采取任何行动，但在乌克兰却做得太多，而且做了错事。”当我们这里许多媒体忙于为俄罗斯“打抱不平”时，俄罗斯舆论界像卡拉加诺夫这样冷静的声音却日益成为主流。类似地，西方舆论对其对乌政策的反省之声也十分强大。

风波之后的乌克兰向何处去？此间许多媒体描绘了可怕的前景：分裂、内战，乃至把世界卷入爆发国际危机，等等。但是熟悉选举政治的人都知道，大选期间的激情表演是不能太当真的。大选过后通常是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老百姓如此，政治家亦然。“所谓的亲俄候选人，如果他只以微弱多数获胜，他的胜利就会有争议，这使他无论如何不会像原先承诺的那样奉行亲俄路线。亲西方候选人也一样，如果他也以微弱多数取胜，他的胜利同样会有争议，他也永远不会奉行反俄政策。”笔者相信这位俄国学者的判断。乌克兰民族的自立之梦已经千百年，乌克兰立国也已经历了十三个

春秋。当年沙俄帝国解体时，独立的乌克兰转眼就被淹没在战争的血海之中。70多年后苏联解体，乌克兰的独立之路尽管依然坎坷，但是毕竟走过来了。它的转轨危机尽管在整个中东欧独联体世界是最严重之一，但也已经过去，其经济已经连续数年增长，什么克里米亚危机、黑海舰队危机、刻赤海峡危机、记者失踪风波、录音带风波等等都过来了，难道这次大选风波就会翻船？

有本于此，笔者想以一句唐诗来表达对乌克兰人民的祝愿：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下篇

前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










前东欧、俄罗斯的“面包时代”？（上）

什么是"面包时代"？

"面包时代"，这个颇具黑色幽默的名称并不太常见于公开的报端，这是俄罗斯、中东欧的知识分子私下里指人们日常生活的"面包"超越了人类所有其他目标，成为了唯一追求的对象的年代。在这个时代生存是第一位的，人们丢失了精神家园，面包取代了一切，它高于独立思辨、高于道德、高于自由、高于精神追求、高于尊严，只有面包而没有其他。看过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的人都知道瓦西里的那



列宁在十月 ▸

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当牛奶和面包满足了人们的生活欲望时，“在一个不允许平常人谈论平常事的国家里”，[①]大多数厌倦了政治的人都采取了“冷漠和麻木”的“鸵鸟策略”，把头埋在沙子里，不但一般的民众如此，就连被称为民族良心的知识界也忘记了自己肩负的使命，浑浑噩噩地“为面包而面包”地活着，他们环绕四周看到的是，历史被压抑、记忆被封存、思想被禁锢、声音被窒息、犬儒主义流行、社会上充斥谎言，在高度一元化的体制下，在个体必须服从权力的社会里，人们被控制得无立锥之地，他们既感到恐惧又自我欺骗，为了生存，人人都只考虑自己，小



▲奥威尔

◀《1984》的手稿

①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下卷），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第383页。

心谨慎地行事，就像套子里的"死魂灵"，人除了空间的肉体再无所有，不去思考生命、真实、创造以及人类自身的意义。这样的社会是混沌恶浊的、语言是被强暴的、审美是恶俗的、生活是猥琐的，人在内心深处被内在地分裂了，社会的真实性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甚至会出现文明倒退、是非不分、人性丧失的可怕而荒唐的景象。伊塞亚·伯林说，"最可怜的人不是被打倒的人、也不是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随意揉捏的人"。这时社会主导的理念是，追求生存和现世的快乐，人们生活的意义就是"面包"，"面包"成为这个时代的最高象征，就像奥威尔的小说《1984》和《动物农场》在现实中上演一样。

毫无疑问，求生是人的本能，谁也不能苛求在人的这种最低要求都无处保障的情况下，号召人们去向强权抗议，"面包时代"体现着一种无奈，但它也是一种倒退。如果人类社会中精神追求从人的生活中退出或者让位于眼下生存，以物质取代精神，人们仅仅满足于口腹之饱、感官刺激、消费和娱乐，不去拷问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哪怕像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哪怕是依靠别人的鲜血而活着都毫无羞耻之心，人人都以"好死不如赖活"为借口而逃避责任明哲保身，社会的主流价值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其表现形式一种是把日常的物质生活作为最高追求，自我蒙蔽地强调这种社会是不需要精神的，是不需要自我头脑的，只要有温饱和疯狂的娱乐，比如崇尚做一个顺从的奴隶，认为个体以卵击石的抗争是微不足道的，渺小人物只不过是"砧板上任凭宰割的羔羊"，思想、精神之类的华而不实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

穿，人们满足于被物质上的小恩小惠和舒适感觉所占领，即便表现出的“智慧”也是投机取巧的“生存的智慧”。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寻求解脱，通过各种集体融合的方式逃避孤独，求神拜佛也罢、向外转移注意力的民族亢奋也行，只要是融入没有危险性的大族群以及其他各种虚构的想象中的强大身份，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聊以自慰。这种社会风气会鼓励人们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释放人性恶的一面，因为一个法制不健全、缺乏是非标准的社会可以充分诱发人性丑陋一面的大释放。正如齐泽克所说的，这个世纪的灾难，不是因为我们屈从于病态的吸引，而是因为我们试图避免面对它，并把它强加在“真、善”之上，批量制造完美的螺丝钉的宗教和政治教育，最终出品的却是一批丧失人性、心智不健全的人。

在沙俄、苏联、前东欧历史上大约存在过三个这样的“面包时代”，他们是怎样对待的？又各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不为一个银卢布而交换灵魂”

第一个“面包时代”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政府一方面在经济上处在追求西方的潮流中，商业功利和享受生活的消费性美学弥漫着上层社会，欲望从潘多拉的魔盒中大量释放出来，王公贵族们夜夜欢歌、极尽奢华，拼命娱乐表现出没心没肺的低俗的生活态度。另外沙皇当局加紧了政治上的钳制，“第三厅”的秘密警察大

量盯梢、抓捕、流放具有异己思想的知识分子。俄国的现代化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拉升了俄国的国力，但是由于不公正的改革严重地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因此在这种现代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反专制与反西化的思想倾向。俄国知识界一时有知识分子是"内侨"的说法，因为颠沛、迫害、被控制、不自由、贫穷、孤独、苦闷、精神饥饿是他们的常态。1863年，在彼得堡美术学院的毕业设计上，院方要求学生以北欧的神话作为命题进行毕业画展，而学生们主张用俄罗斯民间的现实题材为题作画，遭到院方的反对，并警告他们说，如果坚持己见后果将会很严重，结果以克拉姆斯科伊为首的13人退出比赛，当时他们提出的一个口号是："绝不为一个银卢布而交换灵魂。"他们认为坚持自己的理念高于眼下的利益，他们离开学校后自己租房子作画，到民间去巡回展览，并与思想界、文学界遥相呼应，用画笔来展现俄罗斯的精神追求，这就是后来名声大噪的"俄罗斯巡回画派"。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希什金均出自这一画派，他们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写实手法成为俄国画界最有代表性、最有生命力的一派，以至于有人评论道，在俄罗斯画坛中"巡回画派"耀眼的光芒遮蔽了其他流派，几乎成为俄罗斯画坛的象征。他们绘画的草根情结和自然纯朴的审美观念令人心灵震撼，它真实地传递着俄罗斯民族的成长过程，把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的人文理念与审美理念统一在一起，体现了追求社会公正以及反对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价值目标。



▲ 列维坦



▲ 苏里科夫

与此同时，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的"黄金

时代”都充满着有关于面包与道德、面包与精神、面包与坚守理念的话题讨论。黄金时代的作品都在努力体现“灵与肉的搏斗”，表现出对生活意义中精神世界的渴求，以及他们试图从宗教启迪中获得拯救俄罗斯的焦虑。正如号称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之子”的别尔嘉耶夫所描述的，“在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找到某些思想隐居者小组、科学的苦修者、狂热的宗教信仰者，他们毛发很长，而期望永远年轻，这就是俄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抛弃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则遗忘了自己的不幸，他们不停地进行着理论问题的探索，他们全神贯注地关心真理，关心生活、关心科学和艺术、关心人道”。[①]他们认为在思想文化领域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表达空间，应该是最大程度上的“去政治化”。他们以俄罗斯文学与沙皇的专制制度格格不入为例子，证明政治与思想本来就是一对反向性的矛盾体，政治提倡集体和服从，思想注重个性和自由，政治讲究稳定和重复，思想倡导原创和深刻，拒绝重复是思想更新的源泉，而政治则是死气沉沉的换汤不换药。



▲ 列宾



▲ 希什金

在他们看来，独立的思想活跃与否是一个民族道德水准的衡量标准。有人说“俄国文坛是思想家的熔炉”，因为从19世纪上半叶赫尔岑开始，俄罗斯文学家就充当着启蒙者和政论家的角色。俄国思想界的一个特点是“文学中心主义”，以文学的表达形式来体现其他人文学科的现象十分突出，当然，这个文学是广义的“文学”，文学里面不仅有文学还包含有哲学、宗教、艺术和思想。文学家也不仅仅是文学家而是把思想追求和精神寄托蕴含在文学当中的“哲人、

①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55页。

先知"或"思想的引领者"。"俄国文学"是"思想的文学、道德的文学、小人物的文学和社会良知的文学"。俄国文学成为"思想的引领者"也就不难理解了。俄罗斯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青藏高原"，就在于它的精神探索。哲学家费达多夫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任务是思想性的。"①



▲ 托尔斯泰



▲ 陀思妥耶夫斯基

最经典的当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著名寓言：说有一天耶稣复活来到人间，见到人间的"大审判官"，他对耶稣说，你回来干什么？你空手而来，只带给人类一点自由的承诺，但人类的愚民百姓根本不知道你所谓的自由有什么实际用处，因为人类社会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自由，你说人并不是只为面包活着，你曾经说，人类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动物，断了精神就相当于大脑缺氧，但我要告诉你，我把他们喂饱了，他们就跪伏在我的面前说，只要有面包吃就愿意拿自由作为交换，说明"吃饭哲学"高于虚幻的精神追求。最后大审判官警告耶稣不要再到人间来试图挽救什么集体记忆和民族精神，"面包时代"已让人类很满足，耶稣只好悄无声息地离去。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这则寓言告诫人们仅有"面包"与动物无异，总是寻求跪拜的对象，以精神换取一时的安逸，放弃思想、放弃了精神追求的人就不再成其为人，只不过是一种爬行动物，②"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所以在小说中，主人翁卡拉马佐夫在经历了灵魂激荡之后，坚定地走向圣徒之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那些取缔别人自由而强行灌输"真理"的人就是"真理的占有者"的话，我"宁愿跟基督在一起而不是跟

①费达多夫：《知识分子的悲剧》，见《论俄罗斯和俄罗斯哲学文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09页。

②雅·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

'真理'在一起"。他呼吁要为治愈俄国思想道德的"贫血症"走上"基督之路"，从事"心灵"的拯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些人从事拯救灵魂的"内在学问"，奢侈品可以是外来的，但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必须得靠自己生养出来。黄金时代的作家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个文学巨匠，他们作品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对永恒精神追求的思考。

一元化下的"集体魔法"

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像一个崭新的力量吸引着无数的愿意为新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但同时它前所未有的一元化也使知识分子丧失了选择的自由，每个个体都被迫只能在其中寻找自己的身份。人们很快发现，这是一个把整体利益与个体的自由区分开来的时代，国家民族的强大是以个人的牺牲作为代价的。新政权初期人们对此表示理解，国家强大与个人自由的排序是只有在先满足前者的情况下才能惠及到个人，向往强大和统一是俄罗斯人历代的追求目标，弥赛亚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政权为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需要个人为国家做出牺牲也得到了积极响应。

苏俄内战结束以后，处在围困中的"一国社会主义"不得不通过强硬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引发了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一种两难选择摆在了革命者的面前，要么坚持原来的理想，要么使用专政手段保住权力。在第一种情况下

他们总是很少获得成功，但当他们使用无产阶级的专政铁拳的时候，他们就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了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毁灭。"强制与暴力的频繁使用成为一种惯性，甚至从一种夺取政权的手段演变成为最后的目的了。在反对派阶段试图通过政治自由竞争的方式创建"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自信也就荡然无存了，理想主义的目标不可避免地被实用主义的现实所取代，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的社会目标变得越来越遥远而不现实了，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已成为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而维护其政权的暴力手段却变得越来越清晰，在保住权力上升为第一要素的政治需求下，"唯意志论"的理论笼罩了全党，纪律制约、强制手段和社会恐惧成为保持党的统一的重要政治制度。人权、民主、自由、多元文化这些曾经为之追求的目标现在被认为是有害的奢侈品，任其泛滥就会损害到对执政党的认同，自由价值从奋斗理想变成了国家的心腹大患。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解散和改组了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定，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进一步把文学变成"统一的党的机器上的小轮子、螺丝钉"，形成命令畅通的一元化的组织领导系统，以政治化、党性原则这两把尺子干预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斯大林以高度动员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



• 苏联时期的宣传画

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全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他们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的便捷材料，就必需要“被禁锢的头脑”，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来看待了。

建立这种体制的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局面。用行政命令统治社会，用强制镇压保持舆论一律，用权威驾驭局势，人人服从则天下太平，他们不懂得没有党外的争论就不可能有党内的生动局面，践踏了全社会的民主，又怎能保证党内的民主？镇压体系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恐怖体系。苏联在抛弃多样性以后必然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政治和道德之间的互相排斥。党以自己取代了无产阶级，除了可以随便践踏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其他各个阶级，也开始践踏无产阶级了。把国家的强大

动员力置于社会的进步之上，在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最需要的是对信仰没有兴趣的人，权力就等于思想的产生者，其他人只能是诠释者，而没有产生思想的权利。"占据真理的自傲意识"往往会把"对自由的敌人的仇视变成对他人自由的侵犯"，[①]思想语言被作为权力的一部分，这个社会的真实性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这个政权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文明倒退人性丧失的可怕而荒唐的时代。

这时左翼知识分子感觉到，个体与整体的悖论并不只是一种"战时状态"，而逐渐变成了一种常态，他们在帮助新政权建立巩固以后，却发现"俄国革命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革命永远是不知感恩的，俄国革命对俄国知识分子特别不知感恩，知识分子曾为它做了准备，它却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把他们抛入深渊"，"革命不宽容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怀疑甚至敌视精神的价值，作家协会是按印刷厂工人的范围进行注册的，自由思想只能在地下继续存在"。[②]这个政权像罗马皇帝尼禄一样会吞噬掉自己的母亲和亲人。知识分子成为了苏维埃政权主要的敌人，就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张开双臂欢迎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有罪阶级"，"有教养的社会"被制造出来的中伤和诽谤，与劳动阶层疏远和敌对，一个人声誉的好坏全凭内务部派下来的"三人小组"的鉴定书来确定。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经过一轮一轮对知识界的整肃以后，知识界的棱角已经被磨损，人们都"学乖了"、恭顺和世故了，选择了装聋作哑是给自己蒙上一层"保护"，知识界成为一个"吓怕了的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它被下降到或被排挤到社会

①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46页、26页、51-53页。

②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224-229页。



◀苏联时期的宣传画

的底层，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地、小心地活着，仅仅是活着，“生存压倒了一切”，[①]“面包时代”又一次主导了人们的生活。生活在苏联的学者对外面解释说，在社会没有任何空隙的情况下，俄罗斯历史上知识分子就是“思想反对派”、“心灵反对派”的传统的香火已经无法延续，“国家同知识

①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持不同政见论文选编》，外文出版社，1980年，第279页。

分子斗争的年代也是尊严、良知、人格、信守原则、诚实、公正、正派、高尚等概念从官方语言中消逝的年代"。[①]苏联的生存环境与沙皇时期文学"黄金时代"作家的处境已大不相同了，俄国和苏联在思想上的联系永远中断了，过去那些执拗的坚持信念的叛逆思想家和冥顽不灵的长发知识分子地

①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下卷），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第365页。



苏联时期的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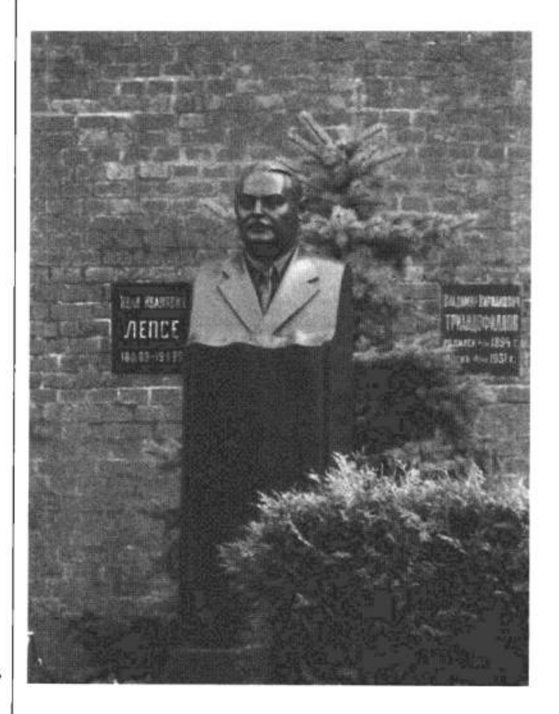
遁般地消逝了。

国内战争不但使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也呈现出“荒漠化”和“自我封闭化”的景象，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的“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繁荣，如一战前的1913年俄国大约出版了2万种图书，而1920年只出版了3260种，而且主要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新经济政策时期短暂活跃文化繁荣，到了20年代末“大转变”时期，私人出版社大规模地消亡，多元化的文学出版活动完全停止。苏联在30年代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避免遭到毒害。做到“清除环境”的第一步是焚毁“政治上有害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这期间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籍的清单，销毁外国和过去的图书资料是惊人的，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种、宣传画223751种，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①]苏联学者到戈尔巴乔夫时代前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其次，拒绝苏联学者与外界的交往，把他们与世界学术界的联系完全隔绝，只聘请个别为苏联唱赞歌的左翼作家，而且让他们看到的也只是“波将金的村庄”。[②]在反对崇洋媚外的口号下，苏联科学家不再参加国际会议，也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文献资料的交流降低到沙俄时期的几十分之一，而且几乎无法使用。曾经有个涉世未深的学生问从英国前来访问的伊塞亚·伯林，沙皇时期那么十恶不赦，为什

①（俄）格·维·日尔科夫：《19-20世纪俄罗斯书报检查制度史》莫斯科，2001年，第339页。

②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的宠臣波将金为叶卡特琳娜巡视建立的粉饰太平的虚假的村庄。



日丹诺夫像

么那个时候比现在更加多元、更加自由，反对派分子可以组织成政党来推翻沙皇，而现在却做不倒呢？这是否说明现在的这个政权比沙皇政权更加专制？伯林环顾四周，吓得落荒而逃。这种状况被后来的苏联作家概括为"日丹诺夫时期"一元化下的"集体魔法"，这个时期也就是所谓的严寒"冰冻"时期。

“面包不是自由的交换物”



▲ 爱伦堡



▲ 高尔基

赫鲁晓夫时期，首先是爱伦堡在1954年发表中篇小说《解冻》开启了苏联“解冻”文学的解冻时代，紧接着作家杜金采夫发表小说《人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在该书中重申了1863年“巡回画派”诞生时的宣誓话语，“面包固然重要，但它不是自由的交换物”，他引用赫尔岑的话说，“争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让活着的、各自有其目的个人获得自由，使他们自由追求他们认为神圣，他们为之行动、奋战，也许舍身以赴的目的”。[①]诗人叶夫图申科反对把“诗人”和“战斗员”、“宣传员”划等号，他说，现在对普希金的阅读也失去了个人认同的权利，在过去俄罗斯文坛上，诗人就像帕尔那索斯山上的神享有崇高地位，诗歌王国要胜过沙皇的权力，人们要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痛苦、沉思和理想，如果把诗人的作用划定在意识形态吹鼓手的范围内，必然会导致“地下诗人圈”和“隐士文学家”的出现。他们试图冲破社会文化领域出现的“荒漠化”和“自我封闭化”禁錮，纠正谎言时代。爱伦堡曾以“黄金时代”的作品作为例证说，十月革命前两托（陀）、契诃夫和高尔基等人想些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就写什么，而不受行政官员和某一级组织的管辖和监督，才能够成就他们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在一元化的领导下什么思想无禁区、研究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时候真正做到过？真实的情况是“和领导保持一致”，“党中央是最高的裁判员”（葛罗米柯语），[②]“意识形态纪律”是文学家必须遵守的第一要务，

①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上册，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②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45页。

社会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1]刚刚开启的"解冻"的潮流很快就戛然而止，上述作家都遭到了苏联作协组织的集体批判，爱伦堡等人在这种意识形态强势面前，只好以保持沉默的态度维护自己的尊严，这种低调姿态后来被人概括称为"沉默的理论"。

紧接着《真理报》发表社论，首先明确不能对社会主义的"真理"和"正义性"发生怀疑，"英明伟大"的党是绝对不能批评的，如果产生这种想法在客观上就陷入了反共的立场。[2]其次强调党性原则是高于所谓资产阶级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的，[3]只有政治上立场坚定，以党的是非标准作为最高准则，排斥任何"中立主义"和"历史真实论"的"经院派"的论调。针对有些作家提出的，文学家"没有祖国，没有君主，只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承"的说法，《真理报》批驳道，假如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些没有祖国、没有亲族、没有朋友的人，不就落到了人类中最不幸、最龌龊的一类了吗？和禽兽有什么区别？[4]第三，党报提出要搞"意识形态净化运动"，指出党养着你们这些作家，需要的就是"驯服工具"和意识形态的吹鼓手，需要的就是前赴后继地涌现"歌德派"，苏联作协下属的所有的文学社团只能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文学的认知功能和思想探索功能都可以隐去，它的主要功能只剩下一种宣传功能。在党的领导下，文学艺术的功能就是塑造和培养适应这一斗争要求人物和叙事的，一定要改变19世纪黄金时代"文学就是人学"的概念，而变成了文学就是"服从党"的政治学的提法。

①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386页。

②（苏）《消息报》1963年3月10日。

③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85页。

④《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58页。

为此，苏联作协专门进行过一次关于“面包与自由”的讨论，讨论前，斯大林讲话说，这个体制所需要的人要么是听命的臣仆，要么就是敌人，面包提供给臣仆，镇压机器是给敌人准备的。最后参与讨论的人表示，在一方面“原子化”的社会和另一方面强大专政机器的国家里，每一个软弱的个人在国家的强势面前都只有服从的份了。如果在“面包”和其他之间只能二者择一的话，好像只能选择“面包”了，因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全系一处，要养家糊口不能丢了饭碗，在这种“别无选择的选择”的情况下，谁还敢以“黄金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的创作自由来论证“文学和政治体制之间的错位关系”？由于社会的单一化和强力部门的严格控制能力，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吞噬掉个体，个人与集体保持一致和服从性成为了苏联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苏联时期的作



▲ 普宁



◀ 普宁雕像



▲ 布罗茨基

品缺乏真诚，大部分当代作品如同唱片一样一再重复《真理报》上的口号，能够发表和出版的大多是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1933年获奖的普宁因其作品的"灵魂"扎根在帝俄时代，是对"俄国文学一个迟到的承认"，被苏联定义为一个"堕落到





帕斯捷尔纳克著作《日瓦格医生》封面 ▶

君主主义立场上的反动家伙”，由于他“自绝于自己的祖国”，被取消了国籍；1958年获奖的帕斯捷尔纳克迫于国内的压力宣布拒绝接受诺奖，一年半后郁郁而死；1970年获奖的索尔仁尼琴立即被苏联作协革除教门，1974年被剥夺国籍并驱逐出境；1987年获奖的布罗茨基早在1964年就被流放，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只有1965年获奖的肖洛霍夫得到国内官方热捧。

“幸好我们还有萨哈罗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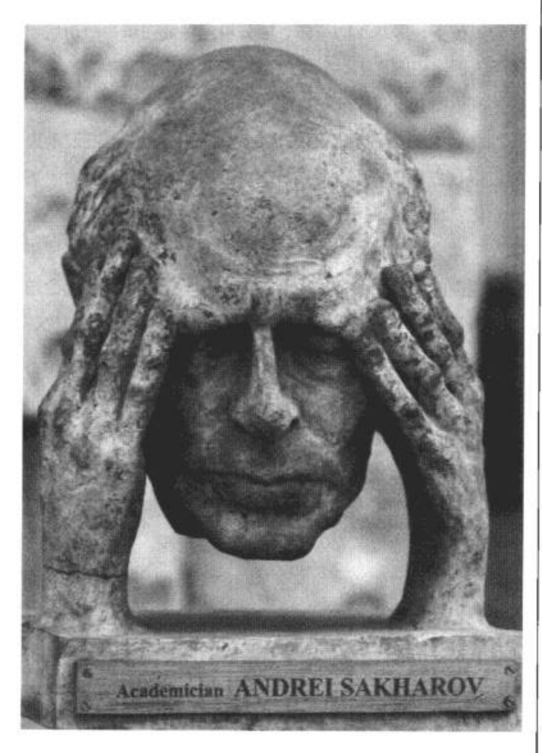
在这种“集体魔法”中每个人都以逃避责任为上策。害怕掉了饭碗、害怕肃反委员会、害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害怕克格勃，害怕被找去谈话，害怕承担责任、害怕受他人牵连，在人性的尊严被剥夺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包装起真实的一面，大家都在竭力表白：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顺民，我选择了顺从、选择了“从众的随大流”。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放弃”，大家都以自身的利益为最高目的，每个个体被操纵、被量化、被控制、被吸走了能量，成为没有轮廓没有个性的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充满了谄媚味道，为向上爬而丧失自我，更多的人人格被分裂，人们讲话分公开场合与私底下两种，是不能互换的，一种给公众的和麦克风的，另一种给亲人的和极小朋友圈子的。表面上看似是一种不得已的明哲保身，实际上混淆了善恶、“变成了罪犯的帮凶”。1934年“基洛夫案件”以后，“告密”成为忠

于还是反对现政权的标尺，政府鼓励人们"打小报告"，公开招募"告密者"，迫使人们在惊恐不安的氛围中向强大的专政机关靠拢。诗人多马尔以形象的手法描述说：谎言！谎言嵌入我的肉体，肿瘤在向我呐喊，不要除掉我们，我们留着同样的血液，脓疮在哭诉，我们是你唯一的装饰，唯一的美好，继续滋养我们吧，这不会让你损失什么！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只有一把肉眼可辨的短剑，但它是真实的，所以可以致命，但它真的太小了，我随时都有失去它的危险。

所有从外界观察苏联文艺界的人都会发现，你根本听不到任何不同于主流观念的声音，知识界的思想已经被磨得没有棱角，只有那些不针砭现实的考据、考古、古文字等学科可以一枝独秀，人文知识分子的奴性和虚伪成为惯性，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禄所系，因为他们只有听话，才能有所收获，只有思想对路，才会进入日益膨胀的特权阶层，乃至从平均主义的樊笼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新贵。把个人改造成傀儡，以利于大一统的专制统治，纪德说：文学受到了严厉的监视与制裁，"苏俄是普及谎言的，在那里甚至连眼睛都可以受骗"，[1]"俄罗斯不是一个提出诉讼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亚是一个流放的地方，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纪德同时说："在苏联一部作品多么美，只要它不紧跟路线，就会遭到羞辱，美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人也是最早觉醒的人，也必然是道德范畴上的'痛苦人'。"

"面包时代"主宰苏联知识界很多年，一直到上世纪

①纪德：《〈访苏联归来〉之补充》，朱静、黄蓓译，花城出版社，1999年。



◂萨哈罗夫像

70年代《赫尔辛基协议》以后，“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知识界里才有人站出来质疑“面包时代”。就像萨哈罗夫所说的，“最初我认为自己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并认为社会主义是很好的”，即便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损害到个人的时候，我也认为是暂时的，是外部环境导致的，后来我发现


▲利哈乔夫

权力是根本，那些发动革命、信誓旦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要给予人民自由的许诺，只不过是一种动员手段罢了，革命以后国家机器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描述的"弱化"现象，反而更加垄断、更加残酷、对人民的强制性约束力和汲取手段超过以往任何时代。他还说，"我们应该消灭社会的思想一元化，统一的思想体系按其实质是反民主的，对国家是悲剧"。索尔仁尼琴说，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毁，它不但是禁止了舆论自由，而且是强制性地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谎言有时自身也会被欺骗了"。苏联人把当时的官方两大媒体《真理报》与《消息报》说成是"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

后来曾被普京总统奉为"国师"的利哈乔夫评论萨哈罗夫说："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与权力抗衡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没有他俄罗斯人就会永远蒙受耻辱，只有他说出了我们所有人想说的话，他保全了我们的荣誉，他一个人证明了整个民族存在的价值，改变了我们对权力的认识".，"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将被称为'萨哈罗夫时代'"，[①]幸好知识界里还有萨哈罗夫这样的代表。利哈乔夫明确地指出："有的人写作、教书、创作艺术品是按照别人的订单行事，是为了完成任务，是本着党、国家或单位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订货要求的精神行事，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只有那些在信仰上不受约束，不受来自经济、政党、国家压力左右，不屈从于意识形态义务的人，才算得上知识分子。"[②]

①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下卷），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第382页。

②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下卷），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第355页。



前东欧、俄罗斯的“面包时代”（下）

苏维埃帝国下的另一个欧洲

①这是东欧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一种蔑称。

二战后从地理上处于德国与俄国之间的"二等欧洲"[①]诸国根据《雅尔塔协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些国家虽然身处中欧，却在很多方面具有西欧文化的特点，这时它们有了一个带有政治意义的地理概念——"东欧"。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冷战"序幕，苏联建立共产党情报局来统领下属的各共产党，要求他们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按苏联的榜样搞建设。苏联不顾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和他们正在探索的适合自己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粗暴地推

▾ 布拉格城堡





▲ 斯洛伐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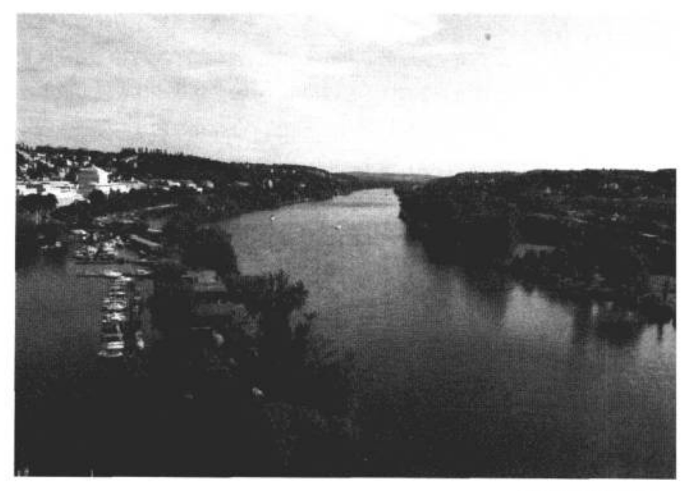
行所谓的“东欧苏联化”的“莫洛托夫计划”，把它们变成“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造强制实现了统一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没收了服务业、商业、工业中私人企业，取缔市场，统一调拨物资和实行计划分配，到1948年年底，捷克20人以上的公司几乎绝迹，匈牙利工业的83%、波兰工业的84%、罗马尼亚工业的85%、保加利亚工业的98%都归国家所有，1949年又开始咄咄逼人地摧毁私人小业主和单干农民。[1]所有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人统统被作为“政治犯”送去劳改，在捷克的1300万人口中有10万以这样的罪名遭到拘捕，这还不包括大量的“行政清理”人员，在总人口900万的匈牙利有1/10的人经历过被捕、监禁和流放。

①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上册，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各国立即涌现出改革浪潮，6月17日，东柏林40万工人发动工潮，保加利亚工人也行动起来，苏联害怕引起传染效应的连锁反应而失去控制，赶紧通过操纵各国党内的"保守派"替换"党内民主派"，强压下拟议中的改革方案。1956年，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出笼后，东欧各党再次出现改革的呼声，1956年和1968年，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都以不同的抗争形式力图摆脱苏联的控制，苏军大兵压境以坦克粉碎了东欧人民探索的希望。①克里姆林宫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只拥有有限的主权，一切民族主义和"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不允许的，任何想要跳出莫斯科掌心的做法都会引起军事干涉。捷共领导人姆莱纳尔后来回忆说，1968年当每个捷克政治局委员身后都站着一名手持武器的苏联红军时，我们每个人"对社会主义的观念一下子都退到了底"，共产主义的灵魂在这一刻就死去了。这时东欧民众的反苏反体制的共识达到高潮。

因为苏联占领者以及他们所扶植的"莫斯科傀儡"政府的"合法性"严重失缺，苏联仅靠刺刀下的军事占领和严厉的镇压手段无法控制局面，在惩罚性报复过后，那些以苏联人马首是瞻的"莫斯科派"靠政治垄断也无法从制度结构中获得合法性，于是他们很快就调整策略，在政治控制严格不放松的情况下，允许东欧国家适当的在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化"，以经济怀柔的方法来平复民众的敌对情绪和修复苏军占领的民族创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方面东欧各国大举借外债在经济上"讨好"民众，另外改变了过去"重重

①1956年10月19日赫鲁晓夫已经下令一个苏联坦克旅开赴华沙，最后因哥穆尔卡保证他能够控制局势，才使"波兰的十月"化险为夷。1980年面对波兰的团结工会勃列日涅夫也考虑过出兵占领波兰，是雅鲁泽尔斯基仿效哥穆尔卡主动实行军管，把苏联军队阻挡在境外。



▲捷克维谢格拉特城堡上眺望伏尔塔瓦河

工业、轻轻工业”的做法，扩大消费品的生产，虽然各国仍是短缺经济，但是供应的商品丰富起来，赫鲁晓夫式的“火柴盒”尽管简陋难看，却也大大缓解了人们的居住压力，在苏联住房一般只占家庭预算的4%，[①]东欧也大抵如此，在保加利亚职工工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得到国家转让的住宅产权。到1970年代东欧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汽车、电视这些当时的高档消费品有了稳定增长，在波兰，1975～1989年人均拥有私家汽车的数量增加了4倍，到1980年代，匈牙利与捷克每10个人就拥有4台电视机，剧变前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

“后政治化”的东欧共产党试图以“胡萝卜＋大棒”的

①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下册，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534页。

物质与刺刀并用的软硬两手来诱导人们当奴才的好处。波兰在盖莱克当总书记阶段硬通货债务增加了大约3000%，为了与教会争夺农民，在1970年代初波兰就给个体农民提供了社会和医疗保险；捷克在所谓的"正常化"时期的硬通货债务增加了12倍；匈牙利更以靠借债发展经济而著名。到1980年代东欧各国平均的债务都翻了10倍，波兰、匈牙利则翻了20倍。到剧变时匈牙利外债总额积累已达226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匈牙利剧变后最后一任总理米克洛斯这样直白地表述贷款的分配方式："我们将贷款的2/3用来偿还利息，剩下的1/3用于进口消费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以及西方的私人银行都乐于向这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贷款，这种借债"过日子"的方式后来直接影响到剧变后的经济转轨模式。

"专政与消费社会的历史会合"[①]

一时之间东欧国家处在"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消费至上"的社会氛围内。有人据此评论说，东欧共产党发生了转型，它虽然依旧还是一个专政的政府，但其追求目标有一个本质的改变，与过去的激进的乌托邦理想相比，共产党体制发生了某些"去意识形态化"的改变，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怪胎，它从廉洁清贫的政党变成了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集团。过去共产党是残酷而不腐败，而现在变得腐败而不残酷。他们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抛弃了清教徒式的革命口号，由于政治理想的"崇高性"和"可信度"大大

①亚历山大·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0页。

剥落，上层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和物质的兴趣，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学说甚至文化传统都不感兴趣，而只对政权本身发生兴趣。这个体制的“逆向淘汰”机制，通过从统治集团中淘汰掉富有独立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者，把没有创造力的顺从者和执行者留下来的方法实现了“革命党”向官僚集团的转化。正如苏联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阿玛利里克所说的，“这种当局的唯一目的，应当是自我保全”，它们既不想“复辟斯大林主义”，也不愿头顶“残害知识界”的恶名，“它只想让一切照旧：权威得到承认、知识界保持沉默、制度不要为危险的和标新立异的改革所动摇”。[①]这时的政权表现得不那么刚性，不那么原则，在实用主义和趋利性的驱使下斗折蛇行，为“保权而发展”使它变得可左可右。

统治集团首先在经济方面做出一些让步，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为人民服务”的提法让位于赤裸裸的为私利的巧取豪夺。把政治掩盖在经济背后，成为一种很流行的统治手段，官员们都变成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两面派。他们不再提艰苦朴素、不再提勤俭建国、不再自我标榜是清正廉洁的典范，不再高调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而是公然提倡享乐主义，拼命地鼓励人们享受物质生活。过去统治者是把国民当成服从性的“螺丝钉”来看待，现在执政者是把国民当成不关心政治的消费者，选择用物质来消解政治诉求，从强制人们服从命令转变到以物质诱导人们安心当顺民，只要放弃政治追求，选择追求生活，选择与政治制度无关紧要的附属品，选择“为五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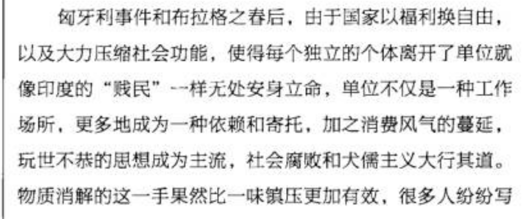
①萨哈罗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论文集》，外文出版社，1980年，第374页。

米折腰"是会有安稳的"好日子"过的，这样不但可以让人们为私利斤斤计较而转移了注意力，更可以让人们懈怠和慵懒，执政者也可以获取合法性。

捷克保守派代表比拉克说，过去我们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必须要在商店的橱窗里摆满了货物，我们才能够用文献记载我们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布拉格之春后的捷克总书记胡萨克说，"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情绪"。接替纳吉的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说，"只要提供商品让老百姓高兴，哪怕社会主义模仿资本主义我也就满足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卡达尔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地下经济的"商品与服务业黑市"，到1980年代初据估计匈牙利有9万地下私营从业人员。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说，过去我认为社会主义就像纸搭的房子非常脆弱，现在看来，只要资本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提供资金，社会主义就会存活下去。它需要"利用他人的资源为自己的枯竭的电池充电"。苏联有个政治笑话说：勃列日涅夫带着他妈去看他的别墅、汽车以及特供的奢侈品，他妈说，真好啊！孩子，可是列昂尼德，要是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 卡达尔



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后，由于国家以福利换自由，以及大力压缩社会功能，使得每个独立的个体离开了单位就像印度的"贱民"一样无处安身立命，单位不仅是一种工作场所，更多地成为一种依赖和寄托，加之消费风气的蔓延，玩世不恭的思想成为主流，社会腐败和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物质消解的这一手果然比一味镇压更加有效，很多人纷纷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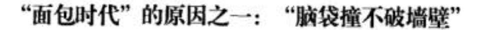
▲ 胡萨克

"悔过书"认罪并"反戈一击"，重新站队成为热心整肃者，有些甚至比原来的保守派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在不久之前都还是纳吉和杜布切克改革的积极拥护者。捷克改革派领导人姆莱纳尔说，"只有在经历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政治事件后的物质利益满足造成了"沉默的70年代"。



▲ 昆德拉

东欧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陷入了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集体魔法"，或者说麻木地接受了现实。这就是东欧的"面包时代"，它被哈维尔等人称作是"没有头脑的时代"或"自我毁灭"的时代。[①]米兰·昆德拉说，在这种世界里，"人们对前景一无所知，一切行为变得机械化，职员们并不关心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意义何在，只和一堆匿名的文件发生关系，更糟糕的是，他们是文件中一个个错误的影子，也就是说他们甚至没有权利作为影子而存在"。[②]国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作为回报，人们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东欧的"泛政治化"一下子变成了"政治冷漠化"，似乎那里的人们完全忘记了风起云涌的1956年和1968年，沉浸于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就像时间进入了一个"历史休止期"。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一："脑袋撞不破墙壁"

思想没有被泯灭的东欧知识界仍有一些人在苦苦思索，他们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必须要回答为什么会有人人犬儒化的"集体魔法"。他们认为造成"面包时代"的首要原

①亚历山大·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22页。

②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巴黎）1986年，第128页。



布拉格街头上的苏军坦克

因是：高压统治带来的恐惧。匈牙利事件后，确立了对"挑动罢工"处以死刑的法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有几千人为此丧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处死，总计有2.2万人因"参与反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1.3万人被关进拘留营，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处在严密的监视下，估计有占总人口2%以上的人逃离了匈牙利。布拉格之春后的大清洗，1970年全党更换党证，50万人被开除出党，主席团和书记处50%以上的人被开除，70%的企业领导人被撤换，1/7（200万）的人受到株连，20万人流亡西方。在和平建设时期除了大量的苏联驻军以外，东欧国家都运转着庞大的强力机构、军事和警察部门，让"远离火线的军人在后方依靠别人的鲜血而活着"的最好办法是把专政的矛头指向本国民众，以震慑的方式让整个社会在"恐怖制度"面前低头。恐惧社会的压制性是造成两面派人数增多的直接原因，整肃之后人们态度的转变并不是这些人的想法改变了，而是他们害怕表达自己的真实信

念，当然不排除其中具有投机者。

在政治环境的苦难面前屈服的另一个因素是，历史上这些民族的挫折感是造成他们“集体生存的恐惧”的心理特征。上述国家在历史上多次经历过动荡，受尽了大国的欺辱，遭受侵略、被外国占领、军事失败、政治幻想覆灭、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回报等挫折不断的历程。他们自称“小民族”，小民族的概念不是数量上的人多人少，而是指一种命运多舛的民族悲剧。米兰·昆德拉说，小民族的概念“是指一种状况，一种命运，他们在历史的这样或那样的时期，都曾从死亡的前厅走过，永远面对强大者的傲慢，永远看着自己的生存被威胁或被质疑，因为他们的存在是问题”。[①]因此他们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受害于大国的“小国”，共产主义制度和慕尼黑阴谋都是以牺牲东欧国家为代价的，他们的历史就是在纳粹和苏联交替恐怖中延续下来。近代被欧洲出卖的教训使他们认为“布鲁塞尔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只有美国才能帮助这片旧大陆”。[②]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转轨国家的左中右都有很多“疑欧亲美派”的原因。罗马尼亚的埃米尔·齐奥朗在1936年出版的《有关小文化的悲剧》一书中说，这些民族随时担心可能突然被从地图上抹去，[③]谈论一个国家的死亡或者消失，在西欧人看来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话，因为要想消灭、征服或者同化，在一天之内发生的政治灭亡只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比喻，[④]而对东欧国家而言则是明摆着的事实，他们都曾经面临从地图上暂时或永远消失的窘况，他们都有过“丧失历史圣地，民族完全或者部分归顺于一个外来强国”的经历。他们感觉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超出了

①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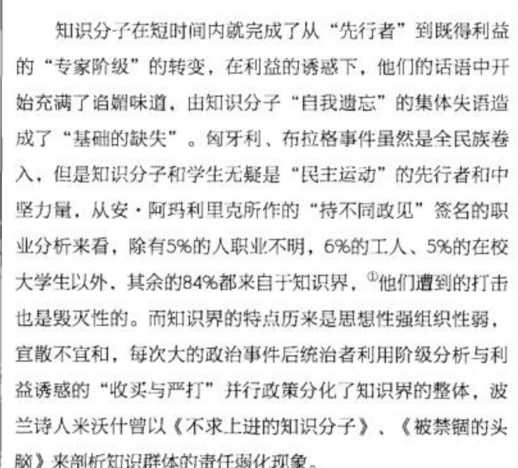
②亚历山大·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4页。

③埃米尔·齐奥朗：《罗马尼亚的变革》，布加勒斯特，1936年，第38页。

④伊斯特万·毕波：《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巴黎）1993年，第162页。

他们反击的能力，"我们这些欧洲的孩子，是伴随着恐怖和怜悯来理解人类生活的"。在这种状态下，生存就会上升到头等重要的意义，"脑袋撞不破墙壁"的理论由此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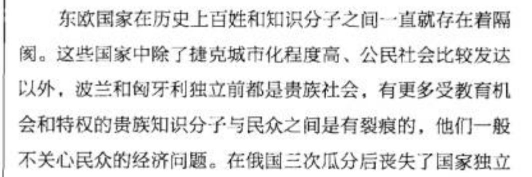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二：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失语



知识分子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先行者"到既得利益的"专家阶级"的转变，在利益的诱惑下，他们的话语中开始充满了谄媚味道，由知识分子"自我遗忘"的集体失语造成了"基础的缺失"。匈牙利、布拉格事件虽然是全民族卷入，但是知识分子和学生无疑是"民主运动"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从安·阿玛利里克所作的"持不同政见"签名的职业分析来看，除有5%的人职业不明，6%的工人、5%的在校大学生以外，其余的84%都来自于知识界，[①]他们遭到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而知识界的特点历来是思想性强组织性弱，宜散不宜和，每次大的政治事件后统治者利用阶级分析与利益诱惑的"收买与严打"并行政策分化了知识界的整体，波兰诗人米沃什曾以《不求上进的知识分子》、《被禁锢的头脑》来剖析知识群体的责任弱化现象。



▲ 米沃什



东欧国家在历史上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就存在着隔阂。这些国家中除了捷克城市化程度高、公民社会比较发达以外，波兰和匈牙利独立前都是贵族社会，有更多受教育机会和特权的贵族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是有裂痕的，他们一般不关心民众的经济问题。在俄国三次瓜分后丧失了国家独立

①萨哈罗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论文集》，外文出版社，1980年，第371页。



▲ 布拉格的古建筑

的波兰和温和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与匈牙利，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是民族的代表，1948年后他们与工农的地位发生了互换。工人地位大大提高，一方面是由于共产党需要完成从“精英党”向“群众党”的转变，无产阶级作为共产党基础力量被大大提升，另外因为战后最初几年工人严重稀缺，与大萧条时的工人失业大军相反，战后的重建和恢复工作形成劳动密集型人手短缺，铁路、煤矿、建筑工地到处都需要劳动人手，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因出身问题而感到尴尬，他们在不断地群众性阶级诉苦宣传中无地自容，纷纷自我贬低以求得到接纳。

"人民民主"结束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更成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在1956年和1968年事件后的整肃运动明摆着对他们又是致命的一击。但很快东欧国家的经济和科学发展，对专业性人才需求大增，使得受教育程度高、掌握一定技能的知识群体，尤其是从事科学、经济、行政管理的人跻身于"专家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从官僚体制中分得残汤剩饭，成为国家机器上的附庸，于是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变成扭曲自己人性的"帮凶"，更多的人难以抵抗复杂多样的诱惑使"他们从精神上被消灭了"。[①]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曾当过纳吉国务部长的伊斯特万·毕波说：民众对"人文主义的感情，也取决于那些知名要人的态度，全体国民的参与固然必不可少，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权威性人物在面对混乱与动荡时，是否能够继续主张和维护道德尊严的原则"。[②]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三："冷漠化"与"常规化"

首先是人们的无奈与冷漠，捷克作家卢德维克·瓦楚利克在《论勇敢》中说，对于辛苦度日的百姓来说，要求于他们的只能这么多，大多数民众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积极地反对政府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此看起来没有必要（又是对普通大众来说）。人们大多会说自己这样做"不够勇敢，但很现实"。[③]

一般来讲，从有道德有责任到麻木不仁有这样几个步

①切斯拉夫·米沃什：《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巴黎）1990年，第249页。

②转引自亚历山大·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99页。

③转引自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下册，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531页。

骤：先是具有感知痛苦，这是清醒认识不可缺少的过程，同时在利益诱导下又是矛盾的，因为明摆着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牺牲一个是享乐，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邪恶”的人都遭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严酷的身体摧残，而将自己的安全与物质置于信仰之上的人、也就是选择了“自我放弃”的人，就能很快适应现状并得到了充分的物质保障和安逸的生活。这时人就容易出现头脑与心灵的悲剧性分裂，头脑否定上帝，心灵寻求上帝。如果在这个阶段能成功地摒弃、克制、抵制住所面临的诱惑，就能得到精神升华，便可以从“面包时代”解脱出来。但是在“一个普遍商品化与文化、思想、道德行为混为一谈的时代”，“在一个舒适安逸、被天花乱坠的宣传所照亮的巢穴”里，[①]几乎可以说大多数人的想法是：最好不要对自己周围提出哪怕一星半点的质疑，明哲保身更要紧。这时有可能人性是分裂的，行动上谨小

①克莱尔·科西克：《现代危机，道德辩证法》，（巴黎）2003年，第114页。



布拉格街头的苏联坦克

慎微但仍然还是道德范畴的"灵魂忧虑"的"痛苦人"；接下来——道德感发生故障、道德感被遗忘或沉睡；再进一步——道德感被颠覆，人们已经心安理得地选择了装聋作哑，满足于自己过上小康日子，完全屈从于麻木的无人性。

其次是执行者阶层的良心面对人类尊严损害时变得麻木不仁，把助纣为虐当成例行公事。苏联坦克不可能长久出现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街头，暴力要变成一种"常规化"的手段，必须使执行者"丧失人性"。①这种社会在使用一种遗忘催眠剂，使人们都处在混沌沉睡的状态。生活得到了粉饰，大家都倾向于对物质生活的狂热和对自身的关注而忘却了曾经有过的追求。不只是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会促使这些条件，任何官僚机器变得冷漠并无视道德束缚时，这些机制就产生了。这些残暴行为也许被当作普通工作来完成，大家都是机械地贯彻命令，"因为这些行为的道德层面不明显，或者制度将其隐藏起来，避免引起争论"，②从而预防个人道德准则与这种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中的不道德性产生矛盾。社会道德的这个畸变过程，执行命令的人只遵从条文、中央政策和一切来自上面的命令，导致理智与良心的分离，用江湖上"各为其主"来解释不得已，以自己要养家糊口不能丢了饭碗来"照章办事"、"奉命行事"，传达上面的指示，自己不过是交差了事。在执行游戏规则的人看来，道德与政治两者是完全分离的。正是这种使"个人免于责任的方式"混淆了"善恶的命题"。哈维尔在1990年任捷克总统时新年讲话上说："我们都对旧体制习惯了，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不可逆转的事实接受了，所以我们一直小心维护着这个体制，同

①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巴黎）2002年，第52页。

②伊斯特万·毕波：《1944年之后的匈牙利犹太人问题》，见《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巴黎）1993年，第56页。

时我们都是它的共同创始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认为过去40年留给我们的遗产仿佛是远房亲戚馈赠来的外来的东西的想法是不恰当的，相反地，我们应当认为这个遗产是我们自己的错误。”[1]

“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

面对“面包时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东欧思想界的回答是，首先要解放“被禁锢的头脑”。要结束个体服从权力、“个体是集体的殉道者”的局面，就必须要从理论上破除权力部门所塑造的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和执政党的论调。这是打开民众悲观和玩世不恭的气氛的第一道缺口。东欧的思想家指出，因为小民族的“政治环境的苦难”，掌握政权的人们不停地以国家最高利益名义限制国民的权力，执政党操纵权力的运作也往往是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颂扬国家的天赋”，不断地把国家神化，“一旦陷入绝境就等待虚假的‘救世主’式的领导来挽救国家”。[2]他们“千方百计地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突出强调前者的微不足道和后者的伟大，这样一来，对个人怀有任何兴趣都具有畸形的自私的形式”。[3]使大多数人把“自由”理解成“混乱”的代名词，把“自由竞争”理解成“斯托雷平式”的弱肉强食的同义词。其实国家的强盛并不需要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作为代价，“国家被国家群体占为己有并不一定能够引起个人解放”。[1]从古希腊以来，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尊严对人

①《哈维尔文集》，崔卫平译（2003年内部交流版），第187页。

②亚历山大·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227页。

③萨哈罗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论文集》，外文出版社，1980年，第380页。

类而言如此珍贵，以牺牲个人自由来维护国家强大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国家被国家群体占为己有是以牺牲个体作为代价的，民族、国家、政党的集体认同并不意味着高于个人的需要，也不意味着它具有高于个人的支配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对以往被贬低被轻视的个体身份要给予充分的承认，塑造个人的自信和尊严感，这是公民自由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人的思想，就是人性自由的思想，不应被视作权力的一部分，而是应确保它能够运用一切方式的意愿。[②]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归功于国家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拥有人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权利，[③]"自由属于每一个人"。

东欧在结束"人民民主阶段"以后，集体利益与民主追求就开始分道扬镳了，这样做导致的后果是，强制与约束越是加强，社会的恐惧感就会增加，恐惧感增加，令人窒息的束缚与强制就会进一步加强，告密者普及，这只能说明道德沦丧的社会蔓延程度，最后只剩下一些奴性，使本来最深刻的欧洲文明变成了被集权者一手遮天的强制社会。那种认为个人自由会威胁到民族与国家的凝聚力，这种自命不凡的救世主式的言辞只会导致人们完全丧失判断能力。说穿了，是对社会功能的不信任。解决办法，倡导"人类尊严的革命"，要重建对被忽视或轻视的身份要给予充分的承认，塑造个人的自信和尊严感，这是公民自由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④]要把法律文字表述的东西真正落实下来，个人对集体也拥有权利，宪法不仅仅是针对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民事纠葛，更重要的是宪法规定了无助的个人和全能的国家之间的

①伊斯特万·毕波：《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巴黎）1993年，第165页。

②雅恩·帕托什卡：《意识形态与思想生活》，（布拉格）1987年，第818页。

③扬诺斯·基斯：《同等的尊严——关于人权基础的评论》，（巴黎）塞伊出版社1989年，第242页。

④伊斯特万·毕波：《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巴黎）1993年，第166页。

关系，国家对个人的侵犯是最主要的违法行为。国家的强盛与多元的社会并不矛盾，要丰满社会的功能，削弱无处不插手的国家权力。让人们明白，产生危害来源的是国家，并不是个人。唯一现实的出路只剩下一条，“自由不会从天而降要靠自己去争取”。哈维尔提出：要做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只有结束个体服从权力的局面，人们才能从“面包时代”中解脱出来。

我们在历史中的责任

破解社会冷漠化的第一步是“还原真实”。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科西克说：真实性要求我们完成态度上的彻底转变，“只有这样的转变才能使人类走出危机”。[①]“任何时候都要活得有尊严，不胆怯、不退缩，即使有些时候会遭到镇压，也要义无反顾地讲真话”。[②]文学家要回到欧洲传统上来，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每个人应当担当责任，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主体，都有义务揭穿谎言，以责任感对抗恐惧，使每个个人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每个当事者承担起他在过去的错误中所应承担的那一部分道德和政治责任。[③]

其次是“道德现实主义的重建”。知识界勇敢地承担起责任来，让精神再次腾飞。匈牙利的毕波说：世界与后人对我们的评价，是将我们与其他民族相比较时放入天平的砝

①科西克：《当前的危机》，（巴黎）1993年，第81页。

②（捷）《今日》杂志，1977年，第3-4期。

③参阅哈维尔：《狱中书简——致妻子奥尔嘉》，（台北）倾向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

码，在于我们确认自己的责任时的认真态度和决心，而不是我们否认错误的数量。[①]他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我们在过去历史中的责任》。他倡导要建立起社会的"自我拷问"机制，在个人责任感这个问题上毫不让步，每个个人不能以时代或集体作为借口，不能以"不是我的错，是历史的错"而推卸个人的责任，个人的怯弱、卑鄙的行动不是源自魔鬼的决定，"而是一群没有自由意志、可悲的失去判断力的人做出的行为"，虽然不指望这些个人承担起责任，"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个词的意义，但是他们必须承担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个人道德良知具有不可简化性"。要勇于承担个体的责任，这个群体必须要寻找到不幸的根源，承担起他们认为由于自身错误造成的责任。要唤醒道德良知，以自我质问精神和自我反省的勇气面对个人行为，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办法，如果我们人人都选择了装聋作哑，实际上就是参与者、就是纵容者、同时也是制度的建构者。我们就既是制度的受害者和行为者，也是制度的建设者。社会的主流价值之所以会发生扭曲，就是人人都在逃避，每个当事者都以官僚体制与个体无关作为借口，国家机器正是利用了个人的自保心理，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现有的一切——平安的生活、物质的享受、便利的条件与奢侈的追求，而放纵恶行甚至沦为帮凶。对他人暴力认可的结果就会使暴力变成一种面向所有人的手段。

打破浑水摸鱼的局面，要把历史化解为每个个人，比如，对纳粹的不妥协和对斯大林主义的抵制是有关联的，这里面关键性的环节就在于个人责任的建立与失缺，要解读纳

①伊斯特万·毕波：《1944年之后的匈牙利犹太人问题》，见《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巴黎）1993年，第251页。

粹的噩梦和斯大林的疯狂，不是归于德国人和俄国人的特产，一定有本民族自身的问题。匈牙利曾有所谓的历史“净化论者”认为，从挽救国家荣誉出发，妄图自行免除二战中灾难的责任（匈牙利的霍尔蒂政权是法西斯的仆从国），那么斯大林的大屠杀“也就被掩盖在一个奥维尔式的历史黑洞中”了。[①]如果人们不接受这个教训，那就注定这个民族以后仍将要为类似的“磨难”买单，说明在一次次的灾难过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层面带来的教训并没有真正融入近代民族意识中。具体到操作层面的方式：要动用社会文化价值倾向来扬善惩恶，对那些有良心敢于承担责任的当权者，

①兰道夫·L·布拉汉诺：《对历史进攻，匈牙利的民族主义与大屠杀》，《现代》杂志，《东欧，不可能的回忆》，1999年，11-12月，第128页。

▼霍尔蒂





▲印有海涅头像的邮票

要帮助和提醒他们能够更加人性和更高的眼界，对那些醉心权术的恶人，一定要揭露他们的罪行，让这种人恶名远扬，不可能再入政坛，防止奸佞小人达到个人目的。恶人和善人都不能掩盖在历史的背后，而是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

是的，我们是一小撮

当人们在询问，"生存与责任哪个更高"时，东欧的思想家给出的答案是"责任高于生命"，起码对那些愿意肩负本民族思想传承的人来说是如此。民主是建立在有责任感的文化之上的。[①]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在"人类尊严的革命"中，最初至少应该有一群这样的人，以胡斯精神和路德教派作为榜样，要抵抗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他们首先摆脱自我麻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实践，以自己的每一次抵抗去拯救一小块自由，一个民族要有少数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圣徒"的责任，因为道德是个人的，它不是契约性的，没有互惠性，帮助他人而不要求回报，这种道德行为就不可能变成普遍性，所以道德行为主体注定是孤独的。在回归道德的问题上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苛求别人，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主体。过去我们特别怕被说成是"一小撮"，怕脱离民众怕孤立，现在应当理直气壮地说，是的，我们是一小撮，我们只代表自己！我们要允许人们胆怯、允许人们自私，每个人都有选择平庸的自由，但是不允许损害他人的利益。海涅在150多年前就说过，那些思想的刽子手使我们成为罪犯，因

①《与克拉科夫斯基对话》，《欧洲与知识分子》，（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4年，第173页。

为我们这些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检察官杀死了自己的思想婴儿。在社会上杀死思想婴儿的人毕竟是少数。对积极的少数派来说，只能从个人角度提倡传教士般的“献身精神”，放弃物质的诱惑。因为自由不像经济发展可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的富裕。反对权力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取权力，不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而充当“反抗者”的，自由只能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来所有人的自由，所以注定有一部分人要当圣徒，这个过程个人道德良知具有不可简化性，从个人角度提倡“献身精神”就尤为重要。

简单的反思在东欧知识分子看来已经不够了，需要一批具有传教精神的知识分子切实具体的行动，知识分子要扮演的角色是“人类精神存在”的传递者，这种人因为能够看到牺牲的含义，所以能够做出自我牺牲。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无所畏惧的，道德缺失与恐惧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们丧失灵魂以后便只剩下驱壳，而且他们常常为之担忧，只有那些灵魂尚在的人才无所惧怕：因为他们明白，真正的恐惧是源自内心而非外部环境，让外部的干扰侵占自己内心的人永远不可能摆脱恐惧，勇于捍卫自己的灵魂和内心的完整，这样的人时刻准备着牺牲一切，包括自身的行动自由，甚至生命，他们可以战胜恐惧，同时也永远置于权力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①]东欧的知识分子倡导应该具有传教士的牺牲精神，以隐修院的禁欲精神抵制物质的诱惑。他们呼吁说，我们所要进行的抗争是超越简单的经济和社会范畴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人文精神的复苏，拯救人类文明是刻不容缓的。这样的呼吁不仅可以帮助压迫的人们，同样也可以帮

①伊万·克里玛：《布拉格精神》，（巴黎）2002年，第134页。

助那些使用镇压工具的人，正是他们扼杀自己的良知和真实的声音。

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几点：第一，要摆脱过去知识分子只讲道德不谈经济的局面，打破“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人为区别的划分。首先弥合知识分子与民众鸿沟的是波兰人，1976年团结工会的前期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就得到了知识分子的“保卫人权和民权委员会”大力支持，他们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工人自卫，为未来的反对派运动开了一好头。后来剧变以后瓦文萨在回答为什么“团结工会”能够做得这么理性，能够用说理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汽油瓶来解决问题时，瓦回答说是知识分子帮助了他们，“保卫人权和民权委员会”帮助了他们。第二，政治不是知识分子的强项，反对权力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取权力，不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而充当“反抗者”的。乔治·康德拉说，“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应该想，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其他人从政治权力的高位上赶下来，以便自己取而代之”。这种态度既防止了野心家的混入，又能够树立起道德形象。由于现代社会中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权力所展现出来的逻辑是会把所有人都腐蚀掉的，只有永远在体制外为不完善的社会努力，为普世价值作贡献才不违背他们的初衷。

“回到哲学中去”

这个命题听起来有点“唬人”。这是捷克人喜欢谈论的话题，因为他们的开国总统马萨里克就是一位“道德至上”

的哲学家，因为捷克曾是“欧洲精神文化的重镇”，而地理位置靠北的波兰人较少提到“重返希腊”，他们不像捷克人那样把自己与欧洲思想传承的渊源关系挂起钩来。其实这里所说的哲学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中说的“哲学”并非深奥的人生哲理，而是指一种人格魅力，在他们看来，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它的形而上是可以与日常的物质化状态保持距离，使个体可以从日常的琐碎中解放出来，在获得解放的同时又带有最强烈的个人意识，就像俄罗斯哲学学会第一副会长丘马科夫所说的，“哲学是自由的，没有任何建制约束，哲学只能在多元化的条件下存在，如果哲学归结为某一种哲学，那么它将不再是哲学，它将变成宗教或是意识形态，因为它已经丧失自己的功能，哲学是每个人自己的小灯笼，在黑暗中它光源虽小，却可以照得很远，你可以看到很多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①]第二层意思中的“哲学”一来是因为哲学思想本身具有可质问性和开放的体系，二来它们是在提醒世人，东欧曾与一个古老的文明——希腊哲学——相联。这是因为对近代欧洲的不信任以及对物欲横流的西欧的反感，使东欧知识分子只能以“托古改制”的手法“回到希腊人那里去”，从古典时代寻找资源。欧洲朦胧而遥远的往昔思想家在捷克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渐渐清晰起来。他们说我们是欧洲的孩子，在这片经历过纳粹与共产主义的土地上，我们应该成为光明的开端。在芸芸众生自我麻醉在“面包时代”，作为欧洲遗产的继承人，人类能够成为真正个体的重获自我的机会。欧洲本来就是一个“被质问的大陆”，欧洲再现并非自身的温饱、并非日常生活那一点微不足道的

①丘马科夫：《全球化下的哲学》，见《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5日。

幸福感，现在人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恢复这种“质问精神”、“询问的功能”，保护它的价值完整。必须要认识到“欧洲精神”的无价之宝，从希腊城邦时期，思想家就提出了人类以其最高的方式参与到不断拯救自我的斗争中去，这就是自我征服，真正的人类生活所需要被征服的不是他人、不是自然，而是征服自我，超越自我，这个觉醒的意识是现在“东欧”知识分子所需要的。这是人类能够成为真正个体的重获自我的机会，欧洲历史上的很多时期并不是“面包时代”，过去的欧洲人做到了，现在我们也能够做到。

（该文中法文注释大部分转引自《欧洲精神》一书）

03

“后极权”，还是“后现代”？

转型时期东欧俄罗斯思想界的困惑

“后共产主义”时期的东欧俄罗斯思想界与社会、经济、政治层面的多元状态相似，呈现出一种说不上是兴旺还是萧条的状态。一方面旧的教条已经荡然无存，另一方面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商品拜物教”、“市场崇拜”又令一些过去曾大力推动变革的理想主义者感到压抑，原来的“铁饭碗”、“大锅饭”已经打破，抛向市场和摆脱管制同时来临，过去的意识形态部门纷纷改弦易辙，大专院校也引入市场机制，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好像没有了方向感。对不少人而言，在经历了“铁幕政治”垮台的喜悦后，接踵而来的是很大的不适应和失落感，甚至那些自认为在政治转型中扮演“启蒙”角色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发现，刚刚有机会对社会讲话，社会就已经不需要他们了，被传媒炒得火爆的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是昔日对抗暴政而坐牢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那些肤浅、平庸却包装得十分精美的“各类明星”，人们惊呼：这是一个只要感觉不要思想的时代。有些人自嘲说，以前马克思认为精神产品生产所需要的两个基本条件：一定的物资基础＋思想上的完全自由，现在都有了，但是批判分析的精神也随之被解构掉了。

"知识分子"：凤凰的火中涅槃

沙俄时代俄国知识分子传统上就有"泛政治化"的倾向，他们是"真理"（истина）的寻觅者，自己虽不知道路在何方，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道德紧张感使他们把探寻人间的不平等的来源作为终身的职业。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他们把不认同现存制度、质疑官方教义作为终身目标，就注定了必然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为了他人"，为了"被欺凌与被侮辱者"，为了"小人物"活着。但是经过20年代的驱赶、30年代的大清洗、50年代的改造、60－70年代的逐步收买，除了体制外的"持不同政见者"，体制内的稍有创建的知识分子为了"躲避政治迫害和政治暴力"大多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以至于那里人满为患，人才过剩、相互消耗，而人文社科领域则成了"没有思想自由、没有创造精神"的"党文化的提线木偶"。就像纪德在《苏联归来》中所说的，他所接触到的原来扮演"社会良知"角色的文学家们的思想"已经被磨得没有棱角，奴性和虚伪成为常态，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禄所系，因为他们只有听话，才能有所收获，只有思想对路，才会进入日益膨胀的特权阶层，乃至从平均主义的樊笼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新贵"。再也不会出现十月革命前的契诃夫和高尔基了。



▲ 纪德

苏东剧变以后知识界的大部分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剧变初期，是以二战后出生的人扮演的"反思者"、"启蒙者"唱主角，他们提出系统的思



▲ 契诃夫

想学说理论体系同旧体制作斗争，因为他们对旧体制了解深刻，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都比较熟悉，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的倡导下，对旧体制造成很大的杀伤力，可以说他们在"破"的方面功勋卓著，但是在"立"的过程中缺乏独创性的东西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政治转型结束、社会多元化的平台建立以后，他们的作用日渐衰弱，陷入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或者与政府若离若即，继续充当俄罗斯各个政党和政治运动的专家，或者脱离政治为生计奔波。


▲ 叶利钦挥手致意

在"叶利钦时代"风头最劲的是年轻的"经济改革家"，他们与人文思想家的批判角色不同，不是为了批判旧制度也不是为了启蒙，他们依靠与权贵的私人关系快速接近决策人物，在已有的政治平台上充当俄国经济改革战略的设计者或实施者。但是由于俄国经济转轨的不顺利，一批批"替罪羊"被先后换下，现在仍有不少经济学家依然很愿意到政府部门当顾问。在政府的圈子里有不同的学校、学科的外围"顾问帮"，他们在电视上频频露脸、夸夸其谈，因此在民众中口碑不太好，而俄国媒体把"经济改革家排挤思想家"的现象叫做"副博士革命"。[1]

上世纪90年代后半开始，有相当多的人员脱离单位下海"单干"，一时间俄国建立起形形色色的战略中心、社会学中心、民意调查中心、政治家形象设计中心、咨询机构以及更是多如牛毛的工作室。1990年以来俄国产生了50多所科研中心、100多所社会学研究中心。这其中民间基金会的作用也不可小视，可以说社会科学领域进行了一次重新洗牌。大

①（俄）《今日报》，1995年7月7日。

量学者更大范围地参与到政府订货、市场订单的服务性项目中。一些“夕阳学科”纷纷向成为“显学”的政治学（据说俄罗斯现在有5万政治学家）、经济学和社会学流动，这批人主要根据市场的需求、商家和政客的订货做舆论调查、市场调研、政治家包装、政情分析。他们基本上是两类，一类是依附在“改革者”周围，另一类则更加市场化。但总之都是“吃谁家饭说谁家话”，是为“老板”效劳的人。在很多人看来他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要么是“权力的同谋”，要么是“寡头的小伙计”，或者干脆就是“混口饭吃的文字工作者”。

虽然还有作为“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之间的分化和分歧也很大。从沙俄时代“异教徒式”的“真理的寻觅者”到“持不同政见者”都主要是一种批判的文化，而不是一种建设的文化，而当失去批判对象之后，他们自身便也遇到了危机。在由“破”转向“立”的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面临分道扬镳的命运，而这种悖论在俄罗斯和东欧当年的反对派运动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索、萨论战”：转轨前的心路预演

1973年，索尔仁尼琴在去国之前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他把苏联的一切罪恶归之为背弃了斯拉夫传统，引进了一种错误的“西方意识形态”，他宣称“这种所谓‘先进思想’的黑风是上个世纪从西方刮来的，它折磨和伤害了



▲ 索尔仁尼琴



俄罗斯大教堂

我们的心灵”，并预言“西方文明在这块狭隘、肮脏、发臭的土地上的总崩溃”。他认为工业化是一种罪恶，城市生活违反“人性”，议会民主是自我欺骗，科学技术“毫无意义”，甚至俄国在地理上靠近欧洲也是一种危险。他敦促当局放弃从西方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传统的东正教、而且是200年前即没有经过尼康与彼得大帝“歪曲”的、没有染上西方邪恶的原教旨东正教中寻找出路。他主张俄国人远离欧洲，移民到西伯利亚而求得民族复兴，摒弃工业和城市而回到自然经济的乡村与公社中，把意识形态的专制变成“道德的专制”，“阶级仇恨的”专制变成“人类互爱”的专制，而不是要搞什么西方民主。索尔仁尼琴到美国以后，也一再发表演说抨击西方资本家为了金钱而不顾道义地讨好克格勃，并认为只有美国工会反对“西方经理与东方官僚作交易”的道义立场才值得赞赏。

索尔仁尼琴的言论立即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中引起强烈反应，其中萨哈罗夫的批评尤为典型，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西方反宗教的无神论的化身”，而恰恰是一种造神术，旧体制也不是根据意识形态，而是根据统治者的实用主义需要建立的，从启蒙时代的世界主义与普遍人性出发，萨哈罗夫认为根本不应区分什么“西方的”与“俄国的”思想，而只有正确的与错误的、先进的与落后的区别。背离人类文明主流的“俄罗斯独特道路”是不存在的，萨哈罗夫毫无保留地赞成科学、理性、经济国际化（即今天所说的“全球化”），并认为索尔仁尼琴夸大了“大工业给今日世界造成的困难”。他批评索尔仁尼琴的宗教乌托邦，指出



▲ 萨哈罗夫

东正教不能救俄国。萨哈罗夫认为俄国与世界各民族一样，必须也可能实行民主，而俄国人的传统奴性"是巨大的不幸，不是民族的美德"。俄罗斯不可能具有世界民族之林之外的"特殊性"，专制条件下的"政治荒漠"靠斯拉夫主义的虚假的"和谐"是解救不了的。

表面上看来，似乎萨哈罗夫比索尔仁尼琴要"亲西方"，但实际上，他们两人在西方的影响不相上下，而且严格的说来，索尔仁尼琴的名声比萨哈罗夫更大，显然这是不能仅仅用"冷战"的需要来解释的。事实上，索尔仁尼琴之所以在西方拥有众多的知音，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反共，而且也是因为他"反现代化"。而今日之西方已经不是急于"走入现代化"的西方，而是急于"走出现代化"的西方，已经不是"理性法庭"的一统天下，而是"上帝死了"的无奈世界，贬理性而重激情、反异化而求回归的"后现代文化"，至少在形而上领域是很吃香的。正是这种"后现代文化"与索尔仁尼琴产生了强烈共鸣。在持不同政见文化主要承担社会批判功能的时代，这并未构成什么问题，然而现在它却带来了苏东思想界的困惑：我们是要现代化还是后现代化？是要搞市场经济、宪政民主还是追求一个原教旨东正教"神秘性与爱"的基杰什城（俄罗斯传说中的"理想家园"）？[①]

①古罗斯传说中不屈服于蒙古统治而自沉于湖中的东正教圣城。

“传统再造”：白俄文化中的新旧悖论

我们前面说过，早期的“俄国式”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就是笃信“非官方”意义上的（所谓“分离派”的）东正教、不顾一切地追求上帝的人，在他们看来信仰是生活的必需，是一种超然的力量，是无情世界中的感情寄托。19世纪俄罗斯的“黄金时代”的大师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果戈理都虔诚信仰宗教，追求上帝，寻求精神家园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在他们的作品中，对世俗的现代社会不满，对现代文明的物欲横流充满了失望，在这种时代潮流中他们看不到生活的意义，认为只有通过自省、忏悔，学会鉴赏痛苦，才能净化灵魂、才能拿到通往天堂的钥匙，正是从这种观念中产生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和赎罪感。俄罗斯的宗教哲学就发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也耶夫号称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之子”。1862年陀氏就在《地下室手记》一书中说，“现代性方案只不过是不需要人性居住的水晶宫”，正是希腊人苏格拉底的理性狡计授予了哲学以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才有了现代人敢于以理性来堆积水晶宫的痴人妄想。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终究会没落，只有“耶路撒冷的重新归来”才是到达彼岸世界的追求。俄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宗教精神一直绵延不断。

1905年革命使一些对暴民革命感到恐惧的知识分子以发表《路标》文集为代表，转向“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脱离社会现实的变革，从事“心灵”的拯救，成为“寻神派”大



▲ 果戈理


▲ 布尔加科夫

师，[①]他们以总结和忏悔的口吻批评激进知识分子在"喧闹的革命"上走错了路，社会主义这种非宗教的叛逆性决定了它的"肤浅"的功利主义，唯物主义决定论将束缚的人类的创造力，只有"精神上的再生"才能真正导致俄罗斯的复兴。他们认为，东正教神秘主义具有创造新型文明的文化和社会力量，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是因为他们是基督之敌。在他们看来革命是以暴易暴、以一种极端反对另一种极端，是冤冤相报的循环，1905年革命是这批人"醒悟"的转折点，他们反思启蒙运动，反思法国大革命，反思马克思主义，都带有浓厚的后现代色彩，有精神贵族的色彩和希腊悲剧情结。而这批人大多在1922年的"哲学家之船"中被驱逐出境，[②]成为"白俄文化"中最重要的一支。

"白俄文化"泛指十月革命后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的千余万俄侨中形成的文化、意识、价值体系与人文学科领域的成果，包括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洛斯基、斯捷潘、弗兰克的哲学，麦尔贡诺夫、米亚科金、基泽特维里、韦尔纳德茨基、拉普申的史学，艾亨瓦尔德、伊兹戈耶夫、普宁、纳波科夫-西林的文学，拉霍曼尼诺夫、夏利亚平、加吉列夫等的艺术。

白俄文化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巴黎、柏林、布拉格、索非亚、华沙等，随着白俄侨民五光十色的政治倾向而分为许多成分，包括社会民主主义、社会革命主义、自由主义（立宪民主主义）、东正教神秘主义、斯拉夫主义至保皇主义等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派别的思想在第一代俄侨故去以后便沉寂下来，只有以"寻神派"为代表的东正教—

① Гредескул Н.А. Вех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М.,1991.с.5.

②1922年，革命后弥漫着反智主义的苏俄把大批知识分子指为敌人，当时还未兴起30年代那种杀人浪潮，这些人都被剥夺国籍驱逐到西方。

斯拉夫传统复兴论倾向长盛不衰而为主流，白俄文化对当时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在今日俄国的复兴都是以这种倾向为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与1949年后海外的“新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颇有类似之处。

白俄文化对十月革命前俄国传统文化与俄国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进行了传统的扬弃与再创造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俄罗斯文化复兴”之势。白俄文化主流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现代工业所造成的世俗化、物资化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并因此对当时西方的各种现代化批判思潮，诸如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这些思潮的源头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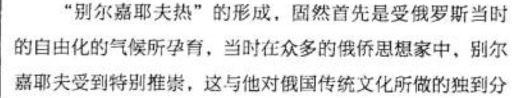
白俄文化对苏俄文化持颇为矛盾的立场，他们既攻击苏俄文化的“社会主义”特征，又攻击苏俄文化的西方特征，同时对苏俄文化的传统与外来成分也有某种程度的认同，尤其在二战期间，这种认同一度似乎淹没了白俄文化本身。白俄文化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和苏东剧变都提供了精神力量，索尔仁尼琴等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都以白俄文化为思想之源，但另一方面它也与持不同政见运动中的“西化派”常有冲突，20世纪70年代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之争为其分野，剧变后这种冲突更大大发展起来，与自由派相对立的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以白俄文化为背景的“斯拉夫文化”派，现在不仅“褐色反对派”即极右翼民族主义打着俄罗斯传统文化复兴的旗号，就连俄共也常常称引别尔嘉耶夫、普宁等，从而使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斗争带有一种文化冲突的色彩。

白俄文化的内涵是很丰富的，它反映了俄国现代化过程的两次大转折（1917年和1991年）中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尴尬，也体现了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和创造的潜力。苏东剧变以后，"白俄文化"又回到了它的母体，与国内的"俄罗斯思想"实现了对接。

"路标"再转：世纪之交的别尔嘉耶夫现象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东剧变，一股重新挖掘"白俄文化"的热潮怦然兴起，国际上最知名的俄侨思想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在这股潮流中最受推崇。1990年他的代表作《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涵义》首次在苏联以俄文出版，一时不胫而走，初版在一个月之内告罄，以至于流传起该书的复印本来，同时思想界的"别尔嘉耶夫热"也很快席卷到其他领域，一时竟使这位俄侨思想家在去世40年后成了俄国知识界谈论最多的人物之一。正像《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涵义》出版后记所说，别尔嘉耶夫现在被认为是"俄国最深刻、最受推崇的思想家，同时也是20世纪最大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在国外尽人皆知，但在出版物浩如烟海的俄国国内广大读者中却闻所未闻，只是现在他的名字才开始回到了我们的文化中"。


▲ 别尔嘉耶夫



"别尔嘉耶夫热"的形成，固然首先是受俄罗斯当时的自由化的气候所孕育，当时在众多的俄侨思想家中，别尔嘉耶夫受到特别推崇，这与他对俄国传统文化所做的独到分

析和独特态度有关。别尔嘉耶夫身跨两个时代，历居俄国与西方，从一个“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变成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立宪民主党的理论家，到国外后通过对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失败的反思，又变成了俄国式的存在主义与东正教神秘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中既有革命前俄国知识分子从西方的工业文明中接受的东西，又有向俄罗斯传统与东正教文化复归的倾向，还反映了与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潮流相呼应的存在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即反思与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内容。他对变幻无常的时代氛围十分敏感，他认为，现代史的矛盾预示着一个“神人创造”的新时代，而人在这个时代里可以使世界重新充满活力。他一方面仇视布尔什维克，谴责“苏维埃制度的罪恶与暴力行为”，另一方面又激烈批判“市民社会”，反对“西化”，从民族文化发展的角度承认十月革命具有某种必然性，并认为十月革命后俄国出现的进步中可以看到“神人创造”新时代的萌芽。[①]因此，持各种立场的当代人们都可以从别尔嘉耶夫身上找到知音：西方的“后现代思想家”把他对市民社会的拜物倾向既理性异化的抨击引为同道，俄罗斯的民族派则与他对列宁—斯大林制度的谴责发生共鸣，而叶利钦时代对“全盘西化”政策不满的反对派——从俄共到俄罗斯民主主义者——可以从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精神”的颂扬以及对西方文化的批评中受到鼓舞。

但这并不是说别尔嘉耶夫的思想是个谁都可以各取所需的这种主义的大杂烩。事实上，别尔嘉耶夫的主要倾向是非常鲜明的：在文化形态上，他不认同西方，而强烈地倾向于植根俄国传统的“新斯拉夫主义”；在社会思想上，他排

①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46页、26页、51-53页。

斥资本主义而向往"教会公社"；在时代坐标上，他批评现代，而追求后现代的"新的中世纪"；在人文价值上，他抵制物欲而重视信仰，反对世俗化而追求终极关怀，敌视近代人文主义的"兽性解放"而主张超越性的人类本质存在，他主张"爱"而反对"恨"，主张和谐而反对竞争，主张彼岸世界的高尚而反对此岸世界的庸俗，这一切使他在俄国文化中的地位类似于"精神领袖"。他那种融合对现存制度之不满，对西方文化的失望和对强大俄国光荣的怀念以及对"后现代"向往于一体的复杂思想，对于当前旧已破而新难立、对过去已失望而对未来又疑虑重重、对自己失去信心而对西方又不信任的、彷徨四顾上下求索的俄罗斯人来说，无疑具有"先知"般的意义。

有趣的是，在俄国最频繁地引用"伟大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话并认同的，不是普京政府及其阵营，而是在野阵营的俄共。随着俄共的日益"民族主义化"，他们逐渐倚重以弘扬"俄罗斯传统"来抵制"全盘西化"，因此他们在越来越软弱地坚持某些"苏维埃教条"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从别尔嘉耶夫这样的传统文化弘扬者身上汲取精神资源。当年被共产党人扫地出门的别尔嘉耶夫，如今却被俄共请来做驱魔的尊神，这种现象说怪也不奇怪，因为别尔嘉耶夫本人也正是从马克思主义走向东正教，从革命者变成卫道士的。而批判现代社会则是他在这种转变中所保持的不变的立场。在民族主义和强国主义盛行的俄国，常常出现"锤子镰刀红旗"与黄黑白（沙皇旗）并肩反对红白蓝三色旗（共和旗）的现象。相应地在形而上领域也就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

东正教原教旨主义结盟反对“世俗资本主义”的局面。然而在历史上，别尔嘉耶夫却主要是作为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的意义被西方后现代思潮树立起来的，而且在俄国曾哺育了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反对派。今天的“别尔嘉耶夫现象”在这一点上，实际上也就是昔日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之争的延续和扩大。

捷克春秋：哈维尔与克劳斯之争

当今捷克，剧变后的第一任总统哈维尔仍然是有影响力的思想家，而现任总统、以前的总理克劳斯则是最能干的实干家，这两个人曾经同属公民论坛——公民民主党，但思想观念的差异却判如两极。



▲ 哈维尔


▲ 克劳斯

哈维尔被尊为“捷克民族的象征”和“东欧最大的理想主义者”，他曾积极参与“布拉格之春”，在1968年以后最严峻的岁月里，他作为“七七宪章”发言人与当局对着干，宁可坐牢也不出国逃避，被誉为圣徒式的人物，为此他还与当时持不同政见者中悲观颓废倾向和“出国潮”的代表米兰·昆德拉展开过一场著名的辩论。1989年剧变后他由阶下囚一跃而为总统，当时曾获得90%以上的选票，连已经开明化的捷摩共也号召党员投他的票，可以说他是剧变后前东欧各国中最无争议的领袖，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利》、《反政治的政治》等书中表述了又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思想：

首先，他主张严格区分旧体制（他称之为“后集权主

义”）和传统专制主义，认为前者不是中世纪的残余，而是现代化的恶果，不是“东方的罪恶”，而是“西方的罪恶”，不是农民社会的罪恶，而是市民社会的罪恶。在他看来，“西方的经理与东方的官僚”都是无人性的，而东欧的旧体制不仅要归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要归罪于伏尔泰，归罪于启蒙时代以来西方理性主义，归罪于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对人类心灵的蔑视”。

其次，解救东欧之路不在于学西方，而恰恰在于摆脱西方工业文明的阴影，要从理性的桎梏中解放人类的心灵，返璞归真，要打破现代科学把人类机器化、程序化的状况，恢复人的本真存在。

第三，哈维尔把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都看成是一路货，而主张用一种“公平的”经济取而代之，这种经济的创造力来源于真诚、博爱与理想主义，同样他认为“苏维埃政治”与“议会政治”都是误人的“现代政治”，应当以“反政治的政治”作为替代，这后一种“政治”应当以公民的个人良心为基础。

哈维尔思想受到了西方非理性思潮中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和捷克胡斯派新教伦理的影响，作为一个作家，他也继承了卡夫卡为代表的奥匈时期文学传统以及当代欧洲的绿色和平主义潮流。然而这一切在转型期却受到了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挑战，因此哈维尔颇多抱怨之词，他当总统的几年间对捷克的变革实践是建议少批评多，因而被讥为“高高在上的教师”，而他自己则限于“理想主义者的孤独之中”，声称自己与在共产党时代一样，仍是个“持不同政

见者”。

对哈维尔的“教师”地位提出挑战的是现任总统、当时的捷克总理克劳斯，克劳斯是捷克“休克疗法”的设计师，他以坚决主张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议会民主而著名，是个“融入现代化”的实干家。他从极端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在从未搞过市场经济改革的捷克一步到位地公平地迈向资本主义，虽然对他的批评也不少，但是就连批评者也承认克劳斯的选择有他的合理性且成效显著，当时人们就预计他有可能取代哈维尔，果真2000年克劳斯成为捷克总统。

东欧的困境说到底，是在西欧“后现代”的语境和氛围中搞现代化（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所遇到的一种特殊困境：一方是向西方学习现代化，一方却是西方人自己在否定现代化而又加上本国前现代传统的阻力，它表现为怎样认识前体制：旧体制的罪恶在哪里，怎样才能走出来？一直有两种说法，是传统之恶还是反传统之恶，农民之恶还是反农民之恶，西方之恶还是东方之恶，农村之恶还是城市之恶，中世纪之恶还是现代病的罪恶，理性的罪恶还是非理性的罪恶……对旧体制的两种认识产生了今后选择道路的两种意见。

东欧知识分子的文化长期以来都是一种批判的文化，一旦失去批判的对象他们就陷入了危机。这个危机的根源在于，这些人具有西方文化的背景，但他们接受的却不是当年西方反专制时的近现代文化，而是对现代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后现代文化”，后现代的思想武器能否解决他们转型期面临的种种难题，这是东欧人的困惑，恐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思想者今天与今后所面临的问题。





俄罗斯、东欧知识分子的两种道德观

"双头鹰情结"

首先，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或是否接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技术人员，而是指俄国词汇中与"天然反对派"类似的一个群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这样一个群体中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着与政权剥离或与政权合谋的现象，所以从已有的信息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双头鹰情结"所导致的，它们就像俄国国徽上的双头鹰，一个头面向东方，一个头面向西方，这种两面性既可以存在于不同的认知群体，也可能体现在一个人生命的不同阶段。有人认为，往往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体里会同时存在着"天然反抗性"和无法抗拒权力的"万有引力"的两种价值取向的较量。这也就是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所说的，怎样看待"猫和老鼠"博弈结果的分歧。在猫和老鼠的游戏中，老鼠是为了取代猫还是永远当老鼠，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看法；是把权力放掉还是留着自己用？对这个问题的答复也因人而异。美国学者刘易斯·科赛在《理念人》一书中也认为，在西方有两种知识分子的传统：一种完全沉浸在脱离世俗的道德中，另一种则



▲ 俄罗斯国徽



◀双头鹰

以关心尘世为己任，对待权力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对待道德的态度。

对双头鹰的其中的一个向度我们很熟悉，那就是面临唾手可得的权力取而代之，因为这本来就是所谓老鼠抗争的目的。尤其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由于科举入仕做官的价值体现使他们会更愿意导向后者，在传统文化熏陶的土壤里，本来就有"读得万卷书，服务帝王家"的抱负，即便是落第秀才迫不得已的"造反"，也具有很强的"道德功利"的色



▲ 罗伯斯比尔

彩。这种一开始就有改朝换代考虑的人，对权力的"干预性"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他们要寻求的并非终极真理而是"皇帝轮流坐"的世俗"成功"。也许他们最初也自信自己能够跳出"造反——当皇帝——被推翻"的怪圈，比如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都曾经为此有过各种防范措施，但是权力的没有灵魂性和腐蚀性在缺乏制度制约的情况下，几乎可以百发百中地突破个人预设的道德防线。当老鼠成为国家机器的主人或附庸时，很快就与他们所反对的"猫"并无二致，就像顾准所说，"罗伯斯比尔就是取胜，自己也会变成拿破仑"。农民领袖龙袍加身以后大搞"奉天承运"、"君权神授"、"山呼万岁"之类的个人崇拜比世袭皇帝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这中间也不乏"坚守个人道德底线"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与猫的斗争只是出于正义的选择，并没有想去当猫，在这些人头脑中，"争取自由不是为了权力的宝座，而是要承担起对自由的责任"。他们的确从思想上始终保持着对权力腐蚀的警惕，能够认识到保持老鼠与猫的张力，也就是保持与政治权力距离感的必要性。但是这种不谙权、术、势，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理想主义者，在猫和老鼠游戏尘埃落定之后会陆续被淘汰出局。[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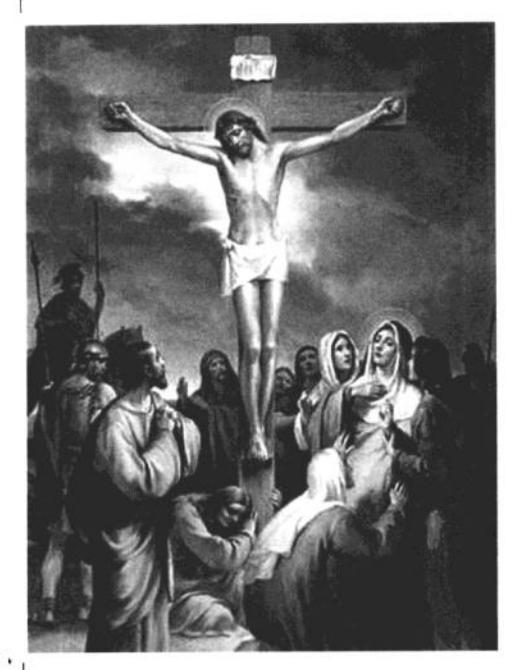
现有的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理论就是试图从制度设计上解决"猫和老鼠"游戏中的轮回关系。除此而外，还有另一些人从宗教、道德层面看待权力问题，这恰恰是我们以往关注比较少的"背负十字架的精神反对派"的价值。一般来讲，在欧洲有宗教救赎情结的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倾向于永

① Шейла Фицпатрик Сталинские крестьяне. «Мыши и кот»М.,2001,с.320.

远当老鼠，他们具有社会正义感和道德责任感，希望通过社会变革用法律途径解决旧制度的弊病，他们参与游戏的本意，是追求一种“反政治”的平衡，从未想过自己做皇帝，也不愿意卷入摧毁文明的暴力革命中。在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革命大潮面前，这些人就会急流勇退，思想立场发生转变，趋向保守主义，从解放现实的世界观转入拯救灵魂的“内在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文化精英取代政治精英不但是一种浪费，也是缺乏自我定位的头脑发热行为。在他们看来，世间的罪恶在于人性深处的欲望作祟，政权之恶的反人道性，根源在于无神论，这种非宗教的叛逆是“缺乏心灵之根”和“价值危机”的主要原因。他们倾向于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人性的阴暗面和无道德性，于是赋予远离政治一种内在的不可知论的哲学含义。在“道德至上论者”看来，那种只追求此岸世界的“低级选择”是逃脱不掉命运惩罚的，比战胜对手更大的挑战在于战胜自己，“权力这个东西注定要劫掠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疏远权力的”，能够不朽的既不是权力，也不是肉体，而是思想。即便是政治意识的成熟也不能防止权力的腐蚀性。无权的老鼠变成猫或者老鼠一致服从猫的话，知识分子就已经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而成为政客和官僚了。这时老鼠与猫就成为了同类，变成了进入官僚体系的权力意志体现者，他们就会镇压别的老鼠，接着就会出现新一轮的“猫和老鼠”的游戏，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等于原地不动，反不如索性建立自己的游戏规则。于是就产生了双头鹰的另一个头。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之为“宗教道德”论者。

“积极的不自由”

在俄罗斯和东欧具有上述两种诉求的知识分子群体都出现过。但是东欧和俄罗斯的“背负十字架的精神反对派”出现的背景略有不同，俄罗斯最典型的“宗教道德主义”者“路标派”的产生，是因为他们看到，“在革命风暴中，采



耶稣受难

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是永远无法获胜的”，于是提出思想与政治的分离，要建立一种在“消极自由”生活态度上的道德责任感，他们自身便投入到重建宗教、重建道德、重建精神的过程中 。[①]东欧则是另一种情况。

二战以后斯大林模式普及到苏军坦克所能到达的地方。在那里权力成为了真理的化身，整个社会都能感到，国家的“公权力”就像章鱼的触角一样，无孔不入地伸向人们的方方面面，把个人的生存空间压缩到极致，以至于连每个个人思想的“正确”与否都必须由权力来确定。这种制度除了对社会经济的垄断外，由于合法性失缺的紧张感，表现出比它所推翻的那个旧制度更加注重对思想的垄断和舆论的钳制。统治者们知道，多元和竞争的局面是最不利于这种靠暴力上台的政权的，只有强力是可以频繁使用的，所以革命后倚重强制手段是一个常规。斯大林就懂得“新秩序是建立在人的脖子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心坎上”的道理。众所周知，在这种靠恐怖维系的“臣民社会”里，新闻和书报检查制度不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集团的利益、为了维护“谎言王国”而存在的。在国家力量强大的工业化时代，民众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榨取的对象，他们必须要为“整体主义”的荒诞理论奉献自己的一切，但是比物质稀缺更令人窒息的是“真实”的稀缺，人们似乎生活在对未来的“预支”中。那些曾经当“老鼠”的时候许诺要给人民以“自由、民主、人性、宪政”的词语依旧保留，往日的奋斗目标也会挂在嘴边，政权所需要的牺牲者都会被冠以圣徒的

①参阅金雁：《百年“路标”》，见《读书》，2010年，第3、4期。

光环虚构化，而且把老鼠把打下的新天地说成是早年追求理想的实现，但是私下里老鼠和猫的位置却在悄悄地移位互换，老鼠得天下后会向猫的制度取经，抄袭猫的维持稳定的手段，就在不知不觉地"热月政变"当中，建立起与猫体制的连贯性，而老鼠革命时期的言行成为毫无生命的遥不可及的象征物，都已经变成毫无意义的"虚构"概念。这些符号仅仅是一种"勉强覆盖在一个血腥本质上的薄薄外壳"，[①]或者是变成可以装进任何"替代物"的载体，所以这个制度与其说是建立过程"不完善"的"残缺"，不如说压根就是"虚伪的"以及从旧制度"抄袭的"。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雷达里赫把这种现象称作"功能性虚构"，意思是指词语和真实之间脱离了关系。正如捷克学者米兰·塞梅切卡所诠释的："政府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一个我并不认同的现实，并声称我的现实是歪曲的、虚假的、错误的，唯独他们的才是客观的、是经由全部历史和政府机关决议所核准的"。[②]也就是说，他们的合法性是由于权力批准而凌驾于任何人之上，而我的合法性只能建立在服从的基础上。在此情况下雷达里赫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概念："积极的不自由"。主体和客体都以虚假的热情投入蒙蔽对方，个体和群体"所有的思想、愿望、感情在任何行为中都不发挥任何作用"，[③]国家假装"为人民服务"，人民假装拥护执政党的领导。在这种制度下很容易形成了人的两面性和"内心的隐秘意识"。民众作为弱势的一方，无法逃离政府，抗争屡遭失败。在超级强权的专政机器下，爬上国家金字塔顶端的老鼠，为了防止其他老鼠效法，把他们抛回老鼠的地位，

①（捷克）伊凡·克里玛等：《地下：东欧萨亚特随笔》，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215页。

②（捷克）伊凡·克里玛等：《地下：东欧萨亚特随笔》，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③（捷克）伊凡·克里玛等：《地下：东欧萨亚特随笔》，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69页。

会比原来的猫更加残暴地镇压老鼠，于是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人们后来知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就如奥维尔在《1984》中说的，“引进极权不是为了保卫革命，而进行革命是为了引进极权”。

现实社会的压迫感，追使人们转向非现实社会，把行为抗暴转化为追求内心的道德净化。“不属于权力世界”的人意识到，以阶级斗争理论来解释社会结构的不完善性并以暴力取而代之，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毁。现有的其他各种思想资源都不足以全面对抗由老鼠变成猫后的局面，即便是西方从启蒙运动以来自由主义思想，只是在争取到自由以后才有意义，而在争取的过程中，它面临一种脱离了原产地水土不服的“移植难题”。更有人认为，现在的“共产极权”甚至就是“启蒙运动惹的祸”，是启蒙运动把欧洲社会从基督教宗教与传统的土壤中拔了出来，并且以大众的名义开始了单一的重塑社会的现代化“国家主义”的试验。在这一“无所畏惧的叛逆性”思潮下，把人类的激情从宗教转移到政治中，不仅催生了暴政，而且在思想方法上的绝对主义、决定论、一元化都成为老鼠变种制度的指导思想。面对这种理论资源的困境，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对这个世界全新的解释系统。在各种药方都不灵验的情况下，东欧知识分子便把希望转移到宗教上，于是“没有希望的希望所在”就只剩下宗教了。当一个人感觉好的时候，他会把宗教赶到一边去，当个人无能为力的时候，宗教就复苏了，“宗教被作为知识分子抗拒道德空白的一种自卫工具” 也就应运而生。[1]于是就有一部分人转向神秘主义和宗教乌托邦。

①（捷克）伊凡·克里玛等：《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146页。


圣彼得大教堂

南斯拉夫的持不同政见者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在1971年写过一篇《宗教复兴》的短文，他把20世纪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时期与罗马帝国公元前后基督教诞生之时的社会背景相比较，认为二者颇有相似度，“苏联，正如罗马帝国一样，已经为整个星球的宗教复兴准备了土壤”。[①]具有类似想法的人认为，政府控制再严也只能约束社会的外表、摧残人的肉体，而无法毁灭人的灵魂和精神，而且他们本来就是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宗教来看待的，只不过认为它是一种“伪宗教”，或者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是一种“错误的宗教”，而抵抗“假宗教”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点燃照亮人类黑暗的“真宗教”。

①（捷克）伊凡·克里玛等：《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96页。

来自于神的道德

俄国知识分子很早就认为，制度是人建立的，是人就有恶有善，或者说善恶可以同时在一个人心中较量，那么人性中二元价值就需要人们去揭示和探索。从这个方面讲，古典时代和现代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在人心中寻找“善”的闪光点和心灵启迪，比战胜外在世界的“恶”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道德问题在这些人心中间显得格外重要的原因。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也曾革命过、抗争过、甚至在绞刑架下与死神擦肩而过，他侥幸生还后便远离现实政治，思考如何在人心中扬善抑恶。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人的灵魂不可摧毁，不是世界的存在决定人的思想，而是人的思想决定世界的存在，不被俘虏的思想是需要一种宗教情怀的。权力只能显示力量的优势，而无法劫掠来自耶稣的光芒，一个内心精神强大的人是能够直面权力和战胜恐惧的。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里，其主人公都有经历了灵魂激荡之后，在监狱里、流放地完成精神升华、变成一个自愿承担社会苦难如耶稣一样的人物，这些文学形象其实就是作者心理路程的真实写照。卡夫卡也是对尘世生活厌倦后，开始了守护灵魂的追求。

东欧的知识分子也是在政治斗争绝望以后，开始从内心深处把宗教作为生命的方向。在他们看来，就像罗马帝国的暴政为基督教发展准备了土壤一样，苏维埃帝国的“坦克政治”和“古拉格政治”也使宗教哲学得以重生。重获新生的基督教成为人们的希望所在。有些人甚至自称是“基督教



基督下葬 ▸

无神论者"，言下之意，不管是否是基督徒，都需要建立一套对现代世俗社会为批判对象的哲学体系。东欧的地下文学中就有一些类似《启示录》那样的东西。这些作品强调，既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不是外部世界决定个人的存在，而是人的内心决定人的命运。极权主义要求人们从内心放弃自由，而宗教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解放。一个人必须

听从内心的召唤，去走一条历史上没有人走过的道路，只要完成了上帝赋予个人在人间的使命，就是崇高的。往极端里说，可怕的生活经历会比平庸而舒适的状态能够提供更好的人生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越沉痛，意义才越深远，而且必须向“逃离罗马”一样，“逃离对历史中心的依赖”，对所有的一切都依赖于历史中心，人就开始沦丧了[①]。对一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意识到自己思想的不朽，精神世界是人们最后的一块阵地。

是站在权力纷争之外守护一种永恒的价值，还是应该为心中的理想挺身而出？在东欧俄罗斯从来都是有争议的，理想主义者和道德至上论者各自坚持自己观点。前者说，不能因为老鼠成了猫，就从此不参与游戏，知识分子认同的价值是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的，如果以“神圣道德”为借口逃离当代政治和现实社会，像虚无缥缈的上帝悬挂在芸芸众生的头顶，那不过是缺乏勇气的知识分子一种自我尊崇地“体面”逃离，是一种以“宿命论”为借口的消极遁世。任何人的血肉之躯都会化为腐朽，但只要生命不息就应该发出呼声，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人性中的闪光点只能在尘世中发光正义从来就不是上天的恩赐，世上的“善”是在呐喊和反抗中诞生的，不是几个人面壁冥思苦想就可以降落人间的。当老鼠最可贵的价值就是反抗，捣乱的老鼠是对猫的不断警示，面对强大的猫，在现实抗争没有完成之前，就提前分流出一部分“退出战斗者”进入虚幻的形而上领域，是不是太过奢侈了？

后者坦言，知识分子抗争失败后“遁世”而进入“纯

①（捷克）伊凡·克里玛等：《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92页。

精神"领域，并不是由于与对手较量力量对比悬殊因胆怯而离开战场的，很大程度上是对同类的失望，是对同类在"拜民主义"的假"崇高"下退去了"真和善"道德的失望，选择"逃避"的确有无奈的一面，再继续战斗下去已经毫无意义，而且作为"退出者"是不需要任何他人批准的。他们认为在一个众人都躁动狂热的时代，如果知识分子六根不净、对尘世间欲望太多，避免不了世间一次次演绎的"老鼠和猫"的互换游戏，因此不只是需要投入的勇气，可能更需要退出的勇气，他们就是要打破缺乏"退出机制"的革命崇拜，"退出"是为了冷静地反思，以避免社会在循环中不断地回到原来的起点。他们要为治愈思想道德的"贫血症"走上"基督之路"，从事"心灵"的拯救，进行文化寻根活动。而且从最现实的角度讲，从事形而上研究所需要的条件、知识结构、学科背景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具备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奢说"退出"的。从此这些人就站在时代潮流之外，沉浸在宗教哲学之中去寻找出路，以求开辟一条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当代"轴心话语"，而去寻求解决身体与灵魂、个人与社会冲突的新途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批很有思想的人物放弃了对现实的关怀，脱离了原来的活动场所另辟蹊径找一块"净土"，进入到一个新的创作领域中去的原因。逃离尘世使他们具有了一种"后现代"的先知形象和思想探索者的称号。总之，不同的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应该从事的事业有很大的认知差别，他们对于人生意义的最终落脚点也有了不同的解说。虽然我个人并不认同这种"道德至上者"的"现实缺位"的选择，他们阳春白雪般

地研究或许过于深奥，很少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但平心而论，这里面的好坏高下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简单地判定的。国际学术界对他们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

这种分歧决定了“道德至上论”者对后共产主义的渴望，不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那套模式，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宗教乌托邦。在他们看来西方的理性崇拜在科技方面是进步了，但是讲人性、净化伦理方面并没有太大的进步。于是他们否定工业社会、否定城市化进程、否定商业社会，不承认西方的理性和逻辑具有普世价值，认为理性导致了心灵的分裂，缺乏精神上的内在联系，他们宣称“城市的物欲空气产生不了思想”，消费社会只能导致物欲横流。可以看出，他们向往的是一种类似于“新的中世纪”的宗教浪漫主义。这种精神胜利法和来自于神启的道德和理念是支配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也是他们以道德作为政治的终点和起点的动机。别尔嘉耶夫对此作过详细的区分，他说，在人世间存在着两种自由：低级的自由和高级的自由，低级的自由是选择善恶的自由，高级的自由是与寓于上帝之中的自由。[①] 别尔嘉耶夫并非一概排斥社会变革，他的出发点是人的精神世界，他主张从内向外的改造世界。在这些宗教哲学家看来，人类最后的审判不是法庭而是道德，他们坚信，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摆脱恶魔的纠缠；他们坚信，正是由于这份比世俗世界更重的责任，人类才能担负起“道德守护者”的天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反对派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之间的对峙变得有些类似于中世纪欧洲教会与皇权之间的二元对抗了。

①参阅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莫斯科）1997年，第251-252页。

以索尔仁尼琴为例

索尔仁尼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们甚至东欧的“宗教道德论者”既有相同之处又不完全相同。不同在于索尔仁尼琴依旧是一个现实关怀者，他的宗教关怀是有明确的目标指向的，相同点是他也是一个从“俄罗斯宗教精神”汲取资源的思想反抗者，并希望把这些资源古为今用、而且他也是一个“后现代论者”。1973年他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就认为，苏联当前面临的危机“都是学习西方惹的祸”，包括列宁倡导的世界革命和斯大林推行的苏联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都是在步西方已经走向没落的“现代性”的老路。而以弘扬“普世价值观”为宗旨的萨哈罗夫则认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什么“西方反宗教的无神论的化身”，而恰恰是一种造神术，旧体制也不是根据意识形态，而是根据统治者的实用主义需要建立的，从启蒙时代的



苏联解体前的老百姓 ▶

世界主义与普遍人性出发，萨哈罗夫认为根本不应区分什么“西方的”与“俄国的”思想，而只有正确地与错误的、先进的与落后的区别。“索—萨争论”刚刚展开，索尔仁尼琴就离开了苏联。应当说在持不同政见文化主要承担社会批判功能的时代，他们两人的争论并未构成太大的冲突，在旧体制“破”的进程即将结束时刻，“索—萨争论”的焦点便凸现出来，虽然他们同为旧体制的“掘墓人”，但是各自不同的价值追求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将要“立”什么样的制度。

1991年超级大国苏联轰然倒塌。由于索尔仁尼琴的远离，导致“国粹反对派”的力量缺乏领军人物而处于弱势，在前体制下反对派力量的博弈决定了“后体制”的发展方向，剧变后俄国的后共产主义势力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一统天下，尤其是在剧变初期的“钟摆效应”下，向西倾斜的幅度很大，新俄罗斯的转轨战略基本上是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的。于是“国粹派”人士纷纷指责索尔仁尼琴，认为他一贯以“俄罗斯命运”的“忧虑者”自居，却在国家转变的关键时刻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俄罗斯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作为一种思潮的代表人物在关键时刻的“空场”，直接影响到了新俄罗斯政治体制和经济转轨的定位，该派的人士责备他错过了最佳的回国时机，错过了与自由主义博弈的最佳时机，错过了可以影响俄罗斯发展战略的最佳时机。因其国内剧变后发展模式不符合索尔仁尼琴的意愿，1994年索翁的“回归之旅”，与他20年前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的称号时大骂西方的拜金主义，大骂唯利是图的美国是“恶的帝国”一样，他仍然对剧变后的



苏联解体后的街头一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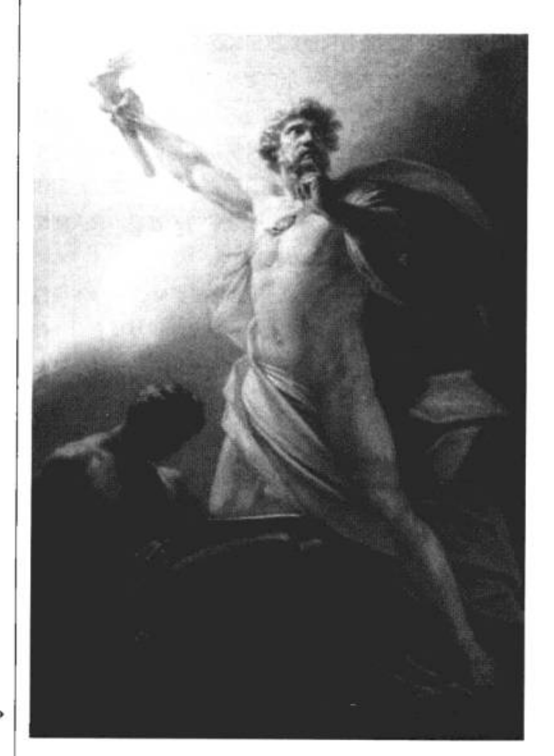
俄罗斯从头骂到尾，从叶利钦到权贵、从民主派到共产党都是他的开骂对象。

剧变后索尔仁尼琴以少有的政论文体发表了"俄罗斯时政三部曲"：《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和《倾塌的俄罗斯》，但遗憾的是他延续了自己一贯地"批判的武器"，论述中批评多而建设少，或者是根本无法操作的主张。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索翁在经济上完全是外行，面对首当其冲的经济转轨问题并无任何具体良方，对一切都看不顺眼的索尔仁尼琴，又一次成为了新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在他看来剧变后的俄罗斯只有"假民主"和"伪自由"，是继17世纪混乱年代和十月革命后的"第三个乱世"。而这一次与苏联时期不同的是，政治铁幕的大门打开以后，多元政治下各种声音很快就淹没了索翁那曾经"震撼"过人心的嘶哑嗓音。人们对他以居高临下的"道德优势"批判一切的态度逐渐不耐烦起来，索翁这三本

针砭现实批判性的论著销量都不足5000册，万众争看《古拉格群岛》的时代过去了，索尔仁尼琴的作用完成了。所以有人说他走得也不是时候，回来得也不是时候。更有评论家奚落道，索尔仁尼琴就应该像希腊神话中的神仙一样，老老实实地生活在奥林匹斯之巅，还到凡间来干什么？意指他归国后再一次扮演"先知"的角色而发表的言论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蠢话。他对时政批评影响越来越小。

捷克的哈维尔与索尔仁尼琴也有些类似，哈维尔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多次说过，"我从小就感觉到有一种高于我的存在，那是意义和最高道德权威所在"，这个意义就是自我拯救的"绝对地平线"。他在《无权者的权利》、《反政治的政治》等书中表述了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思想：他认为，旧体制与现代社会都是把深刻的东西浅显化，就像浮萍一样飘在表面。他当总统的几年间对捷克的变革实践也由于建议少批评多，因而被讥为"高高在上的道德教师"，而他自己则陷于"理想主义者的孤独之中"，所以捷克经济转轨时期，哈维尔声称自己与在共产党时代一样，仍是个"持不同政见者"。一直到2009年11月19日，伦敦经济学院举行"回顾苏东剧变20周年的研讨会"上，哈维尔仍在强调，得到的民主与想象中的民主有很大的差距。他认为自己在1989年之后所犯的错误，就是过分相信经济学家，而忽略了道德，他检讨说，我经常被描绘成一个道德主义者，而实践证明我恰好是无法彻底贯彻道德而丧失了自我。

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可以对这种思想类型的知识分子作一个总结：上述人物以宗教和后现代作为思想谱系，对彼岸的



普罗米修斯

追求高于此岸，重视超验精神胜过主体的客观。我个人倾向于把他们归类于"道德至上"论者或"宗教浪漫主义"，但是欧洲有些学者对这类学者的评价很高，把他们定义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一般来讲，这种"永恒的精神老鼠"，由于与权力始

终保持界限，个人操守都比较严谨，更兼具有的禁欲主义追求、注重道德的自我完善、既蔑视权力又鄙视金钱，实用主义的利益很难动摇他们的意志，他们追求真实、看重个人的道德形象，不会以出卖思想为自己换取实际利益，而且由于他们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情结，在批判极权国家的同时，也批判“市民社会”，批判全球化进程，对西方的那一套不感兴趣。剧变以后他们依然对市场经济转轨持批评态度，而且具有比一般人更敏锐的先知先觉，比如索尔仁尼琴在大骂叶利钦“休克疗法”的同时，还不断地警惕人们不要因剧变后的转轨艰难，而把斯大林时代的“灾难戏剧化地过滤成甜蜜的回忆”，可见其引领社会深层领域探索的象征意义并没有消失。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对来自于这种道德层面的批评，不可避免地有两种缺陷：第一，由于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人参考资源主要来自前近代，对待现实一直采取一种“永远说不”、“骂倒一切”、或者只有批判没有建设的态度。他既否定布尔什维克式的垄断，也反对剧变后的经济转轨方向，可以说，他看到了后共产主义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缺陷，但是提供的理想模式却是无法操作的。现在“东欧”有一些知识分子，很反感大规模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社会，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念旧体制”，而是因为政治转型的落幕便意味着“当老鼠”的作用完结，而社会变革从来是不知感恩的，卸磨杀驴是一种常态，看看那些早已被人们忘记的“剧变推手”，就知道他们所期待的政治变革并不眷顾自己的母体。他们说，最好的时刻是过程进行时，完结的滋味是

残酷的，因为“当你寻找真理的时候，最可怕的是你找到的时候”。而现在经济转轨下的多元政体和市场经济下消费娱乐文化淹没了过去严肃认真的话题，所有这些都让他们倍感失落。第二，类似于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物，曾经以普罗米修斯的苦难体验为人类充当“盗火者”的“道德光环”继续环绕着他们，回到尘世享受到的巨大荣誉，使他们很容易形成一种道德强势的居高临下的自傲，往往会忘记自己的知识局限，喜欢在并不内行的领域里到处发议论、摆导师的架子，随意指责他人，最后反而落得个十分尴尬的处境。

过去的“东欧”虽有“福利”，但并非“福利国家”，因为在专制体制下“福利”是皇恩浩荡，有了你得谢恩，没有你也不许抱怨。在民主制度下“福利国家”才成为一种“公仆”必须提供的服务，提供了民众无需感恩，不提供“公仆”就有被“解雇”的可能。在民众看来，提供公共交通、免费教育、医疗保障、社会养老是政府应尽的职责，所有的公共服务主张必须经过老百姓的同意，因为他们是国家税收的提供者，哪个党派的社会福利政策执行得好，哪个党派的支持率就高。

没错，柏林墙的确是“防御性”的，从来没有人指责这道墙具有军事进攻的功能。问题是它要“防御”谁？防御西边的“法西斯”？它的正式名称的确叫“反法西斯壁垒”。但奇怪的是，它防范的是东边想出去的人，柏林墙存在的28年历史记录，铁证如山地表明它从未对任何一个西边的人，无论他是否“法西斯”，进行过火力拦截——因为根本没人试图闯入。但是，它却以火力射杀了有名有姓的201名东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们并无任何过错，至于在火力拦截中被打残打伤、生擒活捉的东德人就不知多少了。显然，柏林墙就是一道拦截“自己人”外逃的天堑，一道为东德公民设下的天罗地网。

苏联类型国家的民族政策特点之一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它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仅仅是根据领导人的喜好，有时固然搞强制同化，有时却也搞人为的“异化”。只要你在政治上听话，别的什么唱歌跳舞、传统民俗、年节礼仪乃至语言文字之类的“民族特色”不仅可以保留，而且往往还很被提倡，乃至被提倡得过分。

上架建议：文化／政治



定价：48.00元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从“东欧”到“新欧洲”：２０年转轨再回首
作者＝金雁著
页数＝４３２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２０１１．０４
ＳＳ号＝１２７４２０９３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８０９２７５４
ｕｒｌ＝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２．ｄｕｘｉｕ．ｃｏｍ／ｂｏｏｋＤｅｔａｉｌ．ｊｓｐ？ｄｘＮｕｍｂｅｒ＝０００００８０９２７５４＆ｄ＝５０ＣＣＢ９００Ｂ８Ｂ６ＡＣ３８５５６２ＣＢ３Ｄ０８Ｅ０Ｄ７９Ｄ＆ｆｅｎｌｅｉ＝０６０２０５＆ｓｗ＝％Ｂ４％Ｄ３％Ｂ６％ＡＢ％Ｃ５％Ｂ７％Ｂ５％ＢＤ％Ｄ０％Ｃ２％Ｃ５％Ｂ７％Ｄ６％ＤＥ＋２０％Ｃ４％ＥＡ％Ｄ７％ＡＡ％Ｂ９％ＥＣ％Ｄ４％Ｄ９％ＢＢ％Ｄ８％ＣＡ％Ｄ７